

翁列日星夫回忆录
专辑



32251.20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

梅 戈 应晓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Брежнев 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Ленинским курсом» Т. 7.

«Новый мир» 1961, № 11.

本书根据苏联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79年版
«遵循列宁主义方针»文集第七卷和苏联莫斯科版«新世界»杂志1981年第十一期译出

2926.07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

专 辑

梅 戈 应晓松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456弄14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60 × 1176 1/32 印张 3.6 字数 187,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6,001—14,700册

书号：3188·34 定价：(六) 0.90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1978年，苏联《新世界》杂志分三期发表了勃列日涅夫的三篇回忆文章：“小地”、“复兴”和“荒地”，后又出了单行本，并收入勃列日涅夫的《遵循列宁主义方针》文集中。这三篇译文是根据上述文集翻译的。三年之后，该杂志在1981年第十一期上又发表了勃列日涅夫的两篇回忆文章：“按工厂的汽笛生活”和“祖国之情”，这两篇译文是根据上述杂志翻译的。

《勃列日涅夫回忆录》分五个部分。“小地”主要叙述勃列日涅夫在卫国战争中任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时参加的一次战役——诺沃罗西斯克会战。“复兴”主要叙述勃列日涅夫在1946年至1950年间担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时，参加战后经济恢复工作的情况。“荒地”主要叙述勃列日涅夫在1954年被派往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垦荒工作，直到1956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苏共中央书记这段时期的工作情况。“按工厂的汽笛生活”主要叙述勃列日涅夫的家史，以及他在十五岁进厂工作之前所受的世代工人家庭的熏陶。“祖国之情”主要叙述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后踏进社会直到卫国战争爆发这段时期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上过

学、做过工、务过农、当过兵，经历过频繁的工作调动的情况。

《回忆录》发表后，苏联当局就开动宣传机器进行吹捧，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甚至还因这本回忆录授予勃列日涅夫以列宁文学奖金，苏联作家协会并随之发展他为该会名誉会员。

本书第一部分“小地”由马文奇同志翻译，第二部分“复兴”由周邦新同志翻译，第三部分“荒地”由朱翠英同志翻译，第四部分“按工厂的汽笛生活”由晓松同志翻译，第五部分“祖国之情”由羊婴同志翻译。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承蒙郑译生、卢龙、谢纪青、方子汉和张开同志的热情帮助和细心校订，特此表示感谢。

1982年6月

目 录

小地.....	1
复兴.....	62
荒地.....	138
按工厂的汽笛生活.....	249
祖国之情.....	272

小 地

(一)

战时我没有写过日记，但那一千四百一十八个战火纷飞的日日夜夜，我并没有忘怀。一桩桩事件，一次次会晤，一个个战役，那一时一刻，在每个前方战士的记忆中，同样在我的记忆中，都永远不会磨灭。

现在，我想讲一讲一块相当小的战场，陆、海军士兵们都称它为“小地”。它的确“小”，还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然而它又很大，因为奋不顾身的英雄们洒上鲜血的土地，哪怕是一寸，也是大的。为了让读者对战局有个估计，我要告诉大家：在登陆的日子里，凡是渡过海湾登上小地的人，都获得了勋章。我记得，无论哪一次渡海，我们总要有几百人被法西斯匪徒打死、落水淹死。然而，总还有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名苏联军人立足在从敌人手中夺回的登陆场。

1943年4月17日，我照例又要前往小地。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想，小地上的任何一个人也都不会忘记：那天希特勒匪徒要发起“海神”战役。战役名称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计划——要把我们抛入大海。我们从侦察资料中获悉了这一消息，知道他们正在准备一场进攻，

这可不是平常的进攻，而是一场决定性的总攻。

我的岗位就是在那里，在前沿阵地上，在诺沃罗西斯克城郊外伸入采麦斯卡亚海湾的一块岬地上，在小地的狭长登陆场上。

4月间，恰好我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从即将到来的战斗来考虑，该集团军已整编成登陆部队，又增配了两个步兵军、两个师、几个团、一个坦克旅，并将黑海舰队的诺沃罗西斯克海军基地在作战上也拨归它统一指挥。

战争时期，谁也不能选择作战地点，但是应该承认，这次任命使我感到高兴。第十八集团军，总是哪个地区困难，就调到哪里去，必须给予它特别关注，所以，正如常言所说的，我日夜待在那里，寸步不离。我同司令员瓦·日·列谢利泽和军事委员С·Е·科洛宁早就有了共同语言。因此，从方面军政治部调到这个集团军，只不过是使实际所处地位合法化罢了。

强渡我们只能在夜间进行。当我来到格连吉克市码头（又名奥斯沃多夫码头）的时候：码头附近水域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停满了各种船只，船上载满了人和物资。我登上了“里查”号围网船。这是一条旧船，总是散发着一股鱼腥味，船梯踏上去，吱吱作响，船舷和舷边梁已破烂不堪，甲板被弹片和子弹穿了许多窟窿。这条船，战前想必已经效劳多年了，可是直到如今，它还不得安闲。

海上刮来阵阵凉风，吹得人冷嗖嗖的。在南方一般比在北方更怕冷。为什么呢？——我就不必解释了，反正如此而已。渔轮上，转眼间就安顿妥当。战士们把机枪

和反坦克武器架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高度上。每人都给自己找了个比较舒适的角落，哪怕是有一块薄薄的木头挡板，能挡挡海风也好。不一会儿，部队引航员登上渔轮，于是一切都动起来了。

各种船只乱哄哄地蜂拥驶出，看来有点奇怪，但这只是开始几分钟。实际上，每条船都准确知道自己的方位。“里查”号走在最前面，跟在后面噗噗喷气的是两艘我们称之为七号和九号的小汽艇，渔轮拖着它们前进，其他船只鱼贯而行，彼此间相距四百至五百米，我们一直向小地驶去，有几艘“海上猎手”为我们护航。

我打算利用三小时的航程同新补充的战士谈谈心，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情绪。这里无法召开全体座谈会。登陆部队的战士们已在甲板上各自找好了位置，我不想把他们再叫起来，决定自己上各组去走走，向他们提些问题，主要是彼此交谈几句，或者坐到他们身边聊聊天。我了解到，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士气是高昂的。我很清楚，同战士们谈谈心是需要的，但我也知道：对于士兵来说，看到政工人员、政治领导同志同他们并肩前进，同他们共患难，有时比谈话更为重要，而且特别是战局越紧张，这一点就越重要。

在遥远的前方，在诺沃罗西斯克上空，火光闪闪，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这已经习以为常了。在我们左方的远处，正在进行一场海战，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我们的鱼雷艇同德国人的鱼雷艇遭遇了。我同引航员并肩站在驾驶台右侧的露天翼板上，引航员的名字好象叫索科洛夫。

他说：“登陆，战士们只冲一次锋，而艇员们每夜都在

冲锋，每夜都是战斗，大家已经习惯了。我们领航员感到对全体人员负有特殊责任。实际上，正如俗语所说，经常要摸索着领航。在陆地上，工兵们只要探明布雷区，打开通道，就可以有把握地带领人们前进；可在我们的航道上，德国人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用飞机和舰只布雷，昨天安全通行的地方，今天就可能碰上鱼雷。”

越接近采麦斯卡亚海湾，枪炮声就越激烈。敌人在夜间不大轰炸登陆场，而在这里，他们的轰炸机却一批接一批地从海上飞来，隆隆的爆炸声盖住了飞机的马达声，所以飞机似乎是无声无息地突然到来的。它们一架架俯冲下来，又马上掉头飞走。我们的人振作起精神，战士们的表情更加严峻，不大工夫，我们自己也进入了亮光之中。

一般说来，在强渡时黑夜是个相对的概念。德国人的探照灯从岸上射过来，头顶上空几乎不停地挂上一个又一个“灯笼”——从飞机上扔下的照明弹。右边又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窜出两艘德国鱼雷艇，我们的“海上猎手”立刻用猛烈的炮火迎接它们。此外，法西斯的飞机还不停地轰炸通往海岸的航路。

炸弹时而在远处，时而在我们的附近落下来，掀起一股股巨大的水柱。在探照灯和一道道五彩缤纷的曳光弹的照映下，溅起的海水闪烁着彩虹般的颜色。我们时刻都在等待敌人的攻击，然而，这次攻击却来得如此突然，我简直没有立即弄清出了什么事。前面轰隆一声巨响，一股火光冲天而起，我觉得船身被炸开了。实际上正是这样：我们的渔轮碰上了鱼雷。我同领航员正并排站着，两个人一起被气浪抛了起来。

我没有感到痛，也没有想到死，确实如此。死亡的一切景象对于我来讲并不陌生，虽然一个正常人对这种景象不可能安之若素，但是战争迫使人们经常考虑到自己也有这种可能性。人们有时写道，人在这种时刻，会想起自己的亲人，会在他的脑海里一幕幕地浮现出他的一生，开始明白自己一生中的一个主要问题。这是可能的，也是常有的，但在这一霎那间，我的脑海里只闪过一个念头：千万别再落到甲板上。

值得庆幸的，我落在水里，而且离渔轮相当远。我冒出水面，看见船已在下沉。一部分人同我一样，被爆炸的气浪抛了出来，另一部分人自己跳下水。我从小深谙水性，毕竟是在第聂伯河河畔长大的啊！因此在水里能动作自如。我喘了口气，四周环顾一下，瞧见两艘小艇离开拖船，使用螺旋推进器缓慢地向我们驶来。

我游近九号艇。引航员索科洛夫也游到它跟前。我们用一只手抓起护舷木，用另一只手帮助那些肩上扛着弹药箱、吃力地在水中划行的人往甲板上爬。艇上的人伸手把他们一个个拉了上去。据我所见，没有一个人把武器扔在水里。

探照灯已经发现我们，死死地盯住不放。在梅斯哈科西边的宽谷，大炮已经开始射击。炮打得并不准，由于炮弹爆炸，小艇震得左右摇晃。隆隆炮声并没有停息，而周围的炮弹爆炸声却蓦然消失了。大概是我们的大炮击中了敌人的炮兵阵地。在一片喧嚣声中，我听到有个人恶狠狠地叫喊：

“你怎么啦，聋了？把手伸过来！”

后来才知道，这是海军下士齐莫达伸着手在冲我叫喊。他没有看见我没在水里的肩章。在这种时刻，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大家知道，小汽艇吃水浅，现在，只剩一点点浮在水面上。我抓住护舷水，向上猛地一窜，一双有力的大手把我从下面托起。

只是这时我才觉得冷得瑟瑟发抖：4月天，即使在黑海也不是最适宜游泳的季节。渔轮已经不见了。战士们一边拧着衣服，一边小声地咒骂着：“妈的，德国佬真该死！”大家慢慢地静下来，在一只只箱子和一捆捆东西后面，找个地方俯下身或趴下来，似乎这样就保险了。其实，主要的任务还在前面呢！主要的任务是我们马上就要投入战斗。

在这困窘的场合，在爆炸和曳光弹的闪光中，突然响起了歌声。我记得，这歌声是一个大个子水兵唱出来的。这是一首诞生于小地的歌曲。歌词颂扬了战士们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力量，就是现在小艇上的这样一些战士的意志和力量。我知道这首歌，但是，现在我觉得，那时我象是第一次听到它似的。有一句歌词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钢铁英雄汉，划着小木船，坚决冲向前。”

大伙儿慢慢地抬起头来，趴着的坐了起来，坐着的站了起来，已经有人跟着他唱起来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一时刻，歌声振作起人们的精神。虽然有刚才这场遭遇，但大家更加充满信心，又进入了战斗状态。

不大会儿，船底擦到海滩，我们纷纷跳上岸。急促的命令声此起彼伏，一些战士从船里搬出弹药箱，另一些战士扛上肩就跑，运往掩蔽工事，这时分，根本用不着催促，

炮火不容人迟缓。他们放下一箱，又赶紧往回跑，这一切都是在枪弹扫射下，在不停的爆炸声中进行的。岸上的伤员已经抬下来了，准备后送，我们这支增援部队就是去接替他们的。

沿岸地势微斜，卵石遍地，再往前是隆起的陡坡，坡上布满坑洼。要跃进到坑洞那儿，躲一躲炮火，然后再往上爬十五米左右，跳进通往小地纵深的战壕。我再说一遍，虽然主要的任务还在后头，可是这时大家倒觉得很镇静。从这儿沿着交通壕，可以接近登陆场上的任何一支正在作战的部队，甚至可以靠拢任何一支分队。

强渡总是危险的，海里航行也免不了要冒险。卸弹药、跃进、爬陡坡也是危险重重。但我每次来到小地时都想到：当初，在现在这些救命的掩体里，架着德国人的机枪，在这些交通壕里，跑着登陆士兵看不见的、挎着自动枪和手榴弹的希特勒匪徒，在这防卫森严的地带，我们的人又是怎样登陆的呢？一想到头一批人的困难要比现在大得多，每个人想必都增添了力量。

大家知道，我们遵照苏军指挥部的计划，终究在小地固守了整整二百二十五天。现在我想讲的就是，这些日子我们是怎样度过的。

(二)

我们不需要战争。然而一旦战争爆发，伟大的苏联人民就英勇地同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

我记得，1940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会召开

过一次宣讲员会议。我当时特别注意战时爱国主义的宣传，这里我们谈的正是这个问题。大家知道，那时我们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报上刊登出莫洛托夫同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同斯大林会见的照片，这项条约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喘息时间，提供了加强国防能力的机会，但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有一幕情景，仿佛直到现在仍历历在目：有个与会者，名叫萨赫诺，是个挺不错的宣讲员，他站起来问道：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应该做解释工作，说明互不侵犯是真的，谁不相信，谁就是散布挑拨性言论。可是，人民并不太相信啊。我们怎么办呢？还要不要解释？”

时间相当紧迫，大厅里坐着四百人，都在等着我回答，我不能作长时间的斟酌。

我说：“一定要解释。同志们，我们要一直解释到法西斯德国彻底垮台为止！”

当时我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会负责国防工业的书记。如果说，那时有的人还可以让自己松弛一下，可是我却要每天考虑我们所面临的工作。在安排和协调当时乌克兰南部，也包括第聂伯河沿岸地区这个强大的国防综合体的生产方面，有不少重要而紧急的事情需要我去处理。

那些生产纯民用产品的工厂，要转入军事轨道，我们的冶金工人已在试制特种型号的钢材，我必须经常同几个人民委员部联系工作，乘飞机上莫斯科，没完没了地在州里到处跑。那时我们不知道假日，我只是偶尔抽点时间回趟家，记得1941年6月21日夜，我在州委会呆到

很晚，随后又乘车前往我们正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郊区修建的军用机场。这个重要的战略工程项目，由中央控制，日夜施工，直到天快亮时，我才从建筑工地返回。

汽车开到大楼前，我看见大门旁停着康·斯·格鲁谢沃伊的车子，他当时代理州委第一书记。我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房间的窗户闪着灯光，在晨曦的辉映下，显得异样。他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做手势叫我在上楼。我沿楼梯往上跑的时候，就已预感到事情不妙，可是一听到“战争！”，心头还是不禁一颤。就在这个时刻，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坚定不移地决定要到我该去的地方。我请求中央派我上前线，我的请求当天就批准了；我被派往南方方面军司令部听候调遣。

我感谢党中央赞同我在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作战部队的要求。我感谢党中央在1943年，在我国部分领土已获解放的时候，又考虑了我的请求——没有把我从前方党的干部中调出来派到后方去担任领导工作。我还感谢党中央在1944年又满足了我的请求：没有调我去担任更高的职务，没有使我脱离直接的战斗，而是让我在第十八登陆集团军内一直待到战争结束。我只有一个信念：捍卫我们的国土，到处打击敌人，坚持到底，直到彻底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在我们的国土上恢复和平。

我的前线生活同第十八集团军休戚相关，第十八集团军永远是我的老家。我跟随第十八集团军，在决定祖国命运的时刻，转战在高加索的山山谷谷，拼杀在乌克兰平原沃野，翻越喀尔巴阡山的险峰峻岭，参加解放波兰、

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我跟这个集团军一起还在小地坚守过，小地对诺沃罗西斯克和整个塔曼半岛的解放，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在一年内的所见、所闻、所感，往往在不同时期会超过一生中的数量。在这个登陆场上，事件层出不穷，战斗无止无休，残酷异常，似乎不是进行了二百二十五天，而是无穷尽的漫长岁月，但这一切我们都支撑下来了。

从地理上讲，小地并不存在。要弄懂下面讲的事，就得对这一小块傍水多石的陆地有个清晰的概念。它的正面长度为六公里，纵深不过四公里半，这一块土地，我们无论如何是要坚守的。

登陆场是如何出现的呢？诺沃罗西斯克座落在采麦斯卡亚海湾两岸，海湾深深地插入山地。那儿有“无产者”和“十月”两座水泥厂。一边是我们，另一边是德国人。1943年初，左岸完全落入敌人手中，他们居高临下，监视我们舰队的行动。必须剥夺敌人的这种优势。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不妨派出一支登陆部队抢占诺沃罗西斯克郊区。这样不仅可以更可靠地掩护海湾，使敌人难以潜入，而且还能减轻我们今后战斗的困难。

希特勒匪徒很清楚这一点。我尽可能不滥用数字，不过有个数字我现在要引用一下。我们攻占登陆场后，法西斯分子不停地向登陆场开火，倾泻了大量的炮弹和炸弹，更不必说自动枪和机枪火力了。据估计，小地的每一名守卫者，平均可摊到一千二百五十公斤这种致命的金属。

第十八登陆集团军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人在登陆场作

过战，我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小地度过的。因而上面说的这些致命的金属，我多少也分摊到一些。

我想，小地的登陆战和扼守战，堪称军事艺术的典范。我们仔细挑选人员，对他们进行特殊训练。在格连吉克的岬角上训练突击组，教他们携着机枪跳水、攀登悬崖，从不利的位罝投掷手榴弹。战士们学会使用各种缴获的武器，学会掷刀子和用枪托搏斗，包扎伤口和止血。战士们牢记各种规定的信号，蒙上双眼熟练地装上自动枪的弹盘，能根据射击声判断火力来自何方。没有这种训练，要进行果敢的登陆，尤其是最初的那次夜战，是不可设想的，因为一切都得在黑暗中摸索着去做。

第一组叫特务队，只吸收志愿人员参加，挑的都是些骁勇的人。И·Л·库尼科夫少校被任命为登陆指挥官。这个聪明坚强的汉子，我在前几次战斗中就已经注意到了。他当时指挥一个海军陆战营。政治副营长是И·В·斯塔尔希诺夫上尉，营参谋长是Ф·Е·科塔诺夫少校，他们两个在历次战斗中也都表现很好。这三个人后来都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对库尼科夫来说这称号是死后追赠的（他于1943年2月12日受了重伤），斯塔尔希诺夫和科塔诺夫是在登上小地后的战斗中获得。

在建队过程中，他们受权从诺沃罗西斯克海军基地的任何部队挑选人员。这种权力当然非同寻常，但却是势在必授的。我们懂得，在这种登陆战中，每个战士的作用，简直可以说太大了。就这样一共编了五个突击组，组成一个有二百五十人的分队。在极其严重的关头，他们要站在最前列，他们全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1974年，我在诺沃罗西斯克博物馆看到一份引人注目的文件，这是B·A·鲍蒂廖夫上尉写的一份报告，他同库尼科夫一样也是在那天夜里在登陆场登陆的。他写道：“我报告，第一突击组死一人，伤七人。其中联共(布)预备党员死一人，伤四人；共青团员伤二人，非党员伤一人。司令部规定的第一项战斗任务业已完成。突击组士气高昂。”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各个战场上，一共有三百万共产党员英勇地牺牲了。有五百万苏联爱国者在战争年代参加了党的队伍。“我要象共产党员那样去战斗！”这种豪言壮语，我几乎在每次战斗之前都能听到，而且战斗越艰苦，听得就越多。一个人在殊死搏斗的前夕，能得到什么优待呢？党能够给予他什么权利呢？只有一种优待，只有一种权利，只有一种义务，那就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第一个冲锋陷阵。

登陆前，分队宣了誓。共产党员库尼科夫召集大家在一个不大的广场上排好队，再一次提醒说，这次战斗将是一次殊死的搏斗，并且警告说：谁要觉得经不住考验，可以不参加登陆。他并没有发口令，要这些人向前三步走。为了照顾他们的自尊心，他只说：

“我要你们过十分钟再来站队。谁要对自己缺乏信心，谁就不要再来站队。他们可以返回自己的部队，就算是受了一次集训。”

当分队重新集合完毕，我们数了一下，只少了两个人。

如今，事隔几十年，再看到那次出海前的庄严誓词，

仍不能不令人激情满怀。誓词说：“在战斗前我们向祖国宣誓：我们要猛打猛冲，为了战胜敌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我国人民的幸福，为了你，亲爱的祖国，我们要献出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一滴滴鲜血……我们的守则不论是现在和将来都只能是前进。”

当我默默地回顾那突击的日日夜夜，回忆起那庄严的誓词的时候，我总感到由衷的激动和自豪。历史上有过不少个人创建的英雄业绩，然而只有在我们伟大的国家，只有我们伟大的党所领导的苏联人民才能证明，他们能够发扬集体的英雄主义。

(三)

登陆之夜终于到来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码头上的气氛，我没有看到有什么人愁眉苦脸，一张张面孔都是欢快的，流露出急不可待的神情。水兵们在搬运箱子，一边跑，一边喊：“波伦德拉！”我记得当时询问过一个水兵：“‘波伦德拉’是什么意思？”

原来是“闪开”的意思。这样我才晓得了这个词的含义。

1943年2月3日后半夜，天空一片漆黑。载有登陆兵部队的快艇静悄悄地驶出格连吉克，向采麦斯卡亚海湾开去。到达海湾，信号弹腾空而起，部队立即从展开点奔赴海岸。就在这时，我们的大炮也吼叫起来，向作过试射的沿岸地带猛轰。“卡秋莎”喷出一排排火光，发出隆隆的爆炸声（这是在战争实践中第一次在扫雷舰“鲑鱼

号”上安装火箭炮)。两艘鱼雷快艇快速地在登陆舰前方驶过，留下一片烟幕，掩护登陆舰只，免遭岸上炮火的袭击。一艘护卫舰向鱼品加工厂地区开炮，压住炮火袭击后残留的几个敌人的火力点。当库尼科夫的人向岸边冲去的时候，我们的炮兵连便开始向纵深炮击。

在战争中并不是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的。战斗的进展往往不完全象参谋部地图上所标绘的那样，甚至有时完全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指挥员和政工人员，每个陆、海军士兵的勇敢、忠诚和主动精神就极其宝贵了。军事史学家知道，本来打算在距这里三十公里的另一个地方，即在南湖地区夺取登陆场。其实，主攻的登陆点原定也是在那里的，可是风暴阻碍了船只出海，陆军部队抵达出发地点的时间也迟了些。库尼科夫突击队的袭击，是出乎敌人意料的，他们一突击成功，我们也就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战机。

佯攻登陆变成助攻，接着又变成了主攻。小地的长篇史诗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我们的突击队，穿过敌人的火力网，成功地占领了斯塔尼奇卡这个诺沃罗西斯克郊区的一个尽管很小，但却是很重要的海岸地段。消灭了大约上千名法西斯匪徒，缴获了四门大炮，并立即掉转炮口向敌人开火。一个半小时后，这里又有第二批士兵登陆，紧跟着又上来了一批，人数已增加到八百人。

敌人向登陆地点又调来新的部队，法西斯空军不停地狂轰乱炸，重炮也开始向登陆场猛烈开火，孤注一掷的反冲锋一次接着一次。可是已经晚了：登陆部队牢靠地站住了脚跟。他们控制了斯塔尼奇卡的几条街道和长达

三公里的一段铁路。虽然伤亡不小，但没有后退一步。陆、海军士兵们忠于自己的誓言，因为他们知道，必须坚持到主力上来。他们因登陆成功而感到欢欣鼓舞，他们那股狂热激情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

几夜的工夫，在登陆场登陆的已有两个海军陆战旅，一个步兵旅，一个反坦克歼击团和其他一些部队。成百吨的弹药和粮食卸到了岸上。五天之后，斯塔尼奇卡和梅斯哈科地区已集结了一万七千名装备着自动步枪、迫击炮、火炮和反坦克炮的士兵。接着“为祖国而战”、“雷电”、“东北”、“新人”和“小鹰”这五支游击队也在小地登陆了。

借此机会，我想为游击队说几句话。假如有人认为，游击队不过是敌后活动的几支孤立的队伍，那就错了。许多支游击队虽是自发产生的，但他们均有党所领导的核心指挥部，有时他们进行的一些重大战役，完全符合正规军司令部的意图。在小地也是如此。领导这五支游击队的是诺沃罗斯斯克市委书记 П·И·瓦谢夫，他同我们司令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总的来说，我还要重复一遍，小地的登陆战，堪称军事艺术的典范。首先派出的突击队的登陆成功，高效率的兵力扩充，各团、各军在设防坚固、地雷密布的海岸上的推进——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步兵、工兵、水兵和炮兵准确无误的协同。“战争之神”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因为在许多地方，我们的部队同敌军交战时，几乎只有手榴弹所及的距离。飞行员的活动就更为复杂了。我记得，在我们的飞机出击前，战士们都把内衣铺在战壕胸墙

上，以便勾划出自己的前沿。

应当说，我们所处的地势极为不利。我们占据的是沿岸一条狭长地带，光秃秃，平坦坦；而德国人占据的全是高地和森林。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敌人向我们倾泻了几百吨的致命钢铁，既然敌人的兵力数倍于我军，既然敌人从周围山头看小地了如指掌，那末我们的人又是怎么活下来的呢？我们对付这一切，全靠经验、冷静、运筹和每日的劳动。

当时我清楚地懂得，战争，其他姑且不说，也还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劳动。这是昔日的冶金工人、钳工、矿工、农民、联合收割机手、饲养员、建筑工人、木工的劳动。这是穿上军衣的老百姓的劳动，不仅是忠诚和勇敢的反映，而且也是巨大耐力、顽强精神、本领和技能的表现。

实质上，整个小地变成了一座地下要塞。二百三十个隐蔽得严严实实的了望所是小地的眼睛，五百个火力掩体是它的铁拳。我们挖了数十公里长的交通壕、数千个火力点、战壕和避弹壕。情况所迫，不得不在多石的土地上掘出许多水平坑道，修建了地下弹药库、地下医院、地下电站；情况所迫，不得不往来于堑壕之中，在堑壕中很不好受，你一探头，那就完蛋。大家长久坐着不动。到法西斯匪徒撤走的时候，好些战士得了我们所称的“坐病”。

工程部队显示了惊人的发明创造力。爆炸后的弹坑，有的简直可以叫做基坑。工兵们用战壕把它们连接起来，建成掩蔽部。在小地的狭长地带，建立了三道防线，每道相隔一公里。沿每道防线，设置了布雷区，接通了可靠

的地下通讯线路。登陆指挥部设在岩崖的六米半深处，由此可以把部队隐蔽地沿着交通壕调往情况危急的地方。

在斯塔尼奇卡地区，敌我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中间地带，敌人离我们的阵地只有十五——二十米。然而我到那儿一看，发现这段前沿——经常充满惊慌和危险的地方——布满了地雷，四周架设了障碍物。工兵们在作业过程中，不得不经常同敌人打白刃战。

这块坚固设防的登陆场成了一座独特的城堡，其中竟出现了几条街道——医院街、工兵街、步兵街、水兵街。街上没有一幢房屋，这些名称不知是谁想出来的，但这些街名决不是偶然出现的。比如工兵街，是一条防御炮火的深沟，医院街则是块崎岖不平、弹雨横飞的地区，伤员时常从这里被送进医院。工事是在炮火下修建的，既无建筑机械，也无建筑材料，可是我们的能工巧匠们，有一套挖坑打洞的本领，使战壕坚固可靠。他们在这儿安了家，象过日子一样料理得井井有条，似乎不想离开了。参加这个要塞建筑的每一个人，都可称得上英雄。

我怀着特别亲切的感情，回忆起一些年龄较大的工兵。这些人没有被派到敌人的眼皮底下去布雷。看来，这些“老头儿”干的似乎是最平安的工作：在离格连吉克几公里的江霍特附近砍树，把树扎成木筏，于夜间运抵小地。然而他们是怎样运送的啊！上面已经说过，在采麦斯卡亚海湾，我们从未见到过漆黑的夜晚，大炮经常轰击没有武装的木筏。工兵们既不能回击，也无法使这种笨重的木筏灵活地迂回绕行。他们跳到冰冷的水中，抓着

圆木，继续行进。如果有的木筏落上炮弹，他们就洒着水，把木筏捆好，只求不损失宝贵的木材。如果拖船被打沉，他们就发射约定的信号弹，等待另一只汽艇到来。这些“老头儿”就是这样一些人。

读者可能造成这样的印象：几千人在登陆场上过的日子，似乎就只是进攻、投弹、肉搏。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儿过着一种平常人过的生活，应有尽有：阅读报刊，出版报纸，举行党的会议，过节日，听讲课。有时甚至还举行象棋比赛。陆海军歌舞团在这里演出歌舞，那些塑造了许多保卫战英雄形象的美术家B·普罗洛科夫、B·齐加利、И·基尔皮切夫也在这里进行创作。

记得党中央派来了一个工作组。他们都是初次来到我们这里，要我领他们去看看小地的战士。那一次是乘鱼雷艇去的。鱼雷艇一开动，我们的人就发出信号弹，这是约定的暗号，说明是自己人还是敌人。当我们驶近那里时，德国人就不停地向我们开排炮。他们的大炮是曲射的，因此，必须紧贴着海岸，靠边通过。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排炮弹又爆炸了。如果不知道他们是在对着你瞄准，那就有你好看的了。登陆场上有巨钟般的远射程海岸炮炮台。小地人把炮台变成了指挥所。我们不得不冒着炮火钻到那里去，我倒是习惯了，可是，我想，客人们的印象一定太强烈了。我记得有个水兵，突然从黑暗中冒了出来，他背着一大包东西。

“帮个忙，老兄。”他请求道：“这是给大伙带来的。”

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世纪，每当回忆起当时落在我军战士、指挥员、政工人员肩上的重担，有时简

直不相信竟会有这样的事，他们竟然能够支撑得住。而且也支撑下来了。大伙儿都支撑下来了，度过了重重难关，取得了胜利，击溃了法西斯匪徒。

在我把从莫斯科来到我们这儿的陌生客人带到小地上的那天，我一看到这些习以为常的熟悉的景况，自己的眼光好象也不同了。这一切情景，我以前都见到过。可是这会儿见到的，却是随时致命的危险、不堪忍受的困难、我军战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当然，情况有时非常严重。我们与大地的联系被切断了，我们缺少盐，也断过粮。我们派出成队成队的战士到树林里去采集野蒜。再有，这些地下长形掩蔽部非常潮湿，夜间战士们冻得不行，政工人员不得不关心取暖问题，定制一批小铁炉，到处收集木柴。然而小地毕竟是苏维埃的土地，人究竟是人。他们想出各种主意，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甚至还庆贺生日。例如：2月15日，即第一次登陆后的第十一天，一个登陆战士，叫沙尔瓦·塔塔拉什维利，正巧年满二十三岁。他的形影不离的朋友彼得·维列沙金，从自己的子弹盘中掏出二十三发子弹赠给了他。这是最珍贵的礼物，因为子弹不够用，可是又要等待着敌人的轮番进攻。

在这种同死神为邻的生活中，有许多事情，乍看起来，是与战争格格不入的。有一次，海军陆战队第二五五旅政治部主任И·多罗菲耶夫发现旅内有十五名市、区和村苏维埃代表，于是决定召开一次会议。代表们要解决哪些问题呢？就是和平日子里的一些问题：居民的需要、日常生活设施。他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建造澡

堂。还居然建成了！这个挺不错的澡堂可以说完全是在业余时间里盖起来的。有一次，他们领我到那里去了一趟。澡堂虽不大，可是蒸汽倒很足呢！

在小地上，机智、有点子、会找窍门是很受重视的，而这种人材还真不少。我记得，有个挺机灵的小伙子，因某项工作被派往格连吉克去，他在山里发现了一头没主的母牛乱跑。于是他决定把牛牵到小地。他把牛赶到码头，要求艇长让牛上艇。周围的人都笑了，可是他的想法得到了支持，因为伤员这下可有牛奶喝了。牛被安全地带到了小地，安置在一个可靠的掩体里，每天给一所座落在原国营酿酒场地下室里的医院供应牛奶。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牛奶。这头母牛给人们，特别是从农村来到战场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每次炮击和轰炸之后，战士们总要跑来问问，这头黄牛是否安然无恙，是否受伤，并且亲昵地抚摸它一番。所有这些，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但是，这头不折不扣的和平动物，在极度紧张的环境中出现，帮助人们保持了精神上的平衡。提示人们：一切欢乐即将回到人间，生活在继续，只是要善子保卫这一生活。

为了庆祝 1943 年 5 月 1 日，有人给小地呈献了一份很好的礼物。天刚亮，人们哎哟一声，乐得喜笑颜开。夜间战士们在本旅防区的各个地方树起了红旗。一清早，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德国人，都看到了这一面面红旗。

我记得，在黑白影片的时代，影片“战舰波将金号”上的红旗在银幕上出现的时候，给人留下了多么强烈的印象。而在这里，在这弹坑累累、弹片满地、硝烟弥漫、血迹

斑斑、四面临敌的小地上，竟竖起了红旗，简直令人大为吃惊。欣喜若狂的喊声，响彻在这块饱受蹂躏的土地的上空。人们感到这是一种对每个人都十分珍贵的东西。第一阵激情爆发之后，喜悦充满了每个人的心头。由于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人们喜滋滋地笑个不停：“小心点，该死的法西斯，这儿没你的便宜！”

(四)

4月的几次战斗，是在难忘的强渡之后进行的，强渡时，我有幸在海里痛快地洗了个海水澡。这几次战斗是小地最激烈的战斗。现在，就让我来讲一讲吧：

法西斯策划的“海神”战役，按照他们的意图，要彻底摧毁我们的登陆场。为此，维特采尔部队专门成立了数达二万七千人的突击队，有一千二百架飞机、数百门大炮和迫击炮进行支援。他们还制订了一项海战计划，起了个含意深刻的名称：“拳斗”。“拳斗”组包括鱼雷艇和潜水艇两支小舰队。其任务是切断我们的海上通路，并消灭被赶到海里的苏联部队。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设想。

小地的战斗开始于4月17日，此后越打越猛烈。敌人每天都有援兵调来。他们的重炮，一清早就开始轰击，与此同时，天空中出现了飞机。它们几乎挂在我们头顶上，象波浪似的一批接一批地涌来，每批四十至六十架，对整个阵地的纵深和整个战线狂轰滥炸。紧跟快速轰炸机而来的是俯冲轰炸机——也是一批批轮番轰炸，而后是强击机，轰炸一连持续几个小时，然后，坦克和步兵开

始攻击。

法西斯很自信地冲了上来，满以为在硝烟弥漫的小地上，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已不会存在了。然而他们的进攻却遭到猛烈的抵抗，只好扔下成百成百具尸体，连滚带爬地撤回去。接着，一切又重新开始。又是重炮轰击，又是俯冲轰炸机的嘶叫和强击机的狂轰滥炸。这样一天要重复好几次。

轰炸航空兵和强击航空兵都有歼击机作掩护。由于敌人占有巨大的空中优势，尽管我们的歼击机使他们遭到了一些损失，然而，还是阻挡不住他们的狂轰滥炸。苏联轰炸机没有在敌人阵地上空出现过，这就使敌人有可能重新部署兵力，准备进攻。这样一连持续了三天，直到4月20日。这是德国法西斯指挥部确定彻底摧毁小地的日期。

希特勒决心把我们抛进大海，所以他在这段战线上投下全部老本，形势极为严重。于是，第十八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实际上就是我，写了一份告全体战士书。这份号召书传遍了每个战壕和掩蔽部。人们割破指头，用鲜血在号召书上签了名。后来，我给斯大林也寄去一份，让他了解一下战士们是怎样坚守阵地的。

号召书中写道：“我们在诺沃罗西斯克市附近从敌人手里夺回了一小块土地，我们称它为‘小地’。它虽然很小，但它是我们的，是苏维埃国家的，它洒满了我们的汗水和鲜血，我们决不会把它让给任何敌人……我们向自己的战旗宣誓，以我们的妻子、儿女的名义宣誓，以我们可爱祖国的名义宣誓，我们誓死同敌人搏斗到底，消耗敌

人的人力物力，肃清塔曼的法西斯恶棍。把小地变成一座埋葬希特勒匪徒的大坟墓！”

在法西斯进攻的第一天，我们接到了最高统帅部的坚决命令，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登陆场。最高统帅部把登陆场视为解放塔曼半岛的一把钥匙，认为它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密切注视着战斗的进程。

4月18日，以朱可夫元帅为首的最高统帅部代表团乘飞机来到由И·Е·彼得罗夫上将指挥的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就在当天，朱可夫元帅偕同海军人民委员Н·П·库兹涅佐夫和空军司令А·А·诺维科夫来到第十八登陆集团军司令部。司令部的一位上校，来到小地，把这件事通知了我，并加上一句：

“元帅很想见见您。”

“怎么，是命令吗？”我问道。

“我没有接到他这样的命令，”上校回答说。“但是，他说他很想同您谈谈。”

老实说，我也很想谈一谈：敌人的空中优势搞得我们寝食不安。早在德国进攻的第一天，我就向我们的司令员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列谢利泽谈了自己对这方面的看法。我坚决要求空军来支援。我也曾同我一向尊敬的军事委员谢缅·叶菲莫维奇·科洛宁谈过这件事。他们俩都是骁勇无畏、经验丰富、原则性很强的人，两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我认为，关于空军的情况，他们一定会向朱可夫汇报的。在这严重的时刻，我最好还是别离开登陆场。我这样想也这样做了：我同战士们一起留在小地上。

后来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们大家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苏联军人在这场敌我实力悬殊的战斗中，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因为敌人对这个登陆场的保卫者日夜不停地进行空袭和炮轰。”接着元帅写道，他正是想就这个问题了解一下我的看法，我们的士兵还能不能熬得住这非人的苦难，哪怕是再坚持一两天也行，因为最高统帅部已经采取了增援我们的重大措施。

两天以后，战局果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最高统帅部后备队的三个航空兵团相继抵达。他们一到，立即投入战斗。涂有红星的歼击机首先封锁了小地上空。炸弹雨点般地落在敌人的战斗队形上。现在，战斗是在空中均势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久，优势转到了我们这一边，因为飞行员成功地炸毁了敌人的几个机场。

我很难描述空中发生的事。不管你往哪儿瞧，都会看到我们的飞机，单独地，有时是成群地同德国飞机死死地纠缠在一起。被击中的飞机冒出一条条黑烟，相互交叉着，坠向地面。在三天的战斗中，我们的飞行员在小地上空击落敌机一百一十七架。关于这几次激战的情景，战斗的参加者 A·И·波克雷什金在自己写的一本书中已作了详细介绍。

我们的登陆场决定着诺沃罗西斯克和塔曼的命运，因而德国法西斯指挥部向前沿投入一批又一批的部队。小地的战士们在艰难严酷的环境中厮杀了八天八夜，直到敌人的力量消耗殆尽，直到敌人的残兵败将滚回其出发阵地为止。1943年4月20日，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到来了。说来也奇怪，这一天竟引起我一个有趣的回忆。

我们海军陆战队第二百二十五旅有个政治部主任，名字叫 M·K·维多夫，他剽悍、善战，对战士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人指责说：指挥员不应该作无谓的冒险，他回答说：“我是政治委员，不是落汤鸡！”就在4月19日的夜里，他召集政工人员开了个会，作了战斗总结，然后问他们是否知道：法西斯匪徒为什么这样疯狂地反扑？他自己又回答说：因为明天是他们领袖的命名日，他们想消灭我们，向希特勒献礼。他说，我们也要好好庆祝这个日子。

在大家讨论各种建议的时候，当时还不大出名的画家鲍里斯·普洛科夫画了一幅画，立刻受到大家的赞赏。夜里，他在床单上画了一只正从高加索逃出来的猪一样的怪物。这只猪的头上，有一撮人人熟悉的小胡子和一束刘海发——希特勒的这幅肖像真是刻画得淋漓尽致。大家把这条床单固定在框子里，摆在中间地带预先试射过的位置上，牢牢地斜钉在地上。

4月20日的清晨，希特勒匪徒从四周的山头，从自己的各个阵地上都看到了这一贺礼。果然不出所料，德国佬不敢向自己的领袖开枪。过了好大一会儿，他们显然已经商妥了该怎么办。一伙法西斯匪徒从三面向框子爬来。然而这个位置已经试射过了：他们有一半给撂倒了，其余的人夹着尾巴逃跑了。就这样一天重复了三次，直到他们的大炮把“命名日礼物”击毁为止。

“揍得好！狠狠揍他！”战士们哈哈笑着。

这笑声是威严的力量，是乐观的证明，是人们精神健康的象征。当一个地段的进攻被打退以后，我和多罗菲

耶夫一起顺着堑壕走了一趟。从附近一个火力点又传来了笑声。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年轻的中士鼓动员在讲话。

“我们在作战斗总结，上校同志。”他报告说。

“总结出什么来啦？”

围在机枪周围的战士们催着中士说：“你讲讲，你讲讲！”中士起先有点腼腆，但在同志们的要求下，他壮着胆子说：

“希特勒吹嘘说，今天要把我们抛到海里去。我用我们乌克兰的一个小小寓言，来说明他会得到什么下场。有个人去打猎，打死了一只狗熊，剥了一张狐狸皮，拿回家一只兔子；妈妈又宰了一只鸭，混在一起熬了一大锅。他尝了尝，味道是苦的。”

我和士兵们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个快活小伙子讲话。他那不高明的寓言，此时此刻，也许比对军事行动进行的最认真的分析更有价值，作用更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再说一遍，这一天是我们在小地上熬过的最艰难的一天。

大地在燃烧，岩石在冒烟，钢铁在熔化，混凝土在坍塌，然而忠于自己誓言的人们并没有从这块土地上后退一步。一个连阻击一个营进攻，一个营消灭一个团的兵力。机枪的枪膛打得通红，受伤的士兵推开卫生员，拿着手榴弹扑向坦克，战士们用枪托和刺刀同敌人展开肉搏。这场搏斗似乎没完没了。在敌人横尸遍野的地方，又出现了敌人的散兵线，消灭了一批，又上来一批，灰绿色的人影，不断地涌现。也难怪在一次进攻中，第八近卫步兵

旅的一名士兵竟脱口说出这样一句话：“妈的，他们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那一天，希特勒匪徒在兵力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我们遭到了重大的损失，我的脑海里不止一次地闪过一个念头：我们要有多少同志倒在这块土地上，敌人要有多少人回不了家呀！在战争中，怜悯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战争就是残酷的行当，打仗难免要死人。这里，你怜悯一个人，那你就派另外一个人去替代他。这里，你可以找到一个从精神上宽慰自己的理由，那就是在困难的时刻，你同战士们在一起，经受同样的生死考验；尽你一切所能，不让他们去冒不必要的危险，减轻他们的痛苦。

在保存下来的战争年代的文献中，有一份由我签署的命令。这份命令，是在战争后期，即1943年底，在攻打基辅近郊的战斗日子里发给所有政治机关和每个政工人员的。里面所写的，对我来说是整个战争期间最最主要的事情：

“要时刻注意爱护人力，关心士兵的健康。保证士兵能不间断地吃到热饭和开水，这要成为一条决不容违反的规则。要严格监督，保证国家供给士兵和军官的物品都能全部送到他们手里。要给那些对这一工作敷衍塞责、无所作为的人以严厉的处分。要特别重视医疗卫生机关的工作。各兵团政治部必须派专人负责从战场上后撤伤员，给他们以及时的救护。”

如今，鏖战已经过去多年了，我们在百忙中还要经常关怀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要关心和照顾他们，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这是我们政权机关和全体公民合

乎道义的职责，也是我们生活的法律。

(五)

也许读者希望我讲一讲党的政治工作，其实关于这方面，我早已在讲了，因为小地官兵的刚毅顽强，也正是这一工作的结果。登陆场上的井然不紊的日常生活，对人力和士兵健康的关心爱护，航空兵团的及时派出，战斗间隙中的愉快说笑，进攻时所显示的舍己献身的勇敢精神，以及那种表现了人终究是人的情操——凡此种种，都是党的政治工作的结果。所以，要把它从整个叙述中突出出来是很难的，而且也许是不必要的。

用什么来衡量，又怎样来评价一个政治领导人员在战场上的活动呢？一个狙击兵，击毙几十个希特勒匪徒，这就是他的无上光荣。一个连队击退敌人的进攻，守住防线，这是连队指挥员和连队士兵的无上光荣。一个师突破敌人的防御，解放一个居民点，指挥员的名字就会在最高统帅部的嘉奖令里出现。然而，政工人员的功绩也是伟大的，政工人员从思想上武装战士，增强他们热爱祖国的伟大感情，使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鼓舞他们去建树功勋。

在军队里，一个真正的政工人员要把人们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确实了解人们的情绪、需要、希望和理想，使他们具有献身精神，从而去建树功勋。如果认为，部队的士气，一向是部队坚定顽强的重大因素，那么在战争年代里，这一最锐利的武器正是政工人员理应掌握的。他们

锤炼了官兵们的精神和心灵，倘若没有这种精神和心灵，无论是坦克、大炮，还是飞机，都不可能给我们带来胜利。

情况到处一样，不过在“小地”这样艰难的战场上，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士兵们有时觉得他们同大地隔绝了，这就要使他们明白，隔绝并不意味着被抛弃，分离并不等于被忘却。还要向他们指明，反法西斯战争正在各条战线上进行，全国正在给我们以巨大的援助。要把刚才打退的进攻，同全体苏联人民所进行的伟大战役联系在一起。

这里不需要大声疾呼的演说，而且这里也没有可供演说的礼堂。这里需要的是坦率的、有男子气概的，而且可以说是推心置腹的谈话。我出席了作战兵团和各部队召开的大部分党的会议，而且还常常跟士兵们交往。一般说来，我和陆海军战士是能够找到共同语言的，虽然我并没有为此使用过什么特殊的方法。无论谈正经事，还是说笑话，我都尽量做到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我一向说老实话，不管这种话多么使人伤心。我发现，有些军官老想把自己打扮成一种朴实而直率的人。当然，士兵们马上就会发觉你这种故意不分彼此的虚伪性，这样一来，你就甭想听到他们的真心话了。

我们大多数政治部工作人员、政治指导员、共青团小组长和鼓动员都善于找到恰如其分的语言，他们在士兵中享有一定威望，不过重要的是要让人们晓得：那些号召他们坚持下去的人，在困难时刻，将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将手持武器冲在他们的前头。所以，具有党性的热情

语言，再加上实际行动（战斗中能以身作则）就是我们的主要武器。政治工作人员所以能成为武装部队的灵魂，其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他们要参加进攻战役或防御战役的准备工作；编制作战计划，没有他们的参与也是不行的。例如我就不记得，有哪一次列谢利泽将军或与我共同作战过的其他集团军指挥员，不考虑我所提出的看法或修改意见，有时是十分重要的修改意见。不过在战争中，发布命令的是指挥员，这是他们的特权，虽然政工人员也可以发布命令，但我认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他们才能行使这种权利。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主持一个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人们都并排坐在地上听我的报告，这时忽然有一颗德国炮弹在我们后面不远的地方爆炸了。我们都听到它飞来的呼啸声。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我继续讲下去，可是，过了两分钟，又爆炸了第二颗炮弹，这回是在我们的前面，谁也没有挪动地方，虽然大家都是久经沙场的人，我们知道已陷于大炮的交叉射程之中。第三颗炮弹，正如前线战士常说的，是我们的了。于是我马上下令：

“起立！向左面三百米处的谷地跑步——跑！”

我们在另一个地方结束了这次会议。第三颗炮弹果真在我们刚才呆过的那个空地上爆炸了。我和政治指导员B·齐霍米罗夫从那里默默地走回来。他只是说：

“谁也没有动弹，瞧这些人……”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

无论是在战斗中，还是在暂时沉寂的时刻，碰到类似

紧急情况，政工人员有权、也有责任发布命令。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决不当发号施令，而只能进行解释和说服教育，而且这项工作，还要做得灵活、有分寸。即使有人犯了错误，你也无权大声训斥，无权侮辱他。然而，某些人身上依然存在一种习气——喜欢提高嗓门对人讲话。他们这种习气尽管并不常见，但我还是很有反感的。无论是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还是党的领导人，都不应该忘记：他们的部属只是职务上的部属，这些人不是为经理和主任服务的，而是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服务的。在这方面大家是一律平等的。谁要是背离我国制度所特有的这条坚定不移的真理，那就必然会贬低自己的声誉，大大影响自己的威信。是的，一个人犯了错误，应当承担一切责任：党的、行政的，乃至法律上的责任。但绝不能伤害他的自尊心，侮辱他的人格。

我今天还坚持这样的看法，在战争年代，我一直遵守这一条准则，并竭力以这种精神教育我所领导的政治机关。我不能不指出，这是一批多年从事党的工作的作战军官们组成的一个和睦集体，这些军官有经验，有学识，他们以主动精神和个人勇敢面著称，在局势紧迫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投入战斗。他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活到了胜利的那一天。但是每一个人都光荣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现在，我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这些同志。战争期间，我多次嘉奖过他们，给他们签发过不少奖状。我记得，处分他们的事，仿佛一次也不曾有。这并非是我的“心肠好”，恰恰相反，即使他们不分昼夜地工作，我对他们也

不会有任何袒护。我只知道，我可以大胆地信赖每一个人，而他们也决不会愚弄我。为了使读者对我们的这些同志有所了解，我想介绍其中的几位。

C·C·帕霍莫夫是我的副手之一，曾任宣传鼓动处处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镇定自若，乍看上去，甚至有些迟钝，但在必要的时候，他会变得精神焕发，坚定不移。正是在这种场合，他善于找到战士们最需要的唯一的语言。因此每逢要起草军事委员会号召书和其他重要文件时，我总是让他去办。

极其富有魅力的A·A·阿尔祖马扬少校是个演说家和宣传家。他不仅视野宽阔，而且有一种恰到好处、决非多余的幽默感。当时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战后听说，阿尔祖马扬已经当上了院士，随后又成为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这个消息，我并不感到诧异，只是感到高兴。

И·П·谢尔巴克也跟阿尔祖马扬一样，是个优秀的宣传家，早在战前，他已是一位历史学副博士了。Г·И·尤尔金也具有渊博的知识。顺便说一句，从他身上就可以判断出政治部工作人员的大无畏精神。还在诺沃罗斯克进攻战役进行的时候，黑海舰队司令就在战场上直接奖给他一枚战斗红旗勋章。我再补充一句，假若我也那样一个劲地向前跑的话，那末，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参加这一战役的作用，也会得到同样的高度评价。

我们也出版自己的军报——《祖国旗帜报》，它迅速地反映了小地的各种事件。战士们在战壕和坑道里眼巴

巴地盼着这张报纸，争相传阅。我曾多次参加编辑部的碰头会，同编辑 B·И·维尔霍夫斯基及其他工作人员谈话。我一向尊重新闻记者，因为我知道：在战斗时，他们总是深入部队和陆战队，参加破坏组，参加捉“舌头”。

报纸的全体工作人员及其他撰稿的积极分子都是得力的。除了编制以内的工作人员，如后来成了苏联英雄的《真理报》记者 C·鲍尔津科这样一些人之外，作家 B·戈尔巴托夫和诗人 И·科甘也在我们的军报上发表过文章。

其他一些著名作家也常到我们的集团军来。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我们自己土生土长的诗人说的某句中肯的话，或者是这份小小的战报刊登的某幅插图，对于士兵来说，该是多么重要。因为这句话，这幅插图，都是直接面向他们的。我记得，有一天，在拂晓时分，我从前沿回来，看见有两个姑娘从海边过来。一个姑娘，身材不高，腰带扎得整整齐齐，头发火红火红的。她们向我行了个举手礼，我也就过去了。我曾答应我的负责共青团工作的助手，于五点钟接见几个接替牺牲者担任共青团小组长的同志。正巧，那位头发火红的姑娘带着一包文件走了过来。

“你从哪儿来？”我问她。

“从水兵营。”

“他们对你怎么样？”

“很好。”

“没欺侮你吗？”

“没有，瞧您说的！”

原来，她是搞素描的。她当即打开了自己的战斗画稿。其中有一幅素描，我至今没有忘记，它的下面题着几个字：“瓦夏，你干吗胆怯？”

这位姑娘名叫玛丽娅·彼坚科，是她自己要求到小地来的，登陆的最初几天，她就到了登陆部队。她冒着炮火背伤员，在战斗间歇时刻，就带着报纸、信封和信纸，从一个战壕跑到另一个战壕，找人谈话，朗诵诗歌。小地的人都知道她，都喜欢她，公认她是一名优秀的鼓动员。手抄报纸《躲开点》是她出的主意。她竟然想出妙法，把它“出版”好几份，战士们把这些报纸都看烂了。在评论和朗读这些战报的地方，时常爆发出哄堂笑声。

不多久，在我们攻占诺沃罗西斯克的时候，玛丽娅负伤了，但稍加治疗以后，她又参加了战斗部队。为表彰她的英雄主义，授予她三枚战斗勋章。后来，她要求到基辅去，因为那里正在进行极其紧张的战斗。有一次，我看到报纸上（记不清是《真理报》还是《消息报》）刊登了她写的一篇题为《爱情》的文章。也许有人会以为，这是一篇儿女情长的玩艺儿，其实不然。她写的是祖国，是对祖国的热爱。

为了祖国，玛丽娅·彼坚科既不吝惜自己的青春，也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在她后来发表的日记中，她对小地有这样一段描述：“你从地窖里爬出来，眼望灿烂的阳光，顿觉心花怒放。多么想生活下去啊！可是残酷的战争机器把周围的土地兜底翻了个个儿。凹凸不平、满目疮痍的大地上，到处是断垣残壁，斑斑血迹。你还没有来得及欣赏一下阳光，就传来了‘空袭！’的喊叫声。于是你又钻

进那潮气扑面的地洞，那儿，在弹壳做的油灯冒出的黑烟中，几乎辨认不出自己的朋友。”

玛丽娅也象许多英雄人物一样，没有能活到今天。每逢我回想起这位优秀的人物，我的眼前，不由地浮现出我们祖国的其他许许多多曾同男人一道分挑战争重担的女儿。在我看来，她们的形象已成为苏联妇女伟大精神的化身。

(六)

进攻……4月战斗结束以后，整个集团军，从士兵到司令员，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两个字。我们饱尝了辛酸，我们把祖国的许多城市与乡村留给了敌人，在被包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同侵略者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对神圣复仇的渴望，已达到了顶峰。

“究竟什么时候呢？”——战士、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经常这样问。这里无须再加上“进攻”两个字；因为不加上这两个字，大家也不言而喻了。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只能用两个字：“快了”。进攻的日期和计划是严格保密的。不过，正在准备进攻这一点，是不可能隐瞒的，况且也无须乎隐瞒。

发起猛烈突击的局势业已逐渐形成，条件非常有利，各条战线上的主动权已经转入红军手中。法西斯指挥部依靠突然袭击和优越的军事技术而取得的优势已经永远丧失了。1943年，英雄的大后方，向前线提供了二万四千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三万五千架飞机、十三万门大炮。

我们已经拥有比敌人更加优良、数量上也更雄厚的武器。1943年夏季我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总计起来：在中部前线，我军向西推进了三百公里，而在我们南方，则推进了六百公里。

突击诺沃罗西斯克的意图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希特勒感到，他可能陷入更加严重的包围之中，因此，他拼死命抓住南部这个登陆场。他懂得：丢掉塔曼，势必要丧失克里米亚，从而使他在乌克兰的军队受到威胁。为了保住塔曼，法西斯匪徒建立了强大的防线，它从黑海到亚速海，分成两个地带，那儿布满地雷、设置层层防坦克障碍、鹿砦、土木火力点和永久火力点，以及装甲帽堡发射点。

同我们并肩作战的是 A·A·格列奇科的集团军，他第一个感到法西斯在凶猛抵抗。他拿下了一个小丘，停一停，再拿下一个小丘，又停一停。我记得：列谢利泽、科洛宁、我和扎列卢阿上校躺在斗篷上，那是休息时刻，我们讨论了当时的局势，列谢利泽说：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攻占塔曼和克里米亚的关键不在于这些小丘，而在于攻占诺沃罗西斯克。我们一同请求最高统帅部给我们补充一万七千——二万人。我们准备一下，就开始突击。”

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列谢利泽给莫斯科打了电话，统帅部赞同我们的倡议，把格拉德科夫师调给我们。我们的突击就此开始了。

诺沃罗西斯克是德国人重点抵抗的枢纽部。除了沿

着前线修建了一批强大的工事外，他们还在城里建立了许多据点。居民大楼、工厂、升降机、车站等都布满了火器，交通壕纵横整个市区，街道上壁垒森严。港口的防御格外严密。

德国法西斯指挥部自以为深知苏军的战术，认定我们不会正面攻打大型重点抵抗枢纽部，而是迂回包抄。所以，他们以为只要对新俄罗斯克加强防御，就不会在这个地方遭到突击。但是，他们失算了。我们战术的特点，就是灵活性。促使我们恰好在诺沃罗西斯克突破敌人防线的一个原因是出敌不意这一因素。

第十八集团军当时积累了丰富的登陆作战的经验，因此，我们认为，对这个城市的突击可以不按原先拟定的从两个方面进行的方案，而是从三个方面进行——从采马斯卡亚海湾的右岸和左岸，即从小地和水泥厂方面，以及完全出敌不意地从海上大规模登陆。这样的计划被采纳了。

我们还准备采取一个出敌不意的行动。本来，大规模登陆，应当使用许多大型军舰；但这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和跟踪。这次，我们却决定用小船运送军队登陆。此外，对沿岸工事将实行鱼雷攻击。以往从未使用过鱼雷攻击海岸，因为鱼雷是供进行海战和击毁敌舰用的。要使鱼雷如我们预想的那样充分发挥作用，艇上人员还要着实下一番功夫。

大家知道，我们的计划，有一半，事先必然要给敌人猜中。因而，严守机密成了首要任务。我们不准许在任何书信来往中谈及正在准备的战役。战役计划的制定只

吸收严格限定的少数人参加。周密的侦察开始了。为不暴露我们的意图，侦察工作在广阔的战线上同时进行。假造情报迷惑敌人的工作也开展了，一系列巧妙的措施使敌人相信，我们准备在南湖地区登陆。

我们认为，党的政治工作对战役所起的保证作用，并不亚于战役的战斗准备。我们决定，在突击前，在所有部队，无论如何都要有一个朝气蓬勃的党的组织。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把大批共产党员派往最重要的进攻地段，还专门为登陆部队选拔了人员。登陆部队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我也考虑了政治部工作人员的最合理的配置：在整个战役期间，政治部的每个工作人员，固定负责一个部队。后来，我在各师和各团里遇到他们，发现他们作战的劲头很高，正以自己的斗志感染别人。我们还从后备军中吸收许多政工干部，以便在战斗中，迅速替代伤亡的人员。每个党小组都有两名副组长；每个共青团小组则有三名副组长。这样一来，我们在每个分队中，经常有党和共青团的领导者。

诺沃罗西斯克解放后发现，我们搞的那本《登陆人员须知》起了很大作用。在这本手册的引言中，有几段谈到红军在各个战线取得的成就，希特勒匪徒的种种罪行，指出我们给予敌人毁灭性打击和向敌人的暴行讨还血债的时刻到来了。接下去就是一些实际建议。简单地提到，一个战士在登船，在船上，以及下船投入战斗时应当如何动作。我们竭力事先教会人们应付意外情况的办法。这本手册发给了每个登陆人员。

《须知》的主要内容，是我从国内战争期间南方战线的《战士须知》中借用的。弗·伊·列宁当时对这本小册子十分重视，特别指出了它的重要地方。其实，我们在整个党的政治工作中，都运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特别重视的那些条款。下面就列举其中的几段：

“共产党员同志！……你在战斗中应该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你上战场的使命是做红军群众的教育工作。但是，你应当时刻紧握枪杆，以身作则，表明共产党员不仅会高尚地活着，而且也能无愧地死去！”

回想起准备突击的日日夜夜，我认为那是工作最紧张而又最繁重的时刻。不过，这同小地被围困的日日夜夜又是多么不同啊！工作繁重压不倒，担子越重越高兴。每一次新的会见都给人们增添力量。海军陆战队的的一个独立营，自告奋勇地走在登陆部队的前头，指挥这个营的是第一批在小地登陆的英雄——营长 B·A·鲍蒂廖夫及其政治副营长 H·B·斯塔尔希诺夫。我们交给这个独立营一面旗帜，命令他们把它插在从敌人手中夺回的诺沃罗西斯克的高大建筑物上。年轻的共产党员弗拉基米尔·斯莫尔热夫斯基海军下士极其荣幸地接过了这面红旗。这位英勇的侦察员、第一次登陆的战斗英雄，因为受到信任，非常激动，他向同志们宣誓：

“决不玷污海军的荣誉！”

最后，集团军司令 K·H·列谢利泽召集将要率领部队进行突击的各级指挥员，并宣布了代号为“U”的开始时间——9月9日夜间突击的时刻。这里最后明确了每个人的任务。随后，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 M·E·彼

得罗夫在战役开始的前半天，召开了陆海军指挥人员的扩大会议，会上每人汇报了准备情况。

进攻前一小时，各步兵部队、陆战队和各舰艇都举行了大会。这时，有许许多多情况要向人们讲清楚，而在这之前，我们什么也不能说。就是说，要挑选最最需要说的话。我出席了许多大会。我确信，士兵们是欣然地接受突击命令的。我甚至可以说，是无比喜悦地接受了命令。

我们大家等待了二百二十五个日日夜夜的时刻到来了。司令员的观察所，构筑在马尔科特赫山的山岭上。从那里可以了若指掌地看到采麦斯卡亚海湾、港口和相当大一部分城市。

夜间。离战役开始还有一些时间，可是，观察所已有许多人了：集团军司令员，参谋长 H·O·帕夫洛夫斯基将军和一批司令部的军官，炮兵司令员 Г·С·卡里奥菲利将军及其助手们，以及其他兵种的司令员。紧张的寂静不时地受到电话铃声的干扰，侦察员报告：敌人方面没发现任何动静。偶尔传来零落的炮声，某处爆炸了一颗漫无目标的炮弹，而后又是一片寂静。不知为什么，我们讲话都是悄悄的，几乎是在耳语。军官和将领们不时地抬手看表。

代号为“U”的时刻到了——二时四十四分。我知道，就在这一分钟将有八百门火炮和二百二十七门“卡秋莎”同时齐发，有一百五十架轰炸机腾空而起。我当然想象得出这种打击的力量。然而，我听到的声音却使我大为吃惊，仿佛是山崩地裂了。

炮火准备持续了十五分钟。在这段时间，对事先测定的目标倾泻了三万五千发炮弹。海军陆战队和步兵部队从小地发起攻击，我们如此长时间地坚守住这块珍贵的滨海地带，并不是徒劳无益的。从另一方面，从水泥厂地区也开始了进攻。按照我们的计划，海军登陆部队也进入了战斗。

城里火光冲天，照亮了采麦斯卡亚海湾。我朝黑暗中、朝格连吉克方向举目凝望，只看见在靠近港口的地方，第一组“突破”艇以不易揣测的速度疾驶着，摧毁着重重障碍。这是在炮火准备开始六分钟后出击的。发出了约定的信号——“路已打通”。几分钟后，几艘鱼雷快艇飞速冲进海湾，向东西防波堤发射重型鱼雷。这种惊人的打击，摧毁了岸边的防御工事。顿时，硝烟弥漫，水泥灰尘四处飞扬，遮住了海岸。这就掩护了登陆艇，使敌人未能发现，整整过了十五分钟，即在炮火准备结束时，鲍蒂廖夫营已经在码头上厮杀了。半小时内，有八百人在敌人猛烈的火力扫射下登陆了，他们配备有重机枪、迫击炮和防坦克炮。

采麦斯卡亚海湾一片混乱。快艇从四面八方急驶而来，转弯时，搅得水面浪花飞溅，眼看着就要撞在一起了，但是，这一切都服从一个精确的计划。紧跟在鱼雷艇后面的是炮艇、护卫艇和渔轮，各走各的航线。木材码头、粮食码头、石油码头和进口码头，相继遭到了攻击。爆炸和燃烧的火光，把港口区的海湾照得通明。海水简直沸腾起来了。

鲍蒂廖夫营攻占了木材码头，几乎与此同时，C·

日·卡丹奇克指挥的第一三三九步兵团也在猛攻水泥码头。虽然整个团还没有全部登陆，但是，爬上岸的人，都一鼓作气，冲向敌人的工事。黎明时分，他们已攻下一个火力猛烈的据点——“无产者”水泥厂。到第二天夜里，该团其余各分队也与他们会师了。

观察所里，电话铃声响个不停。这儿同各兵团保持着可靠的联系。天才的集团军司令员镇定自若，坚毅果断地指挥着这场战斗。在战斗过程中，他及时而又迅速地变更部队的部署，动用预备队，把增援部队调往有危险的地方。

开头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敌人已经清醒了。每幢楼房、每条街道都喷射出火光。希特勒匪徒搞清我们占领的登陆场的范围，就对它开炮轰击。但是，我们的炮兵也跟随着进攻部队。我们的飞行员对自己的作战行动作了周密安排，不间断地轰炸敌人占领的区域。强击机一直盘旋在空中，它们一天出击六、七次。

到第二天夜里，一三三七团在发电站所在地区登陆了。三一八步兵师师长 B·A·弗鲁茨基上校也同他们一起登陆。但是，司令部跟他的联系中断了。我从司令员脸上的表情看出来，他心里多么不安。这不是一个连、一个营，而几乎是整整一个师，而且是派往主攻方向的一个师，音讯全无啊！

列谢利泽命令派一名负责军官，到发电站地区去，找到弗鲁茨基，弄清情况，立即回来报告。我考虑了一下，建议司令员让我的副手帕霍莫夫去执行这项任务。司令员很了解他，马上就同意了，但命令作战部长派作战部的

普希茨基大尉与他同去。

他还说：“开我的吉普车去。”

他们要穿过前沿进入城市，穿过子弹横飞的地区，找到弗鲁茨基，并以见多识广的目光，估计各处情况，一一标在地图上；而后尽快地赶回来。幸好两个人都安全地回来了，不过司令那辆吉普车被炸毁，不得不丢在“十月”工厂区。他们翻越重重障碍，通过顺着岸边敷设的下水道，到了一片小空地，空地对面就是发电站，右边有长长一排楼房，法西斯匪徒从那儿不停地开枪开炮。到发电站只有七十米，但到那儿去必须通过一片开阔地，或者从煤堆后而那幢楼房旁边过去。他们很快作出决定。普希茨基从煤堆后面爬过去，帕霍莫夫则拼命地从危险地段冲过去。事后帕霍莫夫一本正经地对人说：世界上最优秀的短跑运动员那时也追不上他。尽管危险，他们还是原路返回，而且带回来的地图和情报，不是一份却是两份，保证把有关形势的情报送到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他们还带来了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弗鲁茨基上校受了严重震伤，一目失明，手臂受伤。我们立即采取措施，支援该师各部队，这些部队进展虽然缓慢，但他们却顽强地在向前推进。当时司令部参谋长临时履行师长职责。

各条街道正在进行巷战。消息接踵而来：车站攻克了，车站升起了海军军旗；“灰色别墅”占领了；“红楼”拿下了；我军冲进学校；一〇三街区已解放……伴随每个消息而来的是噩耗：三一八师政治部主任 A·季霍斯图普中校阵亡……集团军政治部指导员 II·伊萨耶夫少校阵亡……集团军政治部监察员 A·采德里克少校阵亡……

在这之前不久，M·维多夫牺牲了；稍后，在阿纳帕附近海军八三旅的政治处主任H·卢金也牺牲了。

记得，沙岸上，有罗马尼亚军队构筑的一个掩蔽部，列谢利泽、我、扎列卢阿和卢金一同走了进去。天气十分炎热，我们想躲在背阴处避避暑，哪怕一会儿也好。可是掩蔽部里却传来嚓嚓声，轻微的、响个不停的嚓嚓声。我说：

“看来，这是钟表机械的声音。可能放了定时炸弹。我们快走开吧。”

我们离开掩蔽部，来到外面，铺开斗篷，便躺下了。卢金也躺下了，就躺在我们旁边。炮弹一个接一个地呼啸着，河岸变成了一片小沙丘。等爆炸声一停，我们就站了起来。我喊他：

“卢金！卢金！”

他没有答应。过去一看，他已经死了，身上没有一处伤痕，什么伤也没有，是被气浪打死的。

不，朋友并没有死，
只是不再站在你身旁，
不再共饮一壶茶，
不能与你同住一间房……

诗人说得多好啊！从理智上我都懂：打仗嘛，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可是，心里却不是这样，悲伤揪心，隐隐作痛。我曾亲自给阵亡军人的妻子写过信，给战友的坟墓上培过一撮土，我也和大家一起鸣枪致过哀。他们是党的忠实儿女，他们以党的名义召唤战士们去进行殊死战

斗。他们号召大家要为国捐躯。在战斗中他们一马当先，以身作则，完成了他们号召别人去做的事情。他们彻底履行了列宁的指示——要以身作则，表明共产党员不仅会崇高地生活，而且也会无愧地死去，会死得其所。

(七)

诺沃罗西斯克的战斗进行了六天六夜。我不想历数部队和兵团的番号，也不打算引用一些数字，因为军事历史文献已经详尽地记载了这次突击强攻。有一点提一提是很重要的，那就是官兵们进攻时激情高昂、义愤填膺，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他们。我们每天，甚至每时，都在目睹他们建树战功。现在我就介绍一下某次战绩吧！

海军陆战队的—个连，强攻法西斯的几座工事，一连冲了三次，都没有成功。连长伊凡诺夫决定成立一个志愿强攻突破组，由十一个人组成，为首的是连队党小组长瓦利乌林，还有四名共产党员。他们一阵猛冲，就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战士们也跟在他们后面涌进去。但是，冲到街的尽头时，侧翼的火力阻止他们前进。于是瓦利乌林对季亚钦科上士说：“机枪一停，就发起冲锋。”说着，他就匍匐前进，在机枪狂吼的那个地下室的窗前，他身中—弹。尽管鲜血直淌，但他仍然向窗口猛扑过去。阵地就攻下来了。

我在小地时就熟知瓦利乌林，他是一个优秀的党小组长。在签署他的奖状时，我考虑过这种功勋的实质。显然，这个人当时知道，上去是准死无疑的。但是，在彼时

彼刻，他未必会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我要去立功了。”不，这种勇敢不是想出风头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不声不响的，不大显眼的，从《战争与和平》这部长篇小说来看，我甚至可以说，这是托尔斯泰特别推崇的那种谦虚的英勇精神。托尔斯泰对功勋这个词是这样理解的：功勋就是人不顾一切地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当然，怕死之心人皆有之，这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关键时刻，能够自然地作出这种决定，乃是毕生修养的结果。这就是说，有这么个境界，在这么个时刻，一个爱国军人意识到他对祖国应尽的天职，从而压下了恐惧感、痛苦和死亡的念头。这就是说，功勋并不是无意识的行动，而是出于坚信自觉为之献身的事业是正义的、伟大的。

列宁在国内战争年代曾写道：“士兵们相信战争的正义性并且意识到有必要为了自己弟兄们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会提高斗志并且肯忍受空前沉重的负担……这是因为每一个手握武器的工人和农民都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战，所以自觉地为正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流血。”^①

列宁这段精辟论述，深刻而准确地揭示出人民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揭示出我国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为争取正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建树不朽功勋的源泉。

9月16日，莫斯科鸣礼炮向北高加索方面军和黑海舰队的英雄部队致敬。伟大的相持战结束了。我们的官兵在一个名叫斯塔尼奇卡的小村附近的一块光秃秃的地

^① 列宁：《在罗果日-西蒙区工人、红军扩大代表会议上的演说》，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117页。——译者

段，顶住了历时七个月的围攻，终于取得了胜利。希特勒匪徒曾经占领诺沃罗西斯克这个大城市，并把它变成无法攻破的要塞，而我们竟在六天之内，把他们赶跑了。

祖国高度评价城市解放者那种无比英勇、豪迈的精神。她授予十九个兵团和部队以诺沃罗西斯克命名的荣誉称号，并向数千名官兵颁发了苏联勋章和奖章。建树了杰出功绩的几十名军人荣获了苏联英雄的崇高称号。

有各兵种参加的诺沃罗西斯克登陆战，是伟大卫国战争中几次最大规模的登陆战之一。

诺沃罗西斯克之战，已作为苏联人民争取胜利的不屈不挠的意志、战斗豪情、大无畏精神、对列宁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无限忠诚的范例之一而载入卫国战争的史册。

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我是在市委那幢半倾圮的屋子里从广播中听到的。我们没有召开市民大会，因为没有居民了。我们上了街，街道也不存在了。那儿是一片废墟。整个城市是一堆瓦砾。我们在一个地窖里找到一个老太太和一只猫，此外再没有看到什么人了。我记得，那儿还有一个粮库，旁边是海员俱乐部。前一天，法西斯分子抓住我们的人，把他们赶到那个地方，浇上煤油，点火焚化。景况惨极了。

工兵们正在忙碌，挖出了数千颗地雷、未爆炸的炸弹和炮弹，并把这些东西运走。“凡留在城里的居民，一经发现，立即就地枪决”的告示都撕掉了。法西斯匪徒怕我们的人……海员俱乐部前面，有一片马铃薯地，于是我快步抢到前面，科洛宁对我说：

“你往哪儿钻呀？”

“你是军事委员会委员，”我答道，“我是政治部主任，我应该向前先走两步。”

诺沃罗西斯克解放后，真想稍许喘喘气，但是我们连一小时也不能停息。成功地突击为全面进攻整个登陆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德国人在我军的进逼下，简直是在逃跑。我们占领了那个人称鬼门关的地方，这样，通向阿纳帕的道路就打通了。希特勒统帅部只好用“布龙希尔德”行动（紧急后撤）代替“克里姆希尔德”行动（有计划地把军队调出塔曼半岛）。但是，就连这位神话史诗中的女王，也帮不了他们什么忙。

黎明时分，我们顺着大路开车疾驶，我们得到通知，我航空兵正在前面攻击德国部队。车子里一共坐着四个人：科洛宁、扎列卢阿、我和副官克拉夫丘克。看来，人们在战火中已经变得很敏感，我忙叫道：

“弟兄们，我们马上就要挨炸了，卧倒！”

我们跳下车，卧倒在路旁，还是险些儿吃了自己航空兵的苦头。不过，这也许不能责怪飞行员。当时大家的进攻激情都迸发了，我们不也都一个劲儿地往前冲吗？

1943年9月21日，我集团军的坦克兵团和步兵兵团以雷霆万钧的攻势，解放了阿纳帕城和港口——敌军在通往克里米亚的道路上设置的重点抵抗枢纽部。这次突击如此凌厉、神速，以至德国占领军不得不扔掉全部物资和携掠来的财物，连准备出海的十六艘满装石油的船只也丢弃不顾了。

我军的进攻激情与日俱增，昂扬的士气同在战斗中取得的经验相结合，形成一股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但是,无论怎样也不能说,胜利是轻易得来的。我们的对手是残忍、强大、装备精良的希特勒部队。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赢得时间,精心地加强了通往克里米亚的最后几道防线,疯狂地死守每一个居民点、每一个高地。只是在北高加索方面军的几个集团军、黑海舰队的舰艇、陆战队和空军以及亚速海区舰队的不断猛攻下,塔曼半岛才于1943年10月9日彻底解放。

在刻赤海峡沿岸,我们看到希特勒匪徒制造的一幅惨无人道的骇人景象。我同一批指挥官从望远镜里依稀地看到,敌人的几艘运输船只渐渐地远去。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但是,飞机一飞临目标,却又掉头飞走了。我们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飞行员报告:敌船的甲板上净是儿童与妇女。飞行员不能扔炸弹,因为这些被武器强行赶上甲板的人们,成了坐在船舱里的法西斯匪徒的盾牌。

前面就是克里米亚。我们向部队宣读了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1943年10月9日发布的第五十一号嘉奖令。

嘉奖令说,“第十八集团军的战士们所走过的战斗历程是光荣而出色的。这条充满荣誉的道路是由在小地、梅斯哈科和诺沃罗西斯克附近山区进行的英勇战斗,以及向诺沃罗西斯克城和港口的大胆勇猛的突击面铺成的。第十八集团军的各部队继占领阿纳帕市和塔曼市之后,首先完成了歼灭塔曼敌军的战斗任务。”

1943年11月1日前夜,登陆艇载着三一八师,即现在的诺沃罗西斯克步兵师的战士进入刻赤海峡。他们顶着狂风,在不间断的炮火下,穿过了三十公里布满水

雷的海域，在靠近刻赤的埃尔季根渔村地区成功地登上克里米亚海岸。

在登陆之前，统帅部代表铁木辛哥元帅说，第三一八师登陆成功，是解放克里米亚的保证。大家知道，他的话完全证实了。

这些实际上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小地”的一切。这是伟大卫国战争的一页，仅仅是一页，但却是难以忘怀的一页。

遵照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我们登上列车，向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驻地开去。在小地战役之后，在猛攻新俄罗斯克之后，这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是一次休息。但是，战火中的生活是变化无常的。命运为我们作了另外的安排。

1943年11月6日，我军解放基辅之后，十天之内向西挺进了一百五十公里，赶跑了包括日托米尔和法斯托夫在内的许多居民点的敌人。切断了“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重要交通线。已形成的局势对希特勒军队显然是危险的。德国法西斯指挥部从法国调来了新的力量，在日托米尔和法斯托夫以南集中了十五个坦克师、摩托化师和步兵师。希特勒的计划，显然是想从西南面进行打击，拔掉我们设在第聂伯河右岸的据点，重新占领基辅。法西斯果然冲开一个突破口，第二次占领了日托米尔。

我们第十八集团军、卡图科夫坦克集团军和其他几个兵团奉命堵住这个突破口，阻止敌人前进。途中，我们转向H·Φ·瓦图京将军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这时敌人已到达日托米尔公路上距乌克兰首都七十四公里

的地方。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司令部和政治部所在的那列列车首先开出。紧接着是载着兵团和各部队的列车。列车风驰电掣，日夜兼程，只是更换机车时才停一停。夜里驶过巴格列伊车站——这里距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总共只有六公里，后来在另一个车站停了下来，离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也非常近。这样，我又回到了故乡。

我走出车厢。外面冷风嗖嗖，寒气袭人，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在黑暗中定睛凝神，仿佛嗅到了亲爱的捷尔任斯基工厂飘来的烟味。这是我父亲做过工的工厂，也是我开始当司炉、后来又当动力车间工程师的工厂。我是多么向往那里，多么想去看看啊，哪怕是一天、一小时，甚至几分钟也好！昨天我收到母亲来信，她已经从疏散地回来了。从信上感觉到，她受了不少折磨。

但是，机车发出一阵短促的嘶鸣。我该上车了。直到很久以后，战争结束了，我才回到家里，见到了自己的亲人……

(八)

我们在戈斯托麦尔车站下车。司令部设在科隆希纳村。

我很少呆在那里，我一直在附近几个车站跑来跑去，帮助更迅速地安排部队下车，特别是炮兵，要设法把他们分散在日托米尔—基辅公路附近的一片树林里。

12月12日凌晨一时左右，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副

处长 H·A·索洛维伊金中校打电话告诉我：敌人已冲进斯塔维谢村附近地区。离我们只有几公里。

我问列谢利泽和科洛宁取得了联系。司令员已经调遣了步兵团，坦克也已驶向那个地点。但是，他们最快也得在一小时之后才能到达突破区。在他们到达之前，我们决定将司令部的几乎全体军官都投到那里去。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切断和控制基辅公路，为此才采取了这一极端措施。

跟索洛维伊金通话之后，我立即命令发警报叫醒政治部的军官。我又打电话给司令员，一共谈了三分分钟左右，当我放下听筒的时候，我满意地看到，三十名挎冲锋枪和手榴弹的军官已经准备就绪。我分配了他们各人应去的地点。

我带上副官克拉夫丘克，和一名冲锋枪手，喜欢储存东西的司机，已将大约三十颗手榴弹放进车里。大街上一片汽车发动的嗡嗡声。我们驱车来到最近一个团的指挥所，获得一些最必要的情报，就继续向前飞驰。在离前沿一公里半的地方，由于迫击炮的炮火猛烈，不得不把车子停下来。我们迎着射击声快步跑去，很快就发现有一条堑壕，几个伤员在呻吟，一个挺年轻的中尉在叫喊着什么。大约有二个名冲锋枪手贴着胸墙在打枪。重机枪在打短促的点射。黑暗中传来了一个惊慌失措的声音：

“应该撤！”

“住嘴，胆小鬼！”——中尉大喝道。

这当儿，我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我还不知道，在法西斯发动进攻以后，这里的第二道防线已成为第一线了。

我也不知道，敌人没容我们站住脚跟，接着又发起了进攻。我看到，法西斯匪徒冒着我步兵的稀疏火力，一边用冲锋枪连续扫射，一边向前跃进，而当我们的一挺机枪开始射击时，他们又趴下，这时我才什么都明白了。

我安慰中尉几句，吩咐他沿线传令，一定要再坚持几分钟：步兵团就要乘车赶到，坦克也正在全速驶来。中尉兴冲冲地向战士们跑去，而克拉夫丘克则带着同样的消息向另一个方向奔去。记得他喋喋不休地重复着：

“这就是政委，政治部的首长！”

我们军队早已不实行政委制了，在部队中也早就听不到政委这个词儿了，然而此时此刻，克拉夫丘克却觉得称呼这两个字是最合适不过了。

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不止一次地看见敌人距离这么近，然而，这次夜战，却格外深刻地铭记在我的脑海中。希特勒匪徒借着照明弹的闪光，一会儿利用地势趴下，一会儿从一个小丘跃到另一个小丘。他们离我们越来越近，能阻止他们前进的主要是我们的一挺机枪。敌人一扑上来，机枪就响了，后来响声突然停止，那时只有一条稀稀拉拉的散兵线还在射击。德国人不再卧倒了——他们嚎叫着，直着腰不停地射击着，就这样壮着胆子向堑壕奔来。可是我们的机枪却默不作声。有个士兵把死去的机枪手拖到一边，我就不失时机地向机枪扑过去。

对我来说，整个世界当时已经缩小到法西斯匪徒奔跑的那一块狭小的土地上了。我不记得这一切持续了多久。我只有一个想法：顶住！我好象没有听到战斗的隆隆声，也没有听到邻近传来的嘈杂的口令声。只是有时

候我发现，我没有瞄准的那些敌人，也一个个倒下去了：这是我们的援兵开的枪。记得，有一个人用手碰了一下我的手说：

“上校同志，请给机枪手让个地方。”

我向四周一看：整个战壕里全是士兵。他们习惯地、迅速地、熟练地各就各位。我觉得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是那么可亲可爱！当然，我们阻止了希特勒匪徒的进攻，而且很快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们猛冲过去。苏联军队解放了日托米尔，继续向前挺进。我现在想着重谈谈我军士兵的手足之情与战斗情谊，以及战士们在自己部队里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爱国者。

任何一场战役，每一次战斗，不管在何处进行，都是炮火、鲜血和死亡。然而，每当你想到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地区直到布拉格各地的一场场战斗时，你的头脑里就不禁浮想联翩，出现一幅幅迥然不同的图景。一想起巴尔文科沃-洛佐瓦亚战役，眼前就浮现出一群陷于深雪之中，顶着凛冽寒风而艰苦跋涉的人们，一想起小地的战斗，眼前就浮现出这样的景象：炸弹落在采马斯卡亚海湾，炸得海水象开了锅一般，满载士兵的小船从这边被抛到那边。直通海岸的苏呼米公路上，尘土飞扬。这些尘土遮天蔽日，笼罩了房屋、武器和汽车。各种植物上也落了厚厚的一层，压得枝对低垂。尘土穿过皮靴筒积在脚底上，透过衣服贴到身上。我们简直是大口地把尘土连同水和食物一起吞进肚子，而且十分自然。

在炮弹的呼啸声中，我沿着这条尘土飞扬、被烈日晒得滚烫的道路，来到一个正在准备投入战斗的师。汽车

前进的道路堵塞了，我下车寻找绕行的道路，发现路边有一个中士和一个士兵正在大声争论。原来这里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那是一个刚出院的士兵，院方发给他一封去后方部队的介绍信。路上他故意落在同行一批人的后面，逃跑了。奉命追他的一位中士，在他受伤前服役的那个部队里追上了他。连队指挥员了解了冲突的原因，就对原先的战士说：毫无办法，跟中士一起回去吧。于是他们就一块儿往回走。路上这个士兵竟造起反来：我不回去，我要回自己的部队。

中士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道：“有命令叫他去我们团，可他不执行命令，违背了誓言。本来应该处分他，可他还犟呢！”

战士求情似地说：“不，我没有违背誓言，指挥员同志，我又不是往后方逃跑，我是回自己的部队去呀！”

“部队在哪里呢？”

“就在那边打得最火热的地方，那儿正等着德国鬼子的进攻呢，可他们，”他反感地把头向中士一摆说，“还一个劲儿地打官腔！”

请你们想一想吧。一个人有合法的理由可以不去参加战斗，至少可以缓期参加战斗，而且究竟什么时候去参加还不知道。可他却争着去参加战斗。从这一乍看起来是个别的事件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士兵相信自己的指挥员和政治领导人，相信同他一道进行侦察或进攻的同志。否则他为什么急于回自己的部队呢？此外，他自己在战斗中的表现也是问心无愧的。胆小鬼才会去找另

一个部队，才会到无人了解他是个畏缩不前的人的地方去。一个懒散的、不为同志所喜欢的士兵，也不会急于去找自己的伙伴。

莫非这个连队是个令人留恋的特殊连队？不是。在整个德苏战场上，在苏联武装部队的每一个医疗营里，我们都听得到这样一句话：我要回自己的部队！人们把自己的连队、团和师看成是特殊的、最好的、名符其实的家。看来我们全军都是由“特殊”部队组成的。

我回想起另一件更为使人惊异的事。也是在进攻的时候，部队已上了军用列车，而我决定顺便到医院去看看。在第一间病房里住着三十来人，基本上都能行走。我同他们告辞时说，我们要继续追击法西斯了，但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赶回部队。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一定赶回部队。在下一个病房里躺着一些重伤员。医生预先提醒说，右边第一人是个中尉，没希望了，气性坏疽已无法抑止了。我走到他跟前。他长着一头漂亮、卷曲的黑发，黑眉毛，在那回光反照的脸上，闪着一对蔚蓝色的眼睛。我问他是否有什么要求或希望。

“有，上校同志，有。如果我死不了的话，劳驾帮个忙，让我再回自己的部队去吧。”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我强压住激动的心情说道，我一定帮忙，请他放心。我问他曾在哪个部队作战，如何负的伤。同他告别后，刚要走，但又听他说：

“上校同志，您是不肯帮忙吧？”

“哪儿的话，我一定……”

“那您为啥没有记下我的姓名呢。”

我仍然不能马上回答他。这时护士解救了我。

她拿出一张纸条。“好，我来写，你看，姓名、军衔、部队番号，都写上了，行吗？”

我伸手拿过纸条，看到上面写着：“您该走了”。

我赶快把它放在图囊里，并看了一下中尉。他笑了。我的喉咙哽塞了。战争期间，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话：“我要回自己部队”。但我却永远也忘不了那位中尉和他所说的那句非军人用语“劳驾帮个忙”；我也永远忘不了苏胡姆公路上的那位固执的士兵。

这些勇士们的心灵何等高尚！热爱祖国的感情是多么朴实，但又是多么难以遏止：他们多么渴望为祖国而战，一点也不考虑自己。感人至深的其实不是战士的这个请求本身，而是他表达这一请求的话语。他不夸耀自己的英勇行为，反面象是表白自己，象是在要求一种完全是本人的、私人的、只有他一个人需要的东西。

在尘土飞扬的路边，我能回答这个士兵什么呢？根据一切条令，根据军规法纪，他是有过错的。战争期间，每个人是不能给自己挑选服役地点的。不能“根据个人愿望”擅离职守，转到其他地方去。根据军事条例，我必须命令他到他本应前去服役的地方去。可是我迟疑了。

“拿您怎么办呢？”我问这个士兵，我的确不知如何是好。

“指挥员同志，那就派我回自己的部队去吧。我要入党呢！上次没有来得及履行手续，因为进了医院，现在申请也交上去了，该死的德国鬼子又打伤了我。”他又向中士摆了摆手说：“他们那儿谁也不了解我啊！”

这番话打消了我最后的疑虑。我让副官记下他的姓名和两支部队的番号。我答应这个士兵说：最迟到明天，就会下达调他的命令。现在跟中士去，谁也无权违抗命令。将来按照命令再回自己的部队去。这个士兵没能掩饰，并且也没有掩饰高兴的心情。他精神抖擞地挺直身子，行了一个军礼：

“可以走了吗？”

列宁曾经指出，联系群众、接触工农兵具有巨大的意义，这句话多么正确啊，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证实。在休息时和在阵地上同战士们多接触、多谈话，结果得出了多少涉及面极其广泛的重要结论啊。到医院去探望伤员，在苏胡姆公路上偶尔同一个士兵的谈话，就是这样的事例。当然，我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而且除此之外，还作出了一项决定：伤员出院后，尽可能把他们派回到自己的部队去。

1944年2月11日，对我来说，是悲痛的一天。我把一位患重病的指挥员送到莫斯科去了。医生们说，希望不大。十天以后，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列谢利泽与世长辞了。

在前线，很快就能了解一个人。在那里一下子就能看清某人的价值。列谢利泽是一个天才的统帅，体现了苏维埃人的优秀品质：对敌人残酷无情，对朋友善良温和，他为人正直、言而有信；他坚毅勇敢、足智多谋，并且十分热爱生活。我的战友康斯坦丁·列谢利泽在我的记忆中就是这样一个人。

往下还有许多事可以叙述，可以写成整整一本书，因

为在这之后还有几千公里的征程和好几个月的战争。可是今天有一点我想再一次强调一下：对小地的怀念以及在小地经受的锻炼和取得的经验伴随着我和我的战友们一直到最后一声枪声。冷静、熟虑、多谋善战加上战士的激情、勇敢无畏和爱国精神——所有这一切总和引导我们走向胜利。

我们经历了无数次残酷的战斗，解放了许许多多的村镇和城市，我们走过乌克兰的基辅、文尼察、赫麦利尼茨基、切尔诺夫策、利沃夫以及其他很多州的土地，直至喀尔巴阡山。法西斯匪徒在这里利用天然屏障，构筑了强大的“阿尔帕德”防线。然而，苏联军队没有克服不了的障碍。我们利用在高加索重山峻岭中进行战斗的经验，强行越过喀尔巴阡山，终于摧毁了看来是不可攻克的敌军防线。

如今，政治工作人员真是不分昼夜地工作。战斗在进行，部队中党的政治工作，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同时还必须帮助地方同志和脱离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员，安排新的生活。许多重大的政治会议（党代表会议、工会代表大会、青年代表会议和妇女代表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召开。自由的气氛鼓起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全体居民的政治积极性。他们把我们当作兄弟，当作救星来迎接。到处都成立了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筹备。后来，我出席大会时看到人们以多么大的热情，通过了关于外喀尔巴阡同祖国人民重新合并的历史性决议。

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欢迎我

军的那种欣喜若狂的情景是难以忘怀的。光荣的第十八登陆集团军也同其他兵团一道，参加了解放这些国家的战斗。在这些地方所做的政治工作，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几十年来，帝国主义者一直诽谤我们党。几十年来，他们向各国人民的头脑里灌输了诬蔑我们生活和我国人民的骇人听闻的谎言。现在，苏联人作为解放者来到欧洲，重要的是，不能让任何东西辱没这一崇高的人道主义使命，我们的军人并没有辱没这一使命。不论在何处，他们都被看成是无私的、光明正大的、富于人道和正义的、经受过战争洗礼的人。

在最困难的1941年，我们就相信胜利必将到来。现在我们知道：胜利指日可待了。我们按照整个事态的发展，做好了迎接胜利的准备。可是等胜利终于到来时，还是难免惊喜若狂。据我看来，谁也无法用语言来充分表达这种喜悦的程度。要讲出1945年5月9日充满我们心中的一切感受，我也是无能为力的。我只好说：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当然，对于我们第十八登陆集团军来说，战争的最后一天来得还要晚些——5月12日。法西斯德国已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可是我们还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收拾那些负隅顽抗的残敌。

我也忘不了凯旋大典——红场上举行庆祝胜利的阅兵式。我看到一份任命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勃列日涅夫将军为乌克兰第四方面军混成部队政委^①的命令，内心感到高兴和自豪。我同全体指挥员一起率领我们混成部队

^① 原文如此。——译者

参加阅兵式时携带的那把军刀，我至今仍把它作为珍贵纪念品保存着。

我那一直在部队干到胜利的理想——几百万苏联士兵的理想——就这样实现了。他们不仅舍生忘死地保卫了自己的土地，而且还光荣地高举胜利的旗帜走完了战争的艰难道路，并把这面旗帜插到柏林的国会大厦上。

* * *

我们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它表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表明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威力，它树立了许多令人惊叹的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的榜样，这一切是千真万确的。但愿和平长在，因为苏联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们都很需要和平。

我们直到最后一天还埋葬过自己的忠实战友，一路上都可看到法西斯兽行的痕迹，遇到哭泣的母亲、伤心已极的寡妇、挨饿的孤儿。如果今天有人问我：你从头到尾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你得出了什么重要的结论呢？我就会回答：再不应该打仗了。永远也不要打仗了。

能够随时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做自己认为必须做的事情，力争实现自己所确信的目标，这样的政治家、这样的国务活动家是幸运的。当我们提出和平纲领，在许多国际会晤中提出旨在消除战争威胁的倡议的时候，我做了、力争了、说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始终深信不疑的话和事。

这看来就是我从伟大战争的经验中所得出的主要结论。

复 兴

(一)

野草已经从铁块和碎石的缝隙中钻了出来，远处传来野狗的狺狺狂吠，四周是一片废墟，烧焦了的树木的枯枝上，挂着黑糊糊的鸟巢。此情此景，我在国内战争后也曾看到过，但那时，工厂只是死寂无声，令人毛骨悚然，而如今，一座座工厂却完全化为灰烬了。

那是1946年的炎夏。那一年，党派我到扎波罗热去，要我先去熟悉州里的一切情况，特别注意工程建设和农业。我领到党中央委员会的有关委任书后，就不失时机地动身去扎波罗热州。

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后，我未立即复员，我抵达扎波罗热的时候，身上还穿着军装。一清早我就驱车去工地，但车子只能开到焦化厂，确切地说，开到高大厂房残留下来的废墟前。再往前就没有道路了，于是只得安步当车，我信步而行，一直到天色很晚，所到之处，尽是直竖着的混凝土桩子、碎砖烂瓦、垃圾堆、歪七扭八的梁架。真是疮痍满目。

清理场地的工作在全速进行；成千上万名建设者在许多工地上劳动，这些工程差不多是同时铺开的。他们

几乎没有机械，全靠双手在干，看来，这项工作是没有尽头的。沿途我认识了一些人，其中有许多人后来我都熟悉了，也记住了。但是他们的解释说明，当时我只听听罢了，主要是自己看，因为基本情况不加说明也很清楚：这座冶金工人和动力工人的美丽城市，实际上在我国的土地上已不复存在。一切都被战争炸毁、烧光、破坏无遗了。

战前的扎波罗热市，我是非常熟悉的。它离我当时工作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很近，乘车去只消一小时半就可到达。那时我得常去扎波罗热市，去看邻居，因为我们好久以来一直在进行友谊竞赛。我记得那里有绿荫如盖的街心公园、赏心悦目的广场和喷水池、扎波罗热人引以自豪的漂亮的住宅大楼、霍尔季茨岛上的游憩地以及树木葱茏的宽阔的列宁大街。它穿过整个城市，一直延伸到第聂伯河。每到晚上，通常在我回家的时候，血红色的反光，照亮扎波罗热炼钢厂高炉上空的蓝天，再往前，只见千百盏灯火倒映在水中，勾画出著名大坝的弧形轮廓。

第聂伯水电站不单纯是在苏维埃政权年代里建成的几百个发电站中的一个。今天虽有比它功率更大、设备更完美的水电站，但是这座第聂伯水电站对我们来说，仿佛已成为苏维埃国家工业强大的象征。这座拦河大坝，经常出现在新闻记录片中，出现在报纸和杂志的照片上，大家都非常熟悉，总觉得它特别美丽。有人对我说起，在不久前的一个旅游季节里，有一位青年女大学生写下了这样一段留言：“第聂伯水电站在我国的位置，如同文学

中的普希金、音乐中的柴可夫斯基一样重要。不管今后在伏尔加河、安加拉河、叶尼塞河上建造起多么巨大的水电站，它们都不能遮盖住苏维埃动力工程中这位先驱者的伟大光辉。”这话说得多好啊！

然而在战后的那一年，看到这独一无二的建设工程，惨遭如此巨大的破坏，真是令人万分痛心。希特勒匪徒的飞机向大坝投掷了近百颗炸弹，每颗都有半吨重，幸亏我们的工兵和侦察兵发扬了大无畏精神，才把拦河坝从彻底的毁灭中拯救出来。在苏联军队强渡第聂伯河的时候，发现在大坝的一个支座上，有一根连接爆炸装置的引火线被砍断了，旁边躺着一具被打死的战士的尸体。这位战士的名字没有查出来，但从那时起，大坝的闸门旁就矗立起一座无名英雄纪念碑。

虽说法西斯强盗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野蛮计划，但所有涡轮机、发电机、起重机全被炸毁，四十七条溢洪道只有十四条完整无损。第聂伯河的水库不再存在了。古老的岩崖裸露了出来。我们看惯的水平如镜的第聂伯河，又象昔日那样在石滩附近泛起泡沫。工地上当时传诵着一个第聂伯河建设者写的一首诗：

第聂伯河的汹涌波涛，
冲击着两岸的花岗峭壁。
这灰色的花岗，这斑白的峭壁，
将永远铭刻着捍卫它的英雄的功绩……

乌克兰有这样一句话：强忍住痛苦就是胜利，这句话

很形象，含义也确切，意味十分深长。苏维埃人在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克服了重重困难，饱尝了种种辛酸，终于忍受过来，取得了胜利。现在他们必须“强忍住”经济陷于崩溃的“痛苦”；必须在和平劳动中取得胜利。

在这炎热恼人的漫长一天，我一边了解工作情况，一边暗自思量：该从何处着手呢？老实说，这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相当悲观的。法西斯匪徒把城市中的七十家工厂全部炸毁了。当扎波罗热炼钢厂开始修复轧板机的时候，我们在厂房中间的一排柱子上，发现根根都有用红色颜料写的拉丁字母“F”^①。红色箭头指示的方向，正是放置炸药的地方。

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国家计划委员会作过统计：扎波罗热市有一千多幢住宅大楼、二十四所医院、七十四所中小学、两所大学、五家电影院和二百三十九家商店被炸毁。城市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没有电。扎波罗热市附近的农业也受到极大损失。

党中央委员会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刻派我到这个州去的。大约在我到达那儿的前一个月，1946年7月27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通讯：“为什么扎波罗热炼钢厂的重建工作停滞不前？”答案是这样的：“无组织是主要原因。组织计划和作业机械化计划全然皆无。作业进度表实际上也没有。计划的完成，不是以实际数量，而是以卢布来计算。因此弄虚作假成风……”后来《真理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三个党委会和一个建筑工程”。文章批评了区委、市委和州委无止无休地干预建设者的工作，

^① 德语“Feuer”一词的第一个字母，意为“火”。——译者

而给予的帮助很不够，有时出的点子也不高明。最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乌克兰党组织中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干部的培训、选拔和分配问题》的决议，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也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局面就是这样，乌共(布)扎波罗热州委会的第六次全会对此进行了坦率而激烈的争论，我是事先了解了各项建筑工程的情况之后参加会议的。在全会召开的前夕，党中央给在扎波罗热州的我打来了电话：

“中央决定推荐您为州委第一书记。请您主持全会。”

联共(布)中央部门负责同志来到扎波罗热。全会的第二项议程是组织问题：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推荐，会议选举我为扎波罗热州委第一书记。这是1946年8月30日的事。

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在全州各方面工作的好坏方面，我对党、对人民都负有明显的责任。党和人民不仅期望我忠诚地工作，而且期望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发生急剧的变化，同时期待全州党组织改变工作作风，大大加快许多企业的建设速度，首先是加快扎波罗热炼钢厂的建设速度。我清楚地懂得，这项任务对国家来说，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实质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1946年3月通过了有关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年)的法令，规定要重建扎波罗热炼钢厂，即“在南方恢复冷轧薄板的生产……”虽然只有一行字，但对懂行的人来说，这一行字是很有分量的。然而，考虑到任务的复杂性，这一项目并未列入优先上马的工程。当时人们议论纷纷，说什么光清理场地，

就需要好几年。有人认为，在别处新建一座工厂倒要容易些。例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这个为援助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而建立的国际组织的专家们，就提出过这样的意见。他们一到扎波罗热，就写出书面意见，说什么重建扎波罗热炼钢厂一般说来是不可能的，不如新建一座倒能节省些。

我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些专家看作门外汉或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人。他们非常仔细地察看了、查明了、计算了一切——破坏的程度、技术水平、我们当时的动力设备、现有的起重机械和劳力资源等等。他们“只不过”是对我国人民的顽强的生命力，对苏维埃人的爱国主义，对党的组织意志估计不足而已。

大洋彼岸的政治家们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看来，他们实在太愿意相信法西斯将军施蒂尔普纳格尔的话了，此人在第聂伯河沿岸败退后向希特勒报告说：“俄国要恢复被毁坏的一切，需要二十五年的时间。”美帝国主义者偏偏喜欢相信那些最悲观的预测，因为他们那时骤然改变了对自己的反希特勒的盟国——苏联的态度。

事实证明，同美国政治家打交道，一般说来是不容易的。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去世了，进入白宫的新的行政当局，立即忘掉了昔日的一切“坚定不移的”诺言和“持久不变”的条约。例如，美国人曾答应为第聂伯水电站生产全套发电设备，但是，卖了三台机器之后，便突然中断了供应。他们把钢板列入战略物资清单，也同样突然停止卖给我们。但是，没有钢板，就不能制造汽车，不能制造拖拉机。老一辈人大概还记得，战后年代我国公路上

行驶的卡车的驾驶室是木板做的，挡泥板是胶合板制成的。

“冷战”开始了。它持续了多年，实际上达二十年之久。那时，几个资本主义大国，企图利用我国的困难，对我国发号施令，干涉我国内政，这不是第一次了，遗憾的是，也不是最后一次。他们的用意很简单，反正苏联需要这些机器和这种钢板，共产党人已经束手无策了，终究会躬身下拜的……怎么，我们给卡死了吗？我们让步了吗？我们停顿下来了吗？没有！精明的外国佬失策了，今天重提此事，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既可记取教训，又有现实意义。

我们又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社会主义经济的无穷潜力，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以及我们国家的雄厚实力。一旦需要，我们就能将这些力量重新调配，将其集中到主要方向上去。

结果，我在这儿谈到的几项工程，非但没有停顿下来，反而进行得更快。美国人拒绝提供的涡轮机和发电机则由列宁格勒和新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工人、工程师和设计师为我们制造出来了。虽然我们限定的期限很紧，但是他们生产出来的机器却比美国货更可靠，功率更大。

1947年早春，重建起来的第聂伯水电站开始发电了。至于说到钢板生产，苏维埃人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他们只用一年的时间，就恢复了这一最复杂的生产。同年秋天，以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命名的孔波罗热炼钢厂的第一期工程（共五个车间，实际上每个车间就是一个工厂）首先投入了生产。

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因为我成了创造这些伟大业绩的见证人和参加者，因为这一战后复兴的重点工程托付给了我，因为在这难忘的一年中我得以和扎波罗热人一起工作。在那时，我必须考虑很多事情，弄清许多情况，还必须学会很多东西。我在这里经受到了最艰苦的锻炼。

(二)

在写这篇回忆录的期间，我曾请党和苏维埃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给我寄过当年的一些有关材料。我想借此机会，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因为许多文件我基本上已经忘记了，有些文件还是第一次看到。

例如，这里有几页是州委常委会头几次会议中的一次会议的记录(1946年9月)。记得，那次会议我们开了很久，因为急待解决的问题成了堆。下面就是这些问题的议程表，不过所列举的远非全部问题：

新瓦西里耶夫区区委的工作报告；

关于采购部所属采购站和各企业的粮食保管与妥善储存问题；

关于扎波罗热州为支援庄稼收割和粮食采购而运送石油产品问题；

关于瓦西里耶夫区和奥西片科夫区的秋耕和秋播的进度问题；

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为消灭违反集体农庄劳动组合章程的各种现象而采取的措

施》的决议：

关于为扎波罗热从德国法西斯强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举行三周年庆祝活动的筹备工作……

这里有大量工作立即缠住了我，急待迅速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容易深陷在事务堆中而不能自拔。考虑到这一点，我作出了决定：日常事务要处理，这原是无法回避的，但是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根本改善组织工作和党的政治工作等问题上。

我最初的印象是正确的。在扎波罗热炼钢厂的工地上，人很多（在建设“高峰”期间竟达四万七千人），但未能形成一个集体。在这里参加施工的，有近四十个建筑公司和承包工程的单位，它们分别隶属于各部的有关总局。我很快发现，这些单位都各自为政，无休止地争吵和相互指责。他们到处动工，但没有一处工程竣工。他们纪律松弛，根本谈不上互相支援与合作。换句话说，完全不具备使众多的人员变成一个步调一致的集体的条件。

我首先关心的，是创造一个有良好组织的、有严格党性要求的局面。现在，无论哪个单位，没有工程进度表就不准开工，而当时有些领导人却郑重地再三说明：根据我们的条件，工程进度表一般地说是行不通的。他们说：这不是“正规”建设——清理场地，拣出各种钢管、钢梁、轧条和完好的机器零件，这样的劳动，无法规定定额。

其实各单位早已有了成规：工作不定定额，劳动生产率毛估估。换句话说，就是使计划迁就薄弱环节，使增长速度适应落后部门的水平，制定计划的根据是一个班或一月内能够未得及完成多少，而不是根据需要必须严格

做到多少。

这种倾向必须纠正，于是我在市委的一次全会上（按当时的惯例我兼任市委第一书记）专门讲了这个问题。照速记记录来看，我当时指责了建筑工程人员：“请你们想一想，在农业上，在播种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能看到汇报，我可以据此采取行动，给予帮助，可以给落后地区再调拨一些燃料和备用零件。难道在我们的建筑工地上就不能同样做到心中有数吗？就算编制整个企业的综合工程进度表，暂时还有困难，但是编制几个已经施工的重点工程项目的进度表，却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没有进度表，”我继续说，“如果我们手中没有可用来进行监督、提出要求、实行鼓励，需要的话，给予处分的各种手段，那就不能想象工作会有任何显著的进展。”

州党委的观点还得到了战前就在扎波罗热炼钢厂任厂长的 A·H·库兹明和继我之后不久来扎市任扎波罗热建筑托拉斯经理的 B·G·迪姆希茨的积极支持。他们俩在各方面完全不同，但却能互相取长补短，配合得十分默契。

阿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库兹明中等身材，胖敦敦的，戴一副夹鼻眼镜，我记得，他从不提高嗓门讲话。从外表看，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工程师，只是在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出身于彼得堡的一个无产者的家庭。他有很多长处：博学、有头脑、工作能力强。他在生产业务上享有无可争议的威望。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沉着冷静的态度。事情不顺利，计划完不成，他能不动声色。有了成绩，开群众大会，他仍然安之若素。他是一

个持重稳健、办事认真的人。

他在厂里经历过极其艰难的时期。1941年8月，法西斯军队到达第聂伯河右岸，开始对城市进行扫射。我们的部队在左岸英勇地坚守了四十五个昼夜，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光从扎波罗热炼钢厂就运走九千六百车箱的最贵重的设备。这是了不起的英雄行为：人们冒着炮击和轰炸，拆除了极其沉重的轧钢机，把机器部件打成包，搬运到站台上，做上标记，绘制出装配简图。所有这一切都是在A·H·库兹明指挥下进行的。他象船长离开自己的沉船一样，最后一个离开了工厂，那时距希特勒法西斯闯进这块土地只有半小时。

半年以后，一批扎波罗热轧钢工人就在新西伯利亚城用薄板轧机进行生产了。人们用及时从地道里取出来的电缆（九十多万米）装备了我国东部的几十个国防工厂。扎波罗热炼钢厂的主要设备运到了马格尼特卡，在那里很快建成一座中板车间，为国家生产出优质合金钢的装甲。

就性格而言，迪姆希茨与库兹明截然不同：他在对问题的看法上有时很武断，但也通晓工作策略，可以说他是一位善于运用策略的好领导。他喜欢大刀阔斧地解决工程技术问题，他能支持革新者，也能制止空谈家。搞建设的人，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在工作会议上讲起话来，有时完全不是议会那一套辞令。我还要补充说，温和而敦厚的库兹明在这种场合也善于坚持原则，坚定地捍卫自己的观点。

施工者与启用者往往意见不一致，不过库兹明和迪

姆希茨却总能找到共同的语言，我想不起他们之间有过什么冲突。州党委对他们的相互关系很有影响。关于工程进度表问题，他们两人一开始就赞成我的主张，结果就实行了。严格制定的按昼夜计算的工程进度表，使各部门的工作步调一致起来，有助于对工程项目的严格按期交付使用进行监督。这是我们共同的胜利。

详细编制的各种工程进度表，后来送到印刷厂印成大量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不但发给建筑工程的领导干部，而且也发给工长、工地主任、党团工会的工作人员，连到工地现场来采访的新闻记者，也人手一份。它们有助于大家了解工程的进度，这对建立一个统一的大集体也是必要的。当一个人只愿在自己的工段里磨蹭而不知周围在做什么，这是一回事；当他了解到工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知道自己在整个工程中所占的地位，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然而，实行工程进度表，无疑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必须做到每天检查进度表的执行情况，必须实行广泛的、并且是公开的汇报制度。建筑工程人员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建立了一个调度机构。总调度员是格里戈里·卢别涅茨，现在他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重工业企业建设部部长（总之在我们的一些工厂和建筑工程中培养不少优秀的党和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当时他还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他座位旁装有十架电话机，他想方设法了解一切，记住一切，各处走走，到下午五点钟，进行每天的调度汇报时，他就能回答已发生的任何问题。无谓的争吵，推说什么东西供应不上、什么东西没有运到等

等借口，统统没有了，而且资料总是准确无误。

我喜欢参加工程建筑人员的会议，他们的生产简报会确实开得短小精悍，碰头会决不拖长到两小时。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必须克服惰性，与“得过且过”的精神状态作斗争。不过，这儿的一切逐渐开始纳入正轨，工程有节奏地进展着，如果发生不协调现象，那就毫不拖延地加以解决。

我记得，1947年5月初，我们在州委小礼堂召开了扎波罗热建设工程的党和经济工作者积极分子大会。迪姆希茨报告了工程的进度，接着库兹明也发了言，他对建设者提出极其详尽的要求，工人们也发了言。最后轮到我对大会作总结发言，我着重指出，必须把一切力量集中到已动工的工程项目上去——当时这是指热电厂和高炉：

“目前的情况非同寻常。你们即使有极其丰富的经验，也应承认，这样的建设速度，这样的建设规模，你们还是第一次碰到。然而交付使用的日期对我们大家来说却是无条件的。不把力量集中到已动工的工程项目上，不建立，如果可以这样说，突击兵团，我们就不能按期完成。有些工区，特别是在高炉这样的重点工程项目上，我们现在，如俗语所说的，打出去的还不是拳头，而是张开五指的巴掌。这就不是有力的突击。”

那一年我们大家进行了学习，而后采用这种把力量集中到拳头上的方法作为武器。这一方法受到全国的重视和好评。扎波罗热炼钢厂和第聂伯水电站的重建工作被公认为是在全民建设中集中人力物力搞重点项目的最

出色的样板。此后，我国许多巨大建设工程也都采用了这种方法。克里沃伊罗格的超大型九号高炉和日丹诺夫的“3600”轧机、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和卡马汽车制造厂都是这样建造起来的；今天，秋明的石油和天然气工程的工作人员，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的建设者们也在利用这一经验。

我想借此机会强调一下，我国的昨天和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同提出新的任务有着非常密切的相互联系。我们的计划规模一年比一年加大，课题的范围和复杂性逐年扩展，因而必须新的水平上用新的方式加以解决。但与此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丰富的实践，党和人民群众的历史经验。

例如，今天西西伯利亚地下资源的综合开发规划及其生产力发展规划就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我们时代的真正宏伟的工程项目，按其规模、投资总额、技术和运输任务的复杂性而言，要超过过去年代和以往几个五年计划时期所建成的一切工程项目。尤为重要的是，根据已经积累的经验，这里决不容许分散力量。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日益迫切的任务：及时地把一切人力物力集中到主要方面，妥善地确定优先发展的项目，也就是说按其对于国民经济所具有的意义来安排解决问题的次序。

善于找出那些可以用最低的消耗而取得最快、最大的效果的具体环节，善于从最终结果着眼去解决任何一项任务——这就是计划工作的艺术，也是一切经济领导工作的艺术。

总而言之，如果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是善于找出这

样一些环节，即紧紧抓住之后我们就能把整个链条拉出来的环节，这一点对我们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而我是在扎波罗热工地上紧张战斗的一年里，根据切身体验，才第一次真正开始懂得这一点，认识到这一点的。

(三)

我从开始工作的头几天起，如上所述，除了组织工作之外，我还得分出很大精力，用于党的政治工作。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同时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那儿不同于固定单位，当时一切都处于流动状态，要解决居住、日常生活和服务设施问题。因为每天都有几百人到工地来，其中有复员军人，其他州支援我们的安装工人，从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回来的我们的冶金工人，曾经被赶到德国去的当地居民，近郊集体农庄的青年。这些人需要党来考虑安排，而且在工作过程中还要仔细观察什么人适于做什么工作。

工地上的优秀人物补充着党的队伍。在扎波罗热工地，1947年上半年我们从工人中发展的联共(布)党员的人数，比1946年全年几乎多一倍，例如，其中就有当时大名鼎鼎的安装工人伊凡·鲁缅采夫。这样，一个上万人集体的战斗核心，就牢固地形成了。党委书记，首先就是政治工作的领导人，而每一个共产党员就是政治工作的战士，这一点提醒一下，是很重要的。

在一次州委全会上，我批评了乌共(布)新瓦西里耶夫区区委书记。一般说来，他是一个挺好的、有主动精神

的干部，但是他过分地注重经济工作，一头扎到业务堆里。当时我说：区委书记——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是我们党中央在一个大行政区的代表。然而，我们有些书记的发言，更象是经济干部的工作报告，感觉不到这里面有什么政治路线。例如新瓦西里耶夫区区委书记谈到拖拉机和牛，就讲得很具体，可是一涉及到党的工作，立刻就不着边际了。这样不行啊！在党的工作中，最要紧的是对形势作政治分析，这样才能知道从何处来抓经济工作。

当扎波罗热炼钢厂的建设者掉了队的时候，当第聂伯工程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我老是听到这样的话：您给我们水泥，工作就能搞上去。许多人以为，一切困难都是材料不足造成的。当然，材料确实是不足，然而同时有一点很清楚：人们已经不再考虑本身的过错了。他们终日忙碌、争吵、为眼皮底下的事情操心奔波，从而看不到前景，看不到主流。我现在翻阅了全会、代表会议、积极分子会议的速记记录，发现当时我常常讲到的正是这一方面的内容。

“水泥无疑是需要的。没有水泥就搅拌不出混凝土。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使往大坝上浇灌混凝土的人懂得，为了什么要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季节，在四十米的高处浇灌、捣固这些混凝土。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拥有大量技术装备和作战所需要的一切。但我们还是打胜了，因为无论是我们，还是在我们率领下冲锋陷阵的士兵，都深深懂得，我们为了什么要去猛扑喷着炮火和危及生命的敌人碉堡。正因为如此，党的各级组织必须把教育人的任

务作为自己活动的重点。顺便说说，这样一来，水泥也好，一切其他东西也好，毫无疑问很快就会有的，我们的工作也将搞得好多。”

我们在讲话中常常提到战争。这不仅是因为前线的例子当时感到特别亲切和明白易懂，而且还因为那一年整个环境仍处于战时状态——工地当时就是战场。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会见第聂伯建设者的情景。在我开始工作后不久，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第聂伯建筑工程党委的决定，该党委把参加巨大工程的共产党员联成了一体。他们的大会体现了求实精神。一些工人、工程师、各部门领导人都发了言，提出了一些棘手的技术问题，谈到了一些缺点，也免不了互相指责一番。我坐在主席团的位子上，仔细地听着，把有些问题记在便条本上。最后，我要求发言。

可能有些人在等待着州委书记将立刻评判发言者中谁是谁非，但是我有意不予预争论。我认为，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做未免过早了。我说，关于水电站建设的技术问题我不准备讲了，这些事没有我他们也解决得了。最好我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组织工作和政治上。开头，我决定抓三个主要问题：工地上的纪律，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社会主义竞赛。

“我们的竞赛搞得怎么样呢？我坦率地说：很糟。卫国战争时期，特别在战争的决定性阶段，部队面临着困难的任任务，虽然缺乏材料、没有工作室和一切其他东西，但直观的宣传鼓动还是搞得非常生动活泼。例如，当准备攻占基辅时，部队驻扎在森林里，放眼看去，到处都是各

种宣传画和标语口号。你们能够看到树上刻着：‘还我基辅！’在一块胶合板上写着：‘战士，明天你就到基辅了！’坦克上、马车上、汽车上，只要可以写字的地方，都写有这类简短的有号召性的标语，我们带着这些标语去攻打柏林，解放布拉格。可是今天我到过车站、到过拦河坝，这类情景一点也没有看到：没有号召性的标语口号、没有一个先进工作者的名字、没有一个说明我们的奋斗目标何在的数字。竞赛的直观宣传情况就是这样。”

我接下去谈到：“党委应该了解所有的劳动突击手，光了解还不够，还要通过鼓动员和宣传员把他们的成绩，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方法，变成全体建设者的财富。这个或那个突击队今天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几，明天就应该通过报纸、无线电广播，借助于传单，使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利用党所积累的一切手段。倘若党委能使竞赛发挥作用，使竞赛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竞赛的话，那么第聂伯水电站即可如期发电。要是党委只是看看计划部门的汇报，这就不算领导社会主义竞赛……”

会场上有人喊道：我们这里往往只根据汇报作判断！
“那就要彻底改变这种作风。竞赛直接取决于党内工作的水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党要解决某一个复杂问题时，总要加强党内工作。如果工地上建立起严格的党的纪律，那我们就能整顿好秩序，整个工作就会有所改进。因为对共产党员来说，没有任何命令比党的命令更有约束力了……”

今天，你看到这些发言记录时，你可能觉得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总的说来，我现在仍然赞成并支持这一立场。

因为只有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努力，不断发展自己的思想，不违背已经说过的话，不忘记自己作出的各项决定，方能形成一条路线、一条政治路线。这里还有一段速记记录，这是在另一大厅里的谈话，题目相同：

“……我同时还必须指出，同志们，你们的直观鼓动工作根本反映不出工程的进度和规模。要知道，一般的号召对任何人也不起作用。例如，‘扎波罗热炼钢厂——南方的一颗明珠！’这一条标语漂亮吗？是的，很漂亮。真实吗？当然真实。但是，它提出了什么？它针对着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呼吁行动的具体号召，我们需要的是上面有数字、有日期、有搞革新的工程师、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主要工种工人的名字的标语，并且标语上并不老是那么一些人，即一经选定、终身不变的那些人的名字，而是要有越来越多的新人——今天在竞赛中冲在前面的那些人的名字。我们应该让人民看看扎波罗热工地上这支出色的劳动者队伍！”

组织工作也好，政治工作也好，都有一个目的。州党委要千方百计地把一大群人变成一个集体，并在这一集体中培养出一批出类拔萃、光彩夺目的带头人。不错，这样的人，已经培养了很多了。对这些人，我不仅有所耳闻，而且在我去工地时，还直接到他们工作的地方，找他们谈过心。在这样的场合，就象在战壕里一样，能更好地了解一个人。

那时，还有一次很不平凡的际遇。每次我到第聂伯工地去，老远就听到姑娘们的响亮声音，她们把混凝土浇

灌到大坝主体上去。她们用头巾把头裹上，一直裹到眉毛，全身满是水泥灰，不论炎热和寒冷，她们始终精神奋发。你要问工作进行得怎样，她们总是响亮地回答：“很好！”这就是上了共和国光荣榜的安娜·洛什卡列娃工作队。有一次召开积极分子大会，突击队、共青团队和前线战斗队全都参加了。会间休息时，一群穿戴漂亮的姑娘走到我眼前，我并没有一下子就认出自己的老相识。

“你们队不也是前线战斗队吗？”

“过去是前线战斗队。”

“不，安娜，我不同意。山洪马上就要下来了，需要好的混凝土，各工作队的工作质量都要决定于你们。你们的前线还要往前挪呢。”

姑娘们干得很出色。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周年时，我在游行队伍中看到了她们，我对着扩音器高呼：“向安娜·洛什卡列娃工作队致敬！”她们回头一看，脸上漾出了笑容……

不久以后，我听说安娜病得很厉害。在饥饿和战争中度过的童年，影响了她的健康，她患了肺结核病。不用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恢复她的健康，建议她干别的工作，但是她断然拒绝：“我不能离开工地，不能离开姐妹们。”

安娜·洛什卡列娃因重建第聂伯水电站有功，荣获了列宁勋章。数年之后，在摩尔达维亚，我们又碰上了。她已痊愈，她和丈夫一起参加了杜博萨雷水电站的建设。我深信，治好她病的，不只是药物和南方的疗养院，还有她自己，因为她始终保持着朝气，不脱离工作，不与世隔

绝，一直充满旺盛的活力。不久前有人告诉我：安娜已经把自己的四个胖小子都养大成人了，现在她担任工人宿舍管理主任。我认为，她是青年的一位好老师。

在另一个工地现场，我认识了涡轮机安装工伊凡·鲁缅采夫。这小伙子年轻、漂亮，有一双灰色的眼睛。他很聪明，肯动脑筋，是个真正精通本行的能手。大概他很早就做工了，因为父亲在战场上牺牲了，他决心帮助母亲。由于他的求知欲很强，他补齐了学校里没有学到的东西；与此同时，又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伊凡在亚罗斯拉夫尔、高尔基、奇尔奇克等城市参加过几个大企业的建设，后来调到我们的扎波罗热工地来工作。当时那种用大块材料进行安装的新工作法，就是他提出来的。

“我们在地上把管子装配好，”他向我解释道，“矫正、矫直，一个个环节安装起来。这样子省力、方便，当然也更快一些。我们用起重机或绞车把装配好的管子吊上去，然后只需把它们连接成一个整体就行了。没有什么诀窍！”

“这是不是冒险？对人有危险吗？”

他微笑着说：

“看上去可怕，做起来没啥。您请放心，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大家早就计算过了，工程师们也检验过了。”

在冶金厂里有许多管道，它们连接各个车间，纵横交错，伸向四面八方，这是紧张的工段。我建议安装管理局党委常委们请鲁缅采夫在公开的党员大会上作报告。我们的《建设者》报登载了大会的总结，后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向安装工传授伊凡·鲁缅采夫的经验”的长篇文章。

章，于是这种工作法就在全中国推广了。

后来，鲁缅采夫参加过华沙文化科学宫的建设工作，在印度安装过比莱冶金联合企业……

我遇见的人很多，不能一一提到。希望这里没有提到的同志不要见怪。我并没有忘记他们。

(四)

我认为，记住人们，特别是记住那些好人，一般说来，是党的工作者做人的义务和职业的责任。与这些人交往永远是必要的。这会丰富党的工作者的阅历，增强他同生活的联系，帮助他，象俗语说的那样，从第一手材料中得知人们的想法、志趣和需要。最后，对自己来说，能够发现一个好人——工人、农庄庄员、建筑师、农艺师、画家、记者、学者，这简直是一件莫大快事。我在这方面从来不惜花费时间，幸运的是，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性质本身，也对此起了促进作用。

在扎波罗热的一次常委会议上，我们几个州委书记之间进行了分工。现在我说一下我分担的一些工作：全面领导州的工作；准备提交常委会讨论的各项问题；农业；宣传和鼓动工作；领导州计委、共青团州委的工作；领导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在州各局的工作；检察机关和干部问题。这些工作中的主要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要了解他们，同时也使他们了解我。

第一书记的工作中没有次要的事情。比如说，接见居民，能够说这是不重要的事情吗？不久前，扎波罗热炼

钢厂的一位老挖土机手，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讲到了这样一件事。他的妻子把食品配给卡全丢了。一家四口近一个月将没有面包吃。这位工人说，他到州委第一书记那里请求接见，书记指示下面帮助解决了。我自己早已把这件事忘掉了。但这个人却还记得。对他来说，当时这是生命攸关的大事。

食品配给卡这件事，只是象征性的一件事。这件事说明，我们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由于战争的破坏，要把田里的庄稼收回来，保管好，所花的劳动是难以想象的。畜牧业几乎得在一片瓦砾、到处是焦土的场地上重新搞起来。要办好工人食堂的伙食，给保育机关和医院提供充分的食品，也得花很大的力气，况且保育机关和医院还必须重新建造。要使几万人能住上房子，困难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没有住房，我们也不能丢下工厂的重建工作”，库兹明差不多每次开会总要讲这句话，当然，他讲得对。我要指出，扎波罗热建筑工程所以一直跑在前面，正是因为他们在城市重建期间推广了快速流水作业法，把通常建筑房屋的期限缩短了三分之二。房屋本来就不是象现在这样有统一标准的，只有根据这些房子的不同规格和不同的破坏程度分批地加以修复。1947年交付使用的住房就有五万五千平方米，这在当时已是了不起的成就……

直到现在我们谈的主要是第聂伯水电站和扎波罗热炼钢厂，但这决不是说，市里和州里就没有其他需要经常关心的项目了。譬如说，公社社员联合收割机厂也在进行重建。起初，这个厂的职工，在还是半倾圮的车间里就

制造出收割堆垛两用机，帮助集体农庄修理保存下来的联合收割机，并为他们制造收割装置，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1946年秋，州委常委会要求加速生产新的、而又更加完善的机器。1947年春，州委常委会讨论了C-6型联合收割机的成批生产问题，州委十月全会指出，这种收割机的产量，到第三季度已比第二季度增加了二点三倍。

回顾过去，想想做过的事情，我们总是从这些经验中汲取有益于今天和有益于未来的东西。在困难、紧张的时期，我通过亲身实践更加坚信，我们的传统做法是正确的，即对那些复杂的问题，州常委总是经常、坚决、严格地一再反复讨论的做法是正确的。如果任务已经提出来了，那么就应该彻底把它解决！积多年之经验，我牢固地树立了这样一个观点：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和责任心，是同检查各项决定的执行情况分不开的。如果我们的经济领导人完全执行了他们自己通过的一切决定，那么许多缺点早就不存在了。

有一个时期，地方的建筑材料供应问题在扎波罗热市十分突出，这关系到第聂伯建设工程、扎波罗热建设工程，也关系到那个公社社员联合收割机厂和全州的住房建筑。我照例又听到一片推说客观困难的苦经，看到种种敷衍塞责的批文和托词，似乎什么也做不成了。但是，1947年3月，我们在常委会上听取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汇报，5月，我们又重抓了这个问题，同时不忘日常的检查，下半年起，“砖”这个字眼就从我们的记录上消失了。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我还得处理一些同经济和日常生活无关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人的命运。保安机关要侦查和揭发那些过去帮助法西斯作恶的叛徒、伪警和讨伐队员，这些人目前隐藏在全国各个角落里，不应该让他们逍遥法外，不受惩处。但是，这项工作必须做得非常细致和慎重，不能捕风捉影，冤屈好人。党必须过问这一工作。我特别反复强调，对一个非自愿留在敌占区的人，不要动辄怀疑人家有叛国行为。

另一方面，也应该指出，战争刚刚结束，要特别提高警惕。每星期几乎都发生非常事件，甚至经常出现武装匪徒，一到夜间，枪声时有所闻。我常常独自一个人夜间开着车子在大路上行驶。如果一个人从整个战争的烈火中闯过来了，而在这时碰上一颗愚蠢的子弹，那才再冤枉不过哩！但是，老实说，当时没有时间考虑个人的安危，令人焦急的是另一桩事情——必须保证全体居民的安全，使他们能过上安定的生活。

1947年2月，州委常委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关于进一步同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的几项措施。记得决议说，我们必须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投到这一战线，加强各种维护秩序的机关，清洗那些不可靠的人：“既然他干了不道德的勾当，那就撤换他！最好让这个位置空着。那样，至少大家都会看到，这个位置空着呢，应该派一个得力的人去。或者由整个集体认真承担起改造这个人的任务。”

民警的工作非常重要。有各种各样的人到扎波罗热市来，但城市却是一片漆黑，没有路灯，没有交通工具。我

记得，有一段时间，拦路抢劫和流氓活动，严重地妨碍了工人上夜班。需要提高民警的威信，加强这一机构，但民警（我想起这么一件小事）的穿着实在太破旧了。我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首先要让民警穿戴整齐，让人们老远就看到——法律和秩序的卫士来了。”

还可以提出许多问题，它们与几项宏伟建设工程比较起来，似乎是些小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与生活有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抽出时间和作出正确无误的决定。当然，如果州委的其他书记不分挑担子，州党委各部门和各机关不协同工作，而且大部分问题不在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得到基本解决，那么，我绝对，正如俗语所说的，拉不动这辆车子。这里，我想着重指出党的领导人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要善于使用其他工作人员，同他们一道工作，信任他们，与他们同操心共努力，重大的决定要由集体来作。

扎波罗热的一班人，基本上是精明强干而又懂行的。我指的是：州委第二书记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州委书记Г·В·叶纽京、И·С·列兹尼克，市委第二书记Н·И·莫伊谢因科。可见，我是有人可以依靠的……

从1947年春天开始，我差不多每隔一天就要到扎波罗热工地去一次，夏天，我干脆把自己的办公室也搬到那里去了。在正在兴建的热电厂和三号高炉之间有一座变电站，它虽几遭轰炸，但有一半仍完整无损。在这里，他们为我找了一间屋子，放上一张写字台、一架电话机、两把椅子和一张床，床是给我值夜班时用的。后来留下值

夜班的次数愈来愈多了。

工地上出现的一切问题，必须到现场具体解决。困难时期，每天都有新的问题向我们提出来。我记得，我们作出了决定：实行两班工作制。这就有可能加快建设速度，保证完成计划。但是，没有灯光照明，晚间当然无法工作。想在州里弄到电灯泡，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决定写信给联共（布）中央日丹诺夫同志。我说明了情况，请求帮助——供应三千只灯泡。不到三天，我们不仅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而且还获得了灯泡。这样一来，就有可能组织第二班生产，减轻了许多人的劳动。这说明中央对有关重建大型工业企业的每一个微不足道的请求，都是十分关注的。

然而，有时我还不得不把建筑工程放一放。我记得，春播时期，我从别尔江斯克回来，由于忙着赶路，结果在野外，在上一年码起来的干草垛里过了一夜。早上七时许就驱车赶到波洛哥夫区。我同区委书记舍尔斯丘科谈话时问道：春播进行得怎么样？机器农具有没有问题？我发现，他有点儿欲言又止的样子。

“亚历山大·萨维奇，你怎么啦？直截了当地说，你有什么事？”

“我倒没什么……您早上听到广播吗？”

“没有，怎么一回事？”

“您知道吗，《真理报》社论打我们的板子了，报上说，扎波罗热炼钢厂的重建速度太慢。措词很尖锐。”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是这样……”我说，“这就是说，斯大林要打电话来

了。我得回去。”

当天夜里，约·维·斯大林果然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同我进行了一场严肃的谈话。我们已经完成的，不久前还看作是成就的一切，现在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几乎成了败绩。形势发生了变化——不是我们州，而是全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这座生产钢板的联合企业的投产时间，要求改在即将到来的秋季，命令我们加快建设速度。我已经说过，这同“冷战”有关。

1947年3月16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提前完成重建工作的命令，接着又颁布了一个加快设备安装的命令。4月8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建筑工程党委工作的决议，也就是关于党要从政治上作出保证的决议。一个月之内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关三次谈到我们的工作。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尖锐地批评了扎波罗热工程党委在复杂的条件下未能跟上形势。虽然我只不过是去年年底才真正开始工作，虽然我可以这样说，这儿没有我的过错，但是，我必须把全部责任都承担下来。这是州委第一书记工作的又一个特点：作为一个领导，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不能推卸责任，不能说这件事发生时他不在场，这个他不知道，那个是别的同志负责的。从他接任全州党组织的领导职务的那一时刻起，他这个第一书记就对一切承担起责任了。

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发表后的第三天，扎波罗热工程召开了党员大会。发言是坦率的、尖锐而不讲情面的。我在自己的发言中，对工地工作的情况作了批判性的分

析，详细地谈到了乌共(布)扎波罗热州委和市委工作中的缺点。

4月28日，我们把有关联共(布)中央决议的问题提交扎波罗热市委全会进行讨论。建设者和启用者都带着新的计划草案和工作进程表来到会场，他们谈得很具体。例如，库兹明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照我们3月份达到的水平干下去，那么高炉投产需要四个月的时间，板坯初轧机开工使用还要四个月的时间，冷轧车间则需要八个多月的时间。

“不要因为3月份的计划已经完成就感到满足了，”这位厂长说道，“要是与4月份相比，速度至少还应该再提高一倍。”

必须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工地上，”当时有人在市委全会上发言说，“今天有三万名工人在劳动。但是各个工区还感到人手不够。要是我们能够把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二十，这等于增加了六千人，那就可以满足工地的需要了！”

现在我们计划工作，已不能用几年，而是要用几个月，甚至用几天来计算了。大家都明白，我们作计划的出发点，绝对不能根据“可能”，而是应该根据“需要”。当大会宣布，我们每昼夜必须完成价值一百万卢布的建筑安装工作量时，全场哗然，许多人还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然而这一指标到5月底时已经达到，到秋季，轧钢车间开工的时候，一昼夜所完成的工作量，其价值已达二百万卢布）。

我在会议快结束时发了言。我谈的内容主要是：必

须在工地上形成一种工作灵活机动、人人奋发向上、注意俭省节约、自觉加强纪律的战斗局面。目前正是这一点才是主要的、基本的、决定一切的。那时我观察到不少现象，它们足以明显地指出我们的疏忽之处和可挖的潜力。

我在会上还谈到这样一件事：有个大车间，窗子都装上了玻璃，屋顶也安上了电灯，可是不久在邻近地方进行了一次爆破，玻璃全被震碎了。这说明，我们一面向工人宣传节约，一面自己在砸玻璃。这样干是不行的！扎波罗热工程党委应就这种浪费现象追究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不管他是什么人。我极其坚决地强调了这一点。但是，我立即认为有必要作一些补充：

“如果我们不干预此事，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不加追究，那是非常危险的。然而，我并不是要求党委开除什么人的党籍，或者象通常说的那样，给子一大堆警告处分。这也不是办法。”

重要的是防止同志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五)

我们要力求以爱护的态度对待干部，珍视我们组织中业已形成的党的与人为善的优良传统。一般地说，我从来不赞成那种粗暴的、大声叱喝的，或者有人称之为“随心所欲”的领导方法。假如一个人被吓坏了，那他再也不肯负责任了。而我们不应该束缚，恰恰相反，应该支

持最广泛的首创精神。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不搞革新，不积极探索，我们什么也办不成。话又说回来，即使在安定的环境里，大叫大嚷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台 BK-151 塔式起重机供安装工作使用，在当时这就算功率强大的机器了。为加快工作进度，起重机负荷过重，起重臂掉了下来，不能再用了。我听说出了这个事故，急忙赶到现场，那儿正在大喊大叫，起重司机站在一边，面色煞白煞白。国家锅炉及起重运输设备监察委员会，甚至侦查机关也都派人赶来了。看来，只有库兹明一个人还保持着镇静。

“有没有伤亡？”我问他。

“没有，”他回答说，“落点太适当了。即使作过专门计算，也无法在这么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找到更适当的落点了。”

对此事开始了调查。起重臂确实掉在空地上，没有砸死人，也没有砸坏任何东西。这时我却听到有人歇斯底里地叫嚷着：“这是破坏！把司机送交法庭！把工地主任送交法庭！”我希望人们正确了解我的意思：我主张严惩，但主要是严惩那些罪证确凿的真正坏蛋和罪犯。然而，当我确信这里没有任何恶意破坏，只是由于不慎造成了事故时，我便要求大家换个调门。为什么要造成紧张和恐怖的气氛呢？相反，要充分理解这一不幸事故所引起的难过心情，同时，还要激发人们去探索一条最快、最合理的摆脱困境的办法。

办法找到了，建筑工人采用了多台起重机合吊的方法，使安装工程得以继续进行，甚至连工作进度也没有

耽误。如果采取严惩的办法，那么，对人、对建设、对我们为之服务的事业又有什么好处呢？退一步说，就算这一事例对别的起重司机和工地主任能起杀一儆百的作用，但是，这样一来，我们的突击手和那些搞革新的工程技术人员，就要按照指示的全部条文，“等因奉此”地工作了，那你就休想在极其苛刻的期限内完成建筑工程。

对修复遭受破坏的工业进行指导的专门学科是不存在的，教我们如何在废墟上把烧尽的、破碎的、炸毁的建筑物兴建起来的教科书也是没有的。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任务本身就要求大胆创造。重要的是，不要扼杀人们的创新精神，必须鼓起所有人——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党的工作者的勇气。在那炽热的（按其原义和转义来说）夏天，在突击工程的各个工段上，人们打破了常规，因而也是在冒风险。然而这种风险是应该冒的，因为它是经过周密考虑的风险，是以知识、经验和精确计算作为依据的风险。

例如，有一次需要从铁路站台上卸下重达八十二吨的轧钢机机架。而钢板起重机只能起重三十吨。在一切工作条例上都要求用功率更大的技术设备，对这个起重队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拒绝接受这项任务。他们可以说：你们去找吊得起的起重机吧，拖到现场来，我们等着。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负责起吊工作的老师傅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切皮加，是个寡言少语、看上去有点抑郁的人。他绕着站台走了一圈，仔细察看了非常沉重的机架，然后又仔细地察看了为机架准备的底座。他自己大略计算了一下，然后

同队里的同志商量了一会儿，便同工程师一起验算了计算数据，结果一个我们叫做“杂技”的节目就准备妥当了。他们在站台和底座之间用枕木搭了一个垫台。随后钩住机架上部，按照切皮加的口令，起重机（就是那台三十吨的）把机架的一端转到垫台上。然后钩住另一端，吊到底座上去。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把机架安放到需要的位置上。戏法的诀窍就在于，重量的主要部分一直放在坚固的支点上。这真正是一出戏法，但它是建立在一个有才能的劳动者的大胆、机智和精确计算的基础上的戏法。

他后来也用这种办法转动了重达一百三十吨的轧钢机的剪断机机架，而且时间定额缩短到九十分之一。在重建热电厂时期，也有过类似事情，当时要把锅炉的沉重炉体吊到很高的位置。这是责任重大的事情，这里又没有必需的起重设备，但是有一位工程师建议用功率不大的吊杆和桁架配合提吊。苏联国营建筑安装托拉斯的专家们知道此事后，着了慌。可是当他们赶到锅炉房时，锅炉炉体已经安装好了。这项工作本来要花几天的时间，当时只花了三十二分钟就解决了。

有一次，我走到从斯大林格勒来的安装工人小组跟前，说：“你们好，近卫军同志们！”我这样称呼他们，不仅因为许多人尚未脱去士兵服，而且因为安装工在我们这儿是殿后的，最后完工期限要决定于他们，正如常言所说的，他们是无路可退的。我照例地问他们，工区有什么新鲜事儿，他们却哈哈大笑。他们讲他们那里发生的事儿，我也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

这事儿的确滑稽可笑。有张图纸落到他们手里，上

面有严厉的批语：“急用！今天必须完成。利夫希茨。”好家伙，安装工人一看，可吓坏了：按最苛刻的工作定额也得要三天时间。不骂娘是不可能的，但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拼命动脑筋，想办法，居然一天就把一切都安装完了。可就在这时候，设计院有个姑娘跑来找他们说：“图纸在哪儿？”原来，苏联冶金工厂设计院动力处处长利夫希茨同志的批语与安装工人完全无关。他只要求把图纸的复本绘制好。

在所有工区，人们简直都在忘我地、大胆地、各展其才地劳动着。有时，他们不完成任务就不回家，一连几天留在工地上——在僻静地方睡上三四个小时，又开始大干起来。州党委从一开始就造成一种意气风发、你追我赶的气氛，人人胸怀伟大目标，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无限的信心。我感觉到：工地上出现了决定性的转变，现在我们将前进、再前进。劳动大军成长起来了，他们敢于执行最大胆的计划，能够在最紧迫的期限内完成任务。重要的是他们能稳扎稳打，犹如在战场上夺取一个又一个堡垒一样……

扎波罗热人的劳动成就，在全国劳动战线上已经尽人皆知了。《真理报》写道：“如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建设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厂和库兹涅茨克冶金厂一样，现在扎波罗热工程这几个字不仅应当成为建筑人员进行战斗的号令，也应当成为迅速重建扎波罗热炼钢厂的一切有关人员进行战斗的号令。”

那年夏天，在许多鼓舞斗志的手段中，报纸、布尔什维克的鲜明有力的语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到扎波罗

热工作后，立即坚决主张增加几份州报的发行量。尽管当时国内纸张不足，联共(布)中央还是支持了我们。我们还争取做到了工人新村无线电化。后来有一件事使机关工作人员大为惊异，那就是他们在工作中第一次听到：州委第一书记竟把扎波罗热工程报《建设者》编辑部的工作报告提交常委会讨论。在常委会的决议中写道：“州党委对报纸在加强群众思想工作方面所起的巨大组织作用估计不足，没有利用报纸作为讲坛……”

在工程最紧张的时候，《真理报》、《苏维埃乌克兰报》、《扎波罗热布尔什维克报》的巡回编辑部都搬到工地上办公。我们州报的宣传鼓动部长是安德烈·克柳钦科，我是在前线认识他的，我们一起从高加索一直打到布拉格。他当时是个有胆略的团政委，后来成了有胆略的新闻记者——在办报事业中这种品质也是必要的。我还记得《扎波罗热布尔什维克报》巡回编辑部的一位编辑弗拉基米尔·列平。这个人，瘦削的身材，高高的个子，戴一副眼镜，具有非凡的钻劲儿。他能最先弄到工地上的各种消息，并且很快——通过报纸，通过传单——使这些消息家喻户晓。

关于特别重大的事件，我们就定期印发传单，由共青团员们开卡车到城里去散发，有时也用 ПГО-2 小型飞机空投。下面是其中一张传单的全文，报道我们得来极其不易的胜利：

(快讯)祖国，请接受我们的汇报：

扎波罗热出铁了！

今天炼铁工人炼出了战后第一炉铁。扎波罗热人啊！你看到了你为亲爱的祖国造福和争光而进行的忘我劳动的果实。

全体苏联人民庆贺扎波罗热炼钢厂所属的超大型高炉和热电厂的复兴。这真是死里复生啦！苏联人民都知道，它们被法西斯恶魔破坏到什么程度。

扎波罗热人啊！今天全国人民都满怀感激的心情在念叨你的名字。

前进，向新的胜利前进！

然而，我的话未免说得过早了：要达到这一胜利，常言说，还得少安毋躁。传单发出去后，就有人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那些妨碍工程的人。我举一个似乎无关重要的例子。有人在路上丢下一块扁钢锭。它妨碍人们工作。第二天一早，钢锭上就出现了下面几句话：“搬运师傅：快把钢锭搬走——丢在路上，妨碍工作。限五小时之内！”还署上名字。你们可料得到——钢锭竟搬走了，道路居然扫除净尽！应该说，这件事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各种各样直观的宣传鼓动工具也“工作”得很好。你走在工地上，到处可以看到数字、日期：板坯初轧机到哪一天开工，冷轧钢材到哪一天生产，只剩下三十天，只剩下十五天……十天……五天了。工地上的事，全城人都一清二楚，每逢召开大会，我们就邀请全体居民参加，建筑工人也把全家人都领来。

“怎么回事，”某人的年轻妻子可能要问，“别人都受到表扬，怎么一句也没提到你呀？”

或许孩子会问：

“爸爸，为啥人家给彼得叔叔鼓掌，不给你鼓掌呢？”

这就是真正做活了的群众工作，它的效果非常大。为人们似乎只需要物质刺激——那是大错特错了。不，苏维埃人需要的东西很多——意识到自己同伟大事业的关系，努力在劳动中表现自己，对自己的技能感到自豪，希望受到同志们的尊敬和得到荣誉。

但是所有这些精神上的需要，当然应该加以培养。在这方面，处处都插一手的报界工作人员对我们帮助很大。人们的先进经验、某人的光辉一生、某人的最高记录、某工区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所有这一切都有效地在各种报纸上登载了。新闻记者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工程参加者。

我记得，我曾建议巡回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同我们工厂和工地的领导人一起每天巡视施工现场。在现场上，随时都会出现有趣的问题，随时都能进行有益的谈话，同时还能熟悉工地上新涌现的英雄人物。我们不仅期待报纸上的赞扬，而且也期待尖锐的批评。

我要顺便说一句，我们要尽可能地不使建筑工人、安装工人和启用人员被过多地叫到各级领导机关去谈话。“把全部工作都搬到现场去做吧，”我常对同志们说，“如果有事，就到工地去。”由于他们看到，州委第一书记正是这样以身作则的，所以这种做法很快就成了区委、市委和州委各书记、部长和指导员们的习以为常的工作作风了。这对他们自己也是大有裨益的。

〈六〉

工程在日益迅速地进展着，它要求挖掘一切潜力，要求革新劳动方法，提出先进的技术方安、树立敢想敢干的作风。我发现，我们的各种困难和匮乏，往往有助于产生新的、有创见的设想。现在提一下留在记忆中的许多事例中的两个事例。

第一个动工修复的三号高炉，是几遭轰炸而保存下来的唯一高炉。但它已经下沉了，倾斜了，好象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只是由于炉内还有炉料才没有完全倒塌。看来出路只有一条：先把这座巨型高炉修好，然后再重新安装。但是，钢结构制造装配局的装配人员，在富有经验的安装工M·H·丘丹的领导下，却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决定把高炉拉直弄平。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有这样干过。详细订出这一计划的该局总工程师A·B·舍加尔这样对我说：

“形势逼得我们采用‘医疗外科学’的基本原理，来补充建筑艺术的传统方法。”

一个晴朗的早晨，装配工人敲掉了炉瘤（凝结的铁块），把九台功率为一、二百吨的液压千斤顶放在高炉下面，然后割开炉身外壳，开始往上吊。千百个建筑工人围在四周愣住不走了。许多人刚刚下了夜班，虽然精疲力尽，昏昏欲睡，但大家还是紧张地等待着看个究竟。我也留下来了。那一天我还有其他好多事情，但是，也和大家一样，舍不得离开。巨大的炉身稍微颤动了一下，慢慢地

竖了起来。炉身的升高用了五个半小时，谁也没有离开工地。我也一直呆到两边割开的隙缝衬上钢板，焊牢为止。大功告成了。时间不是两个月，而是五个半小时啊！为国家节约了一百多万卢布。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丘丹和埃齐克·沃利弗维奇·舍加尔因提出这一大胆的方案而荣获国家奖金。

钢结构安装局局长马尔克·伊凡诺维奇·涅杜日科也成了国家奖金获得者，这是一个有雄才、有胆略的人。他是我的同乡，也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地区的人，他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里，在工厂里当过钳工、焊接工，后来成了安装工。在前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他已经领导过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工地上的安装工程。战争时期他负责敷设通往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的输油管。油管先是安装在拉多加湖的冰上，后来又放到湖底，这样就为列宁格勒方面军提供了所需的燃料。在敌人炮击的时候，马尔克·伊凡诺维奇曾掉在冰冷的拉多加湖水中，从此他重病缠身。但是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的安装局在扎波罗热接受了修复轧钢车间的任务：这几个车间遭到法西斯匪徒精心而又野蛮的破坏（我前面已提到，所有柱子上都写着红色拉丁字母“F”）。马尔克·伊凡诺维奇估量了这一片东倒西歪的乱摊子，建议把整个车间的横竖管道都拉起来。这一大胆、新颖的想法着实使人吃惊。他把要修复的车间划成几个大块块：每一块大约包括二十根柱子，重量至少有一千吨。然后用气割法，一块一块切割开，接着开动他和局总工程师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佩特连科共同设计的套管伸

缩起重装置。这种装置象抓住车间屋顶一样，把整段梁架向上拉起，七歪八扭的柱子也随之逐渐挺直，桁架和大梁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当然，许多零件不可能修复了，只好将其去掉，而有些结构上却留下了接缝和补丁——这还是那种“外科疗法”。

结果，这一段最复杂的工程，起码提前一年完成了。原来打算当作废铜烂铁处理的不少贵重结构得救了。修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工厂的学科，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当时，这门学科我们太需要了，但今后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最好别再用到它。

我们先修复扎波罗热炼钢厂的首批生产线，它只包括生产钢板所需的那些环节。带有鼓风设备的热电厂要为高炉吹风，炼铁的高炉为轧钢车间提供必要的燃气。但是我们不能只做到这点为止，同时还要进行恢复整个企业的工作——铁路网、给水、供电等附属生产部门。重点工程积累的经验非常宝贵，重要的是千万不可使其自生自灭，不要束之高阁，一定要在其他工程项目中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乌共(布)扎波罗热市委委员会专门通过了一项关于研究和推广扎波罗热革新者的先进劳动法的决议。高炉开始吹风前不久，我们召开了党和经济工作积极分子会议。我在会议上谈得最多的自然是关于投产前的一些迫切问题，但也谈到了远景：

“我们大家一起终于在短期内把经济工作领导人员和共产党员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完成国家计划的工作上了。但我们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我希望扎波罗热工程的经验(从党的领导工作角度来看是最典型的经验)将成

为我们整个党组织、一切工业企业的学习榜样。”

那时全国各地都支援我们重建这个工厂。工地旁边搭了许许多多的帐篷，上面写着：“高尔基”、“里加”、“塔什干”、“巴库”、“远东”——建筑队就住在这些帐篷内。分布在七十个城市的两百多家工厂在生产我们的订货。高尔基市送来卡车，阿尔汉格尔斯克供应枕木，亚罗斯拉夫尔提供电动机，巴库和格罗兹尼供给沥青和其他石油产品。各种机床是从莫斯科运来的，钢轨是从库兹涅茨克运来的，木材是白俄罗斯提供的，金属构件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各家工厂制造的，其中也包括我那亲爱的捷尔任斯基冶金厂。基辅、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河罗斯托夫、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市甚至还为我们准备了重建各车间的设计图，虽然在扎波罗热市已经成立了苏联国家冶金工厂设计院分院。

在这里我还想对一位朴实的妇女——扎波罗热炼钢厂的女工程师 E·C·舍列麦特说几句称颂的话。一个人能否作出很多贡献呢？如果他对事业忠心耿耿，并且牢记自己的职责，是可以作出很多贡献的。在乌云压城的撤退日子里，她冒着希特勒匪徒的扫射，把所有图纸收集起来，运走，保存好，胜利后又送还给工厂。这些图纸有成千上万张之多。真是大派了用场啊！设备到达了——有疏散后运回来的，有为我们新造的，——这些老图纸使设计师和安装工人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设计人员和工人竟想方设法把那些老机器加以改造，使之现代化。例如，克拉马托尔人为我们安装的一台板坯初轧机，仍是战前的那一台老机器，但是这台初轧机

的钢锭年生产量从一百二十万吨增加到二百万吨。

在扎波罗热工程的全体职工的倡议下，那一年开展了全苏社会主义竞赛。当时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在突击工程上，一个突击工作年，不是三百六十五天，而是三百六十五个昼夜。我记得，列宁格勒人的来电真使我们高兴：他们不但自己提前给我们发来了急需的设备，而且还号召全国各电器工厂提前完成扎波罗热的订货。我们立即发出复电：

列宁格勒，州委波普科夫同志、电器厂卡缅斯基同志、黑色冶金电气器材供应站斯佩克托罗夫同志：

关于提前发运高压设备的来电已收悉。电气安装情况大为改善。几个施二项目的电气安装工程可望如期完成。感谢全厂职工提前发货。

乌共(布)扎波罗热州委书记

И·勃列日涅夫

扎波罗热炼钢厂厂长

А·库兹明

在投产前的最后一次积极分子大会上（我上面已提到过）提出了有关“零星工程”的问题。许多工区的领导人自豪地汇报了规模巨大的工程的完成情况，剩下的工程，好象是微不足道似的，他们都撇开不谈。但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工程不完成，根本就谈不上企业的投产。应当使工程秩序有条不紊，在执行计划方面有严明的纪律，以下就是有关这方面的发言记录：

“库兹明同志：零星工程加在一起，有时候往往比大规模工程更重要。要知道我们所有工程的期限都快到了。

“勃列日涅夫同志：你提出这个问题很好。应该说得更严格些。建设者还应留给工厂三个星期的试车时间。5月10日我要乘飞机外出，向政治局报告建设的进程，你的意见我认为很重要……”

我还想强调一下：无论建设者，无论州党委，无论我本人，连想也没有想过，我们可能无法如期完成计划，可能请求延期投产，修正计划任务。计划是实现党的经济政策的主要手段。计划在制订阶段，可以并且应该讨论。但是，当计划已被批准，在我国就具有法律效力，那就只有一个义务——去完成它，而且只能按期、以最少的费用和最高的指标把它完成。

当然，没有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最积极、最有效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建成规模如此巨大的工程项目。他们对我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但也给了帮助，如有必要，这种帮助是迅速而又及时的。足以说明问题的是，有些日子，在工地现场，竟会同时出现来自莫斯科的五位部长。汽车工业部、航空工业部、装备部、运输机器制造部、煤炭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应该帮助扎波罗热炼钢厂，并且也给予了帮助。

苏联重工业企业建设部部长 П·А·尤金和苏联黑色冶金工业部部长 И·Ф·捷沃相，比其他部长来得更勤。我和捷沃相是在前线，在解放南方的几个工业中心的日子认识的。他当时就谈到过关于重建高炉、平炉和轧钢车间的一些问题。现在，他一来到我们这儿，就始

终不渝地参加早巡视，当场解决所发生的问题。这是一位好领导，有威信，又熟悉业务。

日子过得很快，时间愈来愈紧迫，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当我回忆起这段时间，总感到心情舒畅而愉快。第一列满载克里沃罗格矿砂的直达列车，到达了扎波罗热，这是大喜的日子。高炉已进入烘干阶段，这也是使人高兴的事。热电厂的鼓风装置开始试用了，首批炉料车沿着斜桥滑过去了，这对每个参加建设的人来说，又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大事。

从莫斯科来了以著名冶金学家、苏联科学院副院长伊凡·帕夫洛维奇·巴尔金为首的国家验收委员会。我还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的时候，就认识巴尔金了。虽然他平常措词谨慎，很有分寸，但在扎波罗热炼钢厂的首批工程的验收书上却写下了如下评语：“建筑工人和安装工人在这里建成的工程如此巨大，不论按规模，或是就解决技术课题而言，均是无与伦比的。”

盼望已久的、意义重大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对一切准备工作作了最后检查后，就下命令：“开炉！”煤气工拧开热风阀门，总工长拿着点燃的火把奔向出铁口，炉子呜呜响了起来，这时，热电厂主厂房上的汽笛，也大声吼叫起来，它宣告着扎波罗热炼钢厂的第二次诞生。城里的人们听到汽笛声，纷纷涌上街头，素不相识的人相互拥抱，大家竟高兴得流出了眼泪。1947年6月30日傍晚时分，我们全体都感到十分珍贵的扎波罗热生铁终于出炉了。

那一天的情况，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炉子均匀地发出嗡嗡声，说话必须扯开嗓门，但这是每一个冶金工

作者所习惯的嗡嗡声，它也使我感到高兴，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冶金工作者。氧气切割器烧穿出铁口，一条白热化的金属细流涓涓流出，它沿途溅着火星，逐渐加大流速，变成了铁水巨流。漾起的波纹，随着铁流奔腾，我们大家也紧紧跟在后面，观看铸罐第一次盛满铁水。还记得，当时我和巴尔金两人相互久久地紧握双手，我们吻遍了在场的炉工。

此时就在工厂的院子里立刻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有一万六千多人参加。我向建筑工人、安装工人和冶金工作者表示祝贺，祝贺他们生产上取得了辉煌胜利，号召他们加快速度，争取完成年度计划，在我国伟大十月革命三十周年这一大庆之日到来之际将轧钢车间交付使用。

是啊，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7月底我们在板坯初轧机上轧出了第一批钢板，8月30日国家验收委员会验收了热轧车间，而9月28日我们就在冷轧板整理车间举行了总“投产”大会。装饰着鲜花的机车，就停在讲台前面，车后拖着一节节平板车，满载着我们要送往莫斯科汽车制造厂的成品，有一节平板车上竖着一块宣传画牌：上面写有：“祖国，请接受扎波罗热的钢板！”

扎波罗热人履行了诺言，国家按贡献评定了他们的功绩。两万名工程参加者获得了恢复南方黑色冶金企业奖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奖励先进集体的命令。扎波罗热建筑托拉斯和扎波罗热炼钢厂被授予祖国最高奖赏——列宁勋章。许多工人、工程师、生产上的指挥员、党的工作者也都获得了列宁勋章。他们中间也有这篇回忆录中提到过的人：И·А·鲁缅采夫、М·Н·

丘丹、A·B·舍加尔、M·И·涅杜日科、B·Ф·迪姆希茨、A·И·库兹明。授奖名单上也有我的名字。这是非常珍贵的奖赏——我所获得的第一枚列宁勋章。

1947年11月，从废墟中恢复起来的焦化厂开始在扎波罗热投产，炼铁工人现在有了可靠的后方。但是这次庆祝会我不可能参加了，因为联共(布)中央已决定派我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工作。

我怀着业已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心情离开了扎波罗热。在乌共(布)扎波罗热州委的第十九次全会上(我在这里参加的最后一次全会)竟会有这样一段插话。会议开头，同志们对我的工作讲了许多好话，这里我不再一一列举，而后主管农业的州委书记彼得·萨维利耶维奇·列兹尼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狡黠地眯缝着眼睛。现在我把速记记录中所记的对话照原样援引如下：

“列兹尼克同志：好吧，我们现在要和勃列日涅夫同志开展竞赛了。顺便说说，我们州正走上坡路，基础打得不错。首先，我们今年播种了六十万公顷，而不是五十万公顷。秋播作物长势很好。其次，秋耕地已经翻耕，国家计划已经完成，现在正在交余粮。勃列日涅夫同志必须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创造出象他在扎波罗热所创造的那种鼓足干劲的气氛。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一定会遇到一点困难的。(全场都笑了起来)

“勃列日涅夫同志：要考虑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有了了不起的布尔什维克。

“列兹尼克同志：但是您也要考虑到，那一堆烂摊子现在也了不起呀！(笑声)

“勃列日涅夫同志：同志们，谢谢！至于竞赛，那应该是健康的、布尔什维克式的……”

(七)

于是我来到一个新的工作地点……

当然，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出生与成长的地方，一直没有中断过联系。在扎波罗热工作期间，我一有机会，就去看望母亲和亲人们，在自己工作过的厂里逗留一会儿，有时因公到这个邻州的首府去，到那儿，自然要去州委，看看自己以前的老同事。现在我又回到了家乡，这次可真的要长期呆下去了。我被选为州委第一书记。我和以前的老同事，已不只是共叙往事了，我们还要讨论明天应做的事情。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地区战前已很出名了，它有自己的冶金工业，有几十个铁矿并和锰矿并，它盛产小麦和玉米，畜牧业也极为发达。这是乌克兰最大的工农业州之一，虽然我在战前年代对它已有较深的了解，但是现在我必须重新而且尽快地熟悉情况，分析各种困难，明确当前的任务，拟定远景规划。

这里遭到的破坏，也使人触目惊心。希特勒匪徒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炸毁和烧毁了一百七十座工厂、六百五十七幢住宅大楼、二十八所医院。他们拆掉六十八公里电车轨道和一百多公里架空铜线，并且运往德国。他们破坏了歌剧和芭蕾舞剧院、艺术陈列馆、一所大学和几乎所有的中小学及学院、火车站和铁路桥。富丽堂皇

的冶金工人宫，被法西斯分子变成了马厩：几间明亮的大厅被隔成一间间马栏，由金属镶边的木块拼成的地板上堆满了马粪。

法西斯分子打算在这一地区把金属生产搞起来。不伦瑞克炼钢厂、福施公司、联合铝公司、容克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公司的代表频频飞来这里。他们想修复扎波罗热炼铝厂、第聂伯特种钢厂、扎波罗热炼钢厂，但是，由于地下工作者的破坏和我们工人的抵制，他们的企图未能得逞。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占领者多次试图使平炉和高炉开工，但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诚然，他们也搞成了一项生产，那就是在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厂内开办了一个果冻厂……

我亲爱的故乡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获得解放的那个欢庆日子，我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我们的司令部设在塔曼半岛。我们的营房设在从前的国营畜牧场的地方，畜牧场的牲畜棚成了我们的一种特殊帐篷。1943年10月25日夜里，扎列卢阿将军跑到我那儿，把我叫醒说：

“太高兴啦，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解放了！我们的部队一举攻占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莫斯科正在鸣放礼炮呢！”

那时我们对庆贺胜利的礼炮已经习惯了，但是这次礼炮对我却不同寻常。

还在前线的时候，我就经常留意第聂伯罗彼得罗夫地区在赶走占领者后的工作进展情况。解放后第三天，即1943年10月28日，彼得罗夫厂的工人修复了热电厂

的一个汽轮机，并已投入生产，为城市供电，而1944年夏天又使第一座平炉投产。在我那亲爱的捷尔任斯基冶金厂大门旁边的街心公园里，有一座朴实的纪念碑，它使我感动得掉下泪来。纪念碑的底座上只有一块钢锭：别无他物。上面题着几行字：

“第一块钢锭系1943年11月21日由第五号平炉铸成，即德国占领者被赶出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城的第二十六天。五号平炉第一炉钢。炼钢工Ф·И·马克列斯和Г·А·潘克拉坚科。”

有人告诉我，弗兰茨·约西弗维奇·马克列斯和戈尔杰伊·安季波维奇·潘克拉坚科不仅炼出了第一炉钢，他们还亲手拆开这座惨遭破坏的平炉的炉壁和炉顶，取出凝结的炉瘤，而后又自己动手修好。他们两人现在都老了，两个人都参加过国内战争，都曾是在1919年我们厂里铆接的那种装甲列车上的炮手。他们两人就是劳动人民的化身，弗·伊·列宁在1919年谈到劳动人民时说：

“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我们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①

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后，这一思想特别明显地得到了证实。因此，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现在世界上的两种社会制度正在进行搏斗。这一搏斗在列宁在世时已经开始了，今天还在继续着，因此，难免要对比一下——谁炼了多少钢，谁采了多少石油，谁生产了多少

^①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843页。——译者

电、多少粮食、多少棉花。我们在算这笔账，我们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也在算这笔账。他们不得不承认，苏联在许多方面赶上了美国。而在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经济指标方面还远远地超过了美国。然而，他们却总是过分地强调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暂时还没有丧失领先地位的那些经济指标。

同时，对我们和他们过去所处的那些历史条件，他们却守口如瓶，企图向自己的读者和听众隐瞒真相。其实在这场，按照他们的说法，“公平的”竞赛中，一方由于远隔重洋，从未遭受过敌人的侵犯，反而在每一次战争中还大发其财；而另一方，却不断受到挑衅，承受了两次战争的最沉重的负担和最严重的破坏，有许多部门几乎不得不从零开始。在扎波罗热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就是这样，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全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毁掉了我国财富的三分之一。

人们不禁会想到，如果没有人妨碍我们，没有人跟我们捣乱，没有人迫使我们离开和平劳动岗位，没有人逼我们搞军备竞赛——在国防上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的话，我们将会多做多少事情，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方面将会前进得多么快啊。尽管有这样一些干扰和阻碍，我们还是在经济、科学和文化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并以此迎来了十月革命六十周年。由此可见，苏维埃制度和我国人民拥有多么了不起的力量！

……我在扎波罗热只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然而，调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时，我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这里也是从巡视工厂和集体农庄开始的，我经常去工地，

下矿井，尽可能多同人们接触。党的工作性质许多人都已知道，因此我来谈谈工作作风问题吧。那时候，劳动经验、战争、人与人的接触、看书和思考，无疑已经决定了自己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我们一切领导人的作风，原则上应该只有一种：即列宁的作风，党的作风。一般说来这是不错的。但同时，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特点。虽然各个州委第一书记的任务、职责范围及权限有其共同性，但是每个人的性格特点在其工作中肯定会表现出来。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我不得不撤换我在战前就认识的 П·А·奈杰诺夫，当时他担任执委会主席，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一个积极而又坚定的领导，为人非常正直，是我的好同志；我记得他有很多优点，但在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州的工作搞得不大出色，结果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更换领导的问题。

我的阅历，在这里，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也用上了。我还记得同几个大厂厂长第一次相识的情景。收割工作开始了，我向州委农业部长 Ф·Е·甘津：我们的运输情况怎样？他的答复与我预料的一样：不妙。那么城里的车辆呢？他回答说，已经通知了各个工厂——调派多少辆卡车、支援哪些单位——但是这些厂长总是拖延、失信，即使给了，也是一些破旧的卡车。

这方面的做法上有缺陷。上面凭空想出一些数字，下面支吾搪塞，因为他们也必须完成本厂的计划。并且，提要求的人也好，承诺的人也好，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登记四十辆汽车，那么能得到的不会超过二十辆，这种情况年年如此。我坐下来拿起电话听筒，请总机给我接

尼科波尔钢管厂厂长 H·A·吉洪诺夫。我向他问了好，并且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一定到您那儿去，但要稍迟几天。现在我想请您帮个忙，今年的庄稼很好，已经成熟了。我知道，您是一位负责的厂长，你们厂搞得不错。如果你们能支援一下收割工作，我们就非常感谢了。不过，请您派好的司机，派管用的车子。”

“我可以拨出十五辆，”他想了一想说。

“请您再考虑一下，跟大家商量商量。要是粮食收不上来，那太可惜了……”

我和其他一些厂长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谈话。他们虽没有按预定的应摊数量派出车子支援收割，但是我们得到的确实是好车子，数量比往年几乎多了一倍。能够做到这一点，全靠平心静气和通情达理的谈话。

那时，我已经深刻认识到，即使在原则问题上同某人发生了分歧，也必须尽力做到通情达理，平等待人，不能侮辱人格，不能逼得人家无路可走，不要伤害人家的自尊心。你可以说：“胡扯！”如果人家出自一片真诚，你不妨也可以这样说：“谢谢您提出的意见。我们再考虑考虑。如果这么做试试看，行吗？……”我认识到，必须控制感情，党把我放在那样的岗位上，我没有权利不加思索地随便讲话。我召集人们开会的时候，确实是虚心同他们商量的，我让每一个人都把意见说出来，同时不忙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否则，会有这样一些同志，他摸到“领导上”的观点，好啦，你就休想再听到不同的意见了。

领导人总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因此，不能表现出手足

无措、软弱无能的样子。不管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外表上必须镇定自若，精神奋发，必须控制住感情，好让人们从你身上也能获得信心。有时，我们对幽默诙谐的作用重视不够，其实开句玩笑，往往也会帮助你把事情办好。

那时，我们认为，工厂对集体农庄的支援，是发展农业和增产粮食的重要推动力。尤为重要的是应提供室内脱粒场，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再从发通知、下命令和给处罚着手，但我采取了另一种办法。有一次，厂长Ф·Н·巴拉金、Н·Р·波波夫、И·И·科罗鲍夫、П·В·萨夫金等都在州委，谈论工厂的工作，而我却突然说：

“有人告诉我，彼得·瓦西利耶维奇打算收拾出二十个室内脱粒场。”

这位后来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列宁工厂厂长彼得·瓦西利耶维奇·萨夫金，干咳了一声说：

“不，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二十个我承担不了。九个还勉强凑合一下。”

“那好吧，咱们就一言为定了！伊利亚·伊凡诺维奇·科罗鲍夫同志有什么要说的？”

后来大家都笑了，但工作推动起来了。另外还有一件事。那是夏天，正值最炎热的时候，我邀请州计委主席和州委地方工业部部长到我这儿来。我们商量了一下当前的工作，我象是顺便地问了一句：

“有点克瓦斯^①喝喝该多好啊，是吗？”

“可不是！”两人点点头。

① 用面包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译者

“咱们州生产吗？”

“暂时……还没有。”

我按了一下电铃，根据事先的布置，有人把一罐克瓦斯端进办公室来，这是一个工作人员从家乡带来的。

“请喝吧……”

I·M·德柳钦科主管州计委工作，是我的老朋友，我俩一起在外贝加尔的一个坦克连里服过役。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用意。

“怎么样，德柳钦科同志，”我问道，“克瓦斯还可以吗？”

“我们马上动手干，”他回答说，“今天就把人召集起来。”

“你们不感到惭愧吗，”我说，“如果说我们坐在这里还嫌热，那么现在站在平炉旁、高炉旁又怎么样呢？拿什么给工人们解渴呢？除了州计委和地方工业部以外，还有谁应当考虑这件事呢？什么时候生产出来？得有一个期限！”

结果是，当年夏天城里就有了克瓦斯。

人有各种各样，同他们谈话也应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有时沉默胜于雄辩。在彼得罗夫工厂，钢轨钢梁车间问题严重，无法如期投产。期限快到了，而那里的工作还未完成。设计单位、建筑单位、承包单位之间争论不休，互相扯皮——只好把他们召集到州委来。到了州委，他们还继续吵个没完，基本上是前两方指责厂方，说它拖延接收。于是，钢轨钢梁车间主任站了起来，扳着指头说：那里螺栓没拧紧，那里零件还不对号，那里电气装置

没调整好——他不能在接收书上签字，因为他是用轧钢机从事生产的呀！

大家都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依照惯例，就等第一书记作总结了，说不定各打五十大板。但是，我只是说：

“同志们，该怎么办大家都明白吗？”

“明白了！”大家回答说。

“那么就去干吧。”

这就是整个结束语。我看出，人们还准备召开会议，弄清楚他们之间的不协调之处，分清各自所负的责任。重要的是要使他们感到，州委关心这一重点项目，相信他们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结果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八)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会极其重视干部的选拔、安排和教育。这个问题当时是非常尖锐的，因为成千上万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在前线、在打游击和进行地下工作时牺牲了。接他们班的那些人，还缺乏经验和学识。“领导的问题就是干部问题”——这是我们组织工作所遵循的原则。州委常委会经常讨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那些共产党员的政治和业务质量，要求更大胆地提拔那些年富力强、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时间证明，我们对这些人基本上没有看错。

当然也常碰到一些心地不纯、敷衍塞责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他们“萎靡不振”，“心灵空虚”（摘自当时速记记录的话语）——我们对这样的人是不能迁就的。1947

年12月全国实行币制改革,某些活动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事先知道了兑换条件,赶紧把钱储存到银行里,以便从中捞一把。我坚持把这些人开除出党。同样,也有一些人,由于无能和目光短浅,把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我也力争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而且不许另行“安排”其他领导职务。从人情上来讲,有时也觉得某些人很值得同情,但是决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而去充当老好人。

而对那些已经证明自己能把事情办好,并取得州委信任的人,则应使他们感觉到这种信任。E·H·马利亚列夫斯基是州委的总务部长,我们战前就认识了,在前线也遇到过几次。我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之后,就对他说:“如有必要,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事实也正是这样,我总是用心听取他的意见,支持他,帮助他,有需要时还给他出出主意。我看得出,这个人是会办事的。这就是说,要使他发挥主动性去完成那些他应该完成的任务。

我对许多工作人员表示:我信任他们,我确实也放手把许多日常工作交给他们去处理,这样,我便能腾出时间来分析形势,思考一些远景问题,提出一些具有原则性的任务。还在扎波罗热的时候,我就从纷繁的任务中抓住了首要任务:大力改进组织工作和党的政治工作。1948年2月,我在州党代表会议上针对这个问题讲了话: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党的工作和经济领导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种艺术。搞党的工作就要学习这种艺术……”

应该说,我自己也必须经常学习。对大家来说当然也要如此,因为情况不断变化,新问题不断产生。党的领

导人，如果不愿意落后，就应该学习一辈子。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我正赶上恢复阶段：工厂已经开始出产品。虽然有许多工厂的车间仍然残破不堪，虽然有许多矿井还被水淹没着，但工业已开始逐渐复元了。现在应当抓抓住房建设，抓抓文化和生活。为了讲清这个问题的尖锐程度，我在这里援引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第十次党代会上的发言片断：

“我看到会场里有我的许多同志、许多过去的老同学，如列维诺夫、奥列伊尼克、格列奇金以及其他一些同志，他们现在担任车间主任、班组长。我打算向他们和你们大家直截了当地说，州委和市委对住房建设抓得很不力。事情搞得怎么样呢，我必须向代表大会汇报，住房建设计划只完成了百分之十一。”

会场上有人喊道：只有百分之七！

“还只有百分之七。这真是丢脸！我们一再说，要使工人安定下来，而现在却是这种情况。新选的市委和州委全体成员，应该结束这种局面了。人们在战争年代吃够了苦头，为了我们的胜利忍受了极大的困难，现在他们有权要求改善生活条件。我们，布尔什维克人，向人民许过诺言：我们将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我们必须使开出的支票兑现！”

情况的复杂性在于，地方苏维埃钱太少，主要资金都掌握在厂长们的手里，而他们不肯拿出钱来建设市区。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实际上没有中心大街，卡尔·马克思大街还是一片废墟，而郊区却在建造简陋的工人新村，他们甚至杜撰出自己一套理论，说什么高炉、炼钢和

轧钢车间的主任必须住在工厂附近：因为当时还没有电话，没有电车，也没有汽车，能弄到一辆马车就算不错了（我记得，有一个领导人在开计划执行情况汇报会时迟到了，问他什么原因，他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说：“我没有汽车，有一匹母马，也送去预防注射了”）。

必须迫使各厂停止建造廉价的临时住房，而要建造设备完美的住宅大楼，不要造在郊区，而要造在市中心。我同一些厂长亲切商谈，并且一再举例证明：他们这种本位主义的建筑政策，说是节约资金，实际上不过是妄想，迟早要吃大亏的。州常委会已经正式讨论过，我们必须着手建设城市的几条主要大街，在大街两旁，盖起漂亮的住宅楼，让优秀的生产者、卫国战争中的残废军人和烈属住进去，使他们具体地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生活改善是十分关心的。但是，事情进展缓慢。

1948年5月底，我又走遍全州，作了一次例行视察。我到过尼科波尔、巴甫洛格勒、克里沃伊罗格、新莫斯科夫斯克、马尔干涅茨，看到了很多情况，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于是我把各大厂厂长召集来，开门见山地说，州委再也不能容忍这种落后的工作方法了，城市就应该象一个城市的样子——现在是着手干的时候了。厂长们持谨慎态度，他们说，他们倒是衷心拥护，但是没有资金，而且也没有好的设计方案，建设基础又很薄弱，并且还重复了以往在类似场合说过的一些情况。

“我有一个建议，”最后我说：“让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一种组织完善的快速建筑法。我们决定去取取经。也用不着到很远的地方去。同意吗？”

“同意！”大家回答说。

“好吧，我们就不多耽搁。明天七时整在州委大楼前集合。”

第二天早上七时，我们分乘几辆汽车同时出发，一起去的有各厂厂长、建筑托拉斯的领导人、市委和市执委会的工作人员。记得那天是阴天，我们经过曼德雷科夫卡——一个小镇，鳞次栉比的小房子，紧贴在山坡上——沿着破败不堪的道路向南驶去。一路上空荡荡的，几乎没有见到一个行人，一辆汽车。道路两旁的树木都被烧焦了，田地里布满掩体，只是在某些地方，有拖拉机或缴获的牵引车在工作。我们这样行驶了约摸两小时光景，而后登上一座小山，山下面展现出第聂伯水电站的全景。水电站后面的盆地上，是一座白色的大城市。这时，正好太阳露出脸来，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闪耀着金光，房屋显得大而明亮……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因为我到扎波罗热来，既作为一个邻州的代表，但同时又是这里的自己人。

常言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们参观团一行，看到了我对他们不止一次地讲过的沥青混凝土。他们对扎波罗热人已在使用的钢索起重机很感兴趣，对怎样用“穿洞法”敷设水管，看得尤为仔细。液压千斤顶把八百毫米的管子压进土里，于是管子在我们众目睽睽下几乎穿过整个街区。当然，这里还有许多问题，诸如期限、价格、劳动生产率、建筑材料等等。后来，我们在工人食堂吃了午饭，回到家已经是深夜了。在归途中得悉，巴布施金和李卜克内西两个厂的厂长，已经看中那种适用的多层大楼，

还商量好也采用同样的设计图……半年之后，在一条主要大街上，有几幢类似的漂亮大楼，平地而起，大大推动了市中心的房屋建筑。基础奠定了！

滨河街的命运问题，恐怕是最有意思的了。今天这里是市内最优美的地方，而当年法西斯分子留下的却是一片瓦砾废墟。我认为这条街应该重建。然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仔细研究过这美好的远景规划后，却不住地摇头：“谁能活到看见这美景的一天？”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活到这一天了！人们很快就看清楚了，住在堤岸上，没有一点儿坏处——第聂伯河毕竟是第聂伯河——他们争先恐后地申请土地，可是已经迟了，因为这一地段已经拨给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造房屋了。

自然，在战后的困难时期，国家把主要力量和资金用在复兴工业和农业上，这是合乎规律的，是正确的。但是，这一正确口号往往掩盖了办事拖拉、经营不善和工作简单化。然而，住房、交通运输、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落后现象，必然影响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必然影响生产的发展。

州委要求党、苏维埃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发挥主动性。有一次我对乌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书记 К·К·塔拉索夫、И·Ф·赫拉普诺夫和市执委会主席 И·Е·加夫里连科说：

“你们带上大皮包到莫斯科去一趟。一定要见到几位部长。把这里惨遭破坏的情况讲一讲，把照片给他们看看，请他们拨下修建供水塔、电车、幼儿园、住房等实际需要的款项。你们就说，这是他们部里工人的需要。你

们要坚定地走进他们办公室，坚决地要求。你们都是共产党员，而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敢说敢做的。”

必须这样干：这样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各工厂为街心花园铸造了铁栅栏，安装路灯，架设了电车线支座。成千上万的工人和职员参加星期日义务劳动——清理乱堆在各处的杂物；种花和植树。那时就为城里最美丽的契卡洛夫公园和谢甫琴科公园奠定了基础。儿童铁路的开放，是孩子们的一大喜事。后来，我们又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得到一笔修复叶卡德琳娜时代的一个宫殿的费用。我们决定把这件事交给大学生去干，每个高校的学生，在工地劳动五十小时。这样，我们就有了大学生文化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著名的建筑古迹和最受欢迎的青年俱乐部。

但是，这里还应补充说一下。一个党的领导者，在要求人们发挥主动性的同时，也应在复杂的情况下保护他们，自己承受批评打击。例如，尼科波尔钢管厂厂长H·A·吉洪诺夫那件事就是这样。他大概比任何人都关心工人生活，厂里的工作也搞得不错（顺便说一下，这是个规律：哪里不关心人，那里就别想搞好工作）。吉洪诺夫支持州委决定的方针，为患病工人开设了住院部，办起工人营养食堂，开始修建遭到法西斯分子破坏的道路，修缮工厂俱乐部，这在州里也是首批中的一个。我记得，拨给他的修建费是七十万卢布，但他实际花费的钱，几乎超过了两倍。这时，捷沃相到我们州里来了，我和吉洪诺夫陪同他一起乘车去工厂。在车上捷沃相申斥吉洪诺夫说：

“你是什么人，洛克菲勒吗？给你钱，叫你干这个

的？”

这时，汽车停下来，我们走出汽车，面前出现一幢宽敞、整洁、漂亮的俱乐部大楼。

“是啊，”我似乎用支持部长的口吻说，“这么一座‘别墅’，你是专为自己盖的罗？！”

伊凡·费多罗维奇·捷沃相哼了一声，我们继续向前驶去，拐上新修的马路时，他又来了气。

“拿你怎么办呢？”他转身对厂长说，“财政部已经打电话给我了，他们也晓得这条马路了。”

“州委也晓得，”我说，“不修这条路，就不可能开夜班。他可不是为自己啊，伊凡·费多罗维奇，他没有把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去。我们把这条路是作为人民的一项建设事业来完成的，您以为怎样？”

后来我们就这样做了，我们为这位优秀的厂长挡住了一场风暴。这事在州内传开了，这类事传得很快，当然也是有好处的，在别处也会引起反响。

(九)

工作是识别一个人的真正价值的试金石。如果一个人不懂行，不称职，那他迟早会试图用虚报假冒等手段来填补自己的缺陷。这一时弊，寓言家克雷洛夫是怎样针砭的呢？……“拍马屁的人总会在我们的心里找到空子。”①

① 克雷洛夫：《乌鸦和狐狸》，载《克雷洛夫寓言》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译者

“你们把问题提出来，”我常对这些人说，“我们不需要歌功颂德。我们不是为听好话才把你们请到州委来的。”

最后一点，如果谈到工作作风和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我懂得，不应当把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一般说来，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党的领导人应该允许自己的同事保持他们的作风。必须知道他们的短处，但也要看到他们的长处，并发挥其长处，使之有益于工作。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

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之后，我同全州最大的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厂厂长伊利亚·伊凡诺维奇·科罗鲍夫的关系未能立即搞好。他是大名鼎鼎的工人世家的代表，他的父亲在马克耶夫卡担任总工长，弟兄们也都是炼铁工人，据我知道，连他的几个儿子，现在还有他的孙子们也都继承了这个传统。斯大林晓得科罗鲍夫一家，全国也都知道。本来也没什么，不过这个人，说得婉转些，有时会失去现实感，有点傲慢自大。

好，这也没什么，我还是照自己的方针办事，始终同科罗鲍夫保持正常关系。我常到工厂去，看看职工，同工人们谈谈话。我支持这个厂的炼钢工人涅夫恰斯、索茨科、高炉工人特罗菲莫夫等人的创举。我也知道科罗鲍夫的长处，他确实是第一流的炼铁工人。虽然他那种不近人情的执拗脾气，我不隐瞒地说，有点使我生气，但是不应计较这些，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工作人员，而这是最主要的。

1949年底，乌克兰出现了燃料和电力不足的紧张局

面。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厂，同许多别的工厂一样，分配的“口粮”不够吃，经常停产，眼看计划完不成了。当厂长们纷纷通过自己的途径求援告急的时候，我们州委分析了情况，并查明，有不少燃料变成废气跑到空气中去了。这本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算出的总数字却使人大吃一惊：损失相当于五十万吨煤。我召集各厂厂长一计议，办法就找到了！要把一切力量联合起来，从废物、废次品、超计划产品中搜集金属，并轧制成钢管，用来敷设煤气管。我应该承认，科罗鲍夫是首先想出这个主意的一个，他做了许多事情，我们相当快地实现了这一设想。

后来，科罗鲍夫的火暴脾气惹了祸，工厂有人往联共（布）中央写信告他。中央提出撤销他厂长职务的问题。这时，我坚决顶住，尽管，我再说一句，我们的私人关系尚待多方改善。

“我认为科罗鲍夫同志不是意志消沉的领导人，”我在州委常委会上说，“的确，他有错误，脾气古怪，向他指出这些是正确的，但是我坚信，我们还应该为这个人争取一下。”

此事，只给了一个警告处分就算了结了，这样做是对的。伊利亚·伊凡诺维奇又继续领导工厂多年，为发展全国高炉生产作出很大贡献，成了技术科学博士、列宁奖金获得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由此可见，我支持他并没有支持错。

类似情况在扎波罗热也发生过。当时领导第聂伯建设工程的是水利专家费多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洛基诺夫。这个人可以说是天生的奇才。他十一岁起就做工，

曾经同高尔察克匪徒、邓尼金反革命分子作过战，年纪轻轻的就当了副团长。后来，大学毕业，他先后担任过第聂伯第一工地工长，巴克桑和伏尔加河中游水力发电站的工地主任，奇尔奇克建筑工程主任。他是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大个子，坚定果断，性格倔强。他非常自信，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

一长制原则是好的，对这样大规模的建筑工程来说尤为需要，但是，“一长制的长”不肯接受批评就不好了。洛基诺夫有时待人很粗暴、不能自制，动辄暴跳如雷，他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搞来一串念珠，他对我解释说：“我一颗颗地拨弄拨弄，你瞧，我就心平气和了。”我和他发生过严重的冲突，而我当时还是个年轻的州委书记，对付这么一个人，可不容易啊。

第聂伯水电站的第一批机组运转了，但其他机组的投产时间却拖延了，一直拖到乌共(布)中央作出决议，批评这个工程的缺点为止。听惯报刊和口头赞扬的洛基诺夫，拍电报给中央，说他坚决不同意这个决议。1947年11月1日召开了第聂伯工程全体党员大会，我受委托在会上作了报告。

于是我又详细地谈了他的缺点，叫人们相信，这些缺点绝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确实犯过的，正如常言所说的，我不想把一个人踩下去，相反，我是竭力给他指明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我特别强调指出：州委器重洛基诺夫这个同志；认为由他领导这一巨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表示深信，费多尔·格奥尔基耶维奇能够从批评中汲取教训，保证电站的全部机组尽快投产。我确实看

到并珍视这个人的长处：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意志坚强的品质，对事业的耿耿忠心。

“我对洛基诺夫的职务、党性和资历一向是很尊重的，”最后我说，“毫无疑问，我要支持他作为一个领导人的威信，并准备帮助他，然而我认为，我们应该不留情面地、彻底地批评他的缺点，对洛基诺夫，对这位建筑工程的负责人，对这位共产党员，我们决不能迁就。我们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能够有利于建筑工程，才能帮助洛基诺夫同志。与此相反的一切做法，都不是我们的做法，我们必须坚决排除。”

如果一个人精通本行业务，忠于事业，如果他在千方百计地为公共利益而工作，那就应该支持他。这里，目的只有一个：纠正他的错误，克服他的缺点，耐心教育他，而不是整垮他。这里主要的是，为了事业而去发现和利用他的长处。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因而我认为专门谈一下这个问题是有好处的。我国新宪法第四十九条写道：每一个苏联公民都有权向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提出改善其活动的建议，批评其工作中的缺点。宪法写上这一点，决不是偶然的。宪法又强调，禁止对批评实行打击报复。

我认为根本大法中的这一条，原则上很重要。今天，如果我们要达到高度的，我甚至要说：极高度的组织性，如果我们要加强各方面的纪律性（劳动纪律、工艺纪律、计划纪律），那么，我们必须对工作情况用一种关怀的、毫不放松的、批判的眼光来加以观察。这一观点有助于形

成它所需要的社会政治气氛。这样的气氛，将促使人们力求工作得更有效，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建立起一种使二流子、懒汉，使玩忽职守、瞎指挥和弄虚作假的行为无容身之地的环境。

为领导干部打掩护，使其免受批评，这意味着在害他。谁不肯接受批评，对事业来说，谁就是无可救药的了。如果现在拿起当年全会、代表会议、积极分子会议的速记记录，那你们就会发现，每份记录上都有批评。我们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有说服力的，富有建设性的。我根据记录举几件事例。

1947年乌共(布)扎波罗热州委第十六次全会上，曾经有这样一段简短的对话。基洛夫工厂党组书记 A·M·扎利洛在讨论会上发了言，他的话这样荒谬，使我不得不多次插话。

“扎利洛同志：……很遗憾，在我们厂里就有那么一些人，动辄批评别人，譬如机械科科长扎伊采夫……”

“勃列日涅夫同志：怎么，你压制他们批评了？”

“扎利洛同志：没有。可是他们也应该作自我批评。”

“勃列日涅夫同志：这就是说，你只希望他们批评自己，如果批评你，就不准罗。(场内议论纷纷)”

“扎利洛同志：批评与自我批评肯定是好事，但是不能用批评来破坏领导的威信。”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还是有点儿不大清楚，有点儿搞糊涂了……”

“扎利洛同志：我是说，有些同志不理解党的纪律和

党的道德。他们自己该好好工作，而不应闹意气。

“勃列日涅夫同志：嗨，如果出现了闹意气的人，值得不值得在全会上讨论？到处有闹意气的人，而在你们厂里肯定会更多。（场内一片笑声）

“扎利洛同志：是的，这是我们厂最薄弱的环节。

“勃列日涅夫同志：据我了解，你们厂最薄弱的环节就是批评。批评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它是以尊重人为前提的！”

州委对压制批评的人所持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开门见山，不讲情面。但另一方面，我在翻阅这些速记记录时看到，当我在讲台上批评了一个人之后，我总是随即强调：我认为有必要补充一句，他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我一向是很器重的。讲这句话，常常是很有必要的。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最大}工业区是列宁区，区委第一书记是格奥尔基·彼得罗维奇·库佐夫。他是彼得罗夫卡出身的冶金工程师。这个人朝气蓬勃，很能干。但是，在一次市委全会上，他汇报工作时，我尖锐地批评了他。

“我想谈一下库佐夫同志的报告。我本来并不愿意使你难堪，库佐夫同志，但我不能不在全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你的报告是不会得罪人的。它根本没有涉及任何人，没有揭露区委工作中的缺点，也没有点哪个厂长或党组书记的名，而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红角那些事上。我并不想介绍怎样作汇报，如果中央要我到中央全会上去汇报——无论是工业问题，还是农业问题，或者是党群工作问题，——那我就得花上几天时间，尽可能深

入地了解一下，把州里和市里的情况摸得透一些。中央委员会关心的是，州委常委会对当地情况有什么看法。而我们这里，甚至象库佐夫同志这样久经考验、精明干练的工作人员，一个最大的工业区区委书记，来参加市委全会，却以为不必认真地作好准备。”

如通常碰到这种情况一样，库佐夫在会议休息时，独自一人站在一边，样子很不高兴，阴沉着脸。我看到后，马上走到他跟前说：

“我批得你够呛吧！？”

“别提了……我可不希望别人也挨这样的批评！”

“不过，我还是支持你的呀！”

我不记得同他还谈了些什么话，但这里重要的是，应该使人们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的确，批评是相当尖锐的，但现在还是站在一起，友好地谈着话，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同志。

(十)

回想当年自己的工作，脑海中逐一追忆同人们的许多交往，我看到，当时他们身上特别值得我推崇的就是那种顽强精神，独立思考的能力，精通业务的才干，对新事物的敏感，及时发现和支持群众的主动创造精神的本领。应当说，就是在今天，这些品质，也可以说这种工作作风，仍然是我们最需要的。在经济领导实践中，那种四平八稳、拖拖拉拉，为一点无足轻重的小事就向上级请示报告、千方百计地逃避责任、嫁祸于人的作风，必须彻底清

除,这一点很重要。遗憾的是,这类现象现在还可时常遇到。

我在自己的实践中,总是大力支持那些有头脑、有胆略的先进人物。我知道,为这花些精力,一向能得到百倍的补偿。譬如,一个时期,我们高炉的砌衬问题是整个第聂伯河地区的薄弱环节。我了解到,伊凡·费多罗维奇·卡尔巴切夫队的砌炉工一直超额完成定额,我就去向他们请教。我在高炉炉底碰到他们。我们坐下,抽着烟,就聊起来了。

“我们铺砌的炉子有各种各样,”卡尔巴切夫详尽地谈了起来,“有平炉、加热炉、锻烧炉、焙烧炉。工业上用的炉子太多了,凡乎都要砌衬。这些炉子还不是最复杂的。”

“伊凡·费多罗维奇,你自己砌过多少座高炉?”

他还得扳起指头:在库什瓦砌了多少,在下塔吉尔、库兹涅茨克、扎波罗热……我顺便说一说,这类谈话急不得,不能草率了事。他说:我没有工夫,咱们快点儿谈正事吧!如果说我一般还能同工人和农庄庄员找到共同语言,那大概是因为他们看到,我对他们的工作很感兴趣,而且不是假装的,我确实从这种谈话中得到了乐趣。

卡尔巴切夫还详细地讲述了怎样组织劳动的问题,讲述了他们实行的累进奖励制,以及队里工人的工资收入(这里说的钱数,当然是以老的价格标准计算的)。

“昨天,”他说,“我一个班头挣了一百五十四卢布。定额是六十九块砖,可是我砌了二百零四块。”

“超过了两倍!”

“差不离,”队长点了点头,“不过还可以砌得更多些。”

我们队的吉洪诺夫完成了定额的百分之三百五十。”

“那么质量呢？”我问道，“要知道你们砌的是炉底呀，这里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工人们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懂得，同他们打交道的不是外行。砌炉底不仅一向被看作是吃力的活儿，而且也是精细的活儿。砖块之间的接缝不应超过半毫米。每个砌炉工后面，跟着一个检验员，他们用特殊的量隙规检查接缝。因为熔化的铁水都将蓄积在那里啊！

“泥浆配料的精确比例，”卡尔巴切夫说，“这可是个重要秘密。我们使用的是稀泥浆，用灰抹子可抹不上。每块砖要三面涂抹。许多人还得抹三次。可我们都能一下抹好。”

自然，你深入钻研能工巧匠们取得成就的关键，你就能想办法使他们的“秘密”不再是秘密。不久，由于我的坚决要求，苏联热力工程建筑安装公司的工程师们帮助И·Ф·卡尔巴切夫写出了他的操作方法，于是，这些操作方法就变成了扎波罗热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许多工程队的财富了。

这样的交谈有过无数次。既然我脱身来到工厂或工地，那我就在那里多呆一些时间，和人们多谈谈，即所谓坐下来详谈。我记得，有一次我来到“巨人”矿井，我换上矿工服，沿巷道走去，我流连忘返，同矿工们一起呆了五六个小时。在这以后我比较容易了解他们的情绪、要求和打算了。

我常到全州最大的彼得罗夫斯克工厂去，到著名的彼得罗夫卡去，而且次数特别多。有时，人们在工厂管理

处等候州委第一书记，欢迎他的到来。但是，我并不到他们邀请我去的地方去，大概那里把路也打扫干净了，我却转到，譬如说，炉子的后面，那里恰好是不大整洁的地方。冶金工作者的经验给了我很大帮助：自己的青年时代，是在这种工厂度过的，差不多从司炉起一级一级地干到工程师。

这个经历有助于我同工人们打交道。我同这个队谈一谈，同那个队聊一聊，同炉工、炼钢工、轧钢工们会晤交往：同他们一起在工厂食堂吃饭。在正式场合不会谈的话，这儿他们全都掏出来了。交谈后，我照例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坐上半小时或一小时，拟个提纲，晚上去参加党的积极分子大会，我就胸有成竹了，不仅能提出一般任务，而且还能把任务同该企业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

“同志们，我们推心置腹地谈谈吧！我把想到的一切都对你们讲了，现在你们也以工人的直率态度提意见吧。我们该如何改进工作？有什么阻力？哪里还有潜力可挖？”

在这样的情况下，批评不是信口拈来，而是有的放矢的，因而也是建设性的。

读者可能提出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说什么，你教训别人容易，可你本人对接受批评又是怎样的呢？那我就老实地回答：吃批评是难堪的，也许不可能不是这样。批评不是人人爱吃的巧克力糖。只有那种轻浮、空虚的人听到指责后才会一笑置之，而且立即丢之于脑后。有一次，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共青团代表大会上（1948年2月），我不得不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当时我说：我知道，我们中间不会有这样的人，会说什么今天要是没

有人批评我，我就吃不下早饭。但是，批评对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来说，可以培养顽强精神，使其从不满中奋发图强，力求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在一生中听到过各种各样的批评，不管有时多么难堪，我总是竭力从这些意见中寻找合理的内核，作出严肃的结论，结果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工作。然而，一般说来，来自上级的批评，总还是容易接受的，而对待下级的批评，那就复杂多了。有时，听一位慷慨激昂的批评者发言，我甚至发现自己对他有一种厌烦的情绪：“这家伙，真能挖苦人！”但是，扪心自问，我可以说，在针对我的这类发言之后，我从未改变对这个人的态度。这类批评也从没有留下过任何不良后果。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尼古拉·罗曼诺维奇·米罗诺夫的批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十月”区区委书记。此人与众不同，有勇气，大学五年级时自愿上了前线。他打仗很出色，受过重伤，但依然是个快活的小伙子，优秀的运动员。他在我们州的一个很大的高等学校区工作，比方说，重建大学生宫就是他出的主意。在我们历次党代会上，米罗诺夫的发言不同凡响，他能大胆尖锐地提出问题。如果提到市委或州委工作中的缺点，他从来不用外交辞令，不用拐弯抹角的字眼，总是指出具体人的名字，其中也有我的名字。

对此我有何感想呢？我听着这一类发言，我觉得，他们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那么公正的；我自己从第一天开始就提出了这些问题，也力求做到发言者所要求做到的那样。然而，我想，既然现在他们还在讲这些事，那就是

说，这些事还没有办好。旁观者清嘛。而且我很明白，米罗诺夫是想把事情办好，以事业为重，他是为此才提出批评的。因此，我同他的关系不只是好的，而且我甚至可以说是很亲密的——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是这样，在尼古拉·罗曼诺维奇调到莫斯科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之后也是这样，直到他在一次飞行事故中悲惨地死去为止。

现在我让大家看看 1948 年我在一次全州党代会上对批评作出反响的发言（根据速记记录）：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仔细地听了所有人的发言，如果说我没有弄错的话，批评肯定使这个或那个工作人员、我们州党组织的这个或那个活动家感到相当不愉快。我应该说，在许多情况下我接受批评时也感到不好过，但是我们应该从这个批评中为自己作出结论。对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来，这种不满、这种内心不安的本身，应当激发起工作的主动精神和干劲，争取尽快改正受到指责的那些缺点。我个人对自己只能作这样的结论。”

不要认为，批评意见多，就证明工作干得不好。事情恰成反比：尖锐、公开的批评越多，工作进行得越好。第聂伯罗彼得罗夫地区的劳动者胜利地完成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我们州的播种面积超过了战前。彼得罗夫卡、捷尔任斯基和其他许多工厂都超过了战前的生产水平。克里沃罗日耶和尼科波尔的矿井已经恢复，并能充分供给国家南部和中部冶金工业所需的矿石。第聂伯河流域在战争中遭受到的极严重的创伤已经治好了。

国民经济的复兴阶段到 1950 年可以认为已经结束

了。在州委第一书记的工作项目单中，工作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许多新的有意义的工作。我记得，谢甫琴科剧院的一些演员在我处一直坐到深夜两点钟。他们解释着，为什么在他们的剧目中没有古典戏的原因。他们抱怨说，布景很困难，服装也不够，于是这一切问题都要加以研究，给予帮助。1949年，全苏水上运动比赛在我们州举行，为此有许多事要办，但是这些操心事，可以说我不认为是负担，恰恰相反，倒使我感到高兴。这就是说，人们迫切需要文化、艺术、运动的时刻来到了，这也是复兴的证明啊。如有空余时间，我自己也常常驱车到体育场去。两个老对手，扎波罗热的“冶金工人”足球队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钢铁”足球队的比赛，使我特别感兴趣。坦白地说，无论什么比赛，我都是同样“关心”的。

到我办公室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有带着设计图纸的建筑师、带着装饰画稿的画家、业余文娱活动的导演、大学校长、运动健将、学者、教育家、医生。这里我插一句，那时我同捷共杰出的领导人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会见了，我们在同志式的气氛中谈了好几个小时，他对我讲了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计划，我讲了如何加深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回忆了我如何参加解放布拉格的往事。

今天，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朋友们、同发展中国家的客人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们的这类会见，在州委书记们的工作中日益增多了。他们自己也越来越经常地出国访问，这使他们的工作对党、对国家变得更加重要。我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这么多事情都要靠州委第一书记

去决定，州委第一书记这个职务在我们党内是多么复杂、多么艰巨，可以说又是多么重要啊。

* * *

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追忆全部献给了第聂伯河流域的岁月，可以说，我那时已是第二次同这块布满大型企业和肥田沃地的美好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有机会同这块富饶土地上的工人、农庄庄员、建设者、工程师、农艺师和学者一起劳动，确实是令人愉快的。

俄罗斯谚语说得好：“本乡本土，理应造福”。今天这句话大概已经过时了。千百万苏联爱国者响应党的号召，远离家园奔赴他乡，积极参加改变国家面貌和建设共产主义的工作。他们在那里劳动，同那个地方一起经受种种困难，迎来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正如常言所说的，在那里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这块土地对他们来说是倍感亲切和特别珍贵的。

如今，每当我有事重返故土时，我不光单纯欣赏第聂伯河两岸的美丽风光，还要抚今追昔：这条路是我在任时铺筑的，这个文化宫是我在任时建造的，这些工厂、电站、矿井，这些城市街道，这些集体农庄的村落——这里都有我的一小部分劳动，有我的心血和操劳，也有我的多少个不眠之夜……

荒 地

(一)

有粮食就会有歌声……这话说得有理。自古以来，粮食就是人们最最主要的食品，又是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成就，而粮食依然是各国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目前，人们在征服河川海洋，在地球深处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人们掌握了原子能，进入了宇宙空间，然而粮食依然是粮食。

我们的国徽上饰有一束麦穗。我国公民生来就与粮食有着极为密切的、神圣而又特殊的关系。可以说，这种关系，我从青年时代，就已经深知了。

我的父亲是工人，祖父是农民。我既做过工，又从事过农业劳动。开始当工人时，那是在经济陷于崩溃的年代，工厂长期停工，我不得不去耕地、播种、割草，我领略了种田的滋味。后来我当上了土地规划员，在库尔斯克农村，以及在白俄罗斯和乌拉尔工作过，就是在以后，当我再次成为冶金工作者的时候，那逝去的岁月仍然使我难以把粮食忘怀。我曾同其他共产党员一起奔赴农村，在村里的大会上斗争过富农分子，组织过第一批集体农庄。

可以说，在我劳动生活的初期，有四年的光阴是全部献给农村的。也可以换句话说，整整四个年头完全扑在农村里。集体化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当上了土地规划员，而当集体化基本实现的时候，我又返回工厂。1927到1931这几年是我国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把土地分给了各个农业劳动组合单位，我们认为这并不是单纯地取消地界，而是要帮助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变农民几千年来生活方式。

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城市和农村，工厂和田地，工业和农业，都和我息息相关。前面，我提到过扎波罗热市，在那里，我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业复兴上，但同时也经常为集体农庄的事情而操心。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城市和农村在我的工作中所占用的时间几乎相等。而在摩尔达维亚，我的工作重点是抓农业，然而，那里的工业实际上等于重起炉灶，因此也不容许我袖手旁观。这样，我必须同时兼顾两面，似乎是两条不该相交的平行线，却在我的身上相交在一起了。

就是现在，关于春耕进度、庄稼长势和收割速度等汇报仍然按时放在我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桌上。多少年来，我养成一种习惯，喜欢亲自给全国各地打电话。在我拿起听筒听库班、第聂伯河沿岸、摩尔达维亚、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等地的同志的汇报时，一听声音，我就可以猜到他们的谷物情况。举例说，到7月15日荒地还未下过雨，我就知道，粮食要少收几百公担；如果到月底还不下雨，产量还会再减少……每逢这种时刻，在你凭窗眺望莫斯科城时，眼前却会展现出一望无际的荒原，展现出

联合收割机手、农艺师、区委委员们的焦灼不安的面庞。虽说这些亲爱的同志与我相隔千里，但我却觉得自己又回到他们的身边了。

荒地在我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一切是从1954年1月底开始的。那是莫斯科的一个严寒的日子，党中央把我召唤去。谈的问题我并不陌生，关于开荒的事我早有所闻，不过使我感到新奇的是：中央想把大规模垦荒这一工作委托给我。而且哈萨克的垦荒工作一开春就要展开，时间十分紧迫，工作也很棘手——这一点中央并不避讳。此外，还补充说，这是目前党的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中央委员会认为派我和И·К·波诺马连科到那儿去是很必要的。

据我了解，问题的实质在于该共和国的各项工作，搞得不太好。那儿的领导墨守成规，看来，这样的新任务，他们是难以胜任的。说到垦荒，我们对开垦辽阔草原这一任务的认识也必须提高一步。

中央委员会交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垦荒工作顺利进行。我懂得，这一任务异常艰巨，首先必须合理安排完成如此重大任务的组织工作。事情不只是关系到一个加盟共和国的粮食增产问题，而是涉及到如何在全苏范围内基本解决粮食问题。

秋天一到就要向荒地要粮！今年秋天一定把粮食拿到手！

于是我的生活道路又来了个急转弯（这已经好几次了）。

1954年1月30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了会议，

讨论了哈萨克的形势及与垦荒有关的一些事宜。几天后，我便乘飞机飞往阿拉木图。

当时没有想到，我竟会在多年之后认为有必要叙述我一生中这个难忘的阶段。我想不厌其烦地再说一遍：我在垦荒期间没有写过任何笔录，也没有记过什么日记。当时哪能顾得上，但我认为也不必为此感到遗憾。

我想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写的后记。他在后记中写道：他本来准备再写一章，但时间不够，十月革命的前夜“妨碍”了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幽默地说：“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因为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①这几句话是列宁对我们大家的遗训。

千百万苏维埃人在荒地上继续丰富革命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扩大革命成果，并且创造出胜利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新鲜经验。所以，我曾经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这块荒地的那些岁月，将永远是珍贵的，令人难以忘怀的。

我是初次来到阿拉木图。然而，我却怀着一股亲切的感情巡视了这一城市。它是我早就向往的地方，以前虽然没有来过，但我对它的喜爱，并不亚于对卡缅斯科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或扎波罗热的喜爱。

战时，我和很多前方战士一样，也未能立即获悉疏散到后方去的亲人们的住址。过了漫长的令人焦急不安的八个月之后，我在前线收到了妻子的第一封信，回信地址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初版跋》，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276页。——译者

是：阿拉木图，卡尔·马克思大街，九十五号。从这封信中我知道了为我全家提供住房的那户人家的姓名：丈夫叫图尔松·塔拉巴耶维奇·巴伊布瑟诺夫，妻子叫鲁基娅·雅鲁洛芙娜·巴伊布瑟诺娃。我找到了他们的小屋子。它同当时阿拉木图成千上万幢清一色的小平房几乎一模一样。战时，妻子来信说，这所小平房一到夏天，就隐没在绿树丛中，窗下小渠，潺潺作声。但现在是2月份，小渠干涸，光秃秃的树木由于冰雪融化而变得湿润了，枝丫上的水珠慢慢地往下滴着。我猛然想起战争的岁月，一切历历在目。是不是拐进去看看？应该向这些心地善良的哈萨克人道谢，应该向这所房子致敬，因为在那艰难困苦岁月里，这里住的不是四口之家，而是七口人，况且都能和睦相处。不过我还是决定等妻子来，如果有机会，一起去拜访他们。

我沿着大街信步走去，我知道，这是对城市产生最初印象的极好方法，这里将是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顺便去看了一下市场，市场可以向一个阅历丰富的人提供很多情况。因为它是了解各个地区经济生活的一种晴雨表，是反映居民生活习惯、人情风俗的一面镜子。在五光十色的阿拉木图市场上，人声嘈杂，熙熙攘攘，它使我得到不少有益的知识。阿拉木图的城市面貌充满生气，它很合我的心意。

我们不知怎么地竟在这个城市里住过好几个地方。起初住在城外的休养所里，距离现在人人皆知的麦杰奥溜冰场（当时还没有）约五公里。那儿的景色美极了，有花园、林荫小道、清新的空气和从山上流下的潺潺小溪。

附近群山耸立，郁郁苍苍，山峰上的积雪闪闪爍爍。我最近一次去哈萨克是在1976年9月，乘便又去看了一下那个休养所。我决定要找到自己住过的那间屋子。我很自信地登上了二楼，找到了我所熟悉的房门，并对陪同人员说：办公桌是紧靠这扇窗户的，旁边有一张沙发……

“不，列昂尼德·伊里奇，”护士笑着说，“您的房间还差两个门呢。”

出现这种差错的原因，与其说是一个人的记忆力有限，不如说是变化太快。这儿不仅休养所大大改观了，就是整个阿拉木图市也今非昔比。现在，阿拉木图已是一个拥有近百万人口的现代化大城市了，它漂亮而又有独特的风格。城市的建筑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很有气魄，不过，依我说，它很有魅力。这儿你再也看不到死气沉沉、格式单调的住宅了。新的建筑结构新颖，每一座大楼都别具一格。

每次我来到这儿，都要对老朋友们说：“瞧，我又来了，见到你们就象见到亲人一样！”我的家初搬到这儿时，仍然住在一条小狭谷里，那是一座木头的小农舍。现在这所房子已经拆掉了。后来迁到市中心，住在江布尔大街上的一幢用砂石砌成的实验大楼里。看来这些岩石也不太坚固，因为大楼未能保存下来。战争年代我一家人居住过的那所小房子也消失了。如今那里，有一个大喷水池，细流欢快地喷洒着。在我住过的地方，只有一所房子还完整无损地保存着，它坐落在富尔马诺夫街和库尔曼加扎街的犄角上。不过，我在那儿住的时候，已经是我在阿拉木图工作的最后几个月了。

1954年2月初，那时我刚刚熟悉了一下新的地方，就要去参加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可以说，许多人谈到共和国的工作时都作了自我批评，而且很尖锐。我和П·К·波诺马连科注意地听着，两个人都没有发言。会议转入选举时，苏共中央代表通知与会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建议选举波诺马连科为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为第二书记。

我同波诺马连科齐心协力地工作着。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我们忙这忙那，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从我来说，我是一向器重和尊敬波诺马连科同志的，因为他是“第一号游击队员”，在整个战争时期他领导了敌后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时又是出色的组织者，忠实可靠的同志。

全会结束时，他代表我们两人向与会者表示感谢，只说了几句话：

“我希望，我们能够不辜负你们的信任。我们要努力地工作！我想，两年以后我们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今天中央交给哈萨克党组织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想提前说一下，事实确实如此，在整整两年之后，我作为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向苏共二十大作了汇报：党所赋予的开垦荒地的伟大任务，已经光荣地完成了。

(二)

大量的工作一下子压到我们身上。今天，事隔多年，回过头来重新翻阅当年的文件，不禁会想，这么多工作当时怎么来得及做呢？这么多地方，怎么来得及跑呢？看

来，我们生就这样一副机体，能适应不可思议的重负——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体力上的。不妨追溯一下战争年代的情景：人们忍受着最大限度的困苦——睡不足，吃不饱，泡在战壕里，连着几个昼夜卧在雪地上，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里——可他们并没有伤风感冒，也没有染上其他“和平时期”的疾病。类似的情景在垦荒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

我常把垦荒这段历史与前线，与党和人民已经赢得胜利的大规模战争作一番比较。我们这些上过前线的人，永远不会忘记战争，然而我的这番比较是恰如其分的。诚然，荒地上听不到枪声和轰炸声，也没有隆隆的炮声，但其余的一切分明是一场真正的战斗。

要打响这一仗，如果仍然用军事术语来说，那首先必须重新部署兵力，调集后勤部队，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全会以后，接着又召开了哈萨克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原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那么原因何在呢？我来讲一讲。在这个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边疆区，有几百个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农机站，有几万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这里，除了可耕地以外，还有数百万公顷的草地和牧场。然而，此地的谷物、肉类、棉花和羊毛产量，与战前水平相比非但没有增加，有时甚至还下降了。挤奶量低于1940年的水平，谷类作物每公顷只能收五至六公担，棉花总共收了十公担，土豆每公顷不超过六十公担。

那时，一些惨遭战争破坏而变为废墟的地区，如库

班、乌克兰、顿河等地区都已治愈了战争创伤，开始提高谷物和畜产品的产量。可是这儿，尽管1953年对共和国来说是少有的形势大好的年，然而由于缺乏饲料，牲畜倒毙了一百五十万头。在严寒的季节里，牲畜还露宿着，连最简陋的棚圈也没有。还说：“我们这儿历来如此”。再补充一点：在集体农庄主席中，很多人只受过初等教育，有三百人简直近乎文盲。

当然，哈萨克农业上的困境也有其客观原因。它反映了这一极其重要的部门在全国各地抓得不力。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党已经坦率而又公开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即使在全国总的背景下，哈萨克的情况也是令人沮丧的。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某些地方的领导人已经向困难屈服了，并且正在按照“车到山前自有路”的原则行事。

“领导幅员如此广大的共和国，我们是力不胜任的，”直接抓农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И·И·阿福诺夫在代表大会上发言说，“我们不会驾驭各种事变，倒象蹩脚的消防队员在疲于奔命，无休止地扑灭着发生在这儿或那儿的火灾。我们进行领导的主要方式甚至不是通过公文往来，而是委派特派员亲临现场。”

经过他这么一番表白，州党委会缺乏主动精神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有人试图改进工作，那别人就会认为太“别出心裁”了。例如，阿克纠宾斯克州提出倡议——为牲畜准备好一年半饲料。这么好的事情，必然受到赞扬，而且要公诸于报纸。但是，众所周知，任何创举首先要依靠自己内部的力量，依靠尚未挖掘的潜力。创举的

可贵之处也就在这里。可是阿克纠宾斯克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们提出响亮的保证以后，立即给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发了一封信。如此这般地说什么为使保证得以实现，请马上额外地调拨给我们三百台拖拉机、六千吨煤油，以及一定数量的汽车润滑油、润滑脂和各种备用零件等。一句话，如果你们不想和我们一起出丑，那就帮助我们成为先进单位吧。

我担任领导工作(党、苏维埃、军队、经济等各方面的工作)的全部经验，早已使我懂得一种道理：指望依靠他人来改进工作的依赖心，就好象一张石蕊试纸，能反映出这个或那个同志到底有多大本领。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开垦荒地，全国人民都答应支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依赖心就可能发展到危险的地步。这就是我认为必须着重指出这一现象的原因。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要爱护干部。自然，这里指的是要爱护那些已为事实所证明的善于工作的人，而不是主张对什么人都一味迁就。我们必须把那些不称职、不诚实的人坚决撤换掉。在干部问题上我深信：在共和国的各级领导人中，可以说有不少是凭交情提拔上来的。这股歪风必须立即刹住，对此我同波诺马连科采取了铁面无私的立场。为了不让别人感到委屈，我们公开而直率地声明了这一点。例如，在我最初发表的一次演说中(1954年3月对阿拉木图市选民的讲话)我说过：

“由于哈萨克党组织现在面临着巨大任务，因而正确选拔和配备干部的工作，日益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哈萨克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揭露了干部工作中存在的严

重缺点和错误，这说明某些领导人丧失了责任感，他们不是根据工作能力的强弱来选拔干部，而是按其是否效忠于自己为原则。我们决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存在。共和国内有很多非常成熟的、有经验的、可以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的同志，他们有能力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在挑选坚定果断的指挥员和调集后勤部队的同时，我们焦急地盼望着党作出关于开始垦荒的决定。1954年2月底，具有历史意义的苏共中央二、三月全会终于召开了，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增加全国粮食生产和开垦生熟荒地”的决议。

伟大的战役在哈萨克草原上打响了，它在广漠的土地上展开着。北哈萨克从西到东达一千三百公里，从北到南则为九百公里。在这块土地上分布着六个州（以前是五个州），即：库斯塔奈州、泽利诺格勒州（以前叫阿克摩林斯克州）、北哈萨克州、科克切塔夫州、图尔盖州及巴夫洛达州，总面积超过六十万平方公里。它比法国的面积大得多。而现在，要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再开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的肥沃草原，这个面积比整个英国还大。

参加垦荒的不只是我们这儿，还有阿尔泰边疆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新西伯利亚州和鄂木斯克州，以及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远东地区。大概很多人都知道，全国已经开垦的生熟荒地总面积达四千二百万公顷，而哈萨克就开垦了二千五百万公顷，其中一千八百万公顷是1954年和1955年在哈萨克草原上开垦的。

数字是令人吃惊的，然而，垦荒还不只是耕地而已。它还包括建造住宅、学校、医院、幼儿园、托儿所、俱乐部

以及新的公路、桥梁、机场、畜舍、粮仓、库房、工厂等等。总之，包括居民正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发达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一切。

这一切是怎样进行的，我无法逐日地、一件件地加以详细叙述。有关荒地、有关垦荒遇到的困难以及第一批垦荒者的功勋和命运已经写了不少作品了。现在，我只想提一下我们活动的几个主要方面和我们为使荒地从一开始就成为目前这种样子所采取的一些战略和战术。当时许多工作不是顺序而来，一件件地去做的，而是一起压过来，要你同时解决。如：新农庄、新农场和扩大了的老农庄、老农场开展土地整理工作；为新建农场选择场址；接受几十万人前来工作并把他们安置在暂时还无法居住的草原上；大规模地建造农场新村，一下子就是几十个，而后甚至是几百个；挑选数千名专家；把各种各样的人组成和睦、团结的集体；开垦荒地并进行第一次春播……

加强担任领导职务的地方干部的力量这一工作，必须在一个很短的期限内完成，为了使读者对这一工作的规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想举例说明一下：仅在1954年这一年内，我们就审查并推荐了五百余名将担任荒地各区区委书记和基层党组织书记，几千名将担任集体农庄主席、农艺师、畜牧业专家、工程师、机械师的人选。其中有不少是当地的优秀干部，但更多的还是外来干部。苏共中央、联盟各部，许多加盟共和国和全国各州都给我们以巨大支持，慷慨地把自己的干部派到荒地上来。

苏联国营农场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挑选专家的领导机构。该机构的各个房间就象车站的候车室，人来人往，拥

挤得很。我经常到那儿去，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每天接待来访者，往往从清晨一直到深夜。我同每一个要去荒地的人都作了详细而认真的谈话，在这方面我本人从来不吝惜时间。重要的是，要使人们懂得垦荒工作的深刻意义及其复杂性，要使人们对自己所向往的事业充满信心，并全力以赴地为它服务。在了解来访者的过程中，我感兴趣的是：此人是否乐意去荒地，有何经验，是否健康，是否同意全家一起迁去等等。与此同时，有不少人又反过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时候动身，国营农场有多少土地，土质如何，职工都是从哪里来的，有多少农业机器，初去随身要带些什么东西等等。

在国营农场部的走廊里，在谈话的间隙中，那些即将上任的场长们都在为自己挑选专家。人人皆知的五人小组——场长、总农艺师、总工程师、建筑工程师、总会计师——就是这样组成的。后来我们挑选的领导成员不是五位，而是六位——“核心组”还包括管理总务的副场长。经验证明，如不配备总务副场长，人们在荒地上的生活、居住、膳食、文娱活动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就难以得到解决。

我在中央委员会办公，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哈萨克大地图。以往在前线的时候，我在地图上标出部队的驻地，作战区域和突击方向，而现在也同过去一样，我在共和国的大地图上标出数以百计的农庄、农场以及其他据点的分布状况。其中圆圈表示向荒地进军的基地——这是一些距开垦地区最近的，湮没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的城市、车站和乡镇。红绿双色小旗表示原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

农场，它们借助垦荒也大大扩大了自己的可耕地。而小红旗则表示尚待建立的国营农场的场址。1954年，地图上出现了九十面小红旗。而到1956年初，小红旗增加到了三百三十七面！

通常在回忆录里，总要描述一番国营农场的场长们偕同几位主要的专家来到草原的情景。说他们袋里只装着任命书、银行存折的号码和图章。他们一到就把标有国营农场名称的界桩砸进地里，接着就大干了起来……不错，当时确有这样的事。我们很多老同志，也十分推崇当年那种浪漫主义的豪情壮举，但他们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场长和专家们不能到处乱砸界桩，而是砸在严格规定的地方。这些场长除了口袋里的任命书和图章外，还有公文包，包里装着可耕地和新农场的土地规划图。荒地上虽然困难重重，可是人人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当然，不能把事情设想得轻而易举：说什么人马一到大草原，立即各奔东西，马上动手开荒，好在周围有的是荒地。

建筑人员都懂得零点系列工程这一概念。这是与确定建筑物的布局，打地基，敷设地下管道有关的一些工程。这项工作十分繁重，又不引人注目，但它却是盖房之前必须进行的。农业上的土地规划工作，可以比作零点系列工程，因为土地规划仿佛是一个总体计划，它决定着农场或农庄的整个轮廓和特征，各单位的土地、草地、牧场、场址的布局和面积，以及供水水源和其他许多对生活与生产极为重要的问题。

在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内，从一开始就很自然地

成了一个负责垦荒业务的工作小组。后来，这个小组有各种名称：有人称它为工作组，有人称它为业务组，还有人称它为共和国的垦荒司令部。的确，它的活动很象前线司令部，并由我负责领导。这个小组不是正式编制，没有任何专职人员，小组成员都有自己的日常工作，但是又都直接与农业有关系。除我以外，这小组的成员还有：中央委员会农业书记法兹尔·卡里勃扎诺维奇·卡里勃扎诺夫，中央委员会主管农业和国营农场的部长安德烈·康斯坦丁诺维奇·莫罗佐夫和瓦西利·安德烈耶维奇·利文佐夫，共和国农业部长格里戈里·安德烈耶维奇·麦利尼克和国营农场部部长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弗拉先科以及其他负责干部。当然中央委员会内搞过垦荒工作的同志成百上千，但是上述同志组成的却是一个指挥宏伟工程的司令部。

划地垦荒刻不容缓，而且规模空前。至于说谁是一马当先，向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进军的，那当然是科学家、水利学家、植物学家、土地规划员、农艺师呗。一回忆起他们，我首先就想用最美好的语言加以赞扬。

肥沃的土地并不是遍地都是，接连不断的，而是需要勘查、寻找，并加以鉴定和圈定界线，然后确定哪些地方适合种谷类作物，哪些地方可用作草地或牧场。土地规划员在哈萨克境内考察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一亿公顷。仅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就组织并向草原派遣了六十九个综合性的考察团和勘察队。全国各科学院、研究所和实验站的专家们也参加了土地的考察和鉴定工作。俄罗斯、哈萨克、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几千

名土壤学家、植物学家、水利工程师、土地规划员及农艺师们考察了共和国的一百七十八个地区，先选定了二千二百六十万公顷可耕地。他们将这些土地按土壤、植被情况绘制详图，严格标出水源及就地生产建筑材料所需的原料资源，并将其逐级呈报区、州和共和国各有关组织。

我有一张土地规划员的毕业证书。我既是这个幅员广大的共和国的中央书记，又是一位土地规划专家，所以我对这一切都饶有兴趣。科学家们帮助我们很快摸清了情况。他们在共和国的土地上确定了六块划分明确的自然经济地带，哪些地方应该播种谷类作物，哪些地方应该发展畜牧业，哪些地方应该把这两者结合成一个综合体，哪些地方适合发展人工灌溉业，他们都一一作了精确的介绍。

当时我同哈萨克的同志们有过不少次愉快的交往。还在前线的时候，我就喜欢哈萨克人。他们谦虚纯朴、办事一丝不苟，他们是一些勇敢可靠的指战员。在战斗的间隙时刻，他们缅怀自己的故乡，缅怀那辽阔的、羽茅草丛生的大草原。有时你一听到悦耳、忧伤的哈萨克歌曲，就禁不住要走上前去询问：

“你在唱什么呀？”

“在唱草原，牛羊成群的大草原。还想起了姑娘……”

“姑娘可以想念，家园也可以想念，可是草原……这儿的乌克兰大草原有哪儿差呀？”

“确实不差。不过我们的草原——完全是另一种模

样……”

现在，事隔多年，我看到哈萨克族的苏维埃干部大批地成长起来，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中间有党和经济工作方面的高级干部、卓越的科学家、各行各业的才华出众的专家和优秀的文艺大师。

必须指出：在整个哈萨克族人民中，绝大多数人满怀热情地衷心拥护党关于开垦羽茅草丛生的大草原的决定。开垦荒地对哈萨克人来说并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因为多少世纪以来，哈萨克人就跟畜牧业联系在一起；而如今，很多很多人必须改变从前那种草原生活方式，他们将成为农民、机械师，以及种植谷类作物的专家。但是，当地居民有智慧、有魄力，他们积极、英勇地投入了开垦荒地的战斗。哈萨克人没有辜负历史所赋予的崇高使命，他们懂得全国的需要，表现出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的优秀品质。

我同丁穆罕默德·阿赫麦多维奇·库纳耶夫的友谊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当时他是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长。我一到阿拉木图，自然就同他认识了。就其所受的教育而言，他是矿业工程师，有色金属专家；但他不囿于狭隘的专业，能从国家全局出发思考问题，思路开阔，又有胆略，对哈萨克的丰富资源和发展远景有着深刻而独特的见解。此外，这位稳重、诚挚、有魅力的人，还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党性原则。他很快就当上了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而现在则是哈萨克党组织的领导人，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季马什·阿赫麦多维奇（人们平时都是这样亲切地

称呼他的，没有人用他的全名（穆罕默德）向我推荐土壤研究所所长乌米尔别克·乌斯帕诺维奇·乌斯帕诺夫当垦荒顾问。在这位严肃认真的学者的领导下，研究所拥有大量的有关哈萨克土壤的鉴定材料。该所的研究人员在有关国营农场的布局方面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我还愿意提一提共和国农业部土地规划局局长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舍列麦季耶夫。此人别具一格，不论春夏秋冬，从来不戴帽子。他身穿军便服，脚踏大皮靴，肩膀上老挂着一只军用背包。在哈萨克工作的漫长岁月里，他徒步走遍了共和国各地，他不是凭着目测来了解草原的，而是正如大家所说的依靠双手的直感去熟悉草原的。这个人在国营农场中心场址选地问题上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觉得他那军用背包活象神活里的魔袋，从里面可以掏出各种图表和很多小本本，上面记载着数以百计的河沟、山岗、天然分界线，以及少风地带的名称，还有很多当地居民和对土地很在行的那些人的名字。他坚持要把这些人吸收到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筹备委员会里去，而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也都乐意帮助我们。

当舍列麦季耶夫知道我熟悉土地规划工作时，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从此把我当作同行看待，有时甚至有点过分了，竟要求我过问那些没有我同样能解决的琐碎问题。不过有些事也往往需要我去过问，而且要严肃地过问。有一次他非常激动地跑来找我，手里拿着一大包可能是从科克切塔夫州寄来的土地规划图，并对我说：

“您瞧，他们是怎么搞的！对土地不作任何鉴定，竟

在原有土地上又扩充了新的面积。”我气愤地打电话到区里，干涉这件事，可他们却满不在乎地回答：嚷什么，我们又不是第一年耕地，瞧，春天快到了，雪马上就会融化，哪儿能耕种一眼就能看得清楚。

这儿谈的是有些集体农庄也分到一部分需开垦的荒地。那儿的人在草原上种地已经多年了，自然以为自己是熟悉草原的行家，哪里听得进别人的话。必须克服这种思想，反对轻率从事，要求各处在选地垦荒中严格地按科学办事。

我们办事，不仅要讲求效率，而且要从长远着想，作百年大计。为了如此崇高的目的，不应吝惜时间和精力。我经常在中央委员会办公，直至深夜，在共和国部长会议作出关于正式建立几十个农庄与农场的决议和苏联农业部为此下达命令之前，我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研究有关的图纸及其成立的依据。

大家知道，1954年的垦荒工作，即使扣除某些人持怀疑态度的那不小的一部分，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国开垦的荒地不是一千三百万公顷，而是一千九百万公顷。哈萨克也超额完成了垦荒计划。这给创业者带来的鼓舞有多大，信心有多足，那是不言而喻的。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总结了垦荒的初步经验，权衡了国家的潜力之后，通过了“为增加粮食生产进一步开垦生熟荒地”的新决议。哈萨克还应再增建二百五十个国营农场。

1954年建立的第一批(九十)个国营农场，一般说来都分布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靠近当地的铁路或河岸。现在则必须转移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的深处。我们的任

务更加复杂了，在垦荒地的选择上难度也高了，而且矛盾重重，也就是说各种不同观点的斗争发生了。

在围绕两个州的一些问题的纷争中，我们要挺得住。这些纷争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全苏农业部认为，阿克纠宾斯克州根本不必垦荒，因为那儿的土地似乎不适合谷物生长；而相反地，当卡拉干达州的一些同志提议在产量极低的土地上建立十八个国营农场时，他们的“创举”居然得到了农业部的全然支持。我给在莫斯科的农业部长打电话，对他说，这是明显的错误；可是那位部长竟把卡拉干达人誉之为爱国者和先进工作者，而同时，想必在火头上，却把北方其他几个州的一些领导同志斥之为保守主义者，并加上其他种种不可饶恕的罪名，其实那儿荒地的潜力确实微乎其微。

这种口舌之争——缺少数据、理由和根据——是毫无意义的。我乘飞机来到阿克纠宾斯克州，会见了专家们，并实地作了考察，确信那儿有良田。我坚持立即派遣由科学家组成的综合勘察队到那儿去。他们踏踏实实地工作了一个阶段，发现了一百七十万公顷很好的可耕地。后来我又到卡拉干达州逗留了一段时间，同样毫不费力地证明了我们是正确的。我又一次地坚信，办农业应该持科学的、而不是主观唯心的态度。

在阿拉木图召开了共和国州委书记和执委会主席会议。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地把“关于为新建国营农场选地的总结”提交大会讨论。我在闭幕大会上说（根据保存下来的速记稿）：

“我们作了大量的选地工作。找到并圈定了大约九

百万公顷的土地。但是工作尚未结束。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同农业部发生了争论。这儿我所说的土地既指其直意，又指其转意。时至今日，我们对这种争论仍是来而不拒的。我们将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希望能捍卫这一观点。我们觉得，卡拉干达人毕竟没有弄清自己的土壤情况。他们提议建立十八个国营农场，数量似乎不少，但是农场的布局计划，我们无法支持，因为选地不当。而我亲自跑过的该州的好多区倒有良好的土地，那儿才是应该建场的地方。”

我之所以把对草原的调查研究以及新建农场的选地问题讲得如此详细，是因为开垦荒地的零点系列工程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决定着这些被开垦的土地以及这些土地上的整个未来生活的命运。

(三)

荒地上的第一个春天，给我留下了各种不同的印象：这是一个愉快的春天，胜利的春天，但又是一个紧张非凡的春天，困难重重的春天。大草原原来就象一颗硬核桃，而且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还要硬得多。问题不仅仅在于这长期沉睡的土地茎攀蔓生，如同铁丝缠在一起，非常坚固，几乎无法下犁；而且还在于哈萨克荒地上实际上从未有过常人所理解的春天。这儿气候的特点是：冬天刚结束，一眨眼就转入夏天，真是雪刚融化，酷暑就来临了。5月天事实上从不下雨，土地很快干结，硬得象石头一样，翻耕这样的土地，要花双倍的力气。

开掘第一批垄沟时，到处都很隆重，举行了不少大会。第一批方块地开垦得很顺利。荒地上能有这种地也是很寻常的。土地测量员跑东跑西，把沉睡着的大草原，划成大小相仿的方块地，交给拖拉机队去翻耕——这就是二公里长，二公里宽的方块地，也就是说，每一块为四百公顷。

“瞧这些方块地，多么宽广啊！”拖拉机手们开玩笑地说，“只要燃料够用，你就发动马达，笔直地朝前开吧。”

但是，没有多久他们就发现，被迫停下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马达拖不动铁犁，犁铧断了，犁架弯了。只有象 C-80 型拖拉机这样的大力士，才拖得动一排五个犁铧的铁犁，而那种很灵巧，也很轻便的 ДТ-54 型^①及 HATH 型^②拖拉机对开垦荒地来说，就显得娇弱无力了。

人们普遍开始从铁犁上卸下一把，有的甚至卸下两把犁铧。这不仅降低了耕作量，而且还威胁到垦荒计划的完成。

新垦地播种前的耕作任务也不轻：要求把开垦过的土地用圆盘中耕机耕上几遍，再用阔齿耙耙地，并且用注水压平机碾平，然后才能开动播种机，而且土地的翻耕和播种之间的间隔时间不得超过四至五天。我们懂得，不这么办土地会干结，种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收成。

我还记得第一次到库斯塔奈州视察播种工作的情况，H·C·赫鲁晓夫也到达那里的托波尔车站。不久

① ДТ 为柴油拖拉机的缩写。——译者

② HATH 为拖拉机科学研究所的缩写。——译者

在麦库里养马场召开了一次规模很大的会议，该养马场也从事垦荒工作。在养马场的经理办公室里聚集在一起的有：波诺马连科、我、库斯塔奈州州委第一书记 И·И·赫拉姆科夫、州执委会主席 И·Г·斯拉日涅夫、库斯塔奈养马场经理 М·Г·莫托里科（现任哈萨克农业部长）、全苏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的科学家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大家谈了许多问题，但主要讨论的是土层的翻耕问题。

我们对这个问题曾大伤脑筋。问题的实质在于普通耕地用的铁犁无法把前小犁切开的草根土块翻到垄沟底部去。这些带草根的土块乱七八糟地堆积着，下面的土坷垃无法把它们覆盖住。耕耙这种土地是十分艰难复杂的。大家决定休会，到现场看看实际情况，于是大家来到一个拖拉机耕作队。

机耕手们焦急不安，工作不顺利，不管怎样使劲，耕过的土层还是无法完全翻转过来。我走到拖拉机手跟前，同他们交谈，问他们该怎么办。他们回答说，现有的铁犁不合适，需要另一种铁犁。

“哪一种呢？”

“我们早就谈过这件事，可是没有多大用处！”其中一人说道，“要立即安排生产带半螺旋形和全螺旋形犁壁的铁犁。”

这里应该提一下，当赫鲁晓夫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以后，顿时大发雷霆，严厉地斥责科学家们，为什么事先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不是有一段时间可以事先安排工厂生产这种铁犁么？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一个月之后第

一批新型铁犁便送到荒地上来了。

但这毕竟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当时垦荒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必须立即想些办法，以便工作能按预定的速度进行。有一天晚上，我照例给各国营农场打电话。关切地问他们，耕了多少地，碰到哪些困难，我也给奥尔忠尼启则国营农场打了电话。农场主席 Ф·П·库赫金汇报说，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请求多供应些备用的犁铧。

“啊呀，犁铧简直都烫得灼手了……可是，翻耕还在全速进行，您亲自来看看吧。”

我又询问了草根土块的翻耕情况，听到的回答是：

“正常。它被乖乖地制服了。”

翌晨，我们一大群人动身到奥尔忠尼启则农场去，苏联国营农场部副部长 С·В·卡利钦科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在区中心我们把苏共中央负责垦荒工作的代表米哈伊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罗基涅茨也拉去了，我早在乌克兰的时候就认识他，我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工作的那几年，他正好是切尔尼戈夫州州委第一书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次的邂逅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后来，他任科克切塔夫州州委第一书记，此后又担任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营农场部和农业部部长。他在垦荒工作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在奥尔忠尼启则农场之行中才知道，正是他，米哈伊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提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建议，才使他所管辖的几个区的垦荒工作进展顺利。我们在田野上看到了一派欢乐的景象：拖拉机手轻松自如地以正常速度驾驶着拖拉机，而铁犁翻耕着荒地，发出平稳而又

令人愉快的嚓嚓声。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说了嘛，这算不了什么！”罗基涅茨笑着说，“我们是浅耕，翻耕表面那一层。你们看，前小犁只入土七厘米深，而不是指令中所要求的十一厘米。我们就这样解决了问题。”

果然不错，我们这才发现前小犁就象切板油似的，整整齐齐地切下薄薄的一层草皮，并把它们的“皮毛”翻到垄沟的底部。确实是“兜底”翻了。我不由得责备起米哈伊尔·格奥尔基耶维奇及国营农场的同志们来了：为什么早不吭声呢？

“这么一点小事，就大喊大叫，多么难为情！我想，别人也能捉摸出来，这有什么奥妙呀。”罗基涅茨说道。

“你是捉摸出来了，”我说，“但是，别忘记，荒地上的来自全国各地，很多都是年轻人。根据经验所采取的一切有益措施，都应尽快地推广。即使有一些经验丰富的人，也可能会考虑到这一点，但他们害怕负破坏指令的责任呀。是不是这样，斯捷潘·弗拉索维奇·卡利钦科同志？”

“对，可能有人怕负责任，”卡利钦科承认这一点。

“那你就赶快下命令，让各地，凡是草地难耕的地方，都让前小犁入土七厘米，而不是十一厘米。”

“今天就起草。”

我们驱车返回的时候，一路上尽开米哈伊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的玩笑，大家说，乌克兰人给自己切板油总是拼命切得厚一些，可是罗基涅茨却偏偏切得薄薄的，真是破天荒第一遭……

第三天召开了库斯塔奈州常委会。常委会上讨论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在荒地上修筑公路的问题。多数人主张修筑适于汽车运输的公路。虽然这样做花钱要多一些，时间要长一些，但有利于从一开始就发展基础牢固的、现代化的、有长远打算的公路网。与此同时，还建议在中心地点把大型粮仓的建设工程搞起来。然而 H·C·赫鲁晓夫认为，最好是修几条窄轨铁路，按照他的说法，将来可以把粮食从偏僻地区运到铁路线上来。没有人提出任何值得注意的反对意见。于是就先后建成了库斯塔奈——乌里茨科耶，叶西尔——图尔盖两条窄轨铁路。这是一个错误，两条铁路在运粮方面实际上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不久就被拆除了。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为了证实，一个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同时还必须是一位筑路专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等。不，不是这个意思，但他应该掌握一般的发展规律，并能依靠具体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知识处理问题。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中自己是大家所公认的唯一权威。

现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是相当复杂的，只有强大的集体智慧才能驾驭它。因而，必须听取专家和科学家们的意见，而且不能只听某一流派或者某一学派的专家和科学家们的意见；此外，还必须善于同群众商量，以便防止任何“鲁莽冒失”，避免作出任意的、仓促而未经深思熟虑的决定。如果涉及到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全面开发，制订该地区的长远政策，以及需要高瞻远瞩，把握未来的时候，这种决定就特别有害。

我从库斯塔奈出发，到各个垦荒的州、区、国营农场去视察了一番，那儿都在进行播种。

在叶西尔和阿特巴萨尔两个车站上，我看到了真正的人声鼎沸、杂乱无章的情况。车站的吞吐能力与源源涌进来的货物数量完全不相适应。尽管叶西尔是一个很小的车站，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但是在那时候人们就已经把它称之为荒地的大门了。很多货物也运抵区中心阿特巴萨尔车站，这是一座古老残破的小城，四周空旷冷落，尘土飞扬，那里房屋低矮，草木枯萎，绿荫鲜见。但它接纳着很多满载着技术设备、木材、水泥、房屋构件、野外作业的土斗车、金属、汽油、种子、粮食和其他货物的列车。这些列车，不仅为荒地的各生产单位运来了所需的货物，而且也为邻近的三个区运来了急需物资。那时，为了把这些列车上的货物卸下来，竟动员了全城的居民。

区党委会常委、区执委会工作人员和共青团积极分子昼夜不停地在车站值班——接车、指挥卸货、接待来人，并且想方设法把他们临时安置在当地居民家里，我之所以说想方设法，是因为新来的人不肯在任何地方多耽搁一分钟。他们一到，就急着要上草原，在嘈杂的人声中喊着自己国营农场的名字：“马里诺夫斯基”！“阿特巴萨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鲍曼”！必须说服他们，向他们解释，先来的几支队伍已经输送到各国营农场去了，他们在那儿垦荒、播种，为新来的人盖房子，眼下房子尚未造好，新来的人到了那儿也无事可做。同时还要向他们解释，河水已经漫出河岸，现在去很危险。但是说什么也不管用。人群中举起了标语牌：“给我农场”！“给我

荒地”？

拖拉机队和汽车队络绎不绝地把技术设备和人员送到象阿特巴萨尔这样一些位于伊希姆河右岸的农场去。但是有部分技术设备，原先是规定给该区位于河左岸的各农场使用的，可现在由于河水泛滥而运不过去。把这部分技术设备闲搁着，那简直是犯罪，因此区领导决定把这部分技术设备暂时拨给河右岸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农机站使用。但突然有一支拖拉机纵队不见了。

原来，拖拉机纵队队长弗拉基米尔·切卡林听到这一决定后，焦急不安地半夜里把自己那儿的小伙子们叫了起来，开着拖拉机跑了。他们根据共青团组织开的路条，一直开往“红霞”集体农庄，他们这支纵队早在当地，即出发地，就已经组织好了，各人驾驶着自己的拖拉机。区委书记瓦西里·菲利波维奇·马卡林亲自去追赶这些“逃跑者”。他在伊希姆河岸上找到了几辆拖拉机和只身一人的切卡林。

“其余擅自行动的人在哪儿？”

“这就到。”

“谁让你们自作主张的？”

“这怎么是自作主张……这些拖拉机本来规定给谁的？给‘红霞’集体农庄的。现在它们就该到它们该去的地方，为垦荒出力。我们会找到浅滩开过去的！”

区委书记左说右说想劝队长回去，可是小伙子还是犟着不动。这时其余的农机手们来到了岸边，其中有当地的几位老人，他们的大白胡子隐约可见。一位老人听到了上述争论，便对马卡林说：

“咳！书记，你干吗要训这小伙子呢？你自己不对嘛！你为啥不早一点把机器运过去？难道你不知道，大雪一化就要发大水！”

哈萨克老人给小伙子们指明了浅滩所在地，还告诉大家，伊希姆河的这一块地方，底上都是坚硬的石头。不消多大工夫，拖拉机手们把拖拉机开上了左岸。当天他们就驾驶着拖拉机为集体农庄干活了。紧接着技术设备也通过这条浅滩运到左岸的其他国营农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马里诺夫斯基”，“鲍曼”……

瓦西里·菲利波维奇在向我叙述这件事的时候，还是很激动，他感慨地说：无论如何，这么干，毕竟是有危险的。拖拉机手们擅自行动使他很恼火。然而这反映出他们的顽强、机智和勇敢。顺便谈一下，在“逃跑者”事件之后，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到左岸去的渡口。阿特巴萨尔居民把自己所有的船只都放到河里，联结起来，构成两艘渡船。整个春天和夏天，人员、机器、燃料、粮食等就是通过渡船运到左岸去的。这也是真正具有前线那种灵活机动特色的一个事例。这样的例子，我在荒地工作的那些年代里曾经遇到过很多，真是举不胜举。

我和马卡林一起从阿特巴萨尔出来，又从从容容地从一个农场转到另一个农场，从一个作业队转到另一个作业队。我是第一次看到哈萨克草原上的春天景色，一路上尽情地欣赏。多么辽阔广大！太阳从草原这一边的地平线爬到那一边的地平线，长途跋涉，恐怕也会感到疲劳不堪吧。春天的草原气象万千，绚丽多彩，漫溢的河水，泛出蓝色。嫩绿的青草散发着浓郁的芳香，在阳光的

照耀下又是那样光彩夺目。郁金香竞相开放。在这茫茫的绿色草原上，时而在这里，时而又在那里可以看到第一批开垦出来的黑色的方块田。

但是，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有一个念头使我焦灼不安。在视察大口作业时，我发现所有新开垦的方块田都还没有播种，只是在原有的耕地上播了种。我想起当地老住户讲过，他们一向如此，总是到第二年才播种。我并没有急于提出问题，只是在一个作业队里询问了一个不是外来的，而是本地的拖拉机手：

“你们什么时候在荒地上播种呢？6月份吗？”

“谁会在6月份播种呢？”他惊奇地反问，“在我们这儿这么干会叫人笑掉大牙的。我们这儿都这么说：6月到，再播也糟糕！”

在返回阿特巴萨尔的路上，马卡林沉默不语。

“不该汇报一下吗？”我问他。

“有什么可汇报的呢？您全都看到了……”

原来阿特巴萨尔区今春并不打算播种。为什么呢？马卡林解释了一下，新开垦的处女地一向都是在第二年春天播种的，因为垦荒工作动手晚，不会早于6月。为什么很晚才动手呢？因为在这以前农民们忙于播种，而两件工作——播种和开垦——一起干，忙不过来。等到播完种，腾出手来完成垦荒工作，然后再在荒地上播种，那就失去意义了，所以只好等待第二年的春天，只有这样才能初战告捷，获得通常所说的好收成。历来的传统，一成不变观念和偏见就是这样形成的。阿特巴萨尔人商量来，商量去，讨论了好久，怎么办，最后还是决定第一年不

播种。

应该说，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够多了。后来，我又征求了严谨的科学家们的意见，他们搬出一大堆材料，以及很早以前考察团开始对荒地进行勘查所积累的资料。关于这些问题，我以后还要谈。我们计划要在6月里尽量多开垦一些荒地，以期明年，1955年种上庄稼，因为我们这儿在夏末或者秋天翻耕荒地和秋耕地，那就象6月播种一样是不适宜的。这是经科学家们据理证实的，并在我们的计划中作了规定。然而，有一些荒地我们是在头一年春天，即在4月和5月份开垦的，那就不必等到明年，而是在当年就可以种上庄稼了！

这就必须对人们进行说服工作。我俩默默地回到了城里，各自想着自己的事。我在马卡林家里吃了晚饭，他妻子费奥多西娅·库齐米尼奇娜包了我喜欢吃的饺子，我俩就着饺子又喝了两杯酒：一杯——祝垦荒工作旗开得胜，另一杯——祝女主人身体健康。那天晚上马卡林滔滔不绝地谈了各方面的问题：

“请您告诉我，您当真相信，我们边疆区将成为全国最大的谷仓吗？”

“您对这一点还怀疑吗？”

“要征服这块土地可真难哪……”

“可我不仅相信，瓦西里·菲利波维奇，而且我为能参加这项工作而感到自豪。”

我深深地了解这个人，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在建设规模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有一些地方上的老干部不要调动，仍然留在当地工作为好，他便是这些老干部

中的一个。我们的做法是对的。在重大事件的面前，他们只是在最初的时刻感到有些不知所措。马卡林也是这样，他是数千名肩负着最困难的党的基层工作的主要重担的区委书记之一，他们辛勤而又伟大。马卡林在一个极其平静的小城里生活、劳动，他的日子也一天天地平静而又从容地流逝过去。这座默默无闻的小城，一直被人们遗忘在烈日炎炎的荒凉的大草原上。可是1954年到来了，小城一跃而为开展垦荒工作的中心地带，举国上下都注视着它。马卡林值得赞扬的是：他具备农民所特有的丰富经验和超人的智慧，从而使他敢于探索、寻求真理，对新事物深信不疑，并为此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聪明才智。

翌晨，根据我的要求，他把国营农场场长 A·B·扎乌达洛夫、И·Г·利霍巴布、T·Я·图季科夫召集到区委来，区执委会主席 G·K·加卢夏克、副主席拉希姆凯萨林和其他一些同志也都来了。我们再一次对所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讨论。我仔细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发了言：

“你们对重大问题都持认真慎重的态度，这很好。但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争论的焦点在哪里。一个单干的农民，即使象过去所说的是一个善于经营的人，他开垦荒地能否象我们现在这样快呢？毫无疑问，不能！就算他用简陋的木犁，或者至多用多铧浅耕犁，能在5月份把自己那一小块荒地翻耕完，但是进一步精耕细作他根本没有什么工具可用了。只要那长满草根的大土块在日晒、水浸、冷冻的作用下，本身不裂成小碎块，那他几乎要等

一年，甚至要更长久地等下去。难道我们也要向这位农民看齐，学习他那种迫不得已的痛苦经验吗？我认为大可不必。我们利用现有的技术设备在两三天内就可以把开垦出来的荒地疏松耙匀，为播种做好准备。也就是说，在荒地开垦出来的当年，你所付出的劳动，就可以获得报酬。现在请大家决定一下，怎样做更好一些！”

“有什么可决定的！我早说过，该播种啦！”扎乌达洛夫热烈地附议说。

“那就快播种吧。”

“您知道……并不是有人不让我们或者禁止我们播种，而是说：要小心，别自讨苦吃，您不是本地人，这儿的土地您不了解。这样就不由得有所顾虑了。”

“我们一定把开垦出来的荒地全部种上，”马卡林保证说。“您说服了我们。看来，我们是自己作弄自己了。”

“这很好，但是还得注意一点，”我补充说道：“刚才我们列举的理由，可以说都是从农艺和技术设备方面提出来的，根本没有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其实，我们要注意的，不仅仅是可能性，而且还要考虑到尽快在荒地上播种粮食的必要性。这不光是经济上的需要，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要向全世界再一次宣告，我们共产党人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极为艰巨的任务。此外，要使每一个开荒者能在今年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就鼓舞人心而论，也是极其重要的。”

(四)

有时人们会问：开垦荒地的主张是谁提出来的？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不对的，因为其中包含了一种企图——把我们党和人民的杰出成就归功于某一个人的“远见”和毅力。

开垦荒地——这是共产党的伟大主张，这一主张的实现，使我们有可能几乎在一瞬间（如果从历史的范畴来考虑的话）就把我国东部荒无人烟的，然而却是富饶的大草原变成具有发达经济和高度文化的地区。

大家知道，早在上个世纪，俄国欧洲部分的赤贫农民就开始往哈萨克、西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广阔无垠的土地迁徙。不过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出现，迁徙的人就格外多了。同时，大家也知道迁徙会引出什么后果。沙皇俄国的数百万备受压迫、没有土地的饥饿农民，携家带口奔向东方，奔向边疆的“乐土”，他们历尽艰辛，期望能在那里找到土地和幸福。他们有的搭上拥挤不堪的敞篷货车，有的赶着牛车和马车。他们中间有成千上万的人由于经不住长途跋涉的颠簸，受不了饥饿和疾病的折磨，纷纷惨死在路上。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有关这一人间悲剧的大量史料。例如，我们不妨回忆一下画家C·B·伊凡诺夫的一幅画《移民的死亡》。一个养家活口的农民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死在半路上，死在荒凉的大草原上。留下了孤儿寡妇又怎么办？我们总是带着这个令人心酸的问题久久地停留在这幅名画前面。

但是那些顺利到达从未开垦过的荒地上的人们，却陷入了绝境。他们单枪匹马地同荒凉无情的草原进行残酷的斗争。他们没有住房，没有道路，没有水，无处去求援。他们的全部“技术设备”就是一匹拉着简陋木犁的瘦马，那时铁犁是鲜见的。

革命前，“垦荒”对人民来说简直是不折不扣的灾难。A·П·契诃夫、B·Г·柯罗连科、Г·И·乌斯宾斯基都曾愤怒地抨击过沙皇当局残无人道地对待移民的暴行。乌斯宾斯基在《移民区之行》的那篇随笔中，将其在某个农庄里看到的典型景象，作了描绘：

“那黑糊糊的一堆堆象散在各处的不大的泥炭堆或是干粪堆的土窝棚，你看到了根本想不到这是人住的房子，这里，四周不见人影，你简直无法想象，竟会有人居住过。然而，确有人住过……”

请注意，这种“黑糊糊的土堆”，即土窝棚的废墟遗迹，我们在草原上的某些地方还能见到，它们总是使人痛苦地联想到第一批拓荒者的悲惨命运。

农民们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条件，又纷纷返回俄罗斯，他们回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那儿迎接他们的同样是不幸的命运。弗·伊·列宁愤怒地痛斥了沙皇政府对待移民的政策，他写道：“最不幸的贫苦农民失掉了一切，怨气冲天，回到俄国来了。西伯利亚的土地问题应该说是极度紧张的，尽管政府拚命地努力，还是不能安排数十万移民。”^① 在另一篇文章中列宁写道：“这个移民回家

^① 列宁：《移民事业的意义》，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8页。——译者

的大浪潮，表明农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破产和贫困。从前，农民卖掉所有的房屋，跑到西伯利亚去；现在又被迫从西伯利亚跑回来，变成完全破产的穷光蛋了。”^①

资产阶级的考察家们想方设法为政府的行为作些辩护，妄图消除由于大批备受折磨的人们由西向东，再由东向西徒劳迁徙所造成的不愉快印象，竟然杜撰出一整套理论，硬说，一切要归罪于……东部草原的土质。他们写道，这些土地似乎都是不毛之地，鉴于自然条件的特点，它们任何时候都无法利用。然而在俄国又有谁不知道，这些话充其量无非是对从未开垦过的，多少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肥沃大草原的诽谤呢？

“这儿的土地肥沃，盛产粮食，宜种蔬菜，适于放牧”，《西伯利亚地图集》一书的作者 C·V·烈密佐夫早在十八世纪谈到西伯利亚和北哈萨克时曾经写了这样几句话。列宁嘲笑那些冒牌科学家的谎言，他一再说过：还有空闲的土地“——也有肥美的土地，这些土地应该加以开垦”^②！我在《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二百二十九页上，发现他那深邃惊人的洞察力。列宁指出，这些土地之所以不宜耕作，“与其说是由于……自然特点，还不如说是由于……经济的社会特点，正是这种特点使技术停滞不前，使居民陷于无权、闭塞、愚昧、无援的境地。”^③

① 列宁：《论现政府的土地政策（一般的问题）》，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177 页。——译者

②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1 卷，第 437 页。——译者

③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32 页。——译者

十月革命根本改变了农业的“社会特点”，从而为开发西西伯利亚、北哈萨克、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乌拉尔和远东等地区的荒地创造了条件。到1940年，全国可耕地面积与1913年相比增加了三千二百四十万公顷。苏联开垦备用地的第二阶段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也正是在那时，向荒地要粮的迫切性与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现实可能性结合起来了。

党早已准备向荒地大规模进军了。还在二十年代末期时，举世闻名的科学家H·M·图莱科夫就敏锐地预见到，大型机械化农场的建立，为征服荒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于是他组织了第一个科学考察团，以便准确地摸清我国东部适宜于开垦的土地。他在一些文章和向联共（布）中央的汇报中，叙述了考察团取得的成绩。1930年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讨论了我国东部地区扩大粮食生产的问题。顺便说一句，在这次大会上，图莱科夫被吸收为预备党员。在中央委员会农业部起草的《集体农庄运动和农业的发展》这一报告中，党的立场观点阐述得非常明确。现将这个具有远见和饶有兴味的文件摘录如下：

“……我们将把小麦种植在能生长这一珍贵农作物的地方，种植在拖拉机能昼夜二十四个小时进行作业的地方。根据联共（布）新接纳的预备党员，世界上卓越的旱地农业专家，图莱科夫教授的计算，哈萨克有五千万到五千五百万公顷的土地可以算作可耕地，其中约有三千六百万公顷分布在同西伯利亚和乌拉尔毗邻的北部地区，如：阿克纠宾斯克、库斯塔奈、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阿克

摩林斯克、巴夫洛达及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这儿小麦的播种面积只占全部可耕地的百分之五。

“我们打算如何完成小麦的播种任务呢？应该注意的是：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在人口稀疏的地区解决，那里的地形又有可能以最高的效率去使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要完成此项任务大约需要七十万至一百万匹马力，这样就能多播种二千万至二千五百万公顷小麦。这一点我们能够做到，并且应该做到！”

“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组织工作的重心是要最低限度地使用人力和畜力，免得在此地储存大量备荒用的口粮和饲料。这儿除了全盘机械化以外，还必须做到充分利用每一台拖拉机，每一辆汽车和每一个人力。这里的工作必须以一个人应照管二百公顷土地为出发点。”^①

这些建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被采纳了，并且受到人民的赞同和支持。当时，中央和地方的报纸刊登了很多文章，论述了开垦荒地的必要性，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在哈萨克和西伯利亚着手建立了第一批国营谷物农场，为我们后来向荒地大规模进军提供了经验。然而，在那些年代里，国家还不能把足够数量的技术设备投放到辽阔的大草原上去，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来战争爆发了。但是大规模开垦生、熟荒地的想法并没有打消。垦荒这两个字，依然存在，只是需要等待时机罢了。

1974年阿拉木图市隆重举行了开垦荒地二十周年纪念大会，我在会上发言指出：历史性事件、重大的政治决议的真正意义通常不是立即显示出来的，而是在稍后，

^① 未查到出处。——译者

当有可能把意图和效果加以对比，把这些事件和决议对生活某些方面的实际影响作出估价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历史的间隔使那些细枝末节不再引人注意，从而能更清楚、更明显地看到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谈到开垦荒地，那么，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党于1954年提出了极其重要、极其迫切的国民经济任务。当时，苏维埃人对这一主要的东西理解得很深刻。

其实，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五十年代初期的形势。在那些年代里粮食情况令人极端不安。全国的粮食产量，平均每公顷不超过九公担。1953年统购到的粮食是三千一百万吨多一点，而实际消费量却超过三千二百万吨。那时我们不得不动用部分国家储备粮。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必须采取根本性的坚决措施，尤为重要的是要采取紧急措施。在当时情况下，在继续关注提高老农业区产量的同时，党把大规模地迅速扩大耕地面积的任务提到了首位，而这个任务只有依靠开垦东部地区的荒地才有可能实现。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扩大耕地面积不仅是数量问题，而且有一个质量问题。国家不单单需要一般的粮食，她感到极其缺乏的是最珍贵的粮食作物——小麦，然而只有那些可以种植良种优质小麦的荒地，才能向国家提供这类粮食。如果垦荒成功，国家粮食的收支状况就可以得到根本的改变。我认为，这是具有革命性的改变。

事隔多年，在垦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今天，似乎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了，你甚至还会觉得奇怪：当时怎么会有人反对垦荒呢？当时反对垦荒的人确实有。不过，真

正猖狂反对的，对垦荒连听也不想听的人，只是一些不久以后形成的反党集团的成员们。我们绝不可把这种人同那些一时认识模糊、确实抱怀疑态度或过于慎重的人混为一谈。对于后者，我们只能用事实和效果去说服他们。他们的立场一般说来是没有罪过的。对一些重大事件抱正当的怀疑态度甚至是必要的。必须把成千上万个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都加以衡量，考虑到一切细节，这样才能制订出一种能够迅速而有把握地取得胜利，而且只能是胜利的行动方案。

各种怀疑的起因果真不少。我们就纯自然因素，如气候、农业耕作的条件来谈一谈。众所周知，我国与其他很多国家不同，尤其不同于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极为理想的条件的美国。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所谓危险的农业地带。既然如此，那我们在某些专家认为根本无法耕作的那些地方开辟规模巨大的新的农业区，岂不是扩大了上述因素的影响，更多地听命于大自然了吗？这样做是否值得呢？因为我们要在极为干旱、被烈日晒得灼热的大草原上，在每年降水量为二百毫米，最多为三百毫米的条件下，播种千百万公顷的小麦。

这就是为什么凡是规模宏伟的事业，当时都得经过极为详细的讨论的原因。在那些日子里，有人告诉我一件同 K·E·伏罗希洛夫有关的小事。他刚从农业地区结束例行视察回来，他忧心忡忡，满面愁容。他听说讨论了垦荒问题，知道这需要巨额资金，需要人力和设备，他神情忧郁地说：

“可是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农村里，有些地方人们还

用人力拉犁耕地哩……”

是啊，党必须作出相当棘手的抉择。现在不过是战争结束后的第九个年头。战争所留下的创伤，还在淌血。法西斯匪徒焚烧和毁坏了七万个农村，有九万八千个集体农庄和一千八百七十六个国营农场遭到了彻底破坏；它们被洗劫一空，夺走了一千七百万头牛，七百万匹马，至于那些未被占领的地区，那儿的农机站、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物质技术基础也都基本毁坏了。技术设备经过多年使用，已经磨损严重，土地也荒废了，而最可怕的是：到处缺人——几百万拖拉机手、联合收割机手、汽车司机、机械师、技术人员、工程师、农艺师都战死在沙场了。

由于付出了巨大努力，农业生产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是，农村还需要支援，农业还满足不了居民对食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也满足不了工业对原料的需求。

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了一项宏伟的规划，它的使命是克服农业领导工作方面的缺点。看来，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本身，以及国家在资金、物质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所处的困境，都要求把一切力量投入传统的农业地区，以便从那里获得相应的收益。

然而，问题就在于，党制订的规划尽管旨在发展所有的农业部门，但它并不能保证，而且也不可能保证立即取得成效，特别是涉及粮食生产这一主要任务。在大田作物的栽培和植物种植方面产量的增长一般来说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冒风险，也必须为赢得时间而把一部分物资和资金大胆地拨给荒地的原因，预计那里有可能在一个季度内在国家粮食收支处于极度紧

张的状况下提供一笔可观的粮食数。如果预定在1954年开垦的第一批一千三百万公顷荒地开垦成功的话，那么当年秋季就可以为我们粮仓增加八亿至九亿普特^①商品粮。所以党决心这样做。这样一来，党在战术上胜利了，因为立即收到了体现在粮食上的现实效果；在战略上也胜利了，因为我们不是两手空空到荒地上去的，也不是为了去“掳掠”它的财富，从它那肥沃的土地上摘取果实之后就溜之大吉的，而是要长期扎根下去。

顺便说一句，克里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是一位卓越的活动家，他善于全面地权衡轻重，分清哪些全国性的重大措施必须采取，哪些还为时过早，他是赞成垦荒的。后来，他还到过哈萨克，望着无边无际的麦田，高兴地对我说：

“我们到这里来真是太好了！在这广阔土地上长的粮食，可以支援白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和沃洛格达的农民，而且确实是解救燃眉之急的支援。唉呀，要是能在装满荒地粮食的大卡车上画上个黄灿灿的十字，就象小麦的颜色一样……这些小麦可要帮我们大忙，帮我们大忙呢！”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而当时，1953至1954年还为垦荒这件事争论不休呢。最棘手的一条反对意见是：在没有任何后勤基地的情况下，就如此兴师动众地开进荒无人烟的大草原，这怎么行呢？不，首先应该兴建居民住宅、学校、医院、道路、修配工厂、大型粮仓，然后再把技术设备和人力运进去。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才好呢？当然，能具备这些条件那最好啦！只不过提出这一

^① 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

问题的人并不理解向荒地火速要粮是当务之急啊！我们向荒地进军的目的是既要在那儿定居，又要大兴土木，同时还要向荒地要粮。苏维埃人坚持社会主义，为了赢得时间，很多方面都是白手起家的。党对响应号召奔赴荒地的人们坦率地讲明：垦荒是困难的，非常困难，摆在你们面前的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而任何战斗都需要人们去建立功勋，于是几十万爱国者——未来的荒地开拓者——便自觉地去建立功勋了。

党遵循自己一贯的传统，不同人民商量是决不作出任何重大的原则性决议的。这一次也不例外。1953年底和1954年初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哈萨克的许多边疆区和州，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举行了千百次各种类型的会议。这些会议表明：共产党员和广大劳动群众是赞成与支持党关于开垦生熟荒地的主张的。

当然，在那些直接展开垦荒战役的地方，也不是没有争论和怀疑的。但是怀疑具有不同的性质。人们一旦坚信，党的决定并不是草率作出的，而是详细地研究和制订了国民经济宏伟规划的，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坚决拥护。前面提到的阿特巴萨尔区委第一书记 B·Φ·马卡林已在垦荒战斗中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他讲的话就很有代表性。下面就是他不久前所写的当时的思想反复情况。

“事隔多年了，许多事情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现在似乎可以大吹一番，说什么我们这些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卷入了垦荒工作的人，当时已经作好一切准备，犹如轻骑兵一样，跃马扬刀，直接投入了征服沉睡着的草原的战斗，而且马到成功等等。但实际情况可能不是这样。

凭良心说，当我们知道阿特巴萨尔人面临的是什么任务时，我和我那些一起共事的区委领导，说得婉转一些，都感到有些坐立不安。要理解我们的心情并不太难。荒地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些在这块地方土生土长并且工作了多年的人是十分清楚的。农民想征服它，那谈何容易。一百多年以来阿特巴萨尔农民总共开垦出十万公顷荒地，其中能种上庄稼的只占三分之一，而且还要在风调雨顺的好年头。这一切并不是偶然形成的。现在，两年中却要在区内开垦出近五十万公顷荒地，几乎要把整个草原翻个个儿，还要它长出粮食，而且非长出来不可呢！这不得不令人深思……我们毫不怀疑国家准能提供足够的技术设备，那时我国已有发达的工业，雄厚的经济资源。但是请问，谁来使用这些技术设备呢？因为现在还没有出现不需要人操纵就能自己耕耘、播种和收割粮食的机器，况且还要把粮食变成小白面包呢。也许有人会说我有点言过其实，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当时确实如此。我们开创的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其中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的。”

我早就认识马卡林同志了。他的话不错，风险是有的，而且区委书记能够并且应该多方考虑如何更好地完成党所提出的任务。区里不止一次地召集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方面的积极分子开会，他们争论得喉咙都哑了，并且提出各种行动方案——这话也是符合实情的。

“但是我们的怀疑，”B·Φ·马卡林在最后写道，“很快就涣然冰释。党经过详尽研究后，制订出我们原先认为是奢望的一些措施。党所依靠的是人民对它的无限信

任，以及人民具有的高度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冲天的干劲。技术设备源源不断地运进我们区里，成千上万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纷纷来信询问那些要人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地址。数百名专业人材和技术行家响应党的号召纷纷到来。于是史无前例的垦荒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五)

在老的字典里，您可以查到“荒地”这个词，但却查不到“荒地人”这个词。后者产生于五十年代，就象集体化年代出现了“集体农庄庄员”这个词一样。那时“荒地”这一概念本身就失去了纯农业的意义，它变成了社会术语，因为它包含着高度的公民责任感和苏维埃人深厚的爱国热忱。“荒地人”乃是反映英雄时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形象。这一名称代表时势所造就的一代人物。

有一次，我来到库斯塔奈的一个国营农场，那儿只有一幢造好的小房子，人们都还住在帐篷和土屋里。我了解到，这幢房子里最好的一个房间分给了一对年轻夫妇，因为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大家热烈庆贺喜事临门，而幸福的父亲对我说：

“虽说我们来这儿不久，但您现在可以把我们看作是地道的荒地人了。”

“不，”我反对道。“地道的荒地人目前在你们整个农场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刚生下来的小男孩。而你们还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成为此地的地道居民。我想，这不是

很容易就能做到的。”

我回想起很久以前，在泽利诺格勒州，就在这个阿特巴萨尔区，春秋两季所作的两次谈话。这两次谈话的内容迥然不同。在荒地上第一个春天，我听到有些领导人抱怨说，到这儿来的人员不是全都打算留下来的。“马里诺夫斯基”国营农场场长 A·B·扎乌达洛夫说：

“一方面，这些人是各式各样的，另一方面，象军队一样，又全是小伙子。他们今天在这儿，明天又想到别处去了。”

“对，这是个问题……”我同意道，“年轻人具有浪漫主义。一两年后，一部分青年就要远走高飞。您也看到了，大多数人都愿意只住帐篷。您尽可以多给他们压一些担子，使他们觉得肩上有分量。否则，在最初需要做的一切工作完成以后，他们就觉得没事了，就会感到无聊，就想往别处去了。”

“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应该考虑怎样使干部稳定下来。我看有两个办法，首先，要招收姑娘们到这里来。挤奶员、播种工人、电话员、炊事员、医生、教师——这样的工作，无论现在和将来，在新地方难道还会少么？你们把姑娘们请来了，许多小伙子就会永远留在这里了。第二个办法嘛，把有家眷的人请到这儿来，不过要先给他们创造正常的生活条件。这么办，人们就能在这儿定居下来。”

既然如此，我们就要考虑安排个人的幸福生活问题。每一个人都需要房子、家庭、爱情、孩子。国家和社会不可能为每一个小伙子找一个古人所谓的窈窕淑女，但应

该力求做到不使国内出现纯“男性”地区或纯“女性”城市。如果人口结构问题解决得合理，那么青年人就有机会结识，进而结成幸福的伴侣。他们的确应该是幸福的，因为否则就谈不上国家的昌盛。

不久，阿特巴萨尔区首先发起倡议，邀请姑娘们到荒地来。我回到阿拉木图以后，于1954年7月17日在《真理报》上满意地读到“马里诺夫斯基”国营农场的女垦荒队员拉伊莎·叶麦里扬诺娃、亚力山德拉·扎姆齐、叶莲娜·克列什尼亚、瓦列金娜·涅波恰托娃、波利娜·巴什克娃、柳德米拉·谢苗诺娃致全国姑娘们和妇女们的公开信，号召她们到荒地来。这一号召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响应。秋天，我到阿特巴萨尔视察秋收工作时，又遇到了扎乌达洛夫。他又是欢欣喜悦，又是忧心忡忡。我问道：

“出了什么事？”

“真要命，列昂尼德·伊里奇，我现在仿佛不是场长，而是个专职邮递员……农场收到了姑娘们几千封来信。她们都要来，而且都想到我们这儿来！这事要统筹安排一下才好。还有很多其他国营农场嘛。要不然，我们这里将成为未婚妻的大本营，而不是农场了。”

姑娘们蜂拥而来确实造成了不少麻烦。然而，荒地上的生活却明显地起了变化。那种行军式的“军事”生活很快就变成了正规舒适的生活了。今天，我走到荒地的任何地方，到处可以遇到在本地出生的职工。生活已在这个地区深深地、牢固地扎下了根。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让苏尔坦·杰麦耶夫现在已经带

着儿子米拉什·杰麦耶夫一起下大田劳动了。如今，这块土地上不仅有著名的第一批垦荒者米哈伊尔·多夫日克和弗拉基米尔·季久克，而且还有这儿出生的优秀农民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多夫日克和格里戈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季久克。我不止一次地到过北哈萨克州的“日丹诺夫”国营农场，和场长马尔克·帕夫洛维奇·尼科连科见面。这位老场长退休以后，农场就由他的儿子弗拉基米尔·马尔科维奇·尼科连科米领导。库斯塔奈州卡拉苏斯克区“列宁”国营农场的联合收割机手阿曼格利迪·伊萨科夫在荒地上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而他的儿子弗拉基米尔·阿曼格利季诺维奇现在是该区“科伊巴加尔斯基”国营农场的总农艺师。泽利诺格勒州“萨马尔”国营农场的联合收割机手伊凡·格里戈里耶维奇·科斯梅奇建立起了一个真正的务农世家；他的九个儿子现在同他一起种庄稼，收割庄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一切正是象当初所设想的那样：新的土地开垦出来，人们就留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

M·E·多夫日克生产队垦荒时的帐篷早已陈列在莫斯科的革命博物馆内。而当年这种帐篷和土窑所在的地方，已兴起数以百计的草原城市了。目前在哈萨克的垦荒地区生活和从事农业工作的，已有一百二十万人。这儿如同国内其他经济区一样，人丁兴旺，人民安居乐业。

看着垦荒初年拍下的照片，不禁使人回忆起许多往事。照片上是荒芜的草原、拖拉机车队、标着国营农场场名的界桩、帐篷、土窑、拥挤不堪的小斗车和没有正规屋顶的、当时名之为“无檐海军帽”的小土房。人们就住在

这种栖身所里，靠风灯或煤油灯来照明。他们的一切都是临时性的、不方便的、行军式的。但是，您看看他们那一张张面孔，又都洋溢着愉快和欢欣。他们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动作，都反映出他们充满信心和乐观的情绪。所有我们这些当时在荒地上工作的同志，都感觉到这些意识到自己力量的人们的乐观精神和内心喜悦。由我们唤起生机的大草原，多么令人难忘啊！一切都向我们这儿涌来，就象总攻之前全都聚集在前沿一样。当时来到荒地的人，都不由自主地与它休戚相关了。

当然，也有一些人离开了荒地。有些人偶然来到这儿碰运气，他们自以为了不起，自私自利，光打自己的小算盘，人们把这种人恰当地叫做“闯江湖的”。我初到北哈萨克时，就遇到过这种人。这是1954年早春，在托波尔车站上。我刚下火车，就有一个家伙从人群中吵吵嚷嚷地跑到我眼前，象放连珠炮似地向我提了一大堆问题：把他们弄到什么地方来了呀？为什么要他们离开原来的地方呀？住在哪儿呀？工资呢？御寒的衣服呢？还说什么，在这个草原上只有土拨鼠才能在自己的洞里活下去！

我耐心地听他讲完，然后说：把新住户请来就是为了要他们在这儿安家立业。但这小伙子还不罢休，他抖抖自己那件单薄的上衣，要求立即发给他一件短皮大衣。看来很清楚，这是蛮不讲理的人（这种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我只好打断他的话问道：

“您是到这里来吃现成的馅饼么？您穿着这么一件上衣和戴着这么一顶鸭舌帽打算来干什么呀？荒地是不需要象您这样的人的！”

“瞧，总是这一套，”他压低了嗓门，“我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嘛……”

“不，亲爱的，”我说道：“您的要求过一个月，或者过两三个月才是合理的，而且也只是部分合理。只有一年之后，这些要求才是真正合理的。眼下我们对您倒有不少要求哩。您是为什么而来的？我们对您本来是抱着希望的，而现在却不得不赶快找人来替换您。我们能找到人的，您放心。”

我记得这小伙子是舒亚市来的那批人中间的一个。当然，这是个别的例外。同一个舒亚市，也给我们送来了真正的劳动者，他们在图尔盖草原建立了“舒亚”国营农场，后来成了荒地上一个出色的农场。

但是无须隐瞒，困难确实是有的。我们的人民在英勇的几十年期间为了美好的未来作出了许多牺牲，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各个阶段我们感到什么都缺少——钉子和煤油，鞋子和花布，住房和粮食。而党总是坦率地告诉人民：我们要同心协力，顽强地工作，才能克服困难和各种资源的不足，我们的生活会逐渐地好起来的。的确，尽管国家经受了許多新的考验，但是生活却是一年比一年好。

在我们历史的这个或那个时刻，一个人有时会得不到适当的安排和物质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活当然不会轻松，有时甚至是极端地艰苦。在这一意义上来说，不论是老一代的苏联人，或者年轻一代的苏联人，都经历过困难。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经受过象我国人民所经受的那样严峻的考验。但是您从整体上看一看我们

的生活。它不是一直在蒸蒸日上吗？任凭千难万险，我们都闯过来了。拿今天的现实和从前相比，其间的差别犹如宇宙飞船之不同于农民的大车一样。

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开荒时期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就会知道这些现象确实是暂时的。只有那些不屑为集体事业动弹一下手指的自私自利的人，才不理解这一点。人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不顾爹，不顾娘，你我哪在他心上。

垦荒初期，也有过一些迷惘惶惑的小伙子，那完全是两码事。对这些人，你只消找他们谈谈，讲明道理，进行说服，甚至象慈父般地抚爱他们，那就行了。对，要抚爱——我那时同一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谈话时，就经常使用这个词。对生活经验不足的年轻人，要严格要求，同时要亲切地同情。1954年的那个春天，在泽利诺格勒附近的贾尔蒂里车站，我看到一个青年提着一只箱子。他想乘火车。我问道：

“你是回家吗？”

“回家。”

“怎么啦，困难吗？”

“困难。我原先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的性格。我没有想到会这样想家，这样想家乡的土地。我们那儿很暖和。从窗户里就可以看到亚速海。花园里花儿盛开。而这儿是大雪，大风雪。你看现在这风多可怕啊……”

我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万事开头难。可你想一下，从前象你这种年龄的年轻人是怎样在前线浴血奋战的？他们也想家，也想妈妈，

也住土房子。他们还要冒生命危险冲锋陷阵……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在乌克兰搞个花园并不费事，可是在这里的草原上搞出个花园——那可是一大胜利。但是过一两年，这儿就要有村庄，也会有花园。主要的是，应该相信自己。你可不能刚刚开始生活，就想退却啊！”

我记得，那小伙子没上火车。我后来看到他坐在卡车上。我虽不知道这位现在当然已不年轻的同志的姓名，但是我想，他一定也和许多人一样，把自己的命运同羽茅草丛生的大草原联系在一起了。

那时有一家资产阶级的报纸刊登过这样一段话：“在原始的荒原上，人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尽可以放心：荒地始终会是俄国人胃中一块消化不了的硬骨头。”

当时这类刻薄的预言是何等喧嚣啊！但是第一批满载着志愿垦荒者的列车到达后，只过了三个月，大草原上已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麦田了。共和国内可耕地面积翻了一番，当年就达到了二千万公顷。如果象我们的敌人所报道的那样，我们对垦荒工作“毫无准备”，那么究竟是谁开垦了这些土地？究竟是谁在这些土地上播下了种子？谁在那一年向我们提供了二万二千多台新的拖拉机，一万多台新的联合收割机？谁派遣了几千列载有房子、木材、水泥、工业品和粮食的火车开到我们这儿？不，这是一场深思熟虑、计划周密的进攻战，而且我们不是旷日持久地围攻，而是通过急冲锋，英勇地一举攻克称为“荒地”的古老堡垒。

人们可能会问：既然开进大草原的人们配备了强大的技术设备，知道自己得到整个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支持，

既然他们在当时就在歌曲中被颂扬为如俗语所说的，旗开得胜，名扬全国的人，那么现在如此评价“荒地人”这个词，岂非言过其实吗？不，并不言过其实。这些人确实建立了功勋。

英雄的品质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同一个人，他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烈火熊熊的房子，找却不善于日复一日地去做一项平凡单调的工作。有的英雄主义是在短暂的一刹那表现出来的；有的英雄主义是在全体人民生活中最艰苦的时期，如战争时期，表现出来的；而有的英雄主义却是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例如，有的人自觉自愿地到艰苦的地方去，虽然明知道其他地方不会如此艰苦。我认为，荒地人已表明自己是英雄。他们经受住了初期的艰难生活的考验，多年来坚韧不拔地在这块气候绝非温和宜人的土地上建设家园。

在庆祝垦荒二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在阿拉木图的一次大会上谈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伊凡·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他生于列宁格勒，战争时期在保卫自己亲爱的城市时，受了重伤，失去了双腿。经过长时期治疗之后，他来到了哈萨克，就此一直留在这里。他同这个地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成了优秀的机械师，他在战斗中受过嘉奖，现在又在劳动中受到了嘉奖——他获得了两枚列宁勋章和一枚金星英雄勋章。

整个礼堂响起了向英雄致敬的热烈掌声，我也从讲台上向他鼓掌。接下来是其他同志发言。我觉得其中有一个人所讲的似乎也是同样的经历。他也提到了一位共产党员，是列宁格勒人，参加过战争，并失去了双腿。他

来到荒地，成了一名优秀的拖拉机手，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他的名字是列昂尼德·米哈伊洛维奇·卡尔塔乌佐夫……大家又鼓起掌来，我脑子里产生了一团疑云：难道这是巧合？还是我把英雄的名字给弄错了呢？但是不会，这决不可能，这位英雄我记得很清楚。

休息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卡尔塔乌佐夫的情况，原来一点也没错。卡尔塔乌佐夫和伊凡诺夫两个人确实都在荒地工作，两个人的遭遇完全一样，两个人又都是英雄。这一巧合可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无怪乎“荒地人”这个词在我们这儿成了勇敢的象征。

我一生中曾多次发现，在通常的环境中，真正的英雄一般都是谦虚朴实，默默无闻的。他们勤恳踏实地做着本职工作。泽利诺格勒州“远方”国营农场的拖拉机手达尼伊尔·涅斯捷连科就是这样。从名称就可以知道，这个农场位于该州最遥远的地方，而涅斯捷连科要求去的地方正是那里。多雪的冬天快要过去，他所在的那个拖拉机队有可能与农场场部隔绝起来，燃料得不到补充。扎内斯派卡这条不起眼的小河，据当地老住户说，有急剧泛滥的危险。必须趁它还结着冰的时候，赶紧把拖拉机全部开过去。涅斯捷连科帮助同志们冒险开过河，而自己的那台拖拉机放在最后开。但是正在融化的冰层上已经全是水了，支撑不住了……

当朋友们把死者从河里打捞上来时，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份苏联英雄证书。在这以前农场里没有人知道，跟他们并肩劳动的竟是这样一位人物。后来查明，达尼伊尔·波塔波维奇·涅斯捷连科是由于强渡第聂伯河

而荣获英雄称号的。因此，他的不幸牺牲令人倍感难受。我记得第聂伯河，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冒着枪林弹雨强渡第聂伯河的英雄们。按理说，草原上的一条区区小河，对一个久经沙场的人来说算得了什么呢！然而生活中就是有这种无妄之灾。

有一点细节特别使我感动：在涅斯捷连科的帐篷里，朋友们找到了乌克兰的樱桃树苗。这些树苗是他随身带来准备种在草原上的。这说明他要在哈萨克长久地呆下去。如今，这些樱桃已经开花结果，而他却不在人世了。

1954年的冬天酷寒异常，下着罕见的大雪。荒地“在大门口”就对新来的人进行了考验，劈头盖脑地向他们大发淫威。刺骨的寒风一个劲儿地咆哮着，在草原上开车非常困难，甚至会有危险。但是几千台拖拉机，几百辆挂拖车的卡车都必须沿着无路可循的荒原，顶风冒雪，开向那些尚未建立起来的国营农场。

草原上的暴风雪是怎么回事，很多人在童年时代就从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一书中得到了概念。现在我也亲眼看到了草原上的不测风云。草原的上空本是一片万里无云、凛冽澄碧的苍穹，明亮的太阳照耀着大地，但过不了半小时——就天昏地暗，暴风雪平空卷起，狂风怒吼，大雪漫天。只要稍有一点差错，或者发生一件偶然事故，或者是马达突然熄火，一个人就会孤立无援地被困在草原上——四野茫茫，严寒彻骨，如同堕入黑暗的深渊。

我还记得利沃夫建筑学院函授生瓦西里·拉占佐夫之死使荒地上所有的人受到了怎样的震动。他第一批未到了“基辅”国营农场，担任了工地主任。他是一个能干

的组织者，一个好同志，性格开朗，平易近人，因此很快受到第一批垦荒者的尊敬与爱戴，享有很高威望。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拉古佐夫和其他同志开着一队拖拉机为农场的第一条大街从车站运回装配式房屋的构件。那时突然刮起了一场猛烈异常的暴风雪，一连持续了好几个昼夜。纵队停了下来。瓦西里决定去求援。他一个人出发，迷了路，不幸牺牲。这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勇敢不屈的人。下面是在他口袋里找到的一封信：

“致发现这个小本子的人！亲爱的同志：劳驾请把小本子里的这封信转交利沃夫市冈察洛夫大街十五号一室拉古佐娃·谢拉菲玛·瓦西里耶夫娜。

“我亲爱的西玛奇卡^①：不要流泪。我知道你会难受，但是，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办法呢。四周都是草原，无边无际。我简直是在碰运气瞎走。暴风雪就要停了，但是茫茫一片，根本无法辨明方向。万一我遭遇不测，你要把孩子们教养成人。啊，生命，我多想活下去啊！紧紧地吻你。永远属于你的瓦西里。”

当他意识到自己就要死去时，他用冻得僵硬的手指在信尾添了几句话：

“写给儿子弗拉基米尔和亚历山大。沃武什卡、萨顺卡^②！我亲爱的孩子们：为了使我们的同胞过得更富裕和更美好，我来到了荒地。我希望你们继承我的事业。最主要的是——要在生活中做一个真正的人。亲爱的孩子，我紧紧地吻你们。你们的爸爸。”

① 谢拉菲玛的爱称。——译者

② 弗拉基米尔和亚历山大的爱称。——译者

这封信，表面上看来完全是一封写给家人的私信。但是它却成了对全体生者的呼吁书。当人们把这几页字迹模糊的信交给我看的时候，当我把字句都看清楚了的时候——我感到喉咙哽住了。我打电话给记者，建议他们在征得死者妻子的同意后把信刊登出来。这封信在报上发表以后，全国有成千上万人作出反应。为了把瓦西里·拉古佐夫以及和他一样勇敢的人们所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一支支新组成的志愿垦荒队伍纷纷向荒地开来。瓦西里牺牲在一个山岗边，现在这座山岗就以英雄的名字命名。

今日的哈萨克地图表明：全国各地确实都派人来参加这里的垦荒战斗。各地的地名反映在各个国营农场的名称上——“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阿尔马维尔”、“波尔塔瓦”、“塔吉尔”、“索契”、“彼尔姆”、“雅罗斯拉夫”、“沃罗涅日”……除了草原上世居的哈萨克人之外，很多国营农场中还可以遇到其他民族的人。荒地成了国际主义教育的真正学校，成了我国各民族的丰富经验、劳动技巧和必胜决心的总汇。

新的土地总要有新的人来定居。但是到荒地来的人有个特点，那就是在头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志愿者是带着锯子和铁铲去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第聂伯河列宁水电站或者到阿穆尔河^①畔的共青城的，而到了垦荒时，已大非昔日可比了，荒地首先需要的是拖拉机手、电工、司机、机械工人和建

^① 即黑龙江。——译者

筑工人，很多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都把这种技术熟练的专门人材派遣到我们这儿来，他们都成了新建农场的骨干。

人们在土地上培育庄稼——土地也培育了人。形象地说，荒地上另一项大丰收是培育了一大批劳动者、爱国者、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但是，全国各地来的人，都具有各自的特点、性格、经验和爱好，他们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集体。因而这里有必要扼要地说说我们当时探索过的进行党的工作、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的一些方法。党在荒地上的全部工作可以说是一项规模宏伟、敢于创新、成效卓著的活动的典范。

当时的情景就象是在进行重大进攻战役日子里的政治工作。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忙于无止无体的视察，几百次的接见，短暂的接触。在那时既不可以为了谈话而使人们离开工作太久，而我自己的时间也不够支配，因为要不断地朝前走，总是急着要去“前沿阵地”。心里真想各处都跑到，一下子跑它十几个地方。诚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有时居然也办到了。当时党的政治工作的实质，就在于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以具体的行动纲领武装他们，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到共同的目标。

我记得，无论是在乘车途中，或是在草原上徒步行走，或是夜晚坐在帐篷里，或是傍晚蹲在篝火边，我总是对一些党组织的书记重复着同样的话。大意是说：要常把党员们召集在一起，首先使他们互相熟悉，互相了解，讨论形势，这样他们就能带领群众前进。

“没有地方开党员会议呀。”对方这样反驳我。

“必须开。”我坚持自己的看法。

“批评意见太多了。”有些人说，“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您知道，开头是怎么一回事。”

“没关系。”我总是这样回答，“如果我们默不作声，事情也不会好办些。大家在一起开个会，争论一番，把话都推到桌面上，就能想出办法。下一次，你就向他们汇报，什么事情已经办妥了。人们来自四面八方，又是各式各样的——这是个最复杂的问题。然而，也有一个好处，在真正困难的工作中能很快显露出一个人的品质。”

第一个春天，我们全力以赴的就是把这台强大的机器开动起来，因此我们没有时间停顿和休息。

后来，人们长期盼望而又出乎意料的荒地大丰收终于到来了。

(六)

我永远不会忘记 1954 年荒地上的第一个秋天。在科克切塔夫州鲁扎叶夫斯克区的一个国营农场里，人们欢迎我的时候，向我赠送了一捆荒地上种出来的阿克莫林克种小麦。我捧着这捆小麦，不禁感慨万千。此时此刻，一件件往事涌上了心头——最初的计划和设想，多少个不眠之夜，无数次的争论，一列列载满人的列车，在暴风雪袭击下无路可行的拖拉机队，草原上燃起的第一批篝火以及最初开出来的几条垄沟等等。现在，瞧，理想实现啦——草原上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我又想起了最早到这里来的为数不多的垦荒者，他们在革命后不久就在这一带建立起农业公社。当奥布霍夫工厂及谢缅尼科

夫工厂的工人们决定去哈萨克时，列宁就他们的这一行动给农业人民委员写了一个便条：“创举极好，请予大力支持。”^①

伊希姆河沿岸大草原上第一批建立的公社都起了十分动人的名称，如：“革命之光”、“真理之光”、“新生活之路”等等。但是荒地上这些小村庄的条件实在可怜。如“革命之光”公社只有四头公牛，十一头奶牛，一台转臂收割机，一架割草机，四把耙，八辆大车，四间住房和一间板棚。而在当时他们竟能宣称：“我们要征服你，草原！你一定要供养我们！”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啊！现在草原上的麦田，已不是以前的几座小孤岛，而是麦浪翻滚的大海洋了。羽茅草丛生的古老大平原变成了国家巨大的粮仓。荒地第一年的农忙期首战告捷。

小麦的海洋淹没了整个草原。沉甸甸的麦穗被风儿吹得波起浪涌，在太阳的照射下闪着金灿灿的光芒。人们的热情无比高涨。然而，要把这成熟的麦子拿到手，还要付出多大力气啊！

如今哈萨克荒地上已经建立起规模巨大的粮仓和粮库网。但在当时，把所有原始的小库房和各式各样的小土房（荒地人那年秋天把它们称之为“狗窝”）加在一起，最多只能装三百万吨粮食。可是粮食却无论如何也要收下来，保管好，并且运出去。公路上，火车站和转运粮食的堆集点出现了特别困难的局面。

我只要谈一谈当时的一次经历，就足以说明问题。有一次我向泽利诺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尼古拉·伊凡诺维

^① 未查到出处。——译者

奇·茹林一起乘飞机来到阿特巴萨尔。我们刚到机场，来迎接的人就要拉着我们去农场看看大田。用他们的话来说，为的是让我们分享丰收的喜悦。他们的邀请真够热情的，但是关于当地粮食收购站的情况——却没人吭声。我们当然决定首先要去收购站看看。但马上有人提醒我们：

“那儿你们可千万别去。你们会被司机们围困起来的，不撒谎！那里挤满了汽车。一辆车得等两天两夜才轮得到卸车。”

“噢，这倒并不可怕，”我说，“我们到过科卢顿车站，那儿才糟糕呢：站上全是粮食，可汽车不够。”

我们来到收购站。它位于离铁路一公里的地方。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在城郊枯黄的草原上，停着几百辆装满粮食的汽车，排成一公里以上的长蛇阵。收购站就象一个乱纷纷的蚂蚁窝。卡车在腾起的尘雾中嘟嘟地叫着，噗哧噗哧地喘着气，慢慢地向院子中央的粮食堆挤去。在收购站旁边，建筑工程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在盖一座大型的新粮仓。现有的那个陈旧的小仓房已经装得满满的了。几百个人闲着没事干。只有二十来名妇女在用铁锹往口袋里装粮食，然后搬运工把口袋扛到低矮的土坯房里去——扛进去的都是种子。卸车是手工作业，而且卸车的地方只有两四处。

我走到一辆卡车前，伸手从车上掏出一把麦子。这麦子可真逗人喜爱：沉甸甸的麦粒洒落在掌心里，发出黄灿灿的闪光——这是宝贝，这哪是小麦啊！

司机们立刻把我们包围起来。顿时，一切都淹没在

震耳欲聋的吵闹声中。他们大声叫喊着说，他们停在这里已经几天几夜了，睡在驾驶室里，没有地方吃饭，没有地方洗澡。不过，这还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草原上粮食堆积如山，就在露天里放着，粮食会毁掉的！我等他们把话说完，然后说道：

“可真够瞧的，你们这样欢迎客人。……”

不知是我的镇静还是我的微笑起了作用，司机们都不吱声了：本来嘛，把人家围攻了半天，你也得听人家说几句呀。

“别着急，同志们，”我继续说下去，到底该怎么办，我心中也没有底，“我们会想办法的。我保证，这种阻塞现象一定能克服。”

保证是保证了，但是究竟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我们巡视了收购站的全部场地，参观了正在建造的新粮仓，估计它最早也得明年秋季才能完工，也顺便去看了几座“狗窝”。一路上我一直在打量着收购站和车站之间的一大块空地，这是所谓铁路征用地带。这块空地上堆着各种废物——废铜烂铁，钢筋混凝土碎块和垃圾，全都乱七八糟地堆在枯萎发黄、积满尘土的杂草丛里。

“这里是谁的地皮？”

“铁路局的。”

我派人去请铁路分局局长。他不一会儿就来了，自我介绍说：巴伊扎克·佩尔缅诺维奇·佩尔缅诺夫。这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深谙本行的专家，同时也爱开个玩笑，因为他补充了这么一句：

“请别把我的名字弄错了。许多人没听清楚，就叫我

巴尔扎克。但我可不是作家，我是一个铁路工程师，而且我也不是法国人，而是地地道道的哈萨克人。”

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极为复杂，我要求找一个老的粮食收购员来。

“用不着去找，”佩尔缅诺夫说。“这不是，西缅科夫·尼卡诺尔·格奥尔基耶维奇就近在眼前嘛。现在他正在建造新的粮仓，他担任过州粮食收购局的局长。在这方面他是个教授。”

我们几个人就在空地旁坐了下来。区里的几位领导我都很熟悉，只有粮食收购站站长波夫利亚年科不认识。我和他交谈了几句，了解到他上过前线，当过水兵。可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向铁路工程师提出的：

“把这块空地清除干净，再在这里接上一条铁路支线，需要多少时间？”

佩尔缅诺夫在小本子上计算了一下，说道：

“清除场地要一天一夜，铺轨要两天。”

“您的要求不高。我们算它要花五天时间……全区要上缴多少粮食？”

茹林回答道：

“往这儿运粮的不只是一个区，粮食一丰收，这儿受的压力很大。叶西尔区、巴尔卡申区、库尔加利申区都把粮食运到这儿来。一句话，阿特巴萨尔要接受和运出三百万普特粮食。这是最起码的数字。”

“明白了……”我转过身去问粮食收购员：“我们可以通过这块空地把所有粮食运出去吗？”

“一般说来是可以的，”他回答说。“但是光把场地清

除干净还不够。那是违反规章的,而且也很不合算。”

“还需做些什么呢?”

“还要把土地刨开、压平、夯实。此外还非得消毒不可。如果照章办事,那需要十天工夫。”

“尼卡诺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您经验丰富。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啦?”

“在生活中万事都得动脑筋。”西缅科夫说,“或许……可以把场地烧一下。多拖一些麦秸来,放上一把大火。土地烧得灼热,就会硬得象炉底一样。”

“那么消毒的问题呢?”

“一烧,什么毒都消了。”

“您的主意可真是个好办法!”

大家都沉默了,看来一切都谈妥了。可是收购站站长又开了腔:

“不行,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不能同意。粮食堆在哪儿还不是一个样?在草原上露天堆着;在我这儿,也同样是露天。你就是动员全区的力量赶制苫粮的油布篷,也来不及。我们会把粮食给毁了!”

“我们抓紧调度车皮,大力支持你们。这一点我来负责。”

“那么这个呢,”他用手指了指天空,“您也能负责吗?”

那年的秋天酷热异常,太阳悬挂在天上,仿佛一动不动,晴空万里,一点云丝也没有,连天气预报也令人感到鼓舞。可是谁能担保不会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呢?

“您知道,”波夫利亚年科说道,“把收进来的粮食堆在露天场地上,是绝对禁止的。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要是责备他是形式主义和胆小怕事，那是最简单不过的，可是我喜欢上了这个板着脸的人。有些人遇事总是应承：“保证完成！”可是后来却什么也不干。（有这么一个同志，他对什么事都满口应允：“一定去办！”——这个人我以后会谈到的。）波夫利亚年科确实要收进可以堆成一座座小山的粮食，要对这批粮食负责的也正是他。其他同志也同样感到不安：好象在说，您倒好，指示一番后一走了事，可我们呢？既不能给老天爷下命令，车子又不归我们调度，再说，车皮到底会不会有呢？

“好吧，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我说。“如果让粮食远远地堆放在大田里，那是准会毁了的。那里没有粮仓，等到秋雨一下，道路泥泞，或者严寒突然降临，粮食可就运不出来了。几百万普特的粮食一旦糟蹋掉，人们就会丧失垦荒的信心，他们会指责我们：你们只会说空话，算什么领导！他们的指责当然是正确的。可是这儿有铁路，有车站，有机车和车皮，这儿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必要时他们都会赶来抢救粮食的。万一不得已，我们还可以把士兵、大学生、工人派到这儿来——铲的铲，装的装，大伙儿一起帮忙。难道您，伊凡·格里戈里耶维奇，看不出粮食放在哪儿稳当——放在草原或是放在这里？”

“大伙儿来帮忙，”波夫利亚年科说。“可是上法庭受审的就只有我一个。”

很明显，这位同志不相信我的话，不相信大家会给他实际帮助的。不过我不愿意使他难堪，在这种情况下得用激将法才行。于是我说：

“有句古话说得好：战场上是英雄，打谷场上一定也

是好汉。可您这是怎么啦，在前线您不惊慌失措，可在这儿呢？要知道，即便是和平时期，有时也得大喝一声：‘留神！’说到底，我们本来也可以追究您的责任：难道您早先不知道荒地将会有一个大丰收？为什么半年前没作好准备，甚至连您力所能及的事也没有做好？不错，就算我们也有缺点，那我们就共同承担责任吧。可是关于这块场地，我们可要唯您是问，决不讲情面！所有的粮食必须一粒不剩地打这儿运到粮库去，再在那里保存，加工。咱们就共同对这些珍贵的粮食负责吧。”

谈到最后，双方互相向对方提出了保证。伊凡·格里戈里耶维奇仍然是板着脸，很平静地说，他将尽一切可能完成托付给他的事。既不说大话，也不慷慨陈辞。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因为；说实在的，这个人那股寸步不让的固执劲，使我以及我们大家都认识到我们采取的这个步骤的严重性，使我们不能不再一次地作认真的考虑和全面地权衡轻重。我则向他保证密切关注阿特巴萨尔车站上的一切。

也许有人会说，这么大的一个共和国的中央书记用不着抓这种事：所谓杀鸡焉用牛刀。当时有些同志就认为，我似乎不必亲自去过问那些琐碎的事，比如查看荒地上的作业队的伙食之类。我这样做会不会降低基层领导人的责任心呢？对此我要回答说，任何文件，任何电话指示也代替不了直接去接触人，直接去了解生活。令人遗憾的是，我不只一次地发现：任何报告，当它从基层逐级往上送的时候，都一无例外地走样了。而且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变化——变得轻描淡写，没棱没角了。

光靠“坐办公室”进行领导是不够的，必须经常下去接触人民，到现场去，亲眼看看成绩和出现的困难，必要时还须插手实干。每当你和这样的草原车站上的人们争论了一场，或者和拖拉机手们同桌吃了一顿饭，你都会了解到很多情况，学到很多东西。学习永远是有益的，而在象垦荒这样的规模宏伟的事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学习更是完全必要的。

而且，类似上述的情况，并不只是无关紧要的小插曲。它们往往可以导出意义重大的结论。回到阿拉木图之后，我把粮食收购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提了出来，政治局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我跟全苏交通部副部长 H·A·贡多宾取得联系，向他说明了问题的尖锐性。他在那时几乎全部时间都守在荒地上，实际上是在负责泽利诺格勒总调度站的工作。他夜以继日地监督货运和车皮调度情况，我们提出的一切要求，他都相当快地作出反应。所以“小”插曲的影响可以说已扩展到整个垦荒地区了。

现在回过头来继续谈那次阿特巴萨尔之行的情况。那年天气特别炎热。视察完收购站之后，有人提议到小河里去洗个澡。但是到了河边，我们当然又谈起了工作。我向区的领导干部们指出：

“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是你们区在上缴公粮方面仍有可能名列前茅。因为你们具备一切条件。”

我一直密切注视着阿特巴萨尔收购站的情况。我曾要求共和国粮食收购部部长火速去阿特巴萨尔，以便给予实际的帮助。我经常往那儿打电话，询问收进了多少粮食，运出了多少，需要什么帮助。珍贵的粮食全部完好

无损地归仓了。不仅如此，阿特巴萨尔人后来还提出了超计划上缴粮食的倡议。当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保证，当《真理报》发表文章详细报道他们这一很有意义的倡议时，我可以坦率地说，我觉得，在机械师、区委委员、收购员、铁路工程专家们所取得的成绩之中，我个人也是出了一份力的。这一点是十分宝贵的。

1954年，哈萨克有史以来第一次向国家粮仓缴纳了将近二亿五千万普特的粮食，比以前最好的年头增加了一亿五千万普特。我们这些荒地人都为这一胜利而感到无比的幸福。

(七)

从1954年秋天起，向荒地进军的规模更加扩大了。除原先已建成的九十个新农场外，还要再建立约二百五十个农场。随着农场成倍地增加，我们要操心的事也成倍地增多了。

但是，这时候共和国党组织不仅已经积累了当前垦荒工作的丰富经验，而且还在酝酿着相当明确的远景规划。今日哈萨克农业的很多特点、内部结构和基本发展方向在二十多年前的当时就已经确定下来并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来了。

当时什么问题使我们特别焦急不安，哪些问题要优先加以解决，以及如何为实现我们的设想而奋斗——所有这些问题在我的《苏共农业政策问题和哈萨克的垦荒工作》一书中已部分地谈到了，在此不必赘述，我只说一

下当年工作的基本路线和纲领性任务：

通过开垦生熟荒地以及提高原有耕地的产量，把粮食生产部门变成哈萨克农业的主要部门，使这里的粮食生产与以前相比，至少要增加九倍，从而把这个共和国变为我国新的规模巨大的产粮区；

制订并在荒地逐步实施科学的农作制，这一农作制应能最大限度地适应这一地区极其复杂的自然气候条件，保护并提高当地土地的天然肥力；

在建立一批全国最大的生产粮食的国营农场的同时，在每一个农场里还要建立起一切必要的设施——既有设备良好的生产设施，也有带有全套社会、文化、生活服务设施的，设备完善的城市化村镇。此外，要把共和国所有旧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按照新农场的标准加以彻底改组、扩建和改建；

要在最短时期内，在荒地各州建成铁路网、公路干线以及农场之间的公路网，架设输电线、电报及电话线和建立无线电网，在各交通中心修建大型粮仓，兴建生产和修理农业机械的工厂以及数十个其他企业，从而把北哈萨克变为高度发达的经济区，使它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进行活动；

在增产粮食和利用其下脚废料的基础上，依靠迅速扩大饲料作物、特别是玉米的种植面积，以及通过提高饲草的产量和改良草场等办法，从根本上加强饲料基地并保证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将来各类畜产品的产量至少得增加一倍；

在共和国南部，将通过土壤改良，加速发展水稻、棉

花、甜菜、蔬菜以及果园和葡萄园。

这个规划不是轻而易举的。实现这一规划不能零敲碎打，而必须齐头并进。因而，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设想到当时会遇到的和今后将会遇到的一切困难。十分重要的是，要用我们的信念和干劲来激励当时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所有同志。

就拿畜牧业来说吧。有很多同志只看到要为粮食而奋斗，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农业部门。

我们果断地着手进行组织上的改建，例如在畜牧业中就是这样做的。有时候有的同志甚至指责我总是老生常谈。他们说，这不都是明摆着的，何必老调重弹呢？事情倒是明摆着的，可是工作却进展缓慢，有时干脆停滞不前。例如，推广种植玉米这件事，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对哈萨克来说，玉米基本上是一种新的农作物。原来，我们种植玉米，既准备作粮食，但大部分又准备用作青饲料。这引起当地同志的抵制：怎么可以这样，在耕地上种“草料”？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和人家辩论，做工作，具体指导玉米如何播种，管理，收割和青贮。

这一农作物的价值，我在乌克兰和摩尔达维亚时就很了解了。但是，我毕竟不是农艺师，所以决定再一次向人请教。我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米舒林罗格村发了一封信，寄给我的朋友——有名的“玉米迷”M·E·奥泽尔内。他很快就来了回信，提了一些极其宝贵的建议，并按照我的请求，寄来了各种适宜于干旱的哈萨克地区的玉米种子。事情有了起色，但是我们还是不只一次地把玉米问题提到共和国中央政治局进行专题讨论。

第一年春天试种成功，于是在1955年我们拨出七十万公顷土地用来种植玉米。畜牧事业的发展，虽说不是很快，但也开始走上坡路了。在这件事上，也象很多其他事情一样，帮助我们取得成功的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1955年3月我在共和国积极分子大会上说过：

“有些问题就是需要不厌其烦地再三提出来。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以为，这一方面说明了这项任务具有头等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完成这一任务的复杂性。我们对这些问题紧紧抓住不放，这就再一次证明我们的意图是严肃的。我们今后也一定为实现我们的设想坚持不懈地一抓到底，不蛮干、不动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毫无疑问，这些问题总有一天会从议事日程上取消。到那时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新的任务，而且规模更宏大，气势更雄伟，对此我们也是同样地坚信不疑的。”

有些同志对这一点不能理解。他们觉得荒地的第一批粮食一收完，似乎就万事大吉，可以歇一口气了。他们居然跳起“庆功舞”，开始提拔干部了。我并不是说，那些同志不该提拔。相反，我对荒地上第一批国营农场的场长们十分尊敬，至今不忘。他们挑起了重担，很多同志后来都成了组织生产的大行家。可是在当时，把这些人从生产第一线调走却未免为时过早。

有一次，一位叫费奥多尔·特罗菲莫维奇·莫尔贡的同志突然来找我。他向我提出一个可以说是出乎意料的要求：原来上级要提升他，可他不愿意，拍桌子打板凳地顶牛。这位同志的事迹我无须详细叙述，因为后来他自己在《荒地怀旧》一书中对一切都作了描述。他的农场

是一个冒尖的国营农场，经常作为标兵。现在突然要把场长提拔为区执委会主席。按理说，这是个荣誉，可他却委屈得流出了眼泪：农场的工作刚展开，刚和人们打成了一片，刚刚拟定好计划要把农场变为一座生产廉价谷物的真正的工厂，这时候竟要人家把这一切都扔下。我只得亲自出面干预，就此事在一次大会上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不能同意科克切塔夫州党委会常委会关于调动‘托尔布欣’国营农场场长莫尔贡工作的决定，尽管这是提升。对于部的工作调动不能操之过急。必须帮助他们建成国营农场，根据当地土壤和气候特点创造一套农作制，使他们有可能把已开创的事业顺利地进行到底，只有在这以后，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把他们提拔到更高的岗位上去。”

再如，叶夫多基娅·安德列耶夫娜·扎伊丘科娃在来到荒地的时候，已经年近五十了。可是她还保持着青年人的热情、意志和坚定的性格，而最主要的，她有一颗共产党员和爱国者的火热的心。她满腔热忱，愿为国家做最需要、最重要、最有益的事。这种明确的志向使她来到荒地，并使她有力量在草原上建立起“双河”国营农场。这位女同志很快也被提拔上去了。但是，她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打了这样一份报告：

“我坚决请求区党委会委员们解除我区委书记的职务。因为我认为：我在有生之年从事具体的经济工作，定能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我请求派我到落后的国营农场去，我保证同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工人一起，使它进入泽利诺格勒州先进国营农场的行列。”

她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伊热夫斯克”国营农场在她的领导下进入了先进的行列。叶夫多基娅·安德列耶夫娜把她一生中的十七个年头都贡献给了她所热爱的新土地。当她生命垂危的时候，她向来医院探望她的朋友们只提了一点请求：

“不要在我的坟墓周围筑围墙，不要把我和草原隔离开……”

这样的同志是党和人民最宝贵的财富和骄傲。因此我们也特别爱护他们。不经哈萨克党中央的批准，谁也无权任意调动国营农场领导人的工作，更不能解除他们的职务。我记得我们调换的场长不超过十名，因为他们挑不起垦荒这副重担。我们对待其他干部也遵守同样政策：大力支持优秀干部，对于有才干的人要有耐心，而对那些浑浑噩噩、显然毫无作为的人，则要坚决撤换。

粮食大丰收引起了全国对荒地的注意，报刊上唱起了胜利的赞歌，对我们的夸奖和祝贺已经成为常事。但是，我们懂得，不能松劲，不能躺在成绩上睡大觉。哈萨克党组织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尽快修建粮仓、库房，必须赶紧让人们从帐篷和土屋中迁出来——因为那些地方越来越难以居住，越来越拥挤了。

一切几乎都得白手起家。可是用什么来建造呢？如果周围有森林，那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不错，给荒地是运来了装配式房屋和建筑材料，可是不够用。真是力不从心。因此，必须尽量就地取材。但是又远非所有的人都那么灵活机智，会找窍门。

有时你到区中心，向人们询问：建筑工程进行得怎样

了？得到的回答是：很糟。为什么？没有砖头。但是我和区委书记一起在大街上走的时候，却看到几幢高大的建筑物，山墙上刻有日期——1904，1912年……而据我所知，当地是向来没有砖瓦厂的。

“这些楼房是谁建造的？”

“帝俄时的地方自治局。”

“他们从哪儿搞到砖头的？”

“您看，就在草原那边的沟里，他们造了一座露天砖窑，烧了砖。这所学校就是用那里的砖造起来的……”

“这么说，地方自治局能办得到，而你们区委和区执委会就办不到？请问，我们还算是什么领导干部呢？四周粘土有的是，造几座露天砖窑吧，有的地方再建几座小砖厂，就是一百年以后，你们也还用得着的。”

“啊，砖瓦厂，这要求太高了吧！我们办不起来……”

真叫人恼火，这些人是多么地因循守旧！

有一次在莫斯科附近的巴尔维赫区我注意到一座宏伟的砖瓦城堡——那时这里正在举办一个少先队夏令营。我很感兴趣，便问这是什么建筑物。他们回答说：是一位男爵夫人的产业。那城堡怎么造起来的呢？他们说，很简单。男爵夫人先造了一座砖瓦厂，用自己烧的砖瓦造了这一座乡间宅邸和院内全部辅助用房，然后再把砖厂卖了，所得的款子足够抵偿造房子的全部费用。当然，这个主意并不是她自己想出来的，她有一个精明能干的管家，如此而已。而我们这儿有整个集体，有大批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工程师、建筑师，大家摩拳擦掌想干一番大事业，可却办不成一座普通的砖瓦厂，反而向国家伸

手，跑国家计委。

我记得，我们在荒地不得不向某些旧的养马场借几座做马厩的坚固建筑物来办农机站修配厂。这些建筑物也都是用露天窑烧出来的砖头造起来的。每当我把这一切告诉人们，使他们感到震动和羞愧时，那些有见识的经济工作人员马上就会把自己的砖瓦生产安排妥当。他们后来还会来道谢：怎么我们以前就没有想到呢！

芦苇也属于当地的建筑材料。我听说有些会动脑筋的人用芦苇板为自己盖成很结实的房子，我就去看了一下。我对这种住房很满意——房子是平平常常的房子，但是在最初几年却满可以派用场。这就意味着，必须组织人力大规模地收购芦苇，安排好芦苇板的生产。我看了一下标出芦苇产地的共和国地图，决定实地察看一下。我乘飞机沿伊犁河谷飞行，一直飞到巴尔喀什湖。在一百米的高度上，我看到下面生长着一大片连绵不断的芦苇丛。

不久，我们在凡是长有芦苇的地方——在河流的沿岸，在草原上为数众多的湖泊旁边，我们都组织了收购工作。工厂立即生产出简易、方便、效率高的车床，用来碾碎芦苇，然后把它压成密实的芦苇板。用这些芦苇板可以搭成任何式样的房屋。然后再将这些房屋抹上灰泥，粉刷成白色，这就成了非常出色的暖和的住房。作了这一番尝试以后，我们在阿拉木图附近的一个集体农庄里举行了一次共和国范围的研究芦苇建筑的专题讨论会。

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建筑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我们当时给苏共中央写了一份关于该共和国在开

始垦荒时所拥有的建筑力量的报告。这份报告现在还保存着。当时力量极为分散，三十多个施工力量薄弱的建筑单位分别隶属于不同的部和部门。它们总共只有五十九台混凝土搅拌机，六台塔式起重机，五十八部传送装置，五辆自卸汽车，共计五千七百名工人。要完成新的计划，人员至少得增加十倍才行！

当然，建筑材料是很紧张的，砖头尤为突出。我向几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求援。应该指出，他们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爱沙尼亚等共和国和其他许多地方运来了砖头。总之，我们努力解决所产生的一切问题，而且解决得很顺利。

(八)

1954年秋天，召开了哈萨克作家代表大会。这是共和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在这以前，我就曾抓过民族文化方面的工作。还在摩尔达维亚时，我就体会到：你在某一个共和国生活，你就必须了解它的人民的风俗习惯和传统，他们的历史及文艺创作。我一到阿拉木图以后，身旁就堆满了书，我经常接见哈萨克文学家和艺术家，也经常上剧场。我很早就热爱诗歌，到这里以后，我读了哈萨克诗人的许多作品，尤其是阿拜的诗，那抒情的风格，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人民智慧和生活的深刻了解，都深深地吸引了我。阿拜教导哈萨克人民不要闭关自守，不要停滞不前，要以俄罗斯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成就来丰富自己的创作。这一点

对我们时代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任何民族文化，如果和其他民族的文化隔绝，必然枯萎凋敝，失去全人类文化的特点。遗憾的是，并非任何时候和任何人都懂得这一点。

社会主义早已证明：一个民族共和国的成长越快，其国际主义化的进程也就越明显。哈萨克也许是这方面最鲜明的一个例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垦荒事业把这个地区变成了“操一百种语言的星球”。因而哈萨克文化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着其他许多民族文化的精华。这样好不好呢？我们共产党人回答说：好得很，好极了！因为民族传统和民族风格这一最最重要的问题，不能简单化，不可把它仅仅看成是民族的特有事物和日常生活风习，比如，俄罗斯就只是小木房、轮舞和妇女的扇形头饰，哈萨克就只是毡房和马群。

我们在共和国中央的同志们总是尽力给予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以经常性的帮助。尽管垦荒事业困难重重，但正是在这时候，哈萨克国家歌舞团成立了，《哈萨克斯坦文学报》复刊了，莫斯科的哈萨克文艺旬的筹备工作广泛开展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不是没有争论的，有的人只强调民间诗人的口头创作。其实共和国的文学中正在发生深刻的、质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由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本身以及哈萨克文艺界知识分子不断成长所决定的。有天才的青年一代涌现出来了，他们不仅了解和热爱古老的传统和歌谣，而且还了解和热爱苏维埃文学和世界文学。这是一些不囿于陈规陋习的人，对他们应该予以支持。但是主要的是，应使各个创作协会和知识界的气氛健康起来，需要团结知识分子，把所有的力量联合起来，

以解决共和国面临的艰巨任务。

在此我要指出，借口保卫“纯民族传统”而主张民族关门主义的人，一般总是采用迂回隐晦的方式而很少公开地亮出自己的观点。相反地，他们巧妙地利用对手的任何错误，总想把自己打扮得如常言所说的比罗马教皇还要圣洁。我记得，围绕着一位名叫克涅萨勒的人所起的作用问题，曾掀起一阵轩然大波。最初人们说他是一个赞成哈萨克同俄罗斯联合的进步活动家，后来，又找到了文件证明他是反动分子，根本不赞成联合……我不想翻老账，而且我也不认为自己是这一领域中的专家，使我不安的是另外一些事。某些蛊惑人心的人挑起的这场争论，使作家穆赫塔尔·阿乌艾佐夫和卡内施·萨特帕耶夫院士这样一些杰出的人物不得不离开共和国。

我们帮助他们回到了阿拉木图。优秀的科学家卡内施·依曼塔耶维奇·萨特帕耶夫在发展哈萨克的生产力方面建立了很大功绩。穆赫塔尔·奥马尔哈诺维奇·阿乌艾佐夫是公认的哈萨克文学的经典作家。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这些人，过去我同他们经常见面，紧密地共事合作，我们之间的私交也很融洽。我们在交谈中都认为，任何极端做法都是有害的。忘却人民喜闻乐见的口头创作也是不行的。《列宁格勒人，我的孩子！》——江布尔^①这一首广为流传的著名诗篇，全国人民都会背诵。让民间诗人的创作在哈萨克民族文学和苏联多民族文学的共同轨道上生存和发展吧。

^① 江布尔是哈萨克民间诗人。这首诗是他在卫国战争时期创作的。
——译者

还有一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即如何引起文艺界知识分子对垦荒题材的关注？我在中央委员会会见作家们的时候说过，请看吧，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多么了不起。人们大批大批地迁来，一个个多民族的集体正在形成，许多新的家庭正在诞生，刚毅的人正在茁壮成长，当代英雄们正在经受锻炼。哈萨克的面包一向是香甜可口的珍品。甚至古时的阿訇们也说：“《可兰经》是圣书，但为了勉强够到一块面包，不得已时也可以把脚踩在《可兰经》上。”现在这块地方正在成为产粮区。整个生活方式正在变化，人们中间出现了新的心理状态。难道这一伟大和富有戏剧性的变化过程还不能使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感到激动么？这一史诗般的变化如果不能生动地记载下来，垂诸后世，人们无论现在或是将来，都不会原谅我们的。

在当时的形势下，使共和国作家代表大会成为整个苏联文化的节日是很重要的。我们把 M·A·肖洛霍夫、Л·М·列昂诺夫、卡米尔·亚申、米尔佐·屠尔松-查提、马克西姆·唐克等著名作家邀请到阿拉木图来。此后，作曲家、演员、画家都成了荒地的常客，发表了许多描写夺粮战斗的特写和小说，拍了电影，演出了话剧，唱起了新歌曲。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那时我曾憧憬，垦荒的史诗总有一天也会象国内战争在《静静的顿河》中，集体化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那样，在文艺作品中得到深刻有力的反映。对于文学艺术活动家们来说，再没有比反映人民的功勋，当然也包括荒地人的功勋，更有意义，更令人鼓舞的任务了。

(九)

人们把1955年称作荒地的“绝望之年”，但是，我不想作那样极端的评价，尽管当时确实非常困难。整个夏天，从5月起没下过一滴雨。通常象按照时间表那样准时降临的6月雨，我们也没有盼到。必须作最坏的打算了。

没有在这种时候到过草原的人，根本无法理解当时农民的心情。他会感到奇怪：春天里草原上河水泛滥，有时到处汪洋一片，人们到作业队去都是坐船的。但是春汛一退，雨水也截然而止。从一大早起，火辣辣的太阳就开始大施淫威，烤炙着大地上的一切，它在灰白色的天空中慢悠悠地移动着，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灼热；到了傍晚，它变得血红，沉没在天边苍茫的烟霭中。它几乎不让人喘口气儿，第二天又冉冉升起，继续烧烤着万物。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天天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的播种面积却比去年扩大了一倍。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我们播种了将近一千万公顷的谷物。春播作物比计划多种了一百五十万公顷。而且播种工作比第一年的春天进行得更快、更顺利、更出色。共和国在一年时间内在农业方面向前大大地跨出了一步，人们开始感到自己的劳动果实丰收在望，因此继续紧张地劳动，根本没料到灾难正在向他们袭来……

我们当然知道，炎热和干旱在这个地区并不是罕见

现象。但是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草原的气象有这样一条残酷无情的规律：每十年就要来一场特别残酷的毁灭性的旱灾。我们早在向荒地进军之前就已预见到，在这儿和天斗是不可避免的。科学家们在计算垦荒的经济效益时认为：即使每五年中有两年发生严重旱灾，那我们还是可以从草原取得每年平均五亿普特的粮食。对这一计算并没有人怀疑过。我们知道我们面前的道路是崎岖的。然而知道是一回事，到后来亲眼看到人们经过苦战种出来的宝贵的庄稼就在眼前慢慢地干死，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当时人们盼雨真是盼得望眼欲穿啊！人们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有时深更半夜，听到玻璃窗上有沙沙的响声，人们便一骨碌爬起，冲到屋外去。“下雨啦！”但这不是雨点，而是旱风刮起的沙粒在敲击窗户和屋顶。

草原上连呼吸都很困难。空气象火炉里喷出的热浪，烧炙着人的肺腑。就象在严寒的冬季一样，鸟儿也不飞了。植物的叶子干枯凋零，落在尘土里。大地龟裂，裂缝深得连铁通条丢下去都会无影无踪。大片大片的小麦眼看着变成灰白色。沙沙作响的麦穗都是干瘪的、没灌浆的。但是祸不单行，突然刮起了热风暴，扬起了满天尘埃，吹断了电线，掀走了屋顶。

种庄稼的人眼看自己一年劳动的成果毁掉，自己的辛苦和希望全成了泡影，他们的痛心是可想面知的。要经受住这场考验，必须要有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神经。即使他们在道理上明白，在下一个季节，草原一定会把一切损失补回来，这也不能使他们感到多大宽慰：人总是希望在今天就把收成拿到手。

我不想对形势轻描淡写或者加以粉饰。有好几个月，人们甚至纷纷写信来询问中央委员会：怎么办，如何是好？

哈萨克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荒地各单位召开大会，老老实实在向人们说明实际情况，鼓舞人们，引导他们去完成当时条件下的最主要任务，并向他们解释：丰歉是农业生产的常事，在我们荒地上，早晚总会有丰收的节日。同时，我提醒那些出发去各地的同志，不要显出一副乐天派的样子，好象什么也不在乎。以上就是当时党的群众工作的主要任务。

应当说，在各国营农场的群众大会上开诚布公地阐明了一切情况以后，荒地人又卷起袖子，大干了起来。尽管烈日灼人，我们仍继续做着收割的准备工作，直到深秋还在储备饲料。建筑工程，首先是各国营农场的建筑工程，更广泛、更积极地展开了。食品和工业品源源运到荒地各个地区，其数量足够保证整个冬天供应不至中断。

我们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和帮助。

我想对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中央书记们表示最热烈的谢意。在那几年里，为使垦荒工作进行得更快、更有成效，他们做了大量工作。我曾多次去见他们，和他们商谈各种问题，他们总是给予准确、具体的答复，我从他们那儿得到了党组织的坚定支持和善意的道义上的帮助。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在1955年仍然满怀信心地继续工作。我们的信心是以什么为依据的呢？不消说，看到花在土地上的大量劳动没有结出预期的硕果，我们每个

人无疑都很痛心。不过，很多国营农场的收成还是相当不错的。例如：1954年建立的科克切塔夫州的“日丹诺夫”国营农场从二万二千五百公顷的土地上平均每公顷收获七点九公担谷物，而阿拉木图州的“罗斯拉弗尔”国营农场从二万公顷的土地上平均每公顷收获九点一公担谷物。这样的国营农场为数还不少。在那困难的日子里，有好几个区，甚至象北哈萨克及科克切塔夫这样的州，都整个地获得了在当时来说是不坏的收成。必须仔细研究一下，为什么有的地方仍然收到了粮食，而有的地方则只有焦枯的禾苗。我还要补充一点：尽管总的来说收成很低，然而那一年共和国从荒地上收到的粮食仍占其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哈萨克新储备起来的粗饲料比垦荒前要多得多，上交的牛奶多八万五千吨，肉多十二万二千吨。青贮饲料，主要是玉米，居然储存了近一百五十万吨。成绩当然是有限的，但就是这些成绩也足以使人相信，荒地增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方面，现在和将来都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加油子！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但是歉收毕竟是歉收，它使许多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了。

1955年底，我到莫斯科参加全苏党和苏维埃领导干部会议。在这样的会议上，人们没完没了地向你打听情况，成者故意谈些不相干的事情来掩饰他们对你的同情，这当然使人感到很不是滋味。当我在大会讲台上宣布，明年哈萨克将向国家提供六亿普特粮食时，大厅响起一片表示怀疑的嗡嗡声。

从那时以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在荒地上一年的收获五亿到六亿普特的粮食，这在当时是一宗了不起的财富，可是如果现在我们是这个产量，那就肯定会被认为是严重的失败。现在我们每年从哈萨克收获的粮食，平均将近十亿普特！

И·А·冈察洛夫在《帕拉达舰》一书中说，从前有一个时期，日本的县令们要以自己的脑袋对他们管辖的土地上所发生的台风、暴雨、地震等自然灾害负责。我们的脑袋似乎并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在不顺利的1955年以后，我为我并无过错的歉收感到非常内疚，始终耿耿于怀。所以直到今天，我有时还会给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打电话，目的只是为了给那儿的领导人鼓鼓气。记得有一次，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的同志邀请我：“列昂尼德·伊里奇，请上我们这儿来吧，庄稼长势好极了！”可是，没多久刮起了旱风，那儿的庄稼全枯死了。州委第一书记自然非常尴尬懊丧，焦急不安。但我同他谈话时仍旧心平气和，一如往常。在这种时刻，要同人家商量采取什么必要的措施，要给同志们以支持。

在那个苦难的年头，我们对胜利虽然始终抱着希望，有时却也很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当我在一次大型会议上当着赫鲁晓夫的面声明说荒地还会重整旗鼓时，他很不客气地打断了我的话：

“用您的诺言可烤不出馅饼来！”

但是我坚决地据理反驳他说：

“不过我们还是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在荒地上获得大丰收的！”

我们顽强地准备迎接第二个春天。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希望，唯一的补救办法——那就是工作。1956年荒地的播种面积应该是二千七百万公顷土地，其中粮食作物占二千二百万公顷。于是我又想什么都去看看，什么人都去见见，并到各处去走走……

(十)

为了增产粮食、肉类和蔬菜，我们现在拨出巨大的物力和财力，这在当年是想也不敢想的。我们推广最新技术，重新装备农业，坚持不懈地实行生产专业化和集中化，并且制订各种全面规划，例如改造俄罗斯那些自古以来的非黑土地带——在今天，那些地方已是我们的前沿地带。

然而，我不得不经常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在国民经济中没有“后沿地带”。现在还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准备动用几亿、几十亿卢布，然而对一些所谓琐碎小事却不予理会。但是，精打细算地合理使用我们拥有的一切、国家所生产的一切，却是一项主要任务。浪费是不能允许的，而且经济建设的规模越大，这种非主人翁的态度就越使人痛心。

还在荒地时，我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不想放过这些对人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琐碎小事”。例如，我在北哈萨克各地进行长途视察时，来到了泽利诺格勒州的“富裕”国营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草原深处的谢列塔河畔，这个地方风景美丽，但当时还很荒僻。以前，还在刚

开始建设的时候，我也曾到这儿来过；那时我看见的是最初的九顶帐篷，而这次看到的却是整整一座新村。有很多成套房间的住宅大楼、食堂、商店、浴室、面包房、修配厂、办事处、车库。此外，人们还建造了八十多幢私人房屋，而这一点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他们真正到这儿来安家落户了。

我和他们交谈时，问他们还缺些什么，生活是如何安排的。听到的回答是：

“没有大桶。黄瓜没地方腌。”

“我要一头猪崽，可上哪儿去买呢？”

“要是能养头小牛，那该多好……”

没说的，这些都是实际问题。运到荒地上的东西是很多的。但是，现在看来，大桶是必不可少的。家禽、家畜也需要。而且这不仅仅是一种副业。还在第一年，我看到几个新来的人，他们一只手提着箱子，面另一只手拎着篮子，里面放着个小狗，或是小猫。有一个小伙子从扎波罗热来到“雅罗斯拉夫”国营农场，他把一只大公鸡装在笼子里也一起带来了。他对我说：“对草原来说，这可是最好的闹钟！”当然，他是在开玩笑，可是在荒凉的草原上，大公鸡确实给大伙儿增添了乐趣。小伙子们甚至养起旱獭和草原上的野禽。

你可以认为这是人类的一种癖好。但是生活教会我理解这一点，尊重这一点。我自己在童年时代也喜欢欣赏成群的鸽子在屋顶上空翱翔。当然，对我们来说，荒地上的几百万公顷土地，几十亿普特的粮食是主要的，但是也需要帮助人们安排好个人的菜园、牲畜和家禽。没有

这些，几百万公顷的土地和几十亿普特的粮食也不大牢靠。没有家业的农民就好象无根之树。在那些年代里，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是一开始就向人们表明，我们打算在草原上永远定居下来。

我正思考着这些问题的时候，突然又看到了一个新来户：一只白嘴鸦，象一位吹毛求疵的农艺师似地在黑油油的地里独自个儿大模大样地走着。谁都知道，白嘴鸦是农田飞禽。既然它已飞到这儿，那就意味着，它也打算在这一带安家落户了。

在“富裕”农场的那次谈话一直记在我心里，后来我又翻阅了一些旧的文件。早在1934年，联共(布)中央就曾发文给哈萨克边区委员会。文件中非常全面、非常坚决地提出了关于在农业区和工业区都要发展蔬菜种植业的问题，并极其详尽地作出规定，要党、苏维埃、国家机关以及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合作社的领导人对此给予最积极、最全面的帮助。于是蔬菜种植业很快发展起来，并且获得了可靠的物质基础。然而好景不常，过了几年，蔬菜种植业突然衰落下来，几乎缩减了一半。以土豆为例，当时共和国从私人菜园收购的土豆，要比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所得到的多一倍半。

有些农场场长只给人们吃面条汤和稀面糊，我们对此提出了批评，可是他们在答复中总是向我们提要求：没有基金，给我们基金吧！当然罗，中央也要为农村的许多产品提供基金，但是种植土豆、白菜、黄瓜和西瓜要什么基金呢？这些东西在任何一个农场里都能大种特种。蛋和牛奶也是这样。农民自古以来就是自己养鸡，到城里

去卖蛋，为什么现在他们倒要凭票证向莫斯科领取每一只鸡蛋呢？

我写的这些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今天还有不少领导人只是坐等上面拨下万能的基金，他们不想一想，国家又从何处去弄基金呢？在我国，必须挖掘一切潜力和利用每一寸土地来增产农产品，保证各地的副食品供应。在火车上不时可以看到车窗外闪过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这些土地完全可以开出来，种上牧草，放牧牲畜。这将有助于用当地的资源来改善居民的供应，而不必从南方运来西红柿和黄瓜，从几百公里以外运来蛋、奶渣和牛奶。

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以及工业部门的领导人都必须认识这一点。他们必须在大小城市附近发展牢靠的农业基地，办起专业化的综合体，抓好副食品生产，以便商店里有充足的土豆、肉类、牛奶、青菜和水果供应。这种可能性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秋明、伊尔库茨克以及在全国任何城市都具备。1978年春我到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视察时，不得不再次提请地方领导人注意的也正是这一点。

在哈萨克，早在1955年就已决定广泛发展蔬菜生产，给一切愿意种菜的人分配土地，运来农具，并给予大力帮助。在饲养家禽和向个人出售牲畜方面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在所有国营农场建立副食品生产队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可是在这方面出现了奇怪的情况：到开始垦荒时，共和国内副食品生产的数量几乎减少了四分之三。换言之，人们一方面在制定全局规划，准备放手大干，另一方面却抛弃了他们觉得是次要的东西。

而所谓“琐碎小事”，如果引用一些数字，就不难看出其真相：在副食品生产中奶牛的数量减少了一万一千头，羊——二十八万头，而三千七百公顷瓜田，五千公顷蔬菜田，一万一千公顷土豆田也都化为乌有。全国人民的生活还很困难，而我们却少收了大量产品。于是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拨出资金和土地来发展副食品生产，运来奶牛奶羊，建造起玻璃温室和养禽场，开辟出果园，把它们的产品纳入国营农场的计划并且责成场长严格执行。所有这一切对改善垦荒者们的供应来说是很重要的，对人们的心理状态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看到草原上的生活正在走上轨道。

想到这里，我翻阅了那个时期的一些文件，我发现，我常常提到库尔加利吉诺区。当时那里的工作使我大伤脑筋，特别是在我到“草原人”国营农场作例行视察时看到的情况，更使我忧心忡忡。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农场是在1954年夏天，看到的情景确实凄凉。你一到这种地方，马上就会感到事情不妙：人们看到新来的人，就成群结伙地跟在后面发牢骚。有一位妇女一见到我，也马上走到我眼前，连珠炮似地说：

“代表同志，我不知您是什么人，但请您关心关心，帮帮忙吧，我们这儿没有电，没有燃料，也没有煤油，做饭没有柴烧。而且也根本没有东西下锅……”

我同她一起走进商店，那里连盐也没有。另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也激动地对我说：

“勃列日涅夫同志，没有牛奶，没有麦片，您说说，拿什么喂孩子呢？您大概也有孩子吧，您也是父亲，那就请

帮帮忙吧……”

我把供销社主任叫来了。他连眼也不眨地说，麦片只脱销了一天。不过，他的两眼滴溜溜乱转，看得出是在撒谎。我答应妇女们要查清食品的供应问题。但是，更使我吃惊的是，怎么连牛奶也没有。当时我们已给许多国营农场，包括“草原人”农场在内，调拨了大批牲畜，以发展副食品生产。我们还要求下面汇报：给哪个农场分了多少头奶牛，多少只猪，多少匹马，多少只家禽，这才放了心。然而，我在路上却被一大群人拖到食堂去了。我们坐下来以后就开始谈话。

“你们的副食品生产队有多少头奶牛？”

“五十来头。”

“那就应该有牛奶罗。”

“别提啦！奶牛离这儿六十多俄里，在外地放牧呐。”

这时，人们把场长科瓦连科找来了。他一进门就抱怨道：

“真要命，列昂尼德·伊里奇！我说服不了妇女们去当挤奶员，谁也不想去挤牛奶。”

“你们的奶牛都没挤奶就赶出去放牧了？”

“是这样。”

“孩子没奶喝，奶牛在糟蹋，您不着急么？”

“怎么不着急呢？我都害怕了。甚至准备去吃官司。不过我一定想办法……我已经往乌克兰去信啦，叫姑娘们来救急。”

他那一方情况弄清楚后，我又问妇女们：

“你们为什么不肯帮忙呢？这些情况你们又不是不

看见。”

“孩子往哪儿放？”她们七嘴八舌地说：“我们这里都是有家庭的人，拖儿带女的。”

“那好，如果把奶牛暂时分到各户，你们愿意饲养和挤奶么？”

“那还用说！我们不光挤奶，还可以把牛赶到草原上放牧。我们这儿男人也会挤奶。”

“瞧您，科瓦连科同志，倒准备去吃官司了，可连这么一个简单的办法都想不到？把奶牛分给国营农场的工人吧，他们既可以挤奶，又可以喂孩子。往后挤奶员也会有的。”

“我倒没想到。我一定去办……”

我同场长一起到新村去转了一转。我看到，连房子也造得不象样，不打地基，就胡乱地搭起来了。我同他作了一次很不客气的谈话。老实说，我已经不信任科瓦连科了，因为无论对他说什么，他都一成不变地回答：“一定去办，一定去办……”我对他说，我一定还要来一次，进行全面检查。可是现在我第二次来到“草原人”农场，不禁大吃一惊：农场几乎丝毫没有改变！商店和食堂的供应是好了一些，但是这也是去年干预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科瓦连科连指头都未动弹一下。人们还是和过去一样，甚至连用水都感到很苦恼，虽然上一次我已对场长说过，要他在汽车上装个水箱，挨家挨户地去送水——这又不是什么难事。而现在，他对所有的批评仍旧是用那句老话来答复：

“一定去办，一定去办……”

我在荒地上看到的杂乱无章的情况尽管也不少，但这种可以说是令人震惊的无能和毫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事例毕竟还是罕见的。对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干部是决不能姑息的。我在不久以后召开的泽利诺格勒州委全会上，不得不专门谈了这个问题。福利事业就是造福人们，关心人们。这从来就不单纯是经济工作，而首先是政治，在这方面犯错误就会吃大亏。我们为这种错误确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战争中——是人的损失，在和平时期——则是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失。

要在草原上建立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就要求草原各村镇的领导不仅要关心计划的完成，而且要关心人民疾苦。我一到科克切塔夫州，总喜欢去看看例如“红军战士”那样的国营农场。这不仅是因为那儿的生产搞得很有章法，而且还因为那儿的面包烤得特别香甜可口。我敢说，我有生以来在各地所吃过的面包，都比不上“红军战士”农场的面包——又松又软，香味诱人。而彼得·伊凡诺维奇·尼古拉耶夫队里烤出来的面包尤为佳绝。他说：“我们在这儿烤面包，一俄里外也能闻到香味！”记得有一次我还要了几只大圆面包，带去给阿拉木图的同志们尝尝，并且让城里的面包师也学学人家的手艺。

我每到一个新村，看到一口好井，或者是一棵细心种植的树木，我就满心喜悦。居民们以主人翁态度一心一意培育花草树木的勤奋精神，使我十分赞赏。而有些人对自己的家园以至整个新村的外貌毫不在意，这又往往使我感到惊异。

有一夜我在巴夫洛达州从前的加尔金区的一个村里

过夜（遗憾的是我把村名以及留我住宿的那位集体农庄主席的名字全忘了）。清晨，我走出院子大门，在村子里转了一下，不禁大为惊讶。村中一共只有两条街道，在其中一条街上，有些地方屋边种着树木，而在另一条街上则光秃秃地一棵树也没有。怎么回事呢？当时农庄主席给我讲述了这么一段故事。

有一次，斯捷普诺伊边区（现在的北哈萨克草原在革命前属于此边区）的一位省长从鄂木斯克来到这个村子。他来了以后就命令家家户户在自己的屋旁种树：家里有几口人，就种几棵树。三年以后省长顺便来到这个村庄，检查他的命令执行得怎样。他看到：有些人家的屋旁栽上了树，而有些人家的屋旁仍是光秃秃的泥土地。省长命令全体居民都到当时唯一的一条街上来，叫他们站在自家的大门边。然后他把一根带有沉重扣环的皮带交给一个士兵，自己在街上走过去。他对那些种了树的人说一声谢谢，并给他一个银卢布。至于那些不把植树当作一回事的庄稼汉，他命令那个士兵用皮带抽：少种几棵树，就抽几下。士兵一边抽，省长还一边吆喝着：“嘿，瓦西里，你用扣环揍，用扣环揍！”

“这样一来，大街上就绿树成荫了，”主席说完了故事，笑了起来。

笑话归笑话，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已经必须为各个新建国营农场的绿化而奋斗了。现在，我来到荒地，看到国营农场新村掩映在绿树丛中；花园里草木蓊郁，沙沙絮语；苹果树、樱桃树、金合欢和丁香花竞相怒放，万紫千红；无数的池塘和水库波光粼粼，景色诱人；太阳晒热

的岸上少不了有垂钓的人——每当此时，我就会微笑着回想起那个鄂木斯克省长的故事。

* * *

我经常要到外地去——有时坐火车，更多地是乘飞机，而有时候火车、飞机交替乘坐。这样可以节省不少时间，而我的时间总是不大够用的。有时，在重要车站或是州中心要作较长时间的停留，车厢就成了宾馆。飞机预先派到这些地点，于是登上飞机一天就可以飞它几个区或几个国营农场。

我们的“安-2型”飞机是在基辅专门定制的。飞机上有一座大功率的无线电台，客舱里有六只沙发。机务人员还把一张轻便折叠床也带了上来，一直放在机尾。而其余的一切就和大家都很熟悉的十分实用的“安东型”飞机没有什么两样了。这架飞机是我们四处跋涉所必不可少的。飞机驾驶员从空中选择好地点后，就可以降落在草原上的任何地方——靠近任何一条垄沟，一辆拖拉机或野外宿营地。

一切似乎都挺好，只不过这辆空中马车也很会折磨人。我倒是习惯了，可是有一回我们尊敬的演员Л·И·奥尔洛娃、М·А·拉迪尼娜和Н·А·克柳奇科夫却大吃苦头。他们来到荒地举行慰问演出，但是不料没有观众：大家都远在草原上。他们就来找我想办法：

“我们在库斯塔奈已演出过了，可我们想见见荒地人。请您帮帮忙吧，给个什么交通工具都行。”

“那好，用我的飞机吧，”我回答道，并对机务人员说：

“明天我在城里有事，你们把这些同志送到各个作业队去吧，看到哪里有人，就在哪里着陆。”

飞行员们很卖力。一天飞了两、三个区。这天正碰上刮风，飞机颠簸得很厉害，演员们回到城里时已经半死不活了。克柳奇科夫是经过磨练的，他完全顶得住，但是妇女同志可受罪了。我打量了他们一下，就责备起机长来了：

“看来，你把他们搞得太累了吧，尼古拉？”

“瞧您说的，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他们一下飞机，在机翼下稍稍躺一会儿，就开始演出了，一演完就吩咐：起飞！这些女同志真坚强啊……”

我向演员们表示了谢意，但是我发现，他们对我的飞机已经没有早晨那股羡慕之情了。有时候我在草原上要接连飞行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机长对我说：

“我想，您完全可以编入飞行员的行列。您已经飞够一百个小时了。”

“飞行员的标准是多少呢？”

“一百二十小时。”

“那么我当飞行员还太早一点吧。”

“这要看怎么算。我们的飞行可是不正规的。”

“怎么不正规呢？”

“我们的正常飞行高度是多少？一百米。而为了选择降落地点，我们超低空飞行的时间又是多少？不，我们这种飞行每小时应该算两小时。”

我喜欢这架飞机的机务人员——机长尼古拉·莫伊谢耶夫、副驾驶员穆宾·阿比舍夫和随航机械师亚历山

大·克鲁格利科夫。这架外号叫“蚊子”的小飞机什么气象条件下没飞行过啊！在草原上，一年中不刮风的日子只有五十来天，因此这架小飞机几乎每次飞行都是剧烈地颠簸着的。就是在地面上它也不得安宁：为了使它不被大风刮翻和损坏，人们不止一次地开来几辆满载的自卸卡车，把飞机和它们拴住，不管刮风下雨，它一年四季都得飞行，有时还冒险作违章飞行。它经常在太阳下山后降落，有时甚至在夜间降落，这对“安-2型”来说是绝对禁止的。但是工作需要往往与规章无法统一。我坚信，这些始终伴随我飞行的机务人员，全都是精通本行业务的高手。

在那个时候，很多飞行员都已经在向往高速、远程的飞行和喷气式飞机，我的驾驶员们大概也不例外。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分配给他们的是另外一种工作，他们也就勤勤恳恳地干下去了。只有一次，我看到他们惊慌失色，简直吓坏了。如果我没记错，那件事是发生在“塔曼师团”国营农场里。我们飞到这个场的一个边远作业队。那是在5月里，青草已经长得很茂盛。天朗气清，飞机下面的广袤的草原象桌面一样平坦。在这样的草原上选择降落点是并不困难的。我感到，我们很平稳地着陆了。但是飞机发动机刚一关上，通常总是跟在我后面下飞机的正驾驶员一下子就冲到了出口，同时说了声：

“请原谅……”

我紧跟在他后面下了飞机，看到他顺着飞机轮子在草地上压出的辙印急匆匆地走着，好象在找什么东西。后来他停了下来，挥舞着双手，大声招呼在附近工作的拖拉

机手们。一群人围了上来，我也走到跟前，而莫伊谢耶夫脸色煞白，愤怒地说：

“你们看！”

在离左轮辙印半米的草地上放着一把齿朝上的铁耙。这玩艺儿他从空中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只是在着地的一刹那才发现了。不然的话是很可能酿成一幕惨剧的。飞行员们气冲冲地要向队长和拖拉机手们扑过去，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拦住了。当然，拖拉机手们不可能预料到我们的飞机恰巧会降落在这块土地上，不过，铁耙也好，其他工具也好，劳动结束后总该收拾起来，不应该随地乱丢。这件事清楚地表明，管理不善和纪律松弛总是处在犯罪的边缘。

当我即将离开哈萨克时，机长在送别时告诉我说，两年期间，他同我一起飞行了四百八十个航次，飞遍了草原的各个角落。他对这件事很引以自豪，我很理解他这种职业上的自豪感。我深知这位出色的驾驶员技术高超，后来，我以苏共中央书记的身份来到荒地时，我也总是坐他驾驶的飞机。

这样，我们的事业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我一直在旅途上奔波，只能挤时间睡觉，吃饭也没个准地方。有一次，在泽利诺格勒，我觉得身体不舒服。等到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在这以前，我的心脏病曾经发作过一次，大家把我从塞米巴拉金斯克送到了阿拉木图。我只得躺在家里，医生们非要把我关进医院不可，可是我不干。我开玩笑说：一落到你们手里，那就治起来没个完啦。不过，主要是没时间生病。荒地上有一大堆新问题

需要操心,这些问题都很棘手,往往不知从何处下手,但是又非从速解决不可。

夺取粮食的战斗正在进入决定性阶段。

(十一)

我想扼要地谈谈我们在荒地实行的农业技术政策。我们的工作是否一点错误也没有呢?不,我不能这样说。我们是否知道,我们去的地方是风险特别大的农业地区呢?是的,知道的,而且事先作了准备。科学家们说,全面垦殖会使草原变成不毛之地,他们的意见我们是否听到呢?当然,我们听到了,并且也再三权衡了。党在垦荒地区的农业技术政策,简要说来,就是把人在这片原始草原进行活动所带来的各种不良后果限制在最低限度,在这里建立起具有最高水平的大田作物栽培业,然后,建立起适应于干旱地带的农作制。但是它的具体轮廓,我们开始时是不知道的,也无从知道。

“路是人走出来的”——东方人有这样一句很好的谚语。早在革命前列宁就写道:

“俄国工人阶级一定能用他们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来争得自由,推动欧洲前进;让那些在革命方面没有行动的庸夫们以不犯错误而自夸吧。”^①

不进行活动就不会犯错误——这话何其一针见血!

^① 列宁:《(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709—710页。——译者

让大自然的宝库原封不动是最简单不过的，这样肯定不会出差错。但是我们之所以来到这茫茫的原始草原，是因为我们深信人的智慧威力无穷。我们坚信：在规模巨大的，对人民来说又是极为重要的垦荒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能找到保持土地肥力的办法。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在摸索这些新的方法。

我们很快就制止了春播前的翻耕，耙地基本上只在5、6月份和秋天进行以使土地休闲，实行了屏障播种，组织了积雪保墒，也不忽视可靠的休耕地，一言以蔽之，我们尽一切力量来解决干旱草原地带农业上的主要课题——保持土壤中的水分。我们还研究了播种的期限问题，尽管这并不简单。现在荒地上没有人会在5月下半月以前播种了，这已成了起码的常识。而当时……“泥泞下种，富似王公”——这句古老陈腐的农谚到处可以听到。也有一些科学家坚持要在荒地上实行早播。

然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并且第一年的经验已经证明，在那些5月里下种的大面积土地上，粮食收成极好。这是什么在起作用——是处女地的肥力，还是晚播呢？1955年晚播面积大大增加，而且显然都更好地经受住了干旱的考验。一切似乎都很明朗了，然而争论仍在继续着，而要使本地人信服这一点则更加困难。就在上面提到过的那个“红军战士”集体农庄，那位用可口的面包招待过我的队长尼古拉耶夫在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时说：

“当然，我们要对他们做工作，但您可想象不出，我们的庄稼汉是多么难以说服。他们只要一看到可以拖着耙去耕地了，就非得马上去播种不可——还跑得飞快！这

是他们的老习惯……”

但是不管怎么说，到了1956年的春天，在很多新的农场和农庄里，早播已经是很少见的的事儿了，就象不久以前的晚播一样。然而旧习惯仍然顽强地表现出来。叶西尔区委第一书记阿纳托利·罗季奥诺维奇·尼库林是一位优秀的干部，荒地上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有一次他在莫斯科对我说起，他们那儿有一位场长仍然违反了新的播种期限：

“您猜，这位与众不同的人物是谁呢？”尼库林说出了这位国营农场场长的姓名。“‘五一’节还没过，这位‘冠军’却突然闯进了区委，他说：‘书记同志，农场播种完毕！’说完，手举到鬓角敬了个礼，皮靴还象军人那样咣地一碰。我简直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说：‘你头脑发昏啦！子吗这么急？’可他倒好，说什么他们想在全区得第一。我说：‘这样一来，你们连一粒粮食也收不到！’”

果然不出所料：全区平均每公顷产量为十六公担，而这个“先进单位”每公顷只收六公担。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后来这位同志拚命地工作，所以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这种习惯是多么难以根除——匆匆来汇报，一心抢头功，哪怕地里寸草不长也不管。说实在的，有时硬是寸草不长。

应当指出，有时候还有更糟的情况：地耕得很好，也按期播了种，但是后来在收割、运输、贮存和加工等各个阶段，耗损竟达粮食总收获量的三分之一。同耗损作斗争——这是目前挖掘农业潜力的一个主要方面。十分明显，保护好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比生产该产品所花费的

精力和资金要少得多。因此，这一斗争是合算的，它符合党提出的提高效益的方针；而主要的是，它符合人民的利益。

对那些抱定目标，工作不忙乱，不嚷嚷，在农业中稳步地实行自己的一套主张的人，我怀有特别的敬意。荒地上的农业技术措施有很多需要重新加以考虑。例如，播种的深度也象播种的期限一样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1955年大旱时，整个科克切塔夫州的损失之所以比其他州为轻，原来并不是偶然的。还在播种期间，我在“日丹诺夫”国营农场时就已发现，他们的种子似乎下得比一般的深。州委书记 M·Γ·罗基涅兹又给我讲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们的农艺师认为，这里播种深度不应该是荒地农艺规程规定的三到四厘米，而应该是六厘米，甚至八厘米。”

“只有玉米才是这样播种的呀。”

非常遗憾，我把那位农艺师的名字给忘了，但是记得他是这样解释的：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去年就种了几块按这种深度播种的试验田。结果妙极了！道理很简单：这里的土壤，上面一层干得很快，农作物还来不及扎下根，上面的土壤就已裂开，把根扯断。而我们这儿，到泥土变干的时候，下面的根已长得很牢，在吸收下面的水分了，一直等到雨水的降临。”

我对这种新的播种方法观察了两天两夜。我和这位农艺师一起从“日丹诺夫”国营农场飞到“切尔尼戈夫”国

营农场，然后再到其他国营农场，我们改装播种机，我们弯着腰在垄沟里走，扒开泥土检查下种的深度，直扒得手指都开裂了，长出肉刺……果然，当刮起旱风的时候，这些农场的庄稼比其他所有农场都支撑得久一些，好像是干枯草原上的一个个绿色岛屿。这说明这种做法很有价值。现在荒地上播种的深度与其他地方不同，都是八厘米，这已成为常规的耕作方法了。

经验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灾害。科学家们预言过的风蚀现象开始出现了。我还记得那是在巴夫洛达州，我同区委书记 Д·А·阿萨诺夫和 И·Ф·卡布尔涅耶夫一起，第一次看到在田野上空狂旋的龙卷风和路上飞沙走石的情景。那黑色风暴确实厉害，呛得人连呼吸也困难起来。祸不单行，很快杂草也破土而出了。

所有这一切促使我去库尔斯州，到“列宁遗训”集体农庄找 Т·С·马尔采夫。马尔采夫先陪我去看了长得齐刷刷没有一根杂草的麦田，然后才开始介绍情况。他说话有巨大的说服力，其奥秘就在于他在多年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善于集中人民的智慧，并且一心扑在农业上。下面这些话他都说得简单明了：

“外翻犁是草原地区耕作的大敌。我们的一套办法，你们那里可以试试。不过，说不定你们那儿会想出更好、更新的办法？”

“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耕地次数！荒地开出来以后，就尽量少去动它。”

“土地休耕是草原地区丰收的主要条件。如果荒地

上不留休耕地，您就收不到粮食。”

“杂草长出来了吗？应该估计到这一点。这几年有的小麦地里燕麦草已经很多了，再往后，收到的麦子都要不及燕麦草多了。有些人惊慌失措，说什么燕麦草很顽固，怎么办呢？其实不然，这种杂草并没什么了不起。种田人不中用，它才猖狂。你们晚些播种，这是好的。应该等一等，放手让燕麦草长出来，再把它消灭光。然后再播种。神经要坚强。神经脆弱的人种田是没出息的……”

我明白了许多事情。读者们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立刻把好的经验在整个荒地上加以推广呢？我的回答是：土地还有一个比外翻犁和杂草更可怕的敌人——这就是强加给它的形形色色的“建议”。这些建议多如牛毛，使国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后来才明白过来：给农业所下达的各种命令是违反农业本身的规律的。我承认自己有时也很想“加紧推广”，“大力贯彻”，但我总是克制自己，应该让人们自己去把所有的问题弄清楚，以便总结出集体的经验。

我当然也要求新闻记者更广泛地报道那些优秀的国营农场所取得的成就，我还组织了几次专题讨论会，召开了中央会议。我们认为发展科学机构网是至关重要的大事，我们向这些机构提出任务：研究本国的和世界的经验；探索战胜土壤侵蚀的有效办法。我不能不谈一谈以列宁奖金获得者 A·И·巴拉耶夫为首的科学家们所进行的巨大工作。我至今还记得，他是怎样百折不挠地论证少量灌溉休耕地的重要性。所以后来农业土壤保护制正是产生于哈萨克的垦荒地区，这不是偶然的。

我们千方百计地努力捍卫土地休耕制。我想援引一段很有意思的文件。有一次，在我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那是1955年6月9日，正当大旱的时候。天气酷热异常，田里晒得直冒烟，而我们却要谈论未来，即讨论发展哈萨克农业的五年计划。下面是部分速记稿，从中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在当时是如何提出来的。

“麦利尼克同志(共和国农业部长)：现在谈谈轮作问题。由于又开出了好几百万公顷的荒地，我们必须留出大量的耕地作休耕地。头三年我们必须在这些新开垦的土地上连续种小麦，到第四年我们就要开始把这些土地放荒。如果照预定的那样，一年只放荒一百五十万公顷土地，那么到1960年，我们放荒的土地只不过占整个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从农艺学观点来看，这很糟。即使在1960年前我们还能找到二百万公顷左右的荒地来扩大耕地面积，我们仍然必须把目前预计的1960年种粮用地减少一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文明种地。这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做到。否则在第一次轮作时就会把土地糟蹋了。

“勃列日涅夫同志：谁不同意这样做呢？”

“麦利尼克同志：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决议不同意这样做。决议中规定的粮食播种面积是另一个数字。现在的问题是要修改以前通过的决议，因为在作出这个决议的时候，有很多情况我们还无法确切估计。

“勃列日涅夫同志：关于休耕地问题，最好讲得更清楚一些。我看，我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这是不是由于我们的那个决议呢？”

“麦利尼克同志：是这样。这份决议捆住了我们的手脚。

“勃列日涅夫同志：必须以经济上是否合理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根据经营的条件作出严肃认真而又清醒的核算。现在就可看到，我们应该开发水分较少的地带，开发土质较差的地方。我想，可以假定我们还能找到二百万公顷土地。但是总产量怎么办？您不是把休耕地定多了吧？

“麦利尼克同志：不，不多。我们作了通盘权衡，还和各个州协商过。

“阿雷斯塔别科夫（共和国国营农场部副部长）：应该把休耕地的数量提高到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六至十八，这样我们才能完成预定的任务。

“勃列日涅夫同志：那结果还不是一样吗？假定我们共和国平均留百分之十七的休耕地，那么必不可少的总产量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吗？你们要考虑到，在总产量方面哈萨克处境特殊，与众不同。党和政府将严格注视着你们。我们可不能反复无常。休耕地一定要留，但是要留多少呢？开始垦荒之前休耕地是多少？

“安德里阿诺娃（共和国农业部科学管理局局长）：1940年时是百分之十八。对我们这个地区来说，休耕地是耕作的基础。此外，我想谈谈多年生牧草问题。我指的是遭受风蚀的地区。那儿的轮作周期要长一些，并且要规定以牧草来固定土壤。现在在计算中这一点没有考虑到。除了马尔采夫的轮作法，还应该推行粮食与多年生牧草的轮作。

“勃列日涅夫同志：这么办很好……可是今年的苜蓿，例如‘巴夫洛达’农场的苜蓿，怎么样呢？草没种，土壤也没固定住。

“安德里阿诺娃：那儿一向不种草的，但是非种不可。不然的话，他们州里土地侵蚀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重。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保护土壤，那么风蚀将造成可怕的灾难。这些措施应该在我们的五年计划和计算中反映出来。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同意您的意见。我们在写给苏共中央和政府的报告中，应该直截了当地指出，共和国粮食生产将达到某一个水平，然后就会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两年内我们要开垦一千八百万公顷土地，我们将连续三年种麦子，而三年以后就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们以前在初步计划中写上的数字是主观的，只是我们的愿望。今后我们将达到预计的水平，但是只能靠另外再开垦大量荒地，而不是靠竭泽而渔地滥用土地。

“麦利尼克同志：写报告的时间不多了，只剩下两三天了。

“勃列日涅夫同志：让中央书记法兹尔·卡里勃扎诺维奇·卡里勃扎诺夫主持这项工作，由他召集你们大家，你们就日以继夜地一页一页写吧。

“麦利尼克同志：这样，农业部就只好关门了。

“勃列日涅夫同志：这个工作意义重大无比。报告要写得简单明了。只写数字和结论。不要搞得太复杂，别卖弄聪明，一切都应明确，清楚。”

报告写好之后就寄往莫斯科。时间证明，我们的计算是正确的。

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我终于能够自豪地向党汇报：开垦荒地的事业成功了。两年期间共和国的播种面积已增加到二千七百万公顷。有二千三百万公顷种粮食作物，其中小麦占一千八百万公顷，这比垦荒前增加了三倍。我代表全体荒地人向大会保证，哈萨克将能够提供十亿多普特的谷物。

但是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已大功告成，一切困难都已克服，所以我接着又说：

“哈萨克党组织考虑到，现在共和国的播种面积已经达到二千七百万公顷土地，今后进一步增加粮食生产的主要途径，便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垦荒工作中，目前刻不容缓的大事便是根据每个集体农庄和每个国营农场不同的地方特点，拟订一套经营体制，以便保证更好地使用土地和保持土壤肥力。这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作。我们请求苏联科学院、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苏联农业部和国营农场部在此重大问题上给我们以帮助，以便将伟大的垦荒事业顺利地进行到底。”

1956年是荒地扬眉吐气的一年。哈萨克各地草原上获得了特大丰收，共和国向国家上缴的粮食，已不是原定的六亿普特，而是十亿普特了。那一年哈萨克因第一次上缴十亿普特荒地粮面荣获了第一枚列宁勋章，我由衷地感到幸福。就是这第一次上缴的十亿普特为荒地树立起牢固的威信，以后无论是自然灾害的打击，或是加

重这些打击后果的主观武断的决定，都动摇不了这一威信。

遗憾的是，我未能亲眼看到这一由无数心血和汗水浇成的特大丰收。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我重新被选为苏共中央书记。

那天晚上，库纳耶夫、萨特帕耶夫、茹林、马卡林等哈萨克的同志们到我当时下榻的“莫斯科”宾馆来向我表示祝贺。分手前的这次相聚来得很匆促，大家临别依依，颇觉惆怅。他们已在匆匆打点行装，准备回去，我则在考虑新的工作。但是，我要说，同朋友们离别，同我依恋的大草原离别，同我亲切珍爱的荒地人离别，使我不禁黯然神伤。

(十二)

幸好，这次离别对我来说是短暂的。荒地上的那段生活在我的一生中是极为宝贵、极为重要的时期，它永远使我激动，使我向往。现在，我的另一项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我又重新为荒地操起心来。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我的许多工作中有一项工作便是支持以 A·И·巴拉耶夫为首的苏联科学家们所制定的荒地土壤保护农作制。现在这个农作制已付诸实施，它保护了荒地免遭大风的侵蚀。在短短的期限内，我们在辽阔的地区普遍推行了土壤保护制，其中包括我国其他地方的草原地带，并以技术设备保证了这项科学建议的落实和贯彻。

直到现在，我仍在不断地关心荒地的工作，我常去哈

萨克。可以说，我在那儿看到了我的理想和千百万荒地人的理想已经变成现实。

当然，在荒地草原上远非所有的事情都办到了，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但那是另一个话题。而我想说的是已经取得的成就，它令人高兴，令人永志不忘。

哈萨克的垦荒工作不仅是规模极为宏伟的创举，而且在经济上也收到巨大的利益。让我列举数字加以证明。在过去的二十四年期间，哈萨克向国家交售的谷物超过二亿五千万吨，也就是一百五十五亿普特！与此同时，从1954年到1977年共和国用于农业的全部费用（我要强调指出，不单是用于垦荒地区，而是用于共和国整个农业部门）是二百一十一亿卢布。而在此期间，从出售粮食的交易中所征得的税收为二百七十二亿卢布，即国家获得纯利润六十一亿卢布。同时还应该记住，今天哈萨克的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总额为二百五十亿卢布。这就是说，所有付出的劳动和费用在最短时间内已全部收回，并且获得了利润。请看，人类经济史上这一最为壮观的夺粮大会战取得了多么丰硕的成果！古老的草原成了巨大的聚宝盆。它经过人们劳动的改造，更加巩固了我国的整个农业，保证国家能获得必要数量的粮食。而这块土地目前正在养精蓄锐，将来还会有更大的作为。

您乘上飞机到辽阔的草原上空去翱翔吧，您不仅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粮田，而且还可以看到蜿蜒如带的柏油马路、一座座新村、一条条铁路、成片的电线网、巨大的粮仓、大型的工厂和城市。正是由于荒地有了雄

厚的粮食，过去羽茅草丛生的地区才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举例说，阿克摩林斯克在我第一次看到时的那副模样，我至今记忆犹新。又矮又低的泥土房子，狭窄的街道，八万居民……而如今呢？在这个已经更名为泽利诺格勒的城市里，人口增加了两倍，城市几乎全部经过改建更新。现在这里有几十家工厂、四所高等学校、十五所中等技术学校，这些学校仅在最近三年中间已培养出两万多名专业人材。

垦荒有力地推动了哈萨克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科学和文化事业日益发达。出现了一些巨大的工业中心，兴起了九十个城市，其中包括全国闻名的鲁德内、耶基巴斯图兹、叶尔马克、肯陶、阿尔卡雷克、谢甫琴柯等。共和国生产着煤炭、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矿肥、最新式的机床、汽车、拖拉机。过去落后的哈萨克现在也有了快中子反应堆，这已经不足为奇了。

现在，在兄弟共和国组成的星座中，哈萨克这颗明星更加光辉灿烂了。共和国是一年一年地、一个五年计划又一个五年计划地发展起来的；不过，有关的讨论、思考和“酝酿”却要早得多。它目前面貌的许多轮廓几乎早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就已勾画出来了，那时科学家、勘探人员、计划人员和设计人员等越来越经常地聚集在共和国中央我的办公室里，这就要求我多加关心，并为此而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如今，这一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农工综合体，它对国家整个经济的发展有着强大的影响。看到

此情此景，我所感到的欣慰是无须赘言的了。这块土地上的垦荒史诗又一次向全世界显示了苏维埃人极其崇高的道德品质。这一史诗成了忘我地为祖国服务的象征，成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丰功伟绩。

按工厂的汽笛生活

(一)

我幸运地出生在一个大的工人镇上的工人家庭，在那里成长并受到劳动锻炼。我童年时期最初和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工厂的汽笛声。我记得，每当朝霞初现，父亲就已穿好工作服，母亲在门口给他送别。低沉的汽笛在长鸣，在我听来，仿佛响彻整个大地。

当时没有无线电广播，工人们也没有钟表，工厂自己召唤工人上班。早上五点半钟鸣第一遍预备笛，跟着是六点钟的接班笛，然后晚上五点半钟再鸣预备笛，六点钟又鸣上班笛。当时，在我们卡缅斯科耶，在这座后来称为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的工人城，有二万五千人。一切时间计算、全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人们的劳动本身，总而言之整个生活，都是按汽笛声进行的。

我迅速穿好衣服，饭也不吃，光着脚就跟父亲跑了。要是他拉着我的手，我便骄傲地环顾四周，好象在对人家说：瞧，我长得多大了，都已经去工厂上班了。其实，我当时才四岁出头。从邻近的房子里，从两旁的小街小巷里，工人们纷纷走出来，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几乎都穿着用粗糙的“中国土布”做的破旧的短上衣和裤子。记得

我当时非常喜欢和大家走在一起。

上千人成群结队地涌向低处的第聂伯河和巴扎尔斜坡。父亲就把我留在这里。一转眼，他那顶便帽便消失在许许多多便帽、鸭舌帽和毡帽之中了。我只能在远处望着漆黑的出入口把那些去接班的工人吞吸进去。大概七岁时，我才第一次走进这扇大门，手提饭盒为父亲送饭。

工厂分两班干活，每班工作十二小时，有时班次打乱了，工人甚至要在班上干十八个小时。厂里没有食堂，也不给午休，工人只好匆忙地咬几口从家里带来的东西充饥。有些人的饭是由妻子、女儿或姐妹用饭包送来的。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父亲和母亲不是在逛街、逛公园或者在别人家里做客时认识的，也不是在俱乐部里，因为他们那时根本不可能有俱乐部，而是就在这里，在第聂伯工厂的轧钢车间里认识的。

父亲是助理轧钢工，加热炉的锻工是老工人杰尼斯·马扎洛夫。我记得很清楚，这位老工人体格健壮、沉默寡言，是一个真正的俄国工匠。他出生在叶纳基耶沃，早先在尼科波尔做工，后来到我们厂时，已有一大家子人了。他的午饭经常是由已成年的女儿纳塔莉娅送的。她和我父亲就是在这里的加热炉旁，在“280”号轧钢机旁相识的，一年后结了婚。父亲当时二十八岁，母亲二十岁。

关于自己的出身还有什么话要说呢？众所周知，工人家庭是不修家谱的。我只知道，父亲伊里亚·亚科夫列维奇·勃列日涅夫在1900年进厂。他是从库尔斯克省斯

特列茨克县勃列日涅夫村来到此地的。村名和我们的姓一样，大概是根据村子的地理位置靠近河岸而起的，也可能是源出“爱惜”、“保护”这两个词的意思，因为这两个词的意思同农民爱惜衣食之源的土地是完全吻合的^①。农民重视土地，保护土地，爱惜土地，世代代用血汗浇灌土地。可是，他们却世代代摆脱不了贫穷。否则，父亲也不至于背井离乡，出外谋生了。

顺便说说，和我们同住一套房的阿尔卡季叔叔也姓勃列日涅夫。但他不是父亲的弟弟，只是同乡。他也和大家一样是来谋生的，父亲收留了他。他当上了钢铁工人，后来同我母亲的妹妹结婚，才成了我们的亲戚，也就是我的姨夫。在我们村里同姓的人大概不少，在俄国村镇往往都是如此。

因此，论民族我是俄罗斯人，论出身是血统无产者，世代相承的钢铁工人。关于我的家史，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俄国工人阶级的家史。工人阶级正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蓬勃发展起来的。这一蓬勃发展引起了人口大量迁移，使千百万人的生活发生急剧变化。他们每个人的命运可能有偶然性，但他们共同的命运都受着历史的制约，也可以说，是由国内发生的工业革命所预先决定的。所以，我的父母之所以来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区（现在的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在俄国南方落户，这绝不是偶然的。

^① 勃列日涅夫(Брежнев)、靠近河岸(Прибрежный)、爱惜(Беречь)和保护(Оберегать)，这几个俄文词的部分发音近似。——译者

顿巴斯的煤矿和克里沃罗日耶的铁矿凑巧在这个地区彼此为邻，有一条铁路把这两个矿区连接起来，又有第聂伯河的水路把钢材运到别日察和布良斯克的机器制造厂。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可以源源不绝地招收到廉价劳动力，就不仅把俄国企业家，而且也把外国资本家吸引到这里来了。例如，第聂伯工厂就是比利时、波兰和法国的资本联合兴建的（我们镇上把“资本”这个词念成“科皮塔尔”，意思是“攒钱”^①）。工厂发展得十分迅猛：从1887年到1896年，卡缅斯科耶的人口从两千人增加到一万八千人。

这个数字，弗·伊·列宁曾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引用过。他写道：“过去要几百年才能建立起来的，现在只要十年就实现了。”^②很多年以后，我当大学生时读了这篇经典著作，注意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南方冶金工业的发展研究得多么深入细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在分析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候，不仅放眼全俄国，而且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地区，包括以前的卡缅斯科耶村，他研究它的过去，了解它的现状，预见它的未来。我记得，我当时觉得这是十分了不起的。

在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圣彼得堡省、莫斯科省、基辅省、彼尔姆省和弗拉基米尔省在技术装备上是名列前茅的，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却压倒了旧

① “资本”(Капитал)、“科皮塔尔”(Копитал)和“攒钱”(Копить)这三个俄语词的发音近似。——译者

②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77页。

的工业中心，跃居首都省之后。在乌拉尔，“蒸气马力的数量”十年内只增长了一倍半，而南方在同一时间内却几乎增长了五倍。而且南方工厂已经不象乌拉尔工厂那样以木炭为燃料，而是以煤为燃料了；冶炼铸铁已不用冷吹法，炼制锻铁也抛弃了传统的所谓熟铁吹炼法。

弗·伊·列宁作出结论说：“乌拉尔是古老的，统治着乌拉尔的制度‘几百年来神圣不可侵犯’，而南俄却是年轻的，正处于形成期。最近几十年来这里生长起来的纯粹资本主义的工业，既没有传统和等级，也没有民族性与一定居民的闭关自守性。”^①

我重复说一遍，所有这些都是我后来上大学时才读到和领会的。但列宁写的正是我早在童年时代就亲眼目睹和铭记心头的。各种各样的方言，从各省一群群涌到我们这里来的惶惶不安的庄稼汉，匆匆搭起来的木棚以及高炉、平炉和大型轧钢机的兴建，所有这一切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当时南方最大的这座工厂在小镇上拔地而起。我们这里的一切都被它所吸引。我和别的工人子弟一样，知道自己一定会跟着父亲进车间，到那熊熊的炉火跟前去。镇上的人根本不考虑别的出路。工厂发出响亮的汽笛声，显示着自己的威风，于是我意识到：这就是我命定的前途。

工厂的设备在当时看来，可算是很好的了，不过那时的车间当然既不会有辊式传送机，也不会有起重设备。工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444页。

人们卸车皮用的是铁锹，往炉内投煤用的也是铁锹。无精打采的马匹把黑色铸锭运到我的外祖父杰尼斯负责的加热炉前，人们再从这里将那些半吨重的烧得白热的“大家伙”用钩子拖到轧钢机前，然后仍旧用手工把它从一个孔型拖到另一个孔型上去，最后用钳子把那还发着热的但已轧过几道的薄钢条夹起来，跑步拉到金属冷却槽内。

有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腰系围裙、脚穿麻鞋的工人，总是一个劲儿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那里的人称之为“在圈儿里”）。我清楚地看到，他全身都处于紧张状态，时刻准备好钳子。只要那条烧得通红、丝丝作响的恶蛇一窜出来，他就立刻将它制服，然后用力一扔，给另一组轧辊“喂料”。此时此刻，这个人在我的眼里简直成了神话中的大力士和巨人。他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每次发现我后，就招呼姨夫阿尔卡季或者我们的邻居卢卡，再不就招呼别的工人，让他们替换他。父亲洗过手和脸，走到外面。太阳照得他眯起眼睛。他在枯萎的草地上坐下来，默不作声地吃饭，有时还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脑袋，问家里有什么事，母亲怎样。吃完饭，他总说那句老话：“玩儿去吧。”于是，我只顾同自己的伙伴一起朝工厂尽头的烟囱跑去，却不懂得父亲又要去从事那种非人的劳动了。

厂区外面长着一片红柳，我们穿过这片丛林，来到第聂伯河边。这里的河岸又高又陡。我们站在岸上眺望，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远方大地一望无际。河水在我们脚下泛着蓝光，一个灌木丛生的绿岛隐约可见。再往远看，只

见一片朦胧碧蓝的河水、草地以及坐落在对岸的尼古拉耶夫卡村和库利洛夫卡村，这对我们说来已是天涯海角了。

童年毕竟是童年。在这里的第聂伯河旁，一切对我们都是乐趣：我们沿着陡峭的河岸往下跑，在河里洗澡，游泳到岛上去。不过春天就不行了。春汛一到，河水淹没岛上的树丛，远处的河岸一片模糊。现在，当我回忆起果戈理的话：“能飞到第聂伯河中央的鸟儿是不多的……”我就想，第聂伯河的这一形象是从他童年的记忆里产生的。

回忆童年总是愉快的，但是我想尽量避免写回忆录的人常犯的一种错误：他们由于少不更事，总是把往事涂上一层粉红的色彩。

(二)

我们家住在叫做“下移民区”的工人村的阿克谢诺夫斯克胡同。1906年12月19日，我在这里出生。我的弟弟雅科夫和妹妹薇拉也都在同一间屋里出世。

卡缅斯科耶镇上有两座东正教教堂、一座天主教教堂、一座路德派新教教堂和一座犹太教堂，这就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照应。其余的“文化中心”从工厂大门口起就有了：那里有斯特里古林饭馆和斯米尔诺夫饭馆，还有一批数不清的饭馆和官营酒店。

可是，在镇子的西南——“上移民区”，却全然是另一个世界：那里矗立着工厂厂部宽敞讲究的两层大楼。甚

至从许多高高矮矮的圆形烟囱或八角形烟囱里冒出来的浓烟也都避开大楼，几乎总是飘向工人村。后来我才知道，这里的建筑是考虑到第聂伯河沿岸的风向的。由于这个缘故，我童年时代的天空总是烟雾弥漫，我们这里的屋顶总蒙着一层烟尘。

“上移民区”严禁工人入内。那里每天晚上电灯通明，驶到那里去的马车全是胶皮轱辘的，车上下来的都是神气十足的太太和老爷。他们养尊处优，目中无人，仿佛是另一种种类的人。那些头戴制帽、身穿天鹅绒领大衣的工程师从不向工人伸出手来，而工人走到工程师或工头眼前时，却一定要恭恭敬敬地脱下帽子。我们这些工人的孩子只能远远地站在公园的栏杆外，观看那些在管乐声中闲逛的“上等人”。

一个人要想很好了解今天和评价现状，就要真正认识过去。

在我们镇上散发的一份布尔什维克传单说：“象卡缅斯科耶工厂这样苦役般的条件，未必能在别处遇见。一年到头不断地干活，没有任何假日，每天要一连干十二小时，有时甚至干十八小时，没有早餐和午餐时间，这种情况哪里见过？维修房屋和修理机器设备的费用要从工人工资中克扣，这又在哪里听说过？看来我们的吸血鬼还嫌从我们劳动中榨取的油水太少，所以他们就抓住每个机会对我们罚款……我们干一辈子活，受一辈子苦，最后让老板装满腰包，我们却空着肚子。”

俄国南方工人的革命史是很出名的。我在这里要追述一下，早在1885年这里就出现了第一批社会民主主义

小组。卡缅斯科耶也有一个这样的小组，后来列宁的《火星报》也定期寄来了。在各个时期，按照列宁下达的任务在这个地区积极开展工作的有这样一些列宁的学生和战友，如伊·克·拉拉杨茨，维·巴·诺根，瓦·安·舍尔古诺夫，米·格·茨哈卡雅，罗·萨·捷姆利亚奇卡，瓦·瓦·沃罗夫斯基，潘·尼·勒柏辛斯基，格·康·奥尔忠尼启泽。但我想专门说一说第一批自觉走上革命斗争道路的工人中的三位布尔什维克。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伊万·瓦西里也维奇·巴布什金在1897年组织起来的。众所周知，弗·伊·列宁称他为党的骄傲，人民的英雄。列宁写道：“假如没有这些人，俄国人民会永世沦为奴隶，沦为农奴。有了这些人，俄国人民定能把自己从一切剥削中彻底解放出来。”

在巴布什金小组里，格里哥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参加了革命运动，这位工人革命家后来成了我党著名活动家。他当过车工的那个工厂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也改名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尼基佛尔·叶弗烈莫维奇·维洛诺夫是我想回忆的第三个人。他不如前面两人出名，但他也是一名英雄，一名为解放斗争献身的烈士。1903年夏，当罢工浪潮席卷整个南俄时，他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火星派委员会委员。他在党内的化名是米哈伊尔·扎沃茨科伊^①。他确实也是个工厂工人，是个熟练的钳工，

^① 扎沃茨科伊(Заводской)，俄文意为“工厂工人”。——译者

一个有工人气质的真正的工人。

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的消息传到这里之后，维洛诺夫立刻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他曾经写过一封长信给弗·伊·列宁，但没有收到回信，因为他很快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可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他写过回信，几十年后他们的信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档案里发现了。列宁的复信上还保留着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亲笔附言：“12月22日寄送米沙·扎沃茨科伊。”

此外，列宁在他写的《就我们的组织任务致同志的信》这本小册子里还全文引用了“某城一工人”的意见。六年后，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在巴黎见到了维洛诺夫。当克鲁普斯卡娅提到，有个名叫米沙·扎沃茨科伊的人当时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给他们写过几封很有意义的信时，维洛诺夫笑着说：“那个人就是我。”情况这时才弄清楚。

维洛诺夫走的是一条革命者普遍经历过的道路——被捕、坐单人囚房、坐牢、越狱、再次被捕、流放。宪兵把他投进潮湿的单身牢屋，打伤了他的肺部，使他很早就得了肺结核。但他终于成长为一名党的著名组织家和宣传家，1905年革命时任萨马拉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当时，他才二十二岁。

后来他抱着重病流亡国外，住在卡普里，正好处在派别斗争的中心。当时形势严重。由于反动思潮的压力，一部分人思想开始涣散，出现了“召回派”、“造神派”、“经验一元论派”等等派别。一个工人出身的革命者是不易

分清这一切的，但是他正确地作出了跟列宁走的选择。众所周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给阿·马·高尔基的信中曾经谈到他同米哈伊尔·扎沃茨科伊的一次长时间谈话。他深信，工人阶级会锤炼出自己的党，“会比可诅咒的侨居处境有时所设想的锤炼得更快，可靠性也比从某些外部表现和个别情节出发所设想的更大。米哈伊尔这样的人就是这种保证。”^①

的确，象巴布什金、彼得罗夫斯基、维洛诺夫以及其他成千上万这样的人，正是这种保证。而我所以要写这些勇于献身的战士，是为了更加明确地说明，为什么俄国工人阶级一直紧跟列宁、布尔什维克和伟大的共产党。第聂伯工人曾最积极地参加1905年革命。卡缅斯科耶镇继彼得堡、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卢甘斯克以及其他大城市之后，也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起就是苏维埃中的主导力量。被选为主席的是布尔什维克别谢多夫，他是厂里的一名电工。我后来和他见过几次面，因为他在国内战争结束后曾在我们市任苏维埃主席，后来任厂长。

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斗争并没有停止。尽管有大规模的逮捕，尽管发生过思想动摇，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这里从来没有牢固的阵地。斗争日益扩大，秘密小组不断活动，工人举行罢工和“五一”示威游行。例如，《真理报》1912年7月4日写道：“昨天卡缅斯科耶工厂有二十二二人因企图举行政治集会而遭警察逮捕。”在以后的《真理报》上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卡缅斯科耶工

^① 列宁：《给阿·马·高尔基》，载《列宁全集》俄文版第45卷，第415页。

厂有三十二名工人被捕”。但是，工人阶级的斗志是摧毁不了的。

1916年，我们厂流传的一份传单号召说：“只有到处发动全面武装起义，只有彻底砸烂尼古拉二世腐朽没落的专制国家，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民主共和国，我们才能防止人类大屠杀惨祸的重演……让我们的斗争发展成统一的、普遍的斗争，因为团结才有力量！”

当然，在那些年代我没有念过这些传单，大人也不带我们这些孩子去参加“五一”示威游行，而且总的说来，远不是所有事情我们都能知道，都能弄明白。但我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从很早的时候起我就熟悉工人们想法和愿望。我凑在他们中间，倾听大人们谈话，目击他们在罢工日子里的艰难处境。可以说，我从小就受到工人优良品质的熏陶。

工人是伟大的劳动者，有无限的坚韧精神。他们熟悉自己这一行，习惯于把要做的事情干好。甚至在沙皇时代，甚至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他们也非常厌恶粗制滥造的活计，因为他们一贯看重高明的技艺，尊重自己的劳动。人类积累的全部财富几乎都是他们粗壮有力的手创造出来的，但是他们自己并不迷恋财富，也不被利欲迷住心窍。他们心胸宽广、豪迈大胆，永远追求正义。他们机智灵敏，聪明幽默。他们坚定勇敢，忠于友谊，随时准备帮助伙伴。工厂的汽笛一响，所有工人都同时去上工，也正是这汽笛声把工人们联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联合一致、休戚与共和无产阶级团结的高尚情操。而这种无产阶级的团结又把千百万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习惯、不同

民族的人凝结成一个强大有力、坚如磐石的真正革命的阶级。

我出身于这个阶级并在这个环境中受到培养，可以说，同它有着血肉联系。我的父亲直到晚年一直是工人。当工人的还有我的外祖父和几位舅舅，我自己也是刚够年龄就进了工厂，在我之后进厂的还有弟弟、妹妹、妹夫……勃列日涅夫一家人把自己一生的几十年都献给了亲爱的工厂，在工厂的名册上至今仍可找到我们的姓名。

(三)

我要更详细地谈谈我的家庭，因为一个人的性格以及他对生活的态度正是从家庭中培育出来的。我的父母饱尝了沙皇时期的压迫，过了大半辈子的苦难生活，但是我们家里始终充满和睦气氛。也许不会没有丝毫磨擦，但我们这些孩子并未感到过，甚至也没有听到过高声叫嚷。

父亲是个稳重而严厉的人。他对我们不娇养，据我记忆，也从不惩罚。对我们大概也并无惩罚的必要，因为我们是在尊敬父母的精神培育下成长起来的。父亲身材瘦长，他和大多数轧钢工人一样，体格十分强壮。他脸庞清秀，双眼炯炯有神。他总是很注意自己的仪表，即便在家里也把脸刮得干干净净，衣冠整洁，喜欢一切都井井有条。他的这些习惯显然传给了我们。父亲具有极其强烈的自尊心，他不要手腕，脾气直爽，性格刚强，同事们都尊重他。我们做孩子的看到这一点都很高兴。

父亲曾对我说：“如果你许下了诺言，你就要履行。要是对一件事有所怀疑，就应直说；如果你害怕，就不要去做；一旦做了，就不要胆怯。如果你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就坚持到底。”

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总是言行一致的。

卡缅斯科耶镇的人是各色各样的。工厂管理部里有法国人、比利时人和波兰人。工人中也有不少波兰人，但更多的还是当地的乌克兰人，还有许多从叶列茨、库尔斯克、奥廖尔和卡卢加来的庄稼人。我的父亲对劳动人民全都一视同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对人不是按民族而是按阶级成分区分的。我记得，当时对我来说，警察的儿子或阔商人的儿子虽然都是俄国人，但却是外人，而工人的孩子，即使是波兰人的孩子，也是自己人。

革命胜利后，工厂改为八小时工作制，需要增设第三班，于是厂里指定父亲当定料员。他长期当轧钢工人，可算得上是本行行家。但是，担任这个新的职务不仅需要经验，而且需要丰富的知识。定料员要向平炉车间申请材料，要确定采用哪种钢锭才能轧出符合定货要求的钢型；要确定选用哪种牌号的钢材以及如何进行热处理才能减少热损耗等等。实际上这都需要工程师来计算，而父亲凭他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天生的聪明才智做到了这一切。

在苏维埃时期，我们家搬到了佩利纳街，住进了工厂的新楼。我们住在底层的两间一套的单元内。父亲把其中一间房让给姨夫一家。我们过得和睦愉快，经常招待客人，唱歌、聊天，直到深夜。母亲往往要让客人吃了夜点心才放他们走。我们的宿舍楼坐落在特里杜兹纳亚车

站近旁，当时这个地方算是郊区。房后有个绿树成荫的小院，院内洋槐树上花儿盛开。每天一清早，鸟儿就唱起歌来。

父亲成了突击手，到三十年代成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受到周围人们的敬佩，把孩子们也都抚养成人。我们都参加了工作，能够帮助家里了。这时他本该享享清福了，但是他突然病故，终年不满六十岁。

父亲直到临终前还操心厂里的事。他对国内外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非常关心。我记得有这样一次谈话，这是我以后经常想起的，所以我在这里把它写出来。那天我下班回家，习惯地对父亲谈起厂里的事。但父亲却想着别的什么事。他打断我的话说：

“列尼亚，你说世界上哪座山最高？”

“埃佛勒斯特峰。”^①

“那么它有多高？”

我慌了：莫非他在考我？

我对他说：“记不准了，将近九千米吧……你问这千吗？”

“艾菲尔铁塔呢？”

“我看有三百米高。”

父亲半天不作声，心里在盘算着什么，然后说：

“列尼亚，你听我说，要是叫我们造铁塔，我们会造得更高的。只要给我们钢材，我们能造到六百米高。”

“父亲，你这是要干什么？”

“在塔顶搭个绞刑架，吊死希特勒。要让大家老远就

^① 即珠穆朗玛峰。——译者

能看到战争贩子的下场。看来世上的希特勒不只一个，也许有好些个。这样就连吊死他们的地方都有了。嗯？你看怎么样？”

他一辈子都是一个工人，可脑子里却有这些想法。这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很久，远在我们获得胜利之前，远在纽伦堡审判把希特勒匪帮的头目钉死在历史耻辱柱上之前。他虽然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他正所谓打心眼里感到我们的事业无比正确，觉察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性，非常确切地表示出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对战争威胁的态度。

我的母亲纳塔莉娅·杰尼索夫娜比父亲长寿得多。如果说，我象我们家的人所说的那样从父亲身上接受了顽强坚韧的性格以及干事干到底的习惯，那么我从母亲身上继承了平易近人、关心他人和善于用欢笑迎接困难的作风。她操劳一生，抚养我们，为我们洗衣、烧饭，照料生病的子女。每当我想起这一切，我总是要对妇女们、母亲们所从事的繁重劳累、默默无闻和永不止息的崇高劳动产生崇敬之意。

后来我在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哈萨克工作时，总要利用一切机会去看望母亲，我对她始终怀着作儿子的深切敬意。我要进一步说：一个人如果不热爱生育了他的母亲，那么我个人对这样的人是持怀疑态度的。俗话说得好，祖国好比母亲，抛弃和遗忘母亲的人必将成为祖国的不肖子孙。

后来我在莫斯科工作了，但母亲还是怎么也不同意搬到我这里来，照旧住在佩利纳街的那幢楼里，同我妹妹

和妹夫合住在—套拥挤的房子里。妹夫是个能干的工程师，已当上我们厂里的车间主任。后来我还得知下面这样一件事，但不是从亲人那里得知的，他们没有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我。当地政府认为，苏共中央书记的母亲住这样的房子不合适，提出给她—套宽敞明亮、设备齐全的住宅。应当指出，当时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已经广泛开展了住房建设。但是母亲不管别人怎么劝说，还是拒绝搬家，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母亲时常提着—小篮子去商店，如果有人让她不排队先买，她就要生气。她依旧料理全家家务，非常喜欢招待客人。至今我还记得她做的具有家乡风味的面条，我从来没吃过这样美味的面条。—到傍晚，她总穿—件老太太穿的短上衣，包上深色头巾，走到外面，坐在大门旁的长椅上，和邻居们聊天。

当然也有人想利用认识勃列日涅夫母亲的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塞给她各种各样的申请书和报告，以便“逐级”转达。应当承认，我对她的深明大义和待人接物极其谦和得体的态度感到惊讶。这方面的事母亲—桩也没有对我讲过，我也是从旁人那里得知的。她认为自己无权干预我的事。她知道我是十分尊敬和爱戴她的，但是如果我应她的要求而帮助某些人，例如替他们解决住房问题，那么另—些想不到去找她或者不可能去找她的人就要吃亏了。而这些人可能更需要获得帮助。母亲的想法大概就是这样的，但她对对方说得却很简单：

“你瞧，我有两只手。”她举起那双青筋磷磷、长期操劳而苍老的手，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就尽力帮你的忙。但我不能吩咐儿子干这干那。请你多多原谅。”

1966年母亲搬到莫斯科，和我住在一起。她盼来了曾孙，日子过得安宁顺心，受到那些认识她的人的爱戴，并以她的长子受到人民和党的信任而感到自豪。对我来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百忙之余能坐在妈妈身边，倾听她亲切的声音，并凝视她慈祥的亮晶晶的目光。

(四)

我还没有说：不仅我的父亲识字，而且母亲也是既会写字又爱看书的。在她年轻的时候，这在工人村是少有的。我长大以后，才知道父母下了多大决心要使我们这些孩子得到真正的教育。他们想这样做，也终于做到了：九岁那年，我考上了卡缅斯科耶男子古典中学预备班。我记得，当时母亲简直不相信我已被录取，就连周围邻居也都感到惊奇。

在此以前，工人子弟根本不让进古典中学，而当我上中学时，学校大门也不是敞开的，只是稍稍开了一条缝。大概这一方面是由于生产逐渐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受俄国革命事件的影响。可是对我们还要进行专门考试，择优录取，大约十五个人里才取一个，而那一年总共才录取了七名工人子弟。其余的学生全都来自“上移民区”，他们都是官吏、富商和工厂头头的子女。

我们被叫做“官费生”。这倒不是说，我们真能领到奖学金，这只是说，如果成绩优异，可以免缴学费。学费简直高得出奇——六十四个金卢布。这样一大笔钱就连最熟练的工人都挣不到，当然父亲尽管想付也付不起。

但是，我和我所有的朋友一样，学得很好。因为第一，我很爱学习新知识；第二，父亲严格监督我的学习；第三，学习不好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辍学。

校方对我们这些工人子弟的态度和对“上移民区”学生的态度截然不同。对此我们感到气愤，他们说我们学不了科学，我们一心想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并不比那些受到多方袒护的富家子弟笨。

历史教员科瓦列维奇是我们喜爱的老师。他讲课出色，不仅讲沙皇，还讲拉辛和普加乔夫。从他那里，我头一次知道有十二月党人起义，听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赫尔岑的大名。他启发我们思考和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后来我才知道，他讲的内容已远远超出教学大纲规定的范围。当然，我们没想到，我们这位最出色的教员竟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一名地下工作者。这一情况是后来他被邓尼金匪帮枪杀时我们才知道的。现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有一条叫科瓦列维奇的街道。大概不是所有年轻人都知道这个街名是纪念谁的，所以我很高兴我能讲讲它的来历。

1917年2月，远方隆隆的炮声传到了卡缅斯科耶村。专制制度垮台了。但是，战争仍在继续，排队买粮食的长龙没有缩短，土地照样归地主占有，工厂照样由厂主掌管。在我们这里，“上移民区”的人虽然心里也不无恐惧，但仍然高高在上，藐视“下移民区”。主人依旧是主人，工人依旧是工人。

我对十月革命伟大时刻的记忆就完全不同了。可以

说，这些日子我是永志不忘的。

工厂的汽笛突然在非规定的时刻拉响了。时间好象被劈开了，裂成了两段，新的纪年开始了。我们对此感到很不寻常，于是跟着父亲奔向工厂。几乎全城的人都往那里跑去。工人们纷纷走出车间，广场上人声鼎沸，万头攒动。人群中可以看到前线归来的伤兵头上戴着的高筒皮帽，有些地方还隐约可见妇女的头巾，但人数最多的还是钢铁工人。我记得当时有一种普遍高昂的情绪和真正胜利的感觉。

群众大会开始了。卡缅斯科耶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米·伊·阿尔谢尼切夫在会上讲话。他在我们厂的锅炉车间做过工，很早就投身革命，印刷和散发过传单，后来由于被人盯梢才跑到彼得格勒，经历过光荣的地下斗争道路，也没能逃脱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他在芬兰车站迎接过弗·伊·列宁，听过列宁以“社会主义革命万岁”这一口号为结束语的著名演说。后来阿尔谢尼切夫在国内战争年代被白军枪杀了，而我以后有机会上学的那所冶金学院就是以米哈伊尔·阿尔谢尼切夫的名字命名的。

当时，他在会上讲了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谈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且宣布：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府成立了，领导这个政府的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这时人群骚动，迸发出“乌拉”的欢呼声。我还记得，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翘首仰望飘扬在秋天灰色天空中的红旗。

我想补充一点，每一代人都继承先辈的斗争成果和

建树，然后又向前迈进，在新的高度和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继续走自己的道路。青年人有时认为，所有的大事都已成为过去。革命，国内战争，一个宏伟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伟大卫国战争的英雄业绩等等都成为往事了。男女青年就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在一个属于他们的时代正在到来，接力棒正从祖辈和父辈手中传到他们手里，那时他们将会明白，他们要经受不少考验，要干一番大事业。

今天，一想到当之无愧的接班人已在老一辈革命家、头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者和卫国战争将士们身旁成长起来，我心里就感到一阵温暖。现在，我们可以把以前不能想象的巨大的任务交给共青团，交给苏维埃国家的所有青年。我们看到，他们对我们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抱着崇高的个人责任感，并把自己的浪漫主义热情，也可以说是青年的激情，倾注于一切创举之中。青年一代正在成长为信仰共产主义，无限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伟大列宁的事业以及忠于十月革命理想的人。

当我回忆起那面在秋天阴沉的天空中迎风飘扬的革命红旗时，我所想到的事情就是这些。十月革命来到我们工人镇的情景永远不会从我的记忆里消失。红旗高高升起，在一号高炉的烟囱上飘扬着。

* * *

在我青年时期，在时代的转折关头，社会生活极其复杂。那时第聂伯人的处境艰难：德国军队取代了反革命中央拉达的政权，跟着出现了彼得留拉，1919年1月红军骑兵把他赶出了卡缅斯科耶，但是半年后又来了白军，白军中还有马赫诺匪帮和格里戈里匪帮。残渣余孽

纷纷出笼，乌克兰“独立运动分子”、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无政府主义者都在各种集会上大放厥词。那些年，我们受到极其鲜明的直观政治教育，可以说，我们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在不断成长。

我想再次强调：我们的城市是工人城，多数居民都是工人，所以我们总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看作自己的事业，把布尔什维克党看作自己的党，把苏维埃政权看作自己的政权！也就是说，第聂伯工人不存在选择的问题，不存在跟谁走和拥护哪一方的问题。例如，我的父亲没有入过党，更确切地说，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但是他从革命初期就积极拥护布尔什维克，后来当我先加入共青团后又成了共产党员时，父亲和母亲都把它当作大喜事。

在革命后困难的头几年，国内战争的枪声刚刚停息，我们厂的铸造车间就用生铁铸造了一座堪称举世无双的纪念塔。今天它仍矗立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的一个极其壮丽的广场上。高柱上耸立着神话中的巨人普罗米修斯。他挣断了枷锁，手持火炬，那只多少世纪来一直撕啄着他的鹰已被打倒在他的脚旁。这个象征意义一清二楚，在我青年时代也是大家都懂得的。因为我们知道，沙皇这只双头鹰是怎样被打倒的，而熊熊燃烧的火炬却从来就是握在钢铁工人的手中。他们用钢铁谱写了一首颂歌，颂扬那位从天神那里盗取火种并把它永远献给人类的人。这座普罗米修斯纪念塔同时也就是献给工人阶级的纪念碑。

我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来到了。我十五岁时，

当上了工人。古典中学被改为卡缅斯克城第一劳动中学，我领到了毕业证书。应当去做工，应当负担家庭，于是我进厂当了司炉，后来改当钳工，这些工种我都很快地掌握了。工厂是我早就熟悉的。车间的轰鸣声也好，烧红的钢铁散发的气味也好，总之，这里的一切都合我的胃口。

朝思暮想的日子终于来了，这一天工厂的汽笛也在召唤着我。我就同父亲一起去上班，象大家一样地劳动。虽然肌肉酸痛，汗水迷眼，但我感到真正的幸福。接着而来的是一件使我高兴的事：回到家里，我脱下熏黑的棉袄时，母亲象往常对父亲那样，往我手上浇冷水，我把脸洗净。我记得，当我抬起头来时，发现母亲慈祥的眼里含着泪花。

“妈妈，您怎么啦？”

“我这是高兴呀，列尼亚，我真高兴呀。你也成了能养家的人了。”

以前我曾经说过，这里我还要再说一遍：我永远怀念同我一起在第聂伯工厂工作过的我的师傅和老同志。他们传给我第一门手艺，使我懂得复杂的人生之道，表现出劳动者的伟大力量和心灵美。

这样的大学令人永志不忘。

祖 国 之 情

(一)

我们大家对祖国都怀有十分强烈的感情。这是一种美好的感情啊！这种感情当然不光是从欣赏祖国锦绣河山中孕育起来的。正象俗语所说，必须扎根在大地之中；只有当人们在祖国大地上汗流浹背地劳动，种出粮食，兴建城市，开筑新路，或者挖掘战壕来保卫这块土地时，他们才会彻底领会祖国的含义。

我之所以讲这番话，是因为二十年代初期是我开始认识祖国的时候。我坐火车，趁内河轮船，有时也骑马，而更多的是步行，“路远迢迢”地走了几千公里。我最初是到父亲出生的老家去。我在库尔斯克的土地上体验到了农民的生活，参加了农业劳动。

我要讲一讲我的生活道路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骤然的转折。国内战争造成了破坏，同时伏尔加河流域又出现了可怕的旱灾。就在这1921年至1922年，乌克兰也同样遭到干旱和饥荒。整个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区，庄稼枯槁，每个工人一天只能领取半磅面包，而且也不是每天都领得到的。但是，只要炉膛有火光，烟囱在冒烟，工厂在开工，我们还不愁没有活干。后来，第聂伯钢铁厂被迫停

工，艰难的日子就来了。

车间寂静无声，到处一片荒芜。不怕干旱的杂草，沿着专用铁路线飞快地长起来。人们纷纷到邻近的村子去，把仅存的东西换些吃的。有人私自拿了厂里的扁铁，换给富裕农民做铁箍。我们家可不会这一套，也没有积攒起什么东西可拿去作交换。父亲和我非但不能再养家活口，反而成了吃闲饭的人。

卡缅斯科耶的生活失去了任何意义。当地开办了职业介绍所，但工作机会并不因此有所增加。疫病在流行，饥荒已临头，左邻右舍天天都有人死亡。城里人烟稀少，我们也只得离井别乡。记得临别时，我最后回顾了一眼向工厂告别，只见烟囱上、天桥上和车间屋顶上都有了黑色的乌鸦巢；天空鸦群盘旋，下面是这座死气沉沉的工厂。此情此景，使人愁肠欲断。

因此之故，回乡务农是不得已的。然而，年轻时代的我对这次意外的出行倒很高兴。我生平还是第一趟出门，况且我早就想到老家去，经受农业劳动的考验。我当时已经很好地懂得，粮食是国家之宝，农业劳动对人民非常重要，对国家是迫切需要的。所以在以后，当第聂伯工厂重新开工，父亲同母亲带了我的弟妹们回去的时候，尽管那时我非常想回到亲爱的车间去，但我认为自己应该留下来，于是我就在库尔斯克农村以及白俄罗斯和乌拉尔长期从事农业工作。

从那时起，我胸中出现了两种志趣，现在我想来讲一讲。我尊重农业劳动，这是由于自幼受到父母的熏陶，也是由于卡缅斯科耶及其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的镇是很

特殊的。虽说住在卡缅斯科耶的都是在工厂磨练过的真正无产者，但是这个工人镇仍保持半农村状态。无产者的心灵深处依然有着昔日农民的本色。父亲常常讲起自己怎样“尝到做农民的滋味”。过去那种生活有不少的辛酸，可是我看到，父亲谈起辽阔的田野，谈起耕地、割草、打场，以及收到亲手打出来的粮食时，总是隐隐流露出某种惆怅和眷念。所以，我们家中万分珍惜粮食也就绝非偶然了。我永远记得母亲每天在我们饭桌旁带着开玩笑口吻说的一句口头禅：“嗯，孩子们，你们都吃啦，现在快把面包屑都拣起来吃干净！”在人民中间产生这样的话，并非由于贫穷和吝啬。说这些话为的是教育孩子对粮食要抱着珍惜甚至虔诚的态度。

我认为，如果对宝中之宝的粮食不是抱着这种态度，那就造就不出优秀的、真正有道德的人来。现在，食堂、咖啡馆和面包铺都布置着画得很漂亮的标语，号召大家爱惜粮食。这当然是好的，但遗憾的是竟然还需要发出这种号召。节约的习惯理应从从小就培养起来，首先是在家里靠父母来培养。

在此不妨重提这样一件事：1918年，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B. Д. 邦契-勃鲁耶维奇问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当前的奋斗目标能用一个词表达出来吗？”列宁不加思索地马上回答：“粮食。”他在当年写道，为粮食而奋斗就是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现在我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时，我看到了农业劳动对于国家的巨大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在农村学到很多东西，也懂得了很多道理。后来，虽然我回到第聂伯罗捷尔

任斯克,进工厂当了冶金工程师,但岁月并没有使我同农业完全隔离。农村工作的经验同工厂的生活经验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在以后的整个生活道路上,我从事工业和农业工作几乎各占一半。两种志趣融成一体。我感谢命运,它赐予我农村生活和工厂生活的双重经历。

不过,我说到以后的事情上去了。当时,在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我熟悉了农村生活。我既耕过地,播过种,也收割过庄稼,对土地已非常依恋。后来,在1923年,我进了库尔斯克土地规划学校。我参加了入学考试,考得不错,得到了高额的国家助学金。

这所中等专业学校是一所老学校,有良好的教学基地和悠久的进步传统(顺便说一下,邦契-勃鲁耶维奇也在此学习过)。四年学习期间,我们在数理化方面的知识掌握得很扎实。专业课程(大地测量学、普通地质学、土壤学、地理学和农业统计学)是按照高等院校的要求来学的。我们读的列宁著作不是现在通行的多卷本,而是薄薄的小册子,还散发着油墨味。我们学习苏维埃建国史和苏联国家法,我在希格罗夫县一接触到实际工作就体会到,土地规划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十分需要这些知识。

我十七岁参加共青团,从此以后,我觉得自己必须参加一切社会工作。应该说,这类工作并不少。我们参加红色星期六义务劳动,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和帮助流浪儿童的运动,开办农村阅览室,出版墙报,演出节目,举行村会,向雇农解释他们应享的权利。总之,我们样样都

管，什么都干得来。

(二)

当时我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时间不仅有长短，而且有虚实。一个人可以因循苟且，虚掷光阴，也可以抓紧时间并加以充分利用。懂得这点，你就会发现，有许多事情是可以挤出时间来做的。

我们住在赫尔松大街的一座集体宿舍里，有时得忍饥挨冻。我们有啥穿啥：上身是缎纹斜领衫，有头戴油腻的工人鸭舌帽的、平顶羊皮帽的、布琼尼式军帽的。领结当时自然是不打的。可是，二十年代的共青团员们却生活得自得其乐。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憧憬全人类光明的未来，议论纷纷，争论不休，谈恋爱，朗诵诗歌，也自己作诗。

我们并不以精通诗律自居，可是我们把诗歌的现实性和政治性置于首位。我们也有自己共青团员诗人。

有一次我乘火车，车厢里有一位年龄和我相仿的姑娘，也是大学生。在闲谈之际姑娘拿出一本练习本，里面抄了一些诗，正如现在人们常在纪念册里抄诗一样。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其中有这样一首我从未见过的诗：《悼念沃罗夫斯基》。我们当时正在对我国这位大使的遇害感到非常悲痛^①。诗句激动了我，我立即把它背了下来，从

^① 沃罗夫斯基(1871—1923年)是苏联政治家，文学评论家，十月革命后任苏俄驻瑞典、挪威、丹麦和意大利等国全权代表。1923年5月在瑞士洛桑被白匪分子杀害。——译者

第一行“这事件发生在洛桑……”直到最后的这一节：

清晨，在“阿斯托利亚”旅馆里，

我们的大使惨遭凶杀。

在伟大俄罗斯的史册中

又增添了一位烈士的英名。

我记得马雅可夫斯基有一次来到库尔斯克。我们这些共青团员自然都涌到马雅可夫斯基举行晚会的铁路俱乐部去了。一伙衣冠楚楚的听众想使诗人下不了台。大厅里有人喊道：“您自称为集体主义者，可为什么您老是写‘我、我、我’？”马雅可夫斯基不假思索地答道：“依你们说，那么沙皇是集体主义者罗？他不是总是写：‘我们，尼古拉二世’吗①？”场内响起了一阵喧吵声、大笑声和掌声。还有一段插曲。一对青年男女从最后一排站起身来，大概觉得出去幽会比听马雅可夫斯基朗诵更带劲。正当他们沿着最后一排慢慢地挤出去时，台上响起了诗人洪亮的嗓音。马雅可夫斯基伸手指向他们说：“同志们！请注意那超群出众的一对儿②。”于是，又爆发出一阵笑声和掌声。

诗人朗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长诗中的片段。大家屏住呼吸静静听着。我们不久前刚追悼过列宁的逝世。全民的悲痛也是我们大家最深切的悲痛。

乌里扬诺夫的一生

十分短暂，

① 旧俄沙皇在文告中总自称“我们”，类似我国封建时代皇帝自称“朕”。——译者

② “超群出众”在俄语的字面意思是“从行列中走出的”，在文中为双关语。——译者

一直到最后一瞬

我们都很清楚。

可是

列宁同志的

悠久的历史

必须重新描写，

从头叙述。

这些诗句以不寻常的力量回荡着。诗人平稳地朗诵着，仿佛是沉思中的自白，他浑厚的嗓音传到了最后一排。他真的使我们最崇高的概念“重新闪闪发光”。

党和列宁

是一对

双生弟兄。

在历史母亲的眼中

哪一个

更为贵重？

我们说

“列宁”，

指的就是

党；

我们说

“党”，

指的就是

列宁。

铿锵的诗句感人肺腑，令人铭记难忘。

在晚会上，马雅可夫斯基还朗诵了《献给挖出第一批

铁矿砂的库尔斯克工人……」。这首诗勾起我对工厂、对高炉和平炉的怀念。回去的念头油然而生。但是，就在1927年这一年我毕业了，当上了土地规划员，到库尔斯克州的一个县里工作。下一年的春耕季节，我是在白俄罗斯的奥尔沙近郊度过的；后来接到新的任命，调往乌拉尔，先到米哈伊洛夫区工作，后来到了比谢尔季区。这次我不是单身，而是和我的妻子同行。我们是在一次共青团晚会上认识的。她也是在同我自己家一样的工人家庭中长大的，也是为了上学而从别尔哥罗德来到库尔斯克的。从此以后，维克托利娅·彼得罗夫娜不仅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们的母亲，而且一直是我的真正亲密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们在乌拉尔呆了很久。我在乌拉尔走过很多地方，干了很多工作，也永远爱上这个地方，这里的人和壮丽的大自然。

那是一个复杂的时期，根深蒂固的旧生活方式已经崩溃，而新事物的萌芽还刚刚破土而出，必须坚决地去发现它们，爱护和扶植它们。1927年12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进一步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代表大会为实现列宁的合作化计划，采取了农业集体化方针，苏联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正在农村实现极其深刻的社会改造，使农业走上社会主义轨道。1927年至1931年这四年，我正好在农村致力于建立集体农庄的工作，置身于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村社会革命之中。

以前，于我这一行的常常被叫做土地丈量员。现在不这样称呼了，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土地规划员。人们

在建立农业劳动组合时，把土地、牲口、生产用房和工具都加入进来。我们土地规划员不是单纯地消除地界，把个体农户的零星土地在图纸上简单地联成一片集体土地。在绘制规划图时，必须从社会主义大农场的利益出发，考虑到它们在今后一切大田工作中将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和实现大规模机械化；必须在社会的、科学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新基础上从事规划。

我们绘制了一批新图——有组织地、科学地利用集体农庄土地的第一批规划图。我们绘制的图为集体农庄长期采用，卫国战争结束后农艺师们仍旧利用它们。建立第一批集体农庄的土地规划经验，对我后来在北哈萨克垦荒地区组织数百个新国营农场的工作大有裨益。

在从事土地规划工作期间，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成了苏维埃政权的全权代表。水平仪和标尺怎么摆法，定线从何处通过，在同富农冲突中表现怎样，农民就是根据这些来判断党的政策。就在这垌头地旁，人们看到苏维埃政权支持谁和反对谁。

比谢尔季铁路工人送给农民第一台拖拉机的事，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一台马力不大的“福特逊”牌小型拖拉机，但它令人欣喜若狂的程度，比起第一颗人造卫星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单纯是开到田头翻耕土地的机器，这是对农村实行社会改造的工具，是推行集体农庄制度的宣传员和鼓动员。地方上的富农及其应声虫散布流言蜚语，说“铁马”压过的地长不出庄稼。但是，后来庄稼长得格外好。于是，他们在夜间放火烧粮仓。幸亏比谢尔季的农庄庄员发扬大无畏精神，粮食才保住。

这一切并不是发生在银幕上或书本里，而是发生在实际生活中。我同其他共青团员一起，在田头同富农斗争过，在村会上同他们争论过。我们受到过他们的种种威胁：棍棒、干草叉、恐吓信，以及向窗户投掷石块。有一次，我们从报上获悉，富农在邻近的秋明州干下了卑鄙的罪恶勾当（这是大规模集体化时期第一批震动全国的罪行之一）。一天夜间，富农伺机暗害睡在驾驶室里的拖拉机手彼得·季雅科夫，他们浇上汽油放起火来。我们对这位素不相识、但顿时感到非常亲切的战友和同志的不幸遇害深为悲痛。因而，我们向可恶的富农发动了更坚决、更勇猛的攻击。

一首颂扬那位拖拉机手的歌曲很快流行起来了。这首歌我们都挺喜爱，总是唱个没完，而且常常站着唱，以悼念那位献身于集体化事业的英雄。

不论是坎坷小路，还是康庄大道，
我们都和你走在一起。
彼得鲁沙，带我们坐上拖拉机，
一直把我们送到村边的地里！

这首歌总的说来是柔和、抒情而且亲切的，但是最后一段我们就唱得威势凛然，把歌词也和自己联系起来：

凶恶的敌人，在猖狂吠，
对我们的收成又恨又气……
富农要来算计你，
共青团员兄弟，你可不要麻痹大意！

过了三十来年以后，我方才知道，彼得·季雅科夫居然奇迹般地活着，而且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他都在打仗。总

之，他确实是一位歌谣中的英雄。

而当时的1929年是作为规模宏大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战线上实行大转变的一年而载入史册的。那时除了发展作为国民经济主导部门的大工业以外，在国内还同时开始创建机械化的大农业。

不久之前，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会的同志捎给我几份当年的文件。

现摘录1929年12月5日联共(布)比谢尔季区委会全体会议发言记录中的一段：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制定的开展春播运动计划遇到极大困难。我们没有所需的农具，因此，赶紧运送农具来是个十分迫切的问题。鉴于某些村苏维埃决定向多区轮作制过渡，我们将会减少春播和秋播作物的播种面积。由于进行了土地规划工作，较好的土地已分给贫农和中农，所以，我们应当尽力使这些土地都得到播种。无疑，富农会在这方面进行破坏。因此，提供给贫农和中农的一切有利条件都应当充分加以利用。应当特别重视的是，要向组织起来的贫农小组发放贷款。我认为集体化工作缺乏计划是工作中的重大缺点，而各个村苏维埃又不去有计划地进行这项工作。派出去的领导人没有重视农村集体化中的问题……”

这一文件反映了当时这个不安定和相当艰难时期的真实情况。农村工作需要全力以赴。我不惜自己的精力。我认为自己当选为比谢尔季区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是大家对我的信任。接着，我受命主管区土地局的工作，后来又被选为区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1年初，

我接到新的任命，派我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担任乌拉尔专区土地管理局副局长。我和妻子就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但是不久以后，我决定返回原厂当钳工，同时进大学学习。

(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这些年来，我一直从亲人的来信和报纸的报道中注意我们厂发生的变化。第聂伯厂的工人要求工厂复工，他们的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得到当时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捷尔任斯基的接见和帮助。1925年，报上发表了捷尔任斯基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我要说的是，从前在南方有几座巨大的钢铁厂，其中有一座每年能提供二千多万普特的产品。这个大型厂，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第聂伯工厂，从昨天（4月28日）两点钟起开工了，厂里的第一座高炉已经投产。”

这些消息当然使我激动，使我怅惘，因为我们的工厂在壮大成长，这是我所不能忘怀的，何况在这里的乌拉尔，在田野和草原的气息中也处处混合着我熟悉的工业气息。无论走到哪里，都可见到林立的烟囱和滚滚的黑烟。比谢尔季及其近郊，有杰米多夫开设的一些老厂——下谢尔盖耶夫斯基工厂、米哈伊洛夫斯基工厂和列夫坚斯基工厂。至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那就更不用说了：当时正在这里进行规模空前的建设，兴建“工厂的工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

我在盘算：集体化事业已取得不可逆转的进展（截止1931年6月，全国加入集体农庄的个体农户已超过半数），而工业则羽毛未丰。今天，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前沿阵地是在工业战线。没有工业，没有电力，没有广泛的机器和拖拉机站网，就不能掀起农业发展的高潮。国家需要钢铁：南方的工厂提供了三分之二的生铁，而其中规模最大的要算以捷尔任斯基的名字命名的第聂伯工厂：因此我的岗位应该是在那里。

我就是这样返回工厂的。重新穿上工作服，上班劳动，自然遇到困难，而且晚上还要上大学学习，但我有充沛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

1931年，我在第聂伯工厂入党了。我记得，这是10月24日。我口袋里的预备党员证换成了第1713187号党证。我知道，党证并不给我特殊待遇：而是要我承担新的繁重的义务。但是我想，如果有人问我们共产党员是否想选择其他的道路，我们每个党员会坚决地回答：不。因为我们的道路，就是忘我地为人民、为党服务的道路。

我的时间更紧了。车间在改建。领导改建工作的是我厂总工程师 И.И. 巴尔金（他以后成了院士）。车间要安装新机组，实行机械化。总之，忙得不可开交。学院里的生活也很紧张而有意思。我们当时全都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我还先后当选为系的党小组长、工会委员会主席和学院党委会书记。这是同志们对我的莫大信任。当然，信任是令人高兴的，而且就性格来说，我又是个喜欢生活在群众里的人，喜欢完全献身于事业的人。

在三十年代，干部的学习、教育和思想锻炼，首先是

科技知识分子的学习、教育和思想锻炼，是一项特别迫切的任务。因此我认为，1933年交给我的工作责任十分重大的。当时，我这个三年级大学生先后被委任为工农速中的领导人和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冶金学校校长。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力求为同志们多做些事。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一本命令簿。每当我翻阅这些过去的命令时，我不禁微笑起来。现在看来这些命令可能显得有点幼稚，但在当时却是作为政策来执行的。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争取每一个学生，说服厂里的年轻人参加学习，竭力用工会的贷款资助他们或在我们食堂给他们供应营养菜。有一次，我们城里来了位著名的冶金学家、高炉炼铁法理论的创始人米·阿·巴甫洛夫院士。我邀请他来向工农速成中学学生作报告。看到我的同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院士的报告，这时我真感到莫大的快慰。后来，这些年轻人中出了一批优秀的生产指挥员，他们不同于旧“专家”，而是一批实干家、革命家和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人。

我虽然担任了中等专业学校的工作、党的工作和社会工作，但没有中断过学习。我不但不放松自己，反而加倍努力地完成课程设计图，参加考试。处子我的地位，必须以身作则——如果自己学习马虎，那还能要求别人勤奋学习和取得优秀成绩吗？我再摘录一段文件，是1935年1月28日国家评定委员会会议记录中的一段：

“本委员会听取了热动力系五年级学生列·伊·勃列日涅夫对所作《捷尔任斯基工厂的高炉瓦斯静电净化设计》毕业设计的答辩。教研室对该毕业设计的评分为：

理论部分——优，设计部分——优。

毕业设计作者对解决瓦斯净化问题考虑周密，设计中的计算正确，说明他具有优异的工程师素养。

勃列日涅夫同志对所有问题都作出详尽的回答。

兹决定：毕业设计成绩优秀，授予勃列日涅夫同志热动力工程师职称。”

关于我担任动力车间领班这桩新工作，我只扼要地谈谈。这是工作极为紧张的一年，我们探索最理想的生产制度，不断争论，组织突击岗，制定应战计划，挑灯夜战，经常动员全体人员投入紧急任务。

这一年里又发生新的巨大变化：我被征召参加红军。

一天早晨，我随带征召通知书来到军事委员会，遇见我们不久前的同学阿尔卡季·库岑科。原来，根据教育程度我们俩都被派往赤塔，进坦克学校（当时称为外贝加尔装甲坦克学院）。我又要再次告别工厂，告别亲友，奔赴遥远的边疆。

“你想当军人吗？”库岑科问道。

“怎么说好呢，”我回答说，“这一行在我们一生中说不定哪一天会派上大用场……”

(四)

我们的军用列车向东开了四十个昼夜。路过莫斯科时，我本想到红场瞻仰一下克里姆林宫和列宁墓，可是这一愿望只是在以后的归途中才实现。

当某一段生活过去时，人们往往会感到忧伤，同时也

会感到欣喜，因为我们面临一种新的、还不熟悉的生活，正如诗人们说的，别有新天地。

大概我的天性就是如此：凡是我工作过的地方，至今我都十分留恋，把它们当作自己的故乡。我既喜爱那一座座象浅绿色孤岛似地沉浸在麦浪中的乌克兰村落，又喜爱那虽不鲜艳夺目却令人心旷神怡的优美的白俄罗斯景色，以及摩尔达维亚花园中盛开的百花，还喜爱哈萨克一望无垠的草原，尤其是当春到人间，郁金香和罌粟花宛似毛茸茸的厚毯覆盖草原的时候……在这四十个昼夜里，整个祖国在我眼前掠过。我不禁为祖国的幅员广袤而赞叹不已。

我们所到达的军营离赤塔不远，靠近佩夏卡车站。在黄土地上是一长排一长排低矮的灰色棚屋，这还是当年日本人修建起来的。兵营中央是练兵场，四周是重重叠叠的荒野山岩。记得有一头没精打采的骆驼，驮着两个大水桶。这里的水是从别处运来的。每次洗澡（洗澡对战士来说是第一件大事），每人定量供水两小木盆。

我们领到了军服，被分配到各个连队。我分在坦克营第一连。服役就此开始了。

“起床！迅速集合！”

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我们都是赤膊跑出来上操，然后排队去吃早饭，饭后学习军事条令，进行长时间的队列训练以及听那位要求特别严格的法利列耶夫班长的训话：

“这里不是大学。你们在这里要动脑筋。立——正！”

我们操练步伐时唱着歌（当时爱唱的歌曲是《敌人想

进攻我们»),打着口哨,唱得挺有精神,用力踏着脚步走。我很快习惯了这种生活。

不久前,我视察西伯利亚和远东时,到过佩夏卡。虽然今天这里仍有教导队驻扎,但村上已面目一新了。这里设立了部队荣誉陈列馆,我看到馆内陈列着我当年戴着坦克帽的相片。战士们珍爱地收集各种照片、伟大卫国战争的资料以及“小地人”的文献。后来,年轻的战士邀请我们参观他们的住所。这也全然不是我们当年服役时的营棚了。这是现代化的营房,光线明亮的窗户,铺得整整齐齐的床铺,擦得干干净净的地板。而当年,营房不敷需要,坦克都停放在堑壕里,只盖上帆布。

当时我们主要是搞军训。部队一贯重视体育:练单杠,打排球,冬天进行滑雪行军。我记得我有时还要单独作长距离滑雪,走三十至四十公里到铁路会让站去给指挥部送报告。

部队里常常对我们说,坦克兵也应该象步兵那样善于急行军。我们背上背包,系紧鞋带,接着就是口令“前进!”急行军的路程很远。开始时,既有擦伤脚的,也有不会裹包脚布的,什么事都有过。有一年春天,在急行军时,当地山间的一条小河泛滥了。这时我们已在返营途中,一边走一边唱,一切仿佛都很顺当。突然,一条河挡住去路。这时传来指挥员的声音:“干吗站住了?”我们都默不作声,心里在想:明摆着的事,有水过不去嘛,何况寒风凛冽。在那些地区,早春天气从来不是暖洋洋的。我们看到指挥员脱下军便服,裹住自己的武器,然后举到头顶上,下令说:“跟我走!”河水冰冷刺骨,我们过了河,冻得

牙齿直打颤。这时又传来新的命令：“跑步前进！”没什么，也挺过来了。

我们就这样地培养着意志，锻炼着性格——苏联士兵的性格，以后就开始学习极其有趣的科目：战术学，武器装备研究，坦克驾驶。我们要学会驾驶“T-26”和“BT-4”中型坦克，现在来看这类坦克当然是很差的。但是，当时我们都认为是威力强大的武器。我们学习就地射击和在行进中射击活动目标。我们的射击成绩被营长科普佐夫评为优秀，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这位严格的指挥员是位真诚可爱的人，我至今回忆起他，仍然极为愉快。我不能说，我同他成了朋友（他是指挥员，我是学员），但是营长待我很好，我对他也很尊重。一到晚上，我们经常谈论军队中的服役以及可能爆发的战争。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科普佐夫后来参加哈勒欣河战役，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到卫国战争时已是将军，后来在前线英勇牺牲。他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位军官干部，人们通常称这样的军官为部队的骨干。就性格而言，他是沉默寡言、意志坚强、举止庄重、精力充沛的人。他不但是我的老师，也是一位堪为楷模的指挥员，他献身于培养苏联军人的事业，使他们在任何时刻都能挺身而出捍卫我们伟大的祖国。

我记得这样一件事。我们的驻地离奇金卡河不远。我们喜欢到河边去。河水清澈，许多地方一望见底。有一次，科普佐夫说：

“你们在这里的都是工程师。请你们解答一道题目。你们会驾驶坦克开过平原，翻越障碍，攀登山岗斜

坡，可是你们有没有考虑到，怎样才能驾驶坦克过这条河呢？”

经他这么一说，我们真的研究起这个问题来了。大家开始思考推算，怎样才能办到。最后，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这件事说明什么？是进行某种勇敢精神的教育吗？不，营长的命令我们是这样理解的：他要我们准备去应付各种复杂情况，应付那种不是在训练中而是在实际战斗的漩涡中坦克驾驶员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在这种场合，必须解决比在打靶场和练兵场上更复杂的任务。这就是科普佐夫训练我们的目的。许多人都因此而感激他。我们这个营培养出来的坦克兵，在卫国战争中个个都表现为训练有素的指挥员。在此不禁想起苏沃洛夫的话：“训练能吃苦，打仗方轻松。”当然，打仗也从来不是轻松的。

我在佩夏卡是第一批被任命为排长的。这次任命对我来说是一种光荣，我把它看作是指挥部对我的信任。

后来我担任坦克连的政治指导员。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我既要管军事勤务，要出版战报，又要抓政治学习和教育工作，还要同战士谈话。人总归是人，各人都有各人的心事和悲欢。而我不论多忙，总要抽空给家里写封信，我还给家里寄去过一张照片。有一天我站在台阶上，科普佐夫走了过来，有人咔嚓一声照了相。这样就有了一张相片，我决定把它寄回家。我是这样想的：做父母的不仅总是喜欢收到信，而且也喜欢瞧瞧自己儿子的模样。

(五)

在许多年过去之后的现在，我特别清楚地意识到：我到过许多地方，担任过许多职务，见过许多人，做过许多工作；这些经历对我的好处是多么大。

当然，我在进行毕业设计答辩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以后会从事扎波罗热炼钢厂的恢复工作，会去领导州的乃至全国的国防工业；我在担任土地规划员的时候，并没有预见到会和同志们一起去改造数百万公顷的生荒地；我在接受军事训练的时候，也没有完全料到它会在一场极其残酷的战争中发挥如此大的作用。我同样也不知道，如果同群众经常保持联系，那么所有这一切就会变成经验、技能和知识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可以用两个简单的词来称呼，叫做“党的工作”。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开始懂得，我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得到了真正的培养，而且完全有意识地被培养出来担负日后的重任。而进行这一培养工作的就是共产党。

复员后不久，我被选为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当时的主席是阿法纳西·伊里奇·特罗菲莫夫，他是位老党员，当过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参加过十月革命，最初是我们捷尔任斯基厂的工人。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他对我具有工程师学历非常高兴，立即推荐我在执行委员会抓建设和市政方面的工作。

我必须深入钻研苏维埃工作，这是一项头绪纷繁、全面向人民需要的工作。这工作我倒不陌生，早在比谢

尔季区就接触过，但毕竟有许多事情需要重新了解。1960年我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时，这方面的经验曾经对我很有帮助。今天我除了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外，党和人民又再次把这一具有崇高荣誉，但要孜孜不倦工作的重要岗位托付给我，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经验对我也很有帮助。

我根据以往的经验，一开始就致力于草拟和通过扩大代表权利的法律，提出加强地方苏维埃作用、提高地方苏维埃威望的问题，以及改进整个国家机器工作的问题。

我亲眼目睹卡姆斯科耶变成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这座现代化的城市，因而我总是怀着感激之情回忆自己在卡姆斯科耶的工作。那段时间是极有意义的。正是在那时，我们为帕帕宁四人小组征服北极而鼓掌叫好，屏息注视着契卡洛夫越过北极的飞行，为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库兹涅茨克联合工厂和其他新建工程传来的每个捷报而兴高采烈。这些年里，第聂伯工厂也在继续发展；我曾目睹第八号高炉点火，烧结厂和第三平炉车间开工。我们的炼钢工雅科夫·柴科夫斯基创造的斯达汉诺夫记录轰动了全苏。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号召全国炼钢工人学习他的经验。

城市随同这个工厂，说得更确切些，随同我们这里兴建起来的这批工厂，一道发展起来。特里图兹诺耶村和罗曼科沃村都划归了市区。各种问题也不断产生：学校、诊疗所、幼儿园不够，住房困难，上下水道和交通工具要更新。我在执行委员会里就是干这些事。要学会同那些

力图在自己企业内部修建“庄园”的经理们辩论，克服本位主义思想情绪，集中使用人力和财力。我至今仍记得我们取得的初步成就，虽说这些成就微不足道，但都是和人们切身相关的。

我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争取到一笔拨款。于是我们开辟了一条从巴格列伊到列宁广场的无轨电车路线。当一辆辆红色电车穿过全城时，沿途一片欢腾。我记得，至今仍为少先宫所在地的那座漂亮的大楼怎样在六十二天里平地而起；共青团员们怎样建造体育场；市内又怎样出现一幢幢有阳台和大玻璃窗的四层“高楼”。虽然建设规模远远不如今天，但是成百户人家搬进了新居，欢庆乔迁之喜。城里铺起马路，修建街心花园，店里商品增多了，人们对穿戴讲究起来了，生活有了改善——这就是我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的这段工作经历值得纪念之处。

我在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苏维埃工作了一年多，以后被选拔从事党的工作，先是负责乌克兰共产党(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宣传部的工作，1939年2月被选为主管宣传工作的书记。关于州委会——全州党组织的司令部的复杂而多方面的工作，我已在《复兴》一文中详细叙述过。当时我们州的第一书记是谢苗·鲍里索维奇·扎季奥琴科。他是位经验丰富、聪明能干的人，从他身上可以学到许多东西。我们之间形成了合作无间的关系。我当时负责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部门——思想方面的工作。我的职责范围大大加宽了，工作规模扩大了。这时我必须经常到城乡各地去，接触成百成千的人。

我认为我经历的一番锻炼是非常重要的。众所周知，党的领导有三个主要方面——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很难说其中哪个方面更为重要，因为这三者都是党所必需的，都是同样重要的。善于把党的各方面的活动结合起来，这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需要学一辈子。

思想工作过去和现在始终都是共产党的头等任务之一。这一工作是多方面的：它要求对社会中发生的各种进程作出科学分析，并且要经常解决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

如果忽视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思想因素，容忍思想错误，哪怕是一时一刻，哪怕是某些方面的疏忽，都是危险的。乍看起来，思想错误不象技术错误之类那么容易看出。如果某个机组设计得不对，那就不能达到预期的设计能力或者根本无法运转——这是马上可以看到的，遭受的损失一算就知道。可是，思想错误往往是隐蔽的，是被美丽辞藻的外衣伪装起来的，这就成为一种隐患，如果不及时纠正，它一定会发作出来，造成莫大的危害。当今世界上并无真空之处：凡是感到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方，我们的思想大敌就会在那里活动起来。弗·伊·列宁教导说：“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①

这一点我在上述年代里感受特别深刻：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在西方爆发，战争正在逼近我国边境，两种制度的

^① 列宁：《怎么办？》，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2页。

政治思想搏斗已达到了白热化，成为公开的军事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以及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进行积极的进攻性的宣传工作，及时打击敌对的思想体系，提高苏联人民的政治觉悟，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及忠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精神来教育苏联人民。

每个领导人、每个共产党员对这一切都应当关心；此外，更不用说也要关心那些看起来挺简单，但要经常花费精力去完成的任务，这就是向人民说明我们自己所面临的目标，解释我党中央委员会在现阶段的具体任务。换句话说，必须向不同的听众讲话，同群众见面。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时候，我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任务。关于这方面，早在那些年代在我的头脑里就开始形成一些想法，现在我想谈一谈。

党的满腔热情的宣传一向是党的锐利武器，对此必须抱着十分认真的态度。

苏联人拥护和支持党的政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贯重视思想工作。这一工作的主要武器是讲真话。不论是成绩还是缺点，我们认为都必须老老实实地讲。开诚布公的谈话，人们总是能够理解的。列宁曾经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

再没有比无的放矢、不联系听众实际、不顾当前需要的宣传更加徒劳无益的了。做报告的人如果对尖锐的问题避而不谈，他就不能博得人们的信任。如果他在讲台上说话不知所云，内容千篇一律，那么效果就等于零。不仅如此，这种宣讲员会使人干脆不愿再听报告。宣传中切

忌形式主义，务必采取创造性态度。我想强调指出，成功的关键不在于资产阶级政治家擅长的那套圆滑的讲演手法，不在于故作姿态的慷慨陈词，也不在于大叫大嚷。众所周知，列宁并没有宏亮的嗓子，可是大家都听到他的演讲。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他的演讲。人们之所以听到，是因为要听；而人们之所以要听，是因为他的讲话中有群众感到亲切的主张和思想，为了论证这些思想，列宁运用无可反驳的论据，他说话逻辑严密，而且总是作出科学的大胆的结论，提出十分具体而意义重大的任务。

回想起来：战前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工作的年代是一段极为繁忙的时期。从表面上看是一片升平景象：电影院上映着《伏尔加—伏尔加》和《光明之路》等喜剧片，城市和乡村仍然按照通常的劳动节奏生活，庄稼在地里成熟。但是，我们大家都感觉到，战争的威胁在增长。1940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会接到联共（布）中央交给的一项重要任务——把州里的一部分企业改为生产军事装备。莫斯科来了密电，要我们设立主管国防工业的州委书记职位。扎季奥琴科召开了常委会会议。他说，鉴于这一工作的特殊重要性以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重视，提拔到这一岗位上的人不仅应是受过技术训练、熟悉冶金专业的专家，而且应是善于做人的工作的精明能干的组织家。他大致说了这番话后，提名我为候选人。大家一致投票赞成。

我们是否考虑到战争的现实危险并对此有所准备呢？我们当然是考虑到了，并作了准备。战争威胁在增长，法西斯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对此是毫不怀疑的。

国家急需钢铁。1940年6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完成钢铁和轧材生产预定计划的措施》的决议。冶金工作者为充分使用机组设备展开了全苏竞赛，我的同乡在这次竞赛中取得了显著成绩。过去完全制造民用产品的企业，现在开始进行军工生产：阿尔乔姆工厂制造战斗机零件，共产国际工厂制造迫击炮，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钢铁厂制造炮弹……

一份份令人高兴的汇报送到州委会里我的办公桌上。虽然我已负责数百个企业的工作，但是说实在，我在收到自己厂的消息时感到分外亲切。1941年，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基工厂荣获苏联优秀钢铁厂的称号，获得了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和冶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共同颁发的流动红旗。

* * *

我们每个人对祖国的感情是从童年记事的时候产生的，它开始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街巷和故乡。同时，我们心中也有着幅员辽阔的伟大祖国的鲜明形象。一旦面临危险和巨大考验的时刻，整个祖国无分东西南北顿时同我们血肉相联、息息相关。

我有机会亲眼看到祖国广袤的幅员，亲自结识许许多多的同胞。因而我知道，我国人民的计划、理想和愿望是同我们荣幸地生活于其上的这块大地相称的。这块大地是我们从父辈手中接过来的，我们应该把它建设得更加富饶和繁荣而留给孩子们。

这一点，我们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证实了。但是，后来一个苦难深重但又充满崇高信念和空前

的英雄主义的时期在我国人民的生活中来临了。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了。我们不得不奋起捍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维护我们所创建的一切，挺起胸膛保卫我们亲爱的国土。我同千百万苏联官兵一起，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直到光辉的胜利日，从头到尾经历了艰难困苦的战斗历程。

但是，关于这个时期的叙述已是属于另一个篇章了。